



梁振英無誠信和施政不當，必須下台

胡錦濤習近平主政都需要維穩

日本邁向核武裝的危險立法

曼德爾和關於官僚體制的馬克思主義理論

共產國際與格柏烏---

5 月 24 日的行刺企圖和墨西哥共產黨

梁振英無誠信和施政不當，必須下台

振言

梁振英的山頂大宅至少有6處的違例僭建，經傳媒首先而且不斷揭露，至今已將近半年，這期間，梁振英遮遮掩掩，以謊話掩蓋另一個謊話，被港人公開而普遍地稱為「大話精」！在競選香港特首時，他曾公開指責對手唐英年「呃（騙）人」，隱瞞僭建，涉及誠信問題，彷彿他自己在僭建問題上是清白無瑕似的。他自己的僭建，卻隱而不發一年。難怪自由黨的立法會議員田北俊也批評他「說得難聽些，是呃（騙）了特首來做」。

梁振英有關他山頂物業的聲明，和被迫於本月11日到立法會只90分鐘短短的答問會，都表現出他沒有真誠坦白認錯，不願接受應有的懲罰。他最多只承認有「疏忽」，卻沒有認為是錯誤。

《明報》在他發表《聲明》的次日即指出，發表的聲明，他只說「交代不清，引起公眾誤解」，「我承認有疏忽的地方，在處理整件事有欠謹慎」，「並無任何隱瞞的意圖」，如此而已，整篇聲明，要求公眾相信他的誠信無問題，但是此事困擾了市民和社會約5個月，這期間他連致歉也欠奉。這樣看來，梁振英的檢討和反省，仍然不夠誠實，這是值得責備之處。

這與他所標榜的「開誠布公」的態度迥異，言不符實，且反而指是外界對他的「誤解和疑慮」。

梁振英出席立法會答問大會交代僭建問題，本來期望就此平息事件，開場發言時他亦兩度承認疏忽及交代不清，並且三度道歉，強調自己無隱瞞；不過，梁振英其後忍不住強硬反駁議員，表示「記憶中，我無講過話我無僭建」，雖有建制派議員力勸他收回這番言論，表示言論會令人感覺「不服輸、不忿氣」，惟遭梁拒絕，結果撲火不成，反而火上加油，泛民政黨積極佈署狙擊梁振

英的行動。

港府長期推行高地價、高租值、停建公屋和居屋等政策，一方面幫助大地產商從中大獲利益，另一方面又刺激樓價和租金日益飆升，致使估計有近30萬市民被迫要蝸居窄小的「劏房」，甚至要付出高昂租金，即使許多人領有租金津貼，也不夠交租。與此同時，新上任的當局對新界居民要雷厲風行地取締「僭建」，而特首自己及其眾多的問責高官和行政會議成員則不斷被揭露本身不正，在他們擁有的豪華大宅擴充「僭建」！這種做法正有如古語所說的：「只許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

除了新特首企圖享「僭建」的特權及由此引爆的缺乏誠信問題外，更重要得多的是他的政策措施不當，又挑選及委任本身有缺點的高官負責推行。現舉些事例如下：

前發展局局長麥齊光上任後被揭發長期騙取租金津貼，被廉署拘捕調查，以致上任12日即被迫下台。新獲邀擔任行政會議成員的林奮強，在政府推出壓抑樓價措施之前夕便搶先沽出兩個有劏房的物業，引起公眾對他的廉潔的質疑。

跟着是指令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推出被公認為「洗腦」的國民教育課程。這措施立即激發中小學學生、教師和社會團體的堅決反對，成為香港教育文化界少見的鬥爭里程碑，也爭取到當局讓步的一點成果，例如撤回指引。

他派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推出長者生活津貼措施，卻定下嚴厲的條件，如申請的長者資產不能超過19.2萬元限額，須先作資產審查，「理由」是為了節省開支，儘管港府有巨額的財政盈餘。這個苛刻措施引起立法會許多議員反對，要求當局取消資產審查苛刻限制，但當局堅決寸步不讓，以致

部份泛民主派議員在財委會申請撥款時「拉布」，以圖使當局改變。但最後，在突襲而使立法會多數支持下獲得通過。

繼前律政司司長，現為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的梁愛詩多次炮轟香港司法制度和法官、踐踏香港司法制度之後，現任的律政司司長袁國強雖曾信誓旦旦地聲言雙非問題由香港內部解決，釋法是最後手段，但在外傭爭取居港權上訴之際，突然建議終審法院提請人大釋法，藉此禁止外傭及雙非擁有居港權。這就使中央的釋法凌駕在香港終審庭之上，將會由偏離而至摧毀香港的法治，干擾了獨立的司法權，違反《基本法》授權香港法院在自治範圍內執法的條款。如果讓這種偏離事例一開，就會陸續有政府不依《基本法》有關的條文，藉口公共利益而任意提請人大釋法。香港大律師公會對此建議也認為可能干擾司法獨立，需嚴防及慎重處理，對此特發表聲明，「深信終審法院不會因為政治上的權宜，或受某一方政權或政客施壓而接受一些於法不合的論據。」

梁振英挑選和委任的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邵善波，被港報報道他有「左王」之稱，上任不久即直認，中策組不但是政府的政治工具，而且指「政府有必要加強監察網上輿論，且要參與輿論戰，不能捱打。」

對邵善波有關網上民意這種強硬態度，港大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助理教授傅景華指出：香港特首在2008年的《施政報告》中曾提出「主動吸納互聯網上的民意」；但邵善波現在卻如此宣稱，即是將民意放在政府對立面，其「視民意如敵人」的做法是錯誤的。（詳見11月9日《明報》）

從上述梁振英在上任將近半年的實際表現、其欠缺誠信，其採行的許多政策措施，其對一些司局長及行會成員等的選擇和委任的不當等等，綜合起來看，他實在是不夠條件擔任香港行政首長，必須立即下台以謝港人的，香港必須立即實行民主普選行政

長官以替代他。由於這許多缺點、錯誤、不當等等帶來原可避免的社會紛爭（如反國教行動等）、立法會反對長者生活津貼的苛刻限制條款而影响了立法與行政之間的關係，加劇了香港社會的不和諧及紛爭，與香港應該走向和諧的要求背道而馳，又會在客觀上助長一些人「去中國化」的不正確傾向。

由於梁振英的許多令港人不滿、反感的表現，驅使民主黨在立法會會議上提出對梁振英的不信任動議，但遭建制派議員以34票多數對27票否決，再一次顯露後者的保「皇」本質。

跟着還會有工黨、人民力量和社民連等分別提出的彈劾以至應即下台等動議，不排除也會同樣遭建制派多數否決。

這些發展都會激發起泛民主派發起的元旦反梁大遊行，展現出港人對梁振英的強烈反對。而在今年7月1日梁上任的首天，已有40萬港人（民陣數字）大遊行發聲反對他了，即將到來的元旦大遊行人數看來也不會很少的！願港人屆時踴躍參加吧！

2012年11月19日

十月評論 October Review

第39卷第2/3期（總第233期）

2012年12月31日出版

出版/編輯/承印：《十月評論》編輯委員會

通訊處：香港郵政總局信箱10144 號

Address: GPO Box 10144, Hong Kong

E-mail: octoberreview@gmail.com

Website: <http://www.october-review.org>

〔本刊一切具名文章，不一定代表編輯部立場〕

維護新聞自由，港府須速增發免費電視牌照！

微波

觀看和選擇喜歡的電視，本是人民應該享有的新聞自由權利，這既可增添生活情趣，更可迅知世事，增廣知識見聞，尤其是免費收看，如可隨個人喜好，選擇多間電視台看，更是眾所歡迎的！

可是，香港多年以來，免費電視只有兩間，因少競爭對手，它們居於壟斷地位，不重視提高節目內容質素，以致不少內容是爲了減低成本而粗製濫作的。而且，爲了增加收入，廣告佔收看黃金時間頗多，但觀眾卻少選擇餘地，惟有付款加看有線電視。城市電訊於是在2009年底向港府申請發免費電視牌照。

香港市民都想有更多的電視台選擇。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在今年11月初的民調顯示，支持發出新免費電視的受訪者有85%，有7成人對政府遲遲不發牌表示不滿。中文大學傳播與調查中心也於今年10月底至11月初調查，有74.5%受訪市民贊成發新牌。

當局於2009年12月完成免費電視牌照中期檢討後，曾表示歡迎新電視台加入競爭。2011年5月，廣管局原則上同意向三個申請者（城市電訊、電盈旗下的now和有線旗下的奇妙電視）發牌，但遭到亞視和無線反對，高院也駁回亞視司法覆核，顯示亞視反對發新電視牌照並無理由。

實際上，該電視一向很少觀眾，因爲內容不夠充實，立場不夠客觀中立，新聞時段加插很多廣告，重覆播出「亞洲電視，香港良心」的自我宣傳，使人多看生厭。因而社會上不少人認爲，如新台一出，它將很快倒閉，而爲了繼續霸佔半壟斷地位，不惜極力出招，反對增發新牌照。這也是民調支持發

新牌者佔8成左右的原因之一。

台灣民眾最近爲了反對電視台等的壟斷，曾經上街抗議示威，反對獨家收購一些傳媒。香港人也有可能以類似行動表示反對壟斷的。

港府多月來拖延發新免費電視台，很有可能是受各種反對的壓力。以致連前廣播處長張敏儀也發聲，嚴正地批評港府公告發牌在先，不能出爾反爾，若貿然收回決定，則令政府無信而不立。她贊成引入競爭，認爲對整體傳媒、新聞自由及言論自由都是好事。

爲了維護香港的新聞自由、言論自由，順應全港絕大多數市民的需要，能有更多選擇，港府必須儘快批准3間機構提出的申請；打破壟斷，讓香港電視業生機勃勃地生長，從而也得以維護新聞自由！

2012年12月12日



立法局選舉簡評

涓滴

在國民教育風波下的立法會選舉，分區直選投票人數雖創新高達183萬，泛民主派卻未如一般預料般得益，只取得101.9萬張選票，佔56.3%，得票比率是回歸以來最低，所得直選議席也由上屆19席減至今屆18席，打破了以往泛民與非泛民的「六四黃金定律」（指泛民總得票率維持在六成的規律）。相反，建制派等在發動配票機器下得票比率上升至43.7%，即使得票不及泛民，但仍能輕取17席，意味變相盡攬新增的5個地區議席。

這一發展，部份是由於泛民在2010年政改一役中未能取得共識，出現嚴重分歧，在競選時人民力量猛烈攻擊民主黨先前之走入中聯辦接受政改方案，不支持五區公投。結果，在多個選區浪費和流失選票，令建制派候選人坐收漁翁之利。

長久以來，香港大財團和大地產商操控經濟，樓價不斷大幅飆升，百物日益昂貴，許多人要被迫住在「劏房」和「棺材房」，一般人生活困難，貧富不均問題日益惡化，年青人付出金錢和時間進修後仍前路崎嶇，民怨民憤加深：這種種現實情況，本應會激發更多選民投票，且應投給泛民主派，而減少給建制派的，因為後者一直支持政府的不當施政。這也導致泛民主派，尤其是其中的激進派（人民力量、社民連等），在這次直選中合計得票多於民主黨這個老大黨。

社民連由於人力、財力、物力不足等原因，致使派出參選的曾健成、吳文遠和陶君行不能當選，而梁國雄（長毛）在新界東選區中仍繼續以該選區最高票當選連任，反映出他一向在立法會內外的勇於鬥爭行動深受眾多港人歡迎。

人民力量派16人參加直選，其中黃毓民、陳偉業和陳志全當選。

民主黨則由原有的8席銳減至4席，多名派出參選的知名人物（如李永達、陳樹英等）都落敗。

加上公民黨、工黨等當選的議員，再連同功能界別、超級區議員等合計，泛民主派在立法會內的70席中共取得27席，建制派則由於財雄勢大和西環的支持拉票，共取43席，不過，泛民主派仍能保持重要議案的否決權（政府重要議案經三分之二議員同意，有24席便能否決使之不獲通過），還算在泛民主派不和聲中幸得保全否決權，不致影響嚴重。

今後，泛民主派必需團結合作，為港人爭取盡可能多的權益，才不致辜負絕大多數港人的重托和厚望。

2012年9月18日



平民議員 向您交待(轉載)

長毛梁國雄

長路走來 始終如一

我自上任以來，議會內外為民鼓呼，面對打壓橫逆，絕不畏縮退讓，誓要實踐我向諸君許下的選舉承諾。政綱上一字一句，絕非空談，而是身體力行，貫徹始終的奮鬥目標。

1. **五區公投、犧牲議席：**2010年，政府推出政改方案，眼見真普選無期，假方案愚弄市民，我絕不會坐待民主由上賜與，遂與四位同僚聯袂辭職，令全港五區議席出缺，以補選實現變相「公投」，讓市民一人一票向小圈子選舉大聲說「不」，堂堂正正高呼「2012雙普選」！可惜民主黨向中共屈膝，走入中聯辦實行「暗室政治」，致令「公投」成績未如滿理；未來一屆，梁振英大有可能重新為《基本法》23條立法，我屆時亦不會戀棧，會讓香港選民再一次以變相「公投」表態。

2. **以寡敵眾「拉布」戰，議會抗爭阻惡法：**立法會充斥著保皇的建制派和功能組別議員；政府只要「數人頭」便可強行在立法會通過惡法惡策。去年，政府強推剝奪市民補選權的「替補機制」。此舉是因為「貪曾政府」及其主子中共政權害怕「變相公投」，恐怕將來強立《基本法》第23條時，市民再以變相「公投」來挑戰！我洞見其奸，為要阻撓通過「替補機制」惡法，與另外兩位同僚，在立法會以寡敵眾，進行曠日持久的「拉布」戰。我發言17次，每次講足15分鐘，不計算其間點算出席人數的時間，發言

4小時15分鐘。面對建制派的通宵夜戰，毫無懼色；最後雖因泛民主派懼於保守輿論，不允相助，以致未竟全功，但是，政府行政霸道，罔顧22萬市民上街反替補惡法的醜態盡現人前。梁振英企圖照版煮碗，推行「五司十四局」政治僭建，我再接再厲「拉布」，「五司十四局」最終胎死腹中。事後，梁班子醜聞頻生，局長下台，足見所謂政府架構重組，其實是政治酬庸，坐地分肥的鬧劇。

3. **為民權，牢獄何足懼！**在行政主導、功能組別佔一半議席及分組點票這三座大山壓制下，立法會議員只能坐而論道。但是，為民權為民生，議會內外奮力抗爭，遂成為權貴及專制政權的眼中釘，去之而後快！我在2007年因反對政府實行公屋新租金機制，往孫明揚住所前請願，卻被控以非法集會罪，被判60小時社會服務令。惡法通過5年，公屋先後加租兩次，罔顧基層市民負擔日重。去年，為反對政府的「替補機制」，我與市民一起衝入替補機制第二場、也是最後一場公眾論壇，因而被判兩個月監禁。法官雖然重判我，但同時也指出：「遞補機制涉及每位市民的基本權利，影響深遠，爭議亦到達深層次社會矛盾的說法，本席亦理解所謂進入者的憂慮，論壇場數嚴重不足，缺乏廣泛性，所以把握機會強行進入表達訴求，特別是第一被告人(即本人)，由於他先前的一些作為(指發動五區公投)，引致政府推出遞補機制，他當然極為關注。」

4. **爭取公義，不惜腰間錢：**為打擊行政霸權，其中一條戰線便是法庭鬥爭。自當選以來，我不惜冒欠下巨額訟費之險，勢要打破「法律面前、貧人含忍」的無奈，以一己之力，挑戰整個政府機器！犖犖大者，包括以「司法覆核」要求「貪曾」運用憲制賦予的權力，從速訂立最低工資、在 2006 年及今年，先後 2 次入稟法院，挑戰主席裁決，反對《立法會議事規則》限制議員的議事及提案權、其他包括挑戰侵犯市民通訊權及私隱的《電訊條例》、限制民權的《公安法》和選舉權的《立法會選舉條例》，以及為在囚人士取回投票權利等等。官司有勝有負，不包括未判訟費的官司，被罰訟費已高達百萬元以上。雖然經濟損失不菲，但是，經我多年不懈鬥爭，市民已明白利用「司法覆核」去挑戰政府不義政策及法例，是應有民權。
5. **揭穿議會真面目：**建制派一直愚弄市民，詆毀我故意「掙蕉」，可以提早收工。但是，建制派卻從沒有告訴市民，若我要偷懶，只需在會議上略一現身，隨即「走人」，便可有出席會議之名，行偷懶之實，無需要冒天下之大不諱被主席驅逐。況且，我之被逐，全都是在政府公佈施政報告及財政預算的會議上所採取的非暴力抗爭。其中四次是要求政府既然坐擁萬億，就應立即成立全民退休保障。其餘均是反對政府漠視民困，抗議「煲呔禍港，官商勾結」！政府救市不救人，議會權貴充斥，不乏懶惰議員，甘當附庸，何來尊重！
6. **一土諤諤，為民力爭：**建制派造謠我只知爭拗，不理民生。其實，我深明民主對民生至關重要。當年我堅決反對領匯上市，不單受到保守輿論一面倒圍剿，更受暴力威嚇，建制派當年卻支持上市。之後兩鐵合併，公屋新租金機制，都是全仗建制派和功能組別保駕護航，通過惡法。現在惡果一一浮現，市民受加價加租之苦，不正是沒有民主，哪有民生的例證嗎？
7. **一路走來、始終如一：**我自 2004 年當選後，至今仍住於公屋，輕裝簡從依舊，生活依然故我。當選後立即實踐選舉承諾，成立「抗爭基金」，每月從薪金自動轉賬 4 萬元至「抗爭基金」戶口去；扣除五區公投辭職三個月，至今 89 個月，款項 356 萬元。基金為社會運動略盡綿力，除支援一窮二白的社民連，也資助備受打壓，財源缺乏的民間團體。
8. **爭取中國民主，反對一黨專政：**「位卑未敢忘憂國」，我深明香港民主前途繫於國運，香港普選來臨與否，亦與祖國民主大業相關。此所以，我一如既往，為中國被壓迫的維權人士鼓與呼。於 2009 年 12 月 25 日劉曉波被判監時到中聯辦門外示威，被控「非法集會罪」，雖於法庭得直，最近卻遭當局上訴；由 2011 年開始每個星期日均到中聯辦示威，響應國內茉莉花革命，活動維持了一年之久；為李旺陽、劉曉波等人鳴冤爭公義，更是應有之義；近期，與內地維權人士組織「中國百姓維權聯盟」，揭露中國內地種種不公平的收地情況，為國內同胞略盡綿力；並於今年初到瑞典國會，為被逼流亡的工運人士張蜀傑作證。

胡錦濤習近平主政都需要維穩

張開



胡錦濤在中共第18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時，代表中委會作了題為《堅定不移沿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鬥》的報告，他把30年來實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不斷要求資本主義各國承認中國是建成了全面市場經濟地位的國家；在國內則實行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法律，導致日益嚴重的貧富懸殊、階級分化、社會矛盾尖銳、階級鬥爭劇烈，因而造成黨政幹部與人民大眾之間的對立和衝突日益無法緩和：這些都是中共帶領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鐵般事實和必然的結果。把這樣的現實說成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即等於承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資本主義；也就是對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學說的明確背離。

胡溫的施政

胡錦濤在上任之初，曾高呼要「以民為本，想民之所想，急民之所急」；但主政10年來，實際上卻沒有實踐諾言。他年復一年地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幾乎同樣地承認（依然輕描淡寫、避重就輕地描述）：「必須清醒看到，我們工作中還有不少困難和問題。」

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依然突出，制約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較多，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較大，一些基層黨組織軟弱渙散，一些領域消極腐敗現象易發多發，反腐敗鬥爭形勢依然嚴峻。」

為了維穩，國家近年花費非常巨大的維穩費。這種不穩定，正是中共實行一黨官僚專政推行資本主義制度、導致民怨劇烈的結果。

作為國務院總理的溫家寶，儘管每次提出要進行有限度的政治改良甚至改革，但都遭到黨內保守派的抵制、反對，因為這會損害到各級官僚們的既得政治、經濟特權，以致政令不出中南海。

胡錦濤這次代表中委會作的報告，在第五節的第五項中只是闡明：「要深化行政體制改革。深化推進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政事分開、政社分開」，但並沒有要黨政分開，黨的權力仍然至高無上，中共黨員尤其是幹部可以為所欲為，無法無天；人民大眾即使名義上有監督權，「當家作主」，都只是空中樓閣，畫餅充饑，可望而不可得。

中國人民現時最急需需要的，是政治民主改革，這從十八大舉行同時，官方的如下民意調查結果也可得到証明：人民網強國社區就網民最關注的10大問題調查，「民主政治」以32.4%居榜首，其次是「反腐倡廉」，「社會民生」和「經濟發展」。網民指民主政治是解決諸多社會問題的基礎，是國家穩定前提。[1]這確是人民從親身體驗得出的合理結論。這些困難和問題，正是中共領導推行的走資本主義道路所必然造成的。由此迸發出越來越多的民眾群體性鬥爭，由2003年

的5.8萬宗，激增至2008年的9萬宗，之後官方再沒有公布宗數，而據清華大學孫立平教授推算，2010年至少達到18萬宗。[2]

習近平接任後

習近平在十八大接替胡錦濤就任黨總書記和中共軍委會主席後，先提出「空談誤國，實幹興邦」，似是要表示自己不會空談改革；他提出要繼續改革開放，且要有新開拓，要反腐肅貪倡廉，聲稱「腐敗問題越演越烈，最終必然會亡黨亡國！」「千萬不要既想當官又想發財，還要利用手中權力謀取私利，官商結合必然導致官僚主義。」他要從嚴治黨，說「任何組織或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但這種特權實際上久已存在，任人皆知，他以後如果不能做到廢除這種特權(可以預料，他將不能廢除官僚們這種既得的特權)，那就是誤國的空談！

而在實際上，現時的中國，早已貪污腐敗成風，幾乎是無官不貪(除了非常特殊的一些領導人例外)。反貪腐等於是他們自己反自己，中共的不少領導人和決議也曾許多次提出反貪倡廉，但毫無成效，貪污腐敗反而越來越嚴重，最多是檢舉出一些罪行囂張、民憤極大、或者是互相爭權奪利而佔下風的對手來開刀。尤其是資本主義盛行、官商勾結、大量幹部「下海經商」，反貪腐工作更難收效。即使這次新領導人定出具體政策措施來企圖達到目標，而且懲罰一批官員幹部作為反面教材，但貪腐情況已經普及全國，根深蒂固，成為制度問題，牢不能破。只有廢除了整個官僚制度，全國人民真正有權當家作主，才能徹底消除黨政官員所享有的一切特權，不能再肆無忌憚地貪污腐化。

習近平就任後，申明持續改革開放的走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路線，這就使官商勾結、貪污腐化等後果更趨嚴重，中國政局將更趨不穩定，中共更需要維穩。

至於他說要有的「新開拓」，在接任後一個月內仍無公開闡明其具體內容。後來到廣東考察，專家解讀是為新一輪改革等籌謀。在考察中，他強調，中共的十八大向全黨全國發出了深化改革開放新的宣言書、新的動員令，全黨全國各族人民要堅定不移走改革開放的強國之路，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調性，做到改革不停頓、開放不止步，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而團結奮鬥。習近平又強調，我們要堅持改革開放正確方向，敢於啃硬骨頭，敢於涉險灘，既勇於衝破思想觀念的障礙，又勇於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3]

這個新動員令和諾言能否實現多少，尤其是最末一句能否兌現，不會也成為誤國的空談，我們對此是不存幻想的，民眾且等著瞧吧！

2012年12月20日

註釋：

[1] 引自2012年11月19日《蘋果日報》。

[2] 數字引自2012年11月14日《明報》載潘小濤的《胡錦濤的歷史地位》一文。

[3] 《文匯報》載新華社12月11日電。



誰在操縱中國的‘種雞’、‘奶牛’和‘大豆’？

破謎

根據2012年11-12月中央電視台報導，肯德基與麥當勞的大供應商山西粟海集團和山東六和集團被揭發養殖雞隻從孵出到端上餐桌，只需要45天，是用飼料和藥物餵養的。生產“速成雞”的養殖場，採取24小時照明並餵食激素，30克的小雞在40天內能長到6、7斤。為避免雞死亡，“速成雞”至少要吃18種抗生素。[1]

早在1979年，經營飼料的泰國正大集團率先在深圳創建了中國第一家白羽肉雞養殖合資企業，隨後，大量外企攜資金及經營經驗進入中國肉雞養殖市場。由於飼料轉化率高、生長速度快而適合工業化養殖模式，白羽肉雞產業發展迅速，養殖數量從1997年的22億隻增至2010年的48億隻。[2]

中國農業大學動物科技學院博士生導師、國家蛋雞產業技術體系首席科學家楊甯教授曾在2009年表示，中國80%以上的祖代種雞都是進口的。根據長江證券研究顯示，益生股份是中國飼養祖代肉種雞規模最大、數量最多、品種最全的企業。益生股份2011年年報中稱，目前世界範圍內的原種雞種源控制於歐美少數幾家育種公司手中，中國所用的祖代種雞均需從國外進口。2011年，益生股份從美國安偉捷進口祖代肉種雞36.34萬套，從美國海蘭國際公司進口祖代蛋種雞7.59萬套。[3]

農業產業化領域的研究專家張勝軍對本報記者稱，中國種雞幾乎100%源自國外，蛋雞品種也大都源自海外，肉雞育種技術中，除了曾經獲得了以色列轉讓的黃羽肉雞種雞技術，白羽種雞技術及供給全部掌控在海外企業手中。海外企業通過控制畜禽繁育技術攫取了產業鏈高額利潤。種雞、蛋雞育種公司利潤雖然沒有具體資料，但張勝軍稱這些是高利潤行業。即使是國內從事種雞、蛋雞進口、繁殖業務的公司也賺得鉢滿盆滿。益生股份年報顯示，2011年營收約7.7億元，歸屬上市公司股東淨利潤則高達2.3億元，同比增長393%，公司綜合毛利率高達40%，同比增加了16.73個百分點。[3]

而奶牛行業也面臨類似的困境。中商流通生產力促進中心分析師宋亮指出，中國儼然成

為一個“萬國奶牛養殖場”，超過九成奶牛都是來自澳大利亞、新西蘭、荷蘭等地。宋亮稱，長期以來，國外壟斷了種牛以及奶牛的供應，國內乳企往往是從海外購買了奶牛以及種牛或者凍精培育出下一代奶牛，這一代奶牛再培育一代奶牛就基本上不能用了，乳企則需要繼續向海外購買優良奶牛品種重新培育產奶。[4]

在當今世界糧食系統中，轉基因糧食和源頭種雞這兩個核心技術始終掌握在西方跨國糧農企業手中，他們又通過相互控股基本掌握了全球一些農產品鏈條的核心環節：糧食種子、種雞和糧食貿易。

外資操縱糧食的情況尤其嚴峻者當數大豆。中國進口大豆為孟山都、約翰迪爾等跨國農業公司帶來了巨大利潤。他們為巴西農民提供種子、農藥和拖拉機，並與糧食銷售商、飼料生產商形成了牢固的利益鏈條。原有農業模式向工廠化農場的轉變、大量進口大豆催生了一批中國農業公司像國有中糧集團和私有企業新希望集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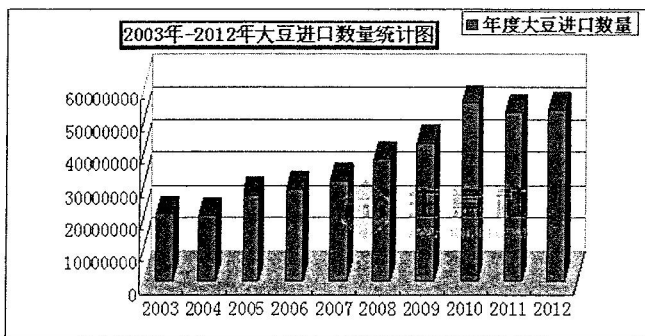
2000年至2011年間，中國的大豆進口量增加了160%。與此同時，大豆種植面積減少了20%。面對進口大豆的價格優勢（進口大豆比本地大豆每噸便宜300-600元），中國農民無力與之競爭。食用油產業中，進口大豆已占原料的1/3。[5]

早在2008年11月，海關總署已發出預警，指出外資企業在中國糧食領域的操控正在加強，尤其是跨國投資企業豐益國際，斥資30億美元進駐東北，企圖壟斷國內非轉基因大豆市場。從1996年開始至2002年，中國每年從國外進口大豆的數量，呈逐年遞增的趨勢。中國進口大豆數量的猛增，使得國產大豆目前只佔有約30%的市場，並且比例仍在不斷下降。[6]

2008年，國際大豆價格一度逼近6000元/噸歷史高價，國際糧商在油脂現貨、期貨市場賺得鉢滿盆滿之餘，開始挺進黑龍江大豆主產區，志在全盤掌控中國大豆市場。而控制著中國進口80%貨源的國際四大糧商ADM、邦吉集團、嘉吉集團和路易達孚已先後在中國各地佈

局，搶佔市場。目前，中國現有90家大型大豆加工企業中，有64家俱有外資背景，實際加工能力超過5000萬噸，占國內的85%。中國作為最大的大豆進口國，喪失了議價能力。[7]

中國國家糧油資訊中心最新監測顯示，中國2013年大豆進口量將再創歷史新高，比上年增長近10%。而本土大豆產量則預計下滑10%。這意味著，中國大豆對外依存度將進一步提升。幾千年來，中國都是大豆主產國。但目前，中國所有的農產品中，大豆的對外依存度最高，80%需求來自進口，而進口大豆中，40%來自美國。[8]



如上圖所示，近十年來中國進口大豆數量不斷增加，2003年進口大豆數量僅為2074萬噸，此後每年大豆進口數量持續上升，以2010年進口數量為最多，高達5480萬噸，較之2003年數量增加一倍之多。[9]

2004年，在國內壓榨企業半數破產後，跨國糧商對倖存的中國壓榨企業“趁火打劫”，開始大規模併購，1000多家內資榨油企業構成的“中國大豆軍團”，瞬間煙消雲散。最終導致今天僅剩90多家企業，且有64家已被外資控制的局面。2006年，嘉吉繼續擴張4家壓榨廠，新增壓榨產能650萬噸；萊寶集團後來居上，收購重慶涪陵和山東龍口兩家壓榨企業，新增產能300萬噸；ADM公司參股的益海集團與嘉裡糧油合併，成立“豐益國際”，其旗下控制的大豆壓榨企業12家，年壓榨能力超過1000萬噸，占中國市場約14.3%的產能，配合小包裝食用油銷售管道，豐益國際佔據了中國小包裝食用油近85%的市場份額，實現了對中國食用油市場“壓榨加工—流通銷售”環節的大整合。[10]

下圖顯示，國內大豆的壓榨產能多數由外資如益海嘉裡控制，國內對大豆的話語權越來越小。[11]

企業	2012年產能 (萬噸/年)	產能占全國比 (%)	企業數量
益海嘉裡	1587	12.7	17
中糧集團	1161	9.29	13
九三集團	828	6.62	9
中紡集團	660	5.28	9
渤海集團	630	5.04	4
嘉吉公司	495	3.96	5
萊寶公司	480	3.84	5
東凌集團	375	3	2
邦吉公司	369	2.95	4
中儲油	360	2.88	4

2012年國內部分企業壓榨產能統計表

根據中國科學院國家健康研究組1月8日發表的《國家健康報告》，國際資本按“利潤最大化”原則，優化配置全球資源，分類定位國家角色，形成以美國等為代表的“寄生消費型”國家、以中國等為代表的“勞動生產型”國家、以沙地阿拉伯等為代表的“資源供給型”國家。

作為全球“勞動生產型”國家，中國國家財富流失觸目驚心，每年被剝奪抽走的“血汗財富”大致相當於國內生產總值(GDP)的60%左右。[12]

普通老百姓，不管是城市市民，或者農村農民，如果都想拒絕吃那些由跨國糧農企業大量生產的‘速成雞’、‘毒奶’和‘轉基因大豆’，那麼，應該共同思考如何打破利益集團壟斷的、有毒的糧食系統，乃至促進本土生產安全的雞肉、牛奶和大豆。

註釋:

[1] <http://baike.baidu.com/view/9658179.htm>

[2]-[4] <國外種雞已佔領中國絕大部分市場>，《第一財經日報(上海)》，2012-12-25。

[5] <誰來養活中國人：公司或農民>，<http://www.grain.org/article/entries/4584>

[6] -[7] <跨國資本加緊壟斷中國大豆產業>，<http://sclnw.com/dtweb/new.php?cid=&id=6121>

[8] http://future.stcn.com/content/2012-10/23/content_7194047.htm

[9] <http://sannong.cntv.cn/20130104/103655.shtm>

[10] <跨國資本加緊壟斷中國大豆產業>，<http://sclnw.com/dtweb/new.php?cid=&id=6121>

[11] <http://sannong.cntv.cn/20130104/103655.shtm>

[12] 中新社北京1月8日。

壬辰冬至六十周年

一卒

1952年冬至全國托派被一網打盡，至今足足六十週年了！當年被捕的人中，最年輕的十六歲，如仍活着，也已七十六歲老人了。不少人屈死獄中，更多的經過幾十年的摧殘，早已作古，有幸活到今天的，寥寥無幾，且多在八十以外，風燭殘年，來日無多了。

共產黨對托派的打壓，比國民黨嚴厲得多。如謝山所說：「同出一轍而攻伐特甚」。國民黨的軍政要員，滿手鮮血的戰爭罪犯，早於1975年分批特赦了。這些罪犯被釋放時，立即享有公民權，不用戴「帽子」，不需接受群眾的「監督改造」。而且允許他們到處去，包括台灣。來去自由，提供方便。而1957年提前釋放，本已恢復公民權，在一個接一個的政治運動中，作為「全能運動員」。從勞改隊的小監獄出來，放在社會上的大監獄更受罪。眾人可共誅之，共伐之，小孩也可欺侮之。不用通過法律，可長期剝奪其政治權利與人身自由。打壓不斷，漫罵無常，超常勞動，還要剋扣工資。多少人被整至奄奄一息，貧病交迫。

陳景光原在中央航空公司做會計，1950年春，參加兩航起義，隨機從香港飛抵廣州。後來以托派「反革命」罪被捕，判刑五年。出獄後顛顛倒倒，下放到武漢郊區當農民。文革時兩派之間爭權奪利，都把他作磨心，批鬥打罵，極盡摧殘，辛辛苦苦一天忙到晚，養不活自己。身心受到嚴重傷害，人也變得麻木了，腦動脈硬化，目光呆滯，步履踉蹌，仍不放過。直至1977年5月幾經艱難，才准他遷移戶口，回鄉治病。

八十年代初，廣州成立南方航空公司，急需專業人才。找到陳景光，可惜他已病入膏肓，生活不能自理，無法復職。一個有為

青年，起義歸國，就這樣被折磨殆盡！

蘇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以肅托為名，殘酷鎮壓異己後，中共於1957年釋放了一批托派分子，其餘的準備「今冬明春全部解決。」可是盛極一時的「百花齊放」，以「反右」告終，跟着一系列政策失誤，民不聊生，天怒人怨。「今冬明春」要解決的托派問題，成了官僚統治的犧牲品。此後刑滿釋放的同時，即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不准回家，留場「就業」，名為「新人」（意指「重新做人」）。幹勞改時一樣的工作，未經批准，不得自由出入。一批自願獻身於社會主義革命事業，從不為非作歹，沒有違法亂紀的知識份子，卻以莫須有的「反革命」罪，一關就三十多年，直至改革開放後的八十年代，才准回家。在漢陽勞改的肖靜仿，判刑七年，1984年才放走。真是「少小離家老大回」。一些未婚青年成了孤寡老頭。在「新人隊」就業，不算工齡，沒有退休待遇，每人發生活費24.5元。大家稱之為「開水費」，醫療費自付。能撿回一條命還算幸運，有些屈死獄中，只能「魂歸故里」。一代精英，就這樣被消磨殆盡！

為甚麼共產黨對托派非要置之死地而後快呢？因為托派敢於說真話，敢於和斯大林主義作鬥爭。所以非壓垮不可！

謝山原在香港新華銀行工作，因替托派領導人彭述之收轉第四國際郵件而被香港政府逮捕，驅逐出境。1950年考入廣東省製糖工業公司，後調番禺市頭糖廠做會計主任。他兢兢業業，盡職盡責。在三、五反前，發現採購甘蔗運費由廠方支付，與原訂合同不符，為廠方追繳贓款一億一千多萬元（法幣），合人民

幣一萬一千多元（一萬兌一元），比當時轟動全國，被槍斃的劉青山、張子善貪污款還要多。可是中國政府不以爲功，反以「反革命」罪入獄。1952年12月22日，冬至之夜被捕。從此顛簸一生。「清理階級隊伍」前十年沒請一天病假的謝山，此後病休十二年！靠堅強的意志，不屈不撓的精神，才活過來的。他把滿腔悲憤傾瀉於詩詞之上。冬至對於謝山有其特殊的感受，下面是從〈苦口詩詞草〉中摘錄的。

冬至詩抄

謝山

壬寅冬至夜（1962年12月22日）

寥落天涯我自知，呼牛呼馬任人嗤。
難忘師友殷懃意，肯作羈囚涕泣辭？
失伴雁常思萬里，經冬樹又發千枝。
年來獨醒慣長夜，起看東方欲白時。

乙卯冬至（1975年12月22日）

二十三年棄置身（借用劉夢得句），
重論往事暗傷神。
自知精衛難填海，
誰信曾參不殺人。
烈火爐中成利器，
嚴霜節後是初春。
仰天忽作開懷笑，
去看荔灣柳色新。

用前韻又成一首（1975年12月22日）

地老天荒寄此身，飄零那敢呈精神？
胸中萬歲千秋事，夢裏逃生欠死人。
猶記聞雞舞星夜，只今捫虱曝陽春。
寒凝未必芳菲歇，青草年年吹又生。

乙丑冬至夜集句（1985年12月22日）

皎日何曾入覆盆（金元裕之），
巫咸不下問銜冤（唐李義山）。
世間甲子須臾事（唐許用晦），
骨朽猶應此念存（宋陸務觀）。

丙寅冬至夜（1986年12月22日）

獨醒沉吟久，東方苦未明。
漫愁寒夜永，為有曉雞鳴。
臘後芳爭發，雪消草易榮。
春光知不遠，已是一陽生。

甲戌冬至夜（1994年12月22日）

長夜冥冥未曙天，晨雞啼罷夜如年。
床頭短燭搖殘影，夢裡悲歌促急弦。
後死自慚成底事，再生仍擬續前緣。
寸心永矢無尤怨，豈向人間作瓦全。

臨江仙 乙亥冬至（1995年12月22日）

「四十三年如電抹」（借用東波句），
猶存瘦骨嶮嶮。
強撐病眼賞新晴，
霜威仍凜凜，
白髮已星星。
一笑塵間千萬事，
那能愚盡群氓。
高談意氣尚縱橫，
故人頻入夢，
相對話平生。

李旺陽「被自殺」真相部份揭露

軍行

筆者於今年6月16日曾經撰文指出，「最新曝光的湖南民運鐵漢李旺陽事件，再次表明地方官僚有法不依，知法犯法，胡作非為。他的猝死，據官方宣布是由於他在留醫時吊頸自殺，但疑點重重，……當局在他死後四日，即強迫他親妹簽字同意立即火化，以圖毀屍滅跡，公然違反新修定的《刑事訴訟法》有關不能刑訊迫供、消滅證據的規定。」（見本刊上期《簡評新的〈刑事訴訟法〉〈後記〉》）

嗣後，官方宣布，指李旺陽親妹李旺玲及其夫趙寶珠同意和簽字驗屍報告，申請火化李旺陽，發出不與外界聯系的公開信等。

但李旺陽「自殺」疑案發生快將100天（9月16日）之際，《明報》記者9月5日突破封鎖，在湖南邵陽市採訪了李旺陽胞妹李旺玲及其丈夫趙寶珠，以及生前好友尹正安。趙寶珠親口向《明報》記者說，他夫婦倆從沒有參與過調查過程，也沒在判定為「自殺」的驗屍報告上簽字同意。趙的講法跟官方調查報告指李旺陽家屬「同意」自殺死因的說法，大相逕庭。

當記者問及當局發放過一些文件有他們的簽名，是否偽造時，趙寶珠說，曾在頭昏腦脹下，被當局要求簽署一份看似是醫學報告的文件，「給我們看了，實在有些專用術語我們不懂……反正我就只能簽了，難道可以不簽嗎？」記者問他們有沒有簽過一份「不與外界聯繫的公開信」時，李旺玲則一再搖頭。

《明報》記者在調查期間，疑電話遭監聽，被公安追上及扣留在一間賓館，遭禁錮44小時，其間用疲勞轟炸方式盤問記者。當局還籌辦了一場在官員攝錄監視下做的「訪問」，市政府人員把李旺陽妹夫趙寶珠等人帶到賓館，要求失去人身自由的《明報》記者訪問，官員在旁全程用攝錄機拍攝。神情繃緊的趙寶

珠一再說：「過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引自9月12日《明報》報道）

以上一切都一再證明當局在不斷造假，欺騙外界，知法犯法，任意胡作妄為，無法無天，持續地犯錯。

有內地法律專家王友金教授指出，李旺玲及其夫的證辭是非常關鍵的證據，基本否定了官方報告的權威和定論，已可以「翻案」，重新調查李旺陽死亡真相。

雖然在公眾質疑下，湖南省官方展開調查，但最終仍定調李旺陽是「自殺」，顯示出歷來的官官相衛官僚傳統，而邵陽市當局的上述做法，在中國官僚專制下更是司空見慣，但卻嚴重侵犯了新聞記者的人身安全和採訪自由，損害了新聞自由，激發起《明報》的強烈抗議，致函香港的新聞專業組織、特區政府、中聯辦、港澳辦正式投訴，要求跟進兩名《明報》記者被扣查44小時事件，要求中央徹查交代，並確保日後不再重演。親北京的香港新聞工作者聯會也向中聯辦反映意見，並引述中聯辦回應，指會向內地轉述本港意見和要求。支聯會主席李卓人更到日內瓦向聯合國人權監督機制官員提交了香港20多個團體、議員有關李旺陽事件的報告，令國際社會關注有關事件，迫使中國當局確保調查在獨立及公正的情況下進行，把違法人員依法查辦，向李旺陽家屬賠償，並確保採取適當預防措施，防止再有相關罪行發生。

我們完全支持上述的訴求，並且要求中國當局儘快公佈徹查李旺陽真正死因的結果，確保李旺玲夫婦和有關律師的人身安全和言論自由，不會遭受秋後算賬等迫害打擊。

2012年9月27日

《我們都是李旺陽》詩刊選篇(轉載)

六月的一個清晨

柳俊江

陽光在你臉上流淌
在六月的同一個清晨
從鐵窗到鐵窗
不過八千個晝昏
有這麼一個年輕人
遠遠讀着民主之精神
在西單那堵牆下
自由的吶喊仿如昨日
飛灰冉冉紛紛
激盪二十三載的餘音
生頂天 死立地
英雄無怨無悔無鬼神
所謂犧牲
每春多少同路人
直教飛霜震憾
在六月的同一個清晨

給妹妹 - 全都有了 夜貓

我喜歡那窗外風景
我也喜歡那風聲鳥語蟬鳴
更喜歡那自由空氣
所以用衣架把我掛在窗前
腳踏實地
用瞎了的眼睛來看
用聾了的耳朵來聽
用那殘障的身軀來感受
腳踏實地
站著
妹妹，我走了
雖然是被走了
但是在這兒
我全都有了

我們也不回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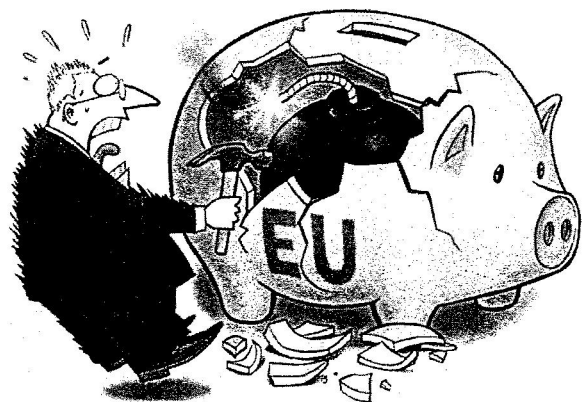
肯肯

有人死了
安息去了
旺陽死了
把瞌睡的良知
叫活了
有人心眼昧了
別過頭看不見了
旺陽雙目弄瞎了
心窗里自由的風景
打開讓人人嚮往了
有人打結
緊緊套住了
旺陽的牽繫
有眼的人都看見了
有心的人都感召了
我們也不回頭
國家事
了亦未了
我們接踵而至
不容
不了了之



人民是如何為金融危機買單的

亨利·威爾努



經濟危機已經持續了三年多。在這段時間裡，對金融的監管幾乎沒有任何進展，而影響民眾生活條件的多種措施卻已付諸實行了。

2012年4月國際勞工組織(ILO)公佈了“勞動世界報告”[1]。該報告描述了金融危機對工薪工作者和人民的多方面影響。

2008年和2011年之間的比較表明，危機開始以來，約5千萬人失去了工作。雖然一些窮國或新興國家仍在創造顯著的就業機會，但不是所有的它們都如此，而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仍然是有限的，特別是歐洲聯盟(EU)更是這樣。德國是唯一保持就業的發達大國，這主要歸功於其部分的失業。

青少年的情況尤其緊迫：在2011年他們並沒有受益於失業的有限減少。中東和北非地區記錄的青年失業率是成年人的4倍以上。在希臘和西班牙，青年失業率超過45%（在西班牙，青年失業率已經從2007年的18%升至現在的45.8%）。

在發達國家，特別是在丹麥、愛爾蘭、西班牙、英國和美國，長期失業（超過12個月）在增加。然而，有一些發達國家（如芬蘭、葡萄牙、荷蘭），長期失業雖然下降，但這是因為長期失業者放棄了希望，不再尋求就業（從而不被算做失業者）。在一些發展中國家，統計資料裡的長期失業率下降，乃是因為這個事實，即受影響的人紛紛謀求非正規就業。危

機的影響不僅尚未解決，而且在有最新資料發佈的國家中，其就業趨勢是遲滯緩慢的（除了在阿根廷，墨西哥和巴西以及土耳其和印尼）。

就業品質惡化

2007年至2011年間，各種兼職和臨時工作的比例增加了。危機的開始時，第一個被消滅的是臨時職位，但在隨後的工作招聘中，招得最多的就是這種形式的職位。相當大一部分的這些兼職工作，並非自願的選擇，事實是一些行業沒有其他的辦法。在發展中國家，非正規就業仍然是大量的。同就業穩定者相比，所有這些工作的收入都處在較低水準。對2007年和2010之間的就業機會之創造的分析顯示，大多數雇工的薪酬都比平均水準低，而且這些工作往往更不穩定。生活貧困工人的比例，在許多國家，尤其是在德國都上升了。



獲得健康服務和教育的機會更少

健康服務條件惡化。許多貧窮國家的醫療保險制度不足，原本的服務已經舉步維艱。但食品和能源產品價格的增加，進一步削減了家庭資源。國際援助在最近幾年已經停滯或下降。在歐洲，希臘就是這個情況，其公立醫院的預算，已經削減了40%。許多希臘人

轉而求助於非政府組織的醫療服務。在美國，如果人們失去了工作及其附帶的健康保險，他們家庭必會面臨毀滅性的醫療費用。

受教育的機會也是這樣的。在一些國家，本已困難的教育處境，如今是雪上加霜了。例如，在孟加拉，因為教育費用的關係，學生離開學校的情況有了顯著的增加，而且童工數目在增長，因為要增加家庭收入。



違反勞動法

許多國家都對就業法作了改革。這些改革越來越涉及長期工人的權利，有關的解雇規則（延長試用期，減少解雇賠償金及減少解雇預先通知時間）具有更大的靈活性。27歐盟國家中有19個已經推出了這樣的改革。其他的主要改革讓集體裁員變得更容易。最後，集體談判所涵蓋的員工的比例有所下降。報告的作者強調，認為高就業水準同就業保護是矛盾的，這個看法是不成立的。在歐盟內部，希臘，西班牙和葡萄牙在緊縮計劃的背景下，實施各種改革措施，成了放鬆管制的實驗室。在這三個國家，2010年引進的法律允許不遵守通用性協議（branch agreement），還允許在解雇時，減少個人和集體擔保。羅馬尼亞也經歷了這整個相同的改革。在義大利、匈牙利、斯洛伐克，已採用了相似但目前全球性較少的措施，等等。

面對公共赤字和債務問題，採取的措施主要涉及公共開支：工資，投資，社會支出和福利。在歐盟27個國家中，有22個削減或降低了公務員的工資。相同數量的國家已經減少了社會福利：失業金，退休金（提高退休年齡，削減退休金，更難領取退休金）。

十月評論 2012年第2/3期

不滿高漲

這增加了社會的不安全感，讓人震驚的是，根據國際勞工組織的指標，“社會動盪”的風險在世界各個地區已增加：首先是非洲和阿拉伯世界，再就是先進國家（歐洲和北美），還有中歐和俄羅斯的國家。2010年和2011年期間，在所分析的106個國家中，有54%對政府的信心下降了。

2012年7月，國際貨幣基金（IMF）的新預測確認了世界經濟形勢的脆弱，並指出全球經濟正呈現出新的疲軟跡象。英國銀行同業拆息（Libor）的醜聞，涉及所謂獨立貸款基準利率銀行的操縱問題，表明整個金融界都是腐敗的。許多國家的統治階級關心的主要是避稅，把他們的資本放到避稅天堂去。各國政府，特別是歐盟的政府，只能採取財政緊縮政策。傳統左翼力量往往支持新自由主義話語和實踐。在世界各地區，特別是在阿拉伯世界和歐洲，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是要知道，在未來幾年誰（激進的伊斯蘭主義、法西斯主義者、民族主義者或反資本主義的力量）將捕獲和組織民眾的不滿。

► 亨利·威爾努是法國反資本主義新黨（NPA, France）和第四國際的成員

註釋

[1] <http://www.ilo.org/wcmsp5/groups/pu...>



在礦業集團覬覦海地時，拉丁美洲起而反對他們

羅傑·安妮絲、金·艾夫斯

整個拉丁美洲風起雲湧，人民和政府都起而反對外國礦業公司，這個動盪正引起投資者及其在帝國主義政府中的政治幫兇們的警惕。

在海地，美國和加拿大黃金礦業公司正虎視眈眈，盯著那些他們相信等待著他們的財富。海地平民觀察組織（Haiti Grassroots Watch）最近的一項研究估計，按每盎司1600美元黃金的當前價格計，地下黃金至少有200億美元[1]。

所以，華盛頓使用其代理人美洲國家組織（OAS），非法設立一個聽話的政權 --- 總統蜜雪兒·馬特萊（Michel Martelly）的統治--- 其競選口號是：“海地向產業開放”，而華盛頓和渥太華，這兩個國際礦業公司在美洲的最主要代表，在整個大陸採取日益強化的干預性反應，這個情況的發生並非巧合。

國有化在增長

“從委內瑞拉，玻利維亞和阿根廷對礦產的徵用沒收，到傳統上對採礦寬鬆的司法管轄區如秘魯和智利的暴力反對，政治緊張局勢的加劇，對於一些享有長達十年的富礦開採權的公司構成風險”，加拿大全國性報紙‘每日環球郵報’7月11日的報導是這樣說的[2]。

此前一天，玻利維亞總統莫拉萊斯宣佈，他的政府將沒收總部位於溫哥華的南美銀業公司（South American Silver）。據該公司說，其在玻利維亞摩爾庫·科塔（Mallku Khota）地區的開採範圍，包含世界上最大的未開發銀、銅、鎳礦床之一。

5月，玻利維亞把一家西班牙獨資的發電公司國有化。隨後幾個星期，在阿根廷，對該國最大的石油公司，一家西班牙石油公司的業務大張旗鼓地實施了國有化。然後在6月，莫拉萊斯政府把科爾基裡（Colquiri）的錫和鋅礦國有化，這些礦由瑞士的全球礦業巨頭嘉能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Glencore International PLC）擁有。

煤礦國有化由玻利維亞內部的衝突而推動，玻利維亞政府指責那些公司煽動了這些衝

突。在礦區，大公司的員工，歷史悠久的通過合作方式而工作的傳統手工作業礦工，和當地土著居民之間，出現緊張關係。國際市場礦產品價格的暴漲進一步加劇了利害關係的緊張。同時，資源行業的國有化，已經是玻利維亞社會運動對政府的關鍵需求，儘管這種需求在摩爾庫·科塔（Mallku Khota）地區顯然還不是一個重要因素。

“不幸的是，所謂的跨國公司...不同社區（ayllu）的礦坑兄弟，姻親，鄰居彼此對立反對，”這是總統莫拉萊斯在談到南美銀業（South American Silver）國有化時所說的。

一些拉美人民無視其政府的立場，站起來對抗礦業跨國公司。在秘魯，這種情況是越來越多。7月的第一周，在反對數十億美元的康加黃金和銅項目（Conga gold and copper project）的抗議過程中，有五人被警察打死，這個項目如果實現，它將是秘魯歷史上最大的礦。該專案的所有者是總部設在美國的紐蒙特礦業集團（Newmont Mining Group）。當地居民不希望開發康加礦山，認為這會破壞當地的水源。近年來，在秘魯發生了一連串反對採礦專案的抗議。

在智利，對於水源和水質以及採礦對電力供應的影響，有著類似的擔憂，並且導致抗議行動。加拿大理事會（The Council of Canadians）2012年3月發佈了詳細的報告，檢討了智利的巴塔哥尼亞地區的關注和最近的事態發展 [3]。總部設在美國的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小組（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Group）在關於智利採礦的2010年研究報告中寫道，“如果反對採礦的社會運動現在是問題的一部分，如果採礦正在製造越來越多的水和能源的激烈競爭，那麼現在真正的問題是，智利將如何從制度上，政治上和法律上，適應礦產資源開發方面的公民聲音。”

干預性的反應

據溫哥華《太陽報》，加拿大貿易部長埃德·法斯特於7月11日寫信給他的玻利維亞同行，表示“深切關注”玻利維亞準備把南美銀業（South American Silver）國有化的報導。法斯特的發言人魯迪·胡斯尼說，部長已指示官員“加強與玻利維亞政府接觸，保護和捍衛加拿大的利益，並尋求對此事有個建設性的解決方法。”

該報紙報導說，預期加拿大官員將會見玻利維亞政府官員和玻利維亞駐加拿大大使。7月12日，南美白銀公司的主席及行政總裁葛列格·詹森，出席加拿大廣播公司（CBC）一台的節目‘潮流’（The Current），抱怨他的公司被冤枉[4]。他滿意地報告說，加拿大政府正在施壓，要玻利維亞政府改變其決定。

該節目的CBC主持人，聽起來就像該公司的公共關係發言人。在隨後的採訪中，他威脅玻利維亞駐美國大使，要求補償南美銀業（South American Silver）。他還抨擊莫拉萊斯的說法，因為莫拉萊斯指責外國礦業公司“掠奪搶劫”拉丁美洲的財富長達數十年。

顯然，該電臺節目主持人還沒有讀過《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The Open Veins of Latin America*）一書，該書是愛德華多·加萊亞諾撰寫的，有關該美洲大陸歷史的經典著作。加萊亞諾介紹了拉丁美洲是如何成為“一個巨礦”的過程[5]。該書詳細介紹了令人難以置信的人員傷亡，苦難和環境的破壞，災害延續幾個世紀，始作俑者是西班牙征服者，延續繼承者是今天的歐洲和北美的礦業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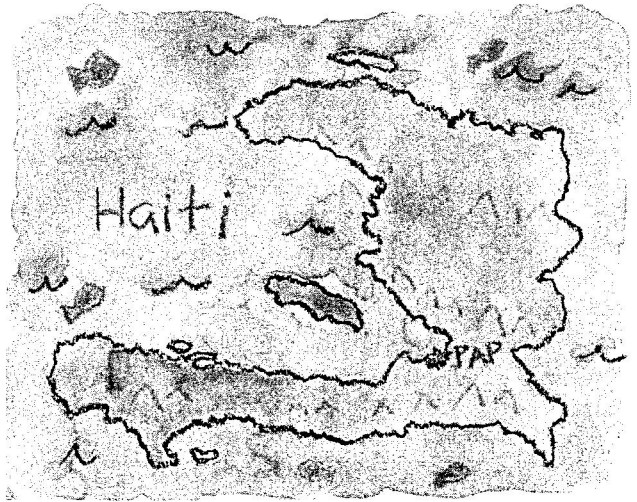
“從新殖民領地攫取的金屬不僅刺激了歐洲經濟的發展，有人也許會說，它們使得經濟發展有了可能，”加萊亞諾寫道。這本書的副標題為“持續五個世紀對拉丁美洲大陸的掠奪”，其意義是一針見血的。”

加拿大勘探和開發人員協會（The Prospectors and Developers Association of Canada）估計，目前有20個加拿大礦業公司在玻利維亞經營。位於比利時的取消第三世界債務（CADTM）委員會最近出版一系列從西班牙文譯成法文的文章，探討了英國-澳大利亞鋁礦業巨頭力拓（Rio-Tinto）在議會反對巴拉圭總統費爾南多·盧戈6月22日政變中的作用[6]。

該公司竭力遊說，爭取一個廉價電力的長期協議，以便利建立鋁冶煉業務。巴拉圭與巴西和阿根廷分享幾個非常大的水電水壩。它已具備了大量的發電能力，約等於加拿大整個電量的5%。2007年，力拓收購了加拿大國有的加拿大鋁業公司（Alcan）和其在魁北克省和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的大型鋁業務。

政變使巴拉圭的傳統經濟精英重掌權力，他們順服地與力拓簽訂長期協議，這不是巧合。在少數幾個承認巴拉圭政變政府的國家中就有加拿大，加拿大還同美國一起，迅速承認了2009年6月的洪都拉斯政變政府。

在未來幾周內，當華盛頓和渥太華考慮如何進一步干預玻利維亞時，將不可避免地加強他們反對莫拉萊斯政府的言論。



海地局勢

2004年2月，華盛頓和渥太華與巴黎一起操作，執行一場針對當選總統讓-貝特朗·阿里斯蒂德的社會進步黨政府的政變。正如自由海地雜誌去年發表的維琪解密公開的外交電報顯示，這三個政府竭力讓阿里斯蒂德在南非流亡七年之久[7]。

2011年03月18日阿里斯蒂德凱旋回歸海地，他在機場向全國發表了講話。“為了紀念[海地的建國之父]讓-雅克·德薩利納，我們給你們帶來一點我們的幫助。”阿里斯蒂德用他充滿比喻的海地克里奧爾語說：“只要教育的小球處在尊嚴球場的 center，我們就能把排斥踢出球場，這樣的話，新的一代將開始受益於沉睡在海地深處的財富：黃金，銅，鈾，鋁礬土，銀……”。在米臘關（Miragoâne）發現的碳酸鈣

價值超過230億美元。石油儲備毫無疑問比估計的更大。

這一給全民的含蓄資訊，正是為什麼美國和加拿大政府的支持推翻阿裡斯蒂德政府，並維持聯合國對海地的軍事佔領至今的原因。在他所處的地方，華盛頓和渥太華代之以馬特萊的“向產業開放”政府。紐蒙特礦業與加拿大歐亞礦產合作，尋求在海地北部三個部門開設黃金開採業務。五月出版的海地平民觀察組織（Haiti Grassroots Watch）的研究‘海地淘金熱：誰將得到財富？’[8]，檢討了黃金礦業公司在推動開礦時，是如何規避海地法律的。海地平民觀察組織（Haiti Grassroots Watch）的主任簡·雷根6月1日對‘今日民主’（Democracy Now）談到了這項研究。[9]

其調查結果如下：

●前海地經濟財政部長現在為紐蒙特公司的高薪顧問。

●兩名海地部長最近與紐蒙特公司和歐亞簽署了“諒解備忘錄”，說這些公司可以在他們的勘探地點之一開始鑽井——而這是違反海地法律的。海地法律規定，沒有採礦合約是不允許鑽井的。

●沒有人出來告訴海地北部的社區發生了什麼事，閉門達成了些什麼事。

●在西半球，海地的開採特許權使用費（生產稅）最低。

合國對海地的軍事佔領，是帝國主義希望就像在殖民征服者時代那樣，確保其對海地礦產財富的掠奪。

去年九月在烏拉圭國家圖書館討論海地目前的困境及其在拉丁美洲的位置時，愛德華·多·加萊亞諾作了發言[10]。“對海地的軍事佔領，聯合國每年花費要超過8億美元，”他說。

“如果聯合國把這些資金用於技術合作和社會團結，海地可以很好地推動其建設性的發展。然後，他們將脫離武裝十字軍的魔爪，因為武裝十字軍的傾向是暴力，屠殺和製造致命疾病。”

十月評論 2012年第2/3期

“海地不需要任何人來加劇其不幸，”加萊亞諾總結說。“但是，海地需要聲援，醫生，學校，醫院，還有一個真正的協作，這個協作要能讓其被國際貨幣組織，世界銀行和其他慈善社團扼殺的主權獲得重生。”

如果跨國礦業公司在海地得其所逞，那麼海地一定會“倍加不幸。”[11]

- 羅傑·安妮絲是加拿大海地行動網路協調員和網站www.canadahaitiaction.ca編輯。他的EMAIL是rogerannis@hotmail.com。
- 金·艾夫斯是《自由海地》編輯，《自由海地》新聞週刊總部在布魯克林和太子港。

註釋:

[1] <http://haitigrassrootswatch.squares...>

[2] <http://www.theglobeandmail.com/repo...>

[3] <http://climate-connections.org/2012...>

[4] <http://www.cbc.ca/thecurrent/episod...>

[5] 《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首次出版於1973年。

2009年4月，在美洲首腦會議上，委內瑞拉總統烏戈·查韋斯把它作為禮物送給美國總統巴拉克·奧巴馬

<http://www.guardian.co.uk/world/200...>

[6] <http://www.europe-solidaire.org/spi...>

[7] <http://www.haiti-liberte.com/archiv...>

[8] <http://www.ayitikaleje.org/journal/...>

[9] <http://www.democracynow.org/2012/5/...>

[10] <http://www.canadahaitiaction.ca/con...>

[11]總部位於多倫多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團結網於2012年8月1日（星期三）發起了在整個美洲的行動，要求結束剝削和不公正的採礦做法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295>.



日本邁向核武裝的危險立法

趙京

2012年6月15日，要求停止所有原子能發展的民眾向日本政府提交了780萬人簽名的請願書，但野田內閣第二天卻決定重新啟動大阪的原子能發電所。更有甚者，面對去年的災難以來反對原子能開發的全民意願，在民主黨、自民黨和公明黨三大政黨絕對控制之下的日本國會於6月20日通過了由此三黨提出的《原子能規制委員會設置法》。其中，在第一條裡插入將原子能開發用於國家安全“我國安全保障”的條款。同時，1955年制定的《原子能基本法》中有關原子能開發的“民主、自主、公開”三原則的第二條也被此三黨偷換，插入了同樣的國家安全條款。這實際上是日本邁向核武裝的危險立法，除此之外沒有別的邏輯解釋。

提出法案的自民黨議員吉野正芳表示，這個條款是爲了把現在屬於文科省的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的安全措施轉移到原子能規制委員會，環境大臣細野豪志、經濟產業大臣枝野幸男、官房長官藤村修同樣也聲稱是爲了“防止核擴散”，保證日本政府絕對沒有想要將原子能轉用於軍事的意圖。但是，IAEA等防止核擴散的國際機構採取的安全措施（英文safeguards、日語“保障措置”）與主權國家擁有的國家安全（英文national security、日語“國の安全保障”）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日本政府的這點玩弄概念的小把戲可以收起來了。

最早試圖把“安全保障”塞入日本原子能政策的是由中曾根康弘起草的1955年9月12日在羽田機場發表的四人“國會議員團共同聲明”，但在實際通過的《原子能基本法》中，爲了避免黨派抗爭，全面採用了日本學術會議有關原子能開發的和平利用三原則，去掉了“安全保障”的字眼。但後來歷屆自民黨政府總是念念不忘如何將“安全保障”塞入日本的原子能政策。當時，日本的左派社會黨、右派社會黨與右翼的民主黨、自由黨在國會的勢力相當；今天，日本的反對黨（共產黨9名議員、社會民主黨6名議員）在眾議院國會（480名議員）中微不足道。

（<http://www.shugiin.go.jp/index.nsf/html/ind>

[ex_kousei2.htm](#)），提出《原子能規制委員會設置法》的三大政黨在眾議院佔有近九成的席位，他們可以爲所欲爲。實際上，他們修訂此法時並未經過聽取公共輿論，也沒有在國會充分討論，事前也沒有上傳到國會的網頁上，連國會的另外的小黨也是在投票的當天上午10點才接到這個長達265頁的法案，就是怕人事先知道。聯繫到宇宙航空研究開發機構(JAXA)設立法中也刪除了將宇宙航空開發限制在和平日目的條款，《朝日新聞》、《東京新聞》6月22日的社論都強調：“不能容忍在沒有國民討論的情況下修改直接與國家政策相聯繫的原子能、宇宙開發等科學技術法律。”“民主黨和自民黨成爲一體，隱瞞了修改意圖。沒有通過正常程式修改了法律內容，損壞了立法部門的名聲。”“應該在下一屆國會刪除此問題條款。”

日本國會基本上完成了向沒有反對黨的“大政翼贊會”的倒退。6月26日，日本三大黨又重演鬧劇，把進一步壓榨窮人的消費稅從5%分兩階段提高到10%。這一次，從冷戰以來推動“大政翼贊”過程的始作俑者小澤一郎被“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野田集團（多出自“松下政經塾”）拋棄，帶領50名左右的眾參兩院議員出走，打出了“反對增加消費稅”、“脫離原子能開發”的旗號，意圖在於吸收被三大政黨拋棄的選民，是這位“風雲人物”最後的迴光返照。

另一方面，對於被金錢控制的代議政治完全失望的日本民眾開始了直接行動。7月16日，17萬人出席了在東京代代木公園舉辦的“10萬人對原子能開發說再見！”集會。在旌旗林立的男女老幼隊伍中，連半個世紀前反對“安保條約”的大學旗號也出現了。日本民眾在經歷了1989年冷戰結束以來政治經濟的連續反動，已經沒有撤退的餘地了。日本社會兩大階級的陣線越加分明，它們的對壘會越加激烈。

註：此文引用主要來自東京新時代社《かけはし》週刊2012年7月2日號。

[趙京，中日美比較政策研究所，2012年7月24日]

無人機的硝煙

趙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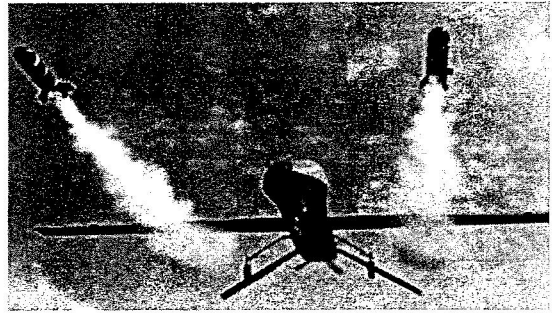
今天（5月28日），我從網上搜索 drone（無人駕駛飛機，也叫 UAV: Unmanned Aerial Vehicle），馬上讀到“美國無人機在巴基斯坦-阿富汗邊界的自治部落地區至少殺死 8 人、傷亡多人”、“還有五架無人機盤旋在上空，給居民造成極大恐慌”、“今年以來，至少有 120 人被無人機殺害”的報導¹。同時，美國國防部長 Panetta 再次強調無人機攻擊“絕對必要”。

4 月 28-29 日，反戰團體“桃色代號”²在華盛頓的一個教會舉辦“世界無人機峰會”，但是來自當今無人機主戰場巴基斯坦的主講人律師 Shahzad Akbar 卻無法得到簽證與會。Akbar 過去幾次來過美國，還幫助美國國際開發署、聯邦調查局在巴基斯坦的工作，他怎麼也變成“恐怖分子嫌疑”了呢？因為 Akbar 律師近年來開始為巴基斯坦的無人機受難者的人權辯護，逐漸引起國際上的注意，讓我們聽到了巴基斯坦法庭傳訊美國中央情報局在巴基斯坦的頭頭（他狼狽逃脫巴基斯坦）這樣的維護和平、人權、正義的國際新聞。我得知“桃色代號”的創始人之一、反戰女士 Benjamin 本月剛出版了《無人機戰爭》，立即購買，幾乎一口氣讀完。³



在本書，Benjamin 提出了許多事實和問題，發人深省。奧巴馬靠反戰贏得了總統權力和諾貝爾和平獎聲譽，但他全面推行無人機戰爭、維持和擴

張了小布殊的“反恐”名義下的恐怖主義戰爭。雖然沒有正式資料，綜合美國 New American



Foundation、英國 Bureau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和巴基斯坦 Body Count 民間組織的非正式統計，在巴基斯坦的無人機死難者已經達到 3 千人左右⁴。五角大樓 2000 年時只有 50 架無人機，十年以後有近 7500 架。雖然軍事預算被迫縮減，無人機預算卻不斷增加（17 頁）。暫時不計在中央情報局、國土安全部服役的無人機，考慮到美國國防部的現有傳統有人駕駛飛機數量 10767 架⁵，可以預計，幾年以後，無人機將成為美國空軍的主力。有人以為無人機比傳統飛機的服役便宜，其實不然。例如，主力機 Predator⁶ 升空一天需要 168 人協同作戰，大型的 Global Hawk 則需要三百人，而目前一架 F-16 戰鬥機需要的協同人員不到一百名。無人機的硝煙從阿富汗、伊拉克的戰場擴散到巴基斯坦、伊朗、葉門、索馬里、利比亞、土耳其、埃塞俄比亞、沙烏地阿拉伯、阿聯會、吉布地、烏茲別克、卡塔爾和敘利亞等 60 多處基地（59 頁）和非戰鬥地區，還活躍在美國的墨西哥邊界等處（目前只是有限地收集情報等功能，但誰能保證將來有一天，我們的後院飛來的一隻“小鳥”不是一架微型

⁴ 日本かけはし週刊，2012年5月14日。

⁵ U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Unmanned Aerial Systems,” January 3, 2012.

⁶ 據華盛頓郵報2011年12月21日報導，加州選出的共和黨國會議員Brian Bilbray說：無人機這樣受歡迎，將來有一天，Predator會被選為美國總統（55頁）。國會的Congressional Unmanned Systems Caucus五十名議員，幾乎是清一色的無人機戰爭和商業的朋友代言人。除了波音、洛克馬丁、雷神、Northrop Gruman等傳統大型軍工企業，新起的無人機專業公司也花費巨額用於政治遊說，所以無人機在國會這樣受歡迎。

¹ <http://www.nation.com.pk>

² <http://www.codepink.org/>。此名稱取自國土安全部的恐怖等級編號。

³ Drone Warfare: Killing By Remote Control, Medea Benjamin, OR Books, May 2012. ISBN 978-1-935928-81-2, ebook ISBN 978-1-935928-82-9.

十月評論 2012年第2/3期

UAV⁷在監視我們的一舉一動？)。本拉登的處死，也確認了奧巴馬的“殺害而不活捉”的政策。這個政策不限於本拉登或直接對美國宣戰的極端伊斯蘭好戰分子，甚至適用於沒有被判罪的（也就是說，無辜的）美國公民。2011年9月30日，美國無人機在葉門殺害了極端伊斯蘭宣教士美國公民 al-Awlaki 和他的助手，哈佛大學法學院畢業的憲法學律師奧巴馬立即宣佈這種暗殺是“反恐”勝利（130-131頁）。後來，連 al-Awlaki 在美國出生的 16 歲兒子也被無人機殺害。直到今年 3 月，奧巴馬的司法部長 Holder 才在西北大學法學院承認奧巴馬的戰爭沒有地理限制，在外國的無辜美國公民雖然有憲法賦予的 due process（中文通常譯為“正當法律程式”），但不是 judicial process 司法程式。大概，奧巴馬認為他聽了幾個顧問的意見，就履行了 due process，可以開殺戒了。怪不得電視主持人 Colbert 不得不感歎道：“看來，我們的建國之父們沒有這麼鑽牛角尖。要打贏這場沒完沒了的反恐戰爭，總免不了有受害者，其中的一個受害者就是我們的憲法”（143頁）。Benjamin 問道：如果古巴派出無人機到邁阿密來監視反對派並暗殺恐怖分子（如爆破民航機的 Luis Posada Carriles），如果俄羅斯派遣無人機到倫敦殺死車臣獨立分子，如果中國派遣無人機到紐約來刺殺維吾爾獨立分子，這個世界還有和平嗎？看來，諾貝爾委員會應該取消對奧巴馬的獎勵，轉給 Benjamin 這樣的反戰人士。

其次，Benjamin 還指出目前從事無人機戰爭的主角不是五角大樓而是中央情報局和國務（外交）部⁸。名義上，美國部隊 2011 年 12 月以後從伊拉克撤退了，但巴格達駐留著世界上最龐大的使領館：11000 名外交部人員和 5 千名私營武裝保安人員以及，——數目不詳的無人機艦隊（57 頁）。這也是奧巴馬選擇中央情報局局長 Panetta 出任國防部長的原因。中央情報局連對它是否從事戰爭區域以外的無人機行動的問題都不屑回答，而法庭竟然也對

挑戰中央情報局這一秘密戰爭政策的人權組織 ACLU 置之不理（59 頁）。更令人擔憂的是：由臭名昭著的黑水公司那樣既沒有軍事紀律、也沒有外交訓練、更沒有公眾監督的私營保安武裝公司“承包”中央情報局和外交部的一部分無人機業務（殺人），豈不“更有效率”？

Benjamin 的可貴之處在於她 2002 年親身在小布殊發動戰爭之後，馬上趕到阿富汗調查無辜的戰爭受害者的實情，知道了戰爭機器之下的謊言，明白美國的安全在於贏得阿拉伯世界的民心，而不是拉攏沙烏地阿拉伯的專制王族或葉門的獨裁者那樣的統治階級。維基解密透露的美國外交部檔顯示：統治了葉門 30 多年的 Saleh 批准了美國無人機在葉門的暗殺行動，在 2010 年 1 月向美國官員獻媚：“我們會繼續說這些攻擊是我們幹的，不是你們幹的”（66 頁）。無獨有偶，除了分享美國軍事技術的英國⁹，把無人機投入實際戰爭的另一個國家就是以色列。以色列在無人機戰爭的理論和實踐方面還是美國的老師呢！正如以色列國防部法律部頭頭聲稱：“你如果幹一件事久了，世界就會接受你。……國際法通過不斷地被破壞而演進。我們既然發明了（無人機）瞄準目標暗殺的倫理，就得幹下去。剛開始有很多抗議，很難放到法律框架裡去講。8 年後，這成了合法界定的中心了”（123 頁）。這個“國際法”的墮落，當然是因為小布殊在“9/11”後發動的戰爭所需。實際上，在此之前的兩個月，美國駐以色列大使 Martin Indyk 還譴責道：“美國政府對瞄準目標暗殺的立場非常明確：這是超法殺人，我們不贊成”（125 頁）。“9/11”以後，美國政府沒有人說它是暗殺了。一個原中央情報局官員 2011 年承認：“我們已經從幼稚園畢業了。我們從 2001 年就開始瞄準目標暗殺，已經建立起行為規範了”（123 頁）。美國濫用無人機的殺戒一開，馬上形成國際市場，以色列可以比美國更無限制地向沒有投入戰爭的中國、俄羅斯、法國、瑞典等公開推銷“經過戰

⁷ 插圖是美國國防尖端研究專案署委託 AeroVironment 公司開發的納米型蜂鳥機。

⁸ 中文一貫把 State Department 譯為“國務院”，不對。
十月評論 2012 年第 2/3 期

⁹ 2012 年 5 月 29 日後補：今天的華爾街日報（此文沒有中譯版）頭版報導奧巴馬當局決定出售戰鬥無人機裝備義大利的航空母艦，國會沒有議員反對出售，唯一的顧慮是高科技洩密，但義大利不太可能自行開發這樣複雜的無人機系統。下一個買主可能是日本“自衛隊”了。

爭考驗”的無人機，連美國最大的無人機專業公司 **General Atomics** 就是以色列工程師創立的。“反恐”戰爭，實際上就是要把整個世界變為擴大的中東火藥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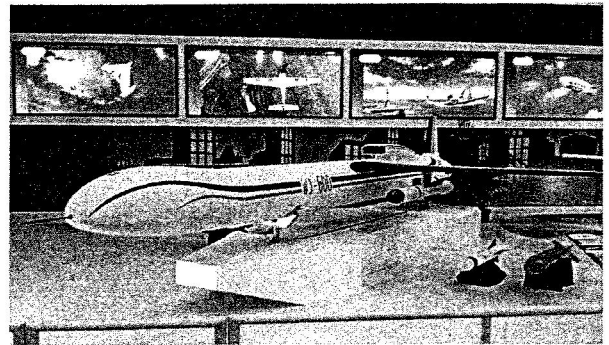
毫不奇怪，中國將成為無人機第二大國。2010年11月19日，中國在珠海航展上展示了至少25款無人機原型（插圖為裝備有數枚導彈的中國WJ-600無人機原型），震驚世界。今年5月14-15日，中國海軍艦艇編隊走出第一島鏈在西太平洋海域進行一系列作戰訓練，日本海上自衛隊的預警機、反潛巡邏機及偵察艇步步緊盯。在密切跟蹤中國海軍艦艇編隊行進路線及訓練課目的過程中，日方對中國艦載無人直升機的海上起降演練給予了特別關注。作為21世紀戰場上必不可少的武器，無人機對中國和美日同盟在從釣魚島到臺灣島、從東海到南海廣闊海域的較量，對於中國監視北部和西部的廣大山脈邊境，至關重要。

除了批判靠五角大樓採購單（也就是美國居民納稅）發財的新老軍工企業，**Benjamin**也介紹了美國社會仍然微弱但不斷成長起來的抗議無人機戰爭的運動。“**Creech 14**”（14位公民“佔領”拉斯維加斯邊上的空軍基地，這裡是萬里之外操縱按鈕直接暗殺巴基斯坦平民的刑警隊）和“**Hancock 38**”（38位公民“妨礙”空軍基地交通）就是抵抗無人機戰爭的非暴力抗爭典範。雖然他們都被法庭判處“有罪”，但正如列根手下的原司法部長**Ramsey Clark**為他們辯護的那樣：“他們要制止的是在本質上違反美國和國際法的無人機戰爭”，何罪之有？連法官在推遲4個月的審判之後，也承認他一直無法入睡，是反戰人士的教育宣傳和道義上的勝利（165頁）。奧巴馬任命的第一個國家情報總監、原海軍上將**Dennis Blair**就是因為不同意無人機戰爭以及整個“反恐”戰略而被奧巴馬趕走的。這個每年浪費800億美元的違反人道、侵犯人權的“反恐”恐怖戰爭，早該終止了。

當然，正如各國的民眾通過民主、人權的抗爭減少了世界核戰爭威脅一樣¹⁰，要把無人

機的恐怖硝煙趕出非戰鬥地區（這是第一步目標），要把無人機的情報收集功能控制在公開、透明的文職管理之下（這是第二步目標。例如，未得到當地社區同意不能非法入侵），要把無人機專用于社會福利事業（如科學研究¹¹、防災、搶險等），需要廣泛的全球社會公正運動。

[趙京，中日美比較政策研究所，2012年5月28日（美國陣亡將士紀念日）紀念無人機死難者]



附文：美國正在放棄扮演全球人權衛士的角色

<http://cn.nytimes.com/article/world/2012/06/29/c29carter/>

吉米·卡特 2012年06月29日

在違背人權的路上，我們這個國家已經越走越遠。像美國高官在國外搞暗殺，包括暗殺美國公民，這樣令人髮指的行為，不過是最近被曝光的例證之一。美國違反人權的活動開始於2001年9·11恐怖襲擊之後。這些活動得到了

業部與教育部共管）時，聽到鄧小平感謝我們說：“沒有核武器，我怎麼敢說中美蘇三角格局？”頗為自豪。但我因為試圖在清華大學組織獨立的學生會選舉，畢業時被取消入黨預備資格、發配蘭州；我因為在日本編輯雜誌，組織中國留學生的民主、人權活動，被沒收護照、被取消國家教委的獎學金、並被趕出大學和日本；我在逃來美國的十幾年無國籍難民身份期間，因為參加各種反戰、社會主義活動，也被國土安全部和聯邦調查局刁難。¹¹ 最新一期的2012年6月Forbes雜誌有一篇關於無人機高科技風險投資的報導，指出國防部最需要開發無人機之間的通訊軟體。看來，機器人之間的空戰為時不遠了。

¹⁰ 文革結束後，中國唯一的高科技就是“兩彈一星”。我1980年剛進入清華大學工程物理系（冷戰時期由核工十月評論 2012年第2/3期

司法和行政機構中兩個黨派的支持，並不斷升級，而且也沒有遇到公眾的反對。結果就是，我們的國家已經沒有資格以道德權威的身份在人權問題上發言。

雖然美國以前也犯過錯誤，但過去十年對人權的全面踐踏則是相比歷史的一次翻天覆地的變化。美國曾在1948年宣導並通過《世界人權宣言》，它被當做是世界自由，正義與和平的基石。這是一個大膽而明確的承諾，它宣示著，權力不再是壓迫人民，傷害人民的掩護。它規定，人人享有平等的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之權利，人人有權受到法律的保護，而不應遭受酷刑、任意拘禁或強制放逐。

爲了人權而奔走的個人和國際社會組織，曾經援引這份《人權宣言》，根據它的原則推翻了世界上多數獨裁的政權，建立起民主制度，並在國內和全球事務中推廣法治。然而，令人不安的是，我們的政府不但沒有強化這些原則，反而在他們的反恐政策中，很明顯地違反了《人權宣言》30個條款中的至少10條，其中就包括不得施以“殘忍、不人道或侮辱性的待遇或懲罰”。

美國最近的立法使總統有權無限期拘留懷疑與恐怖組織或其“相關勢力”有關的嫌疑人。這是一種寬泛而模糊的權力，且得不到來自法院或國會的任何有實質意義的監督。（該法案目前被一位聯邦法官阻止。）這項法案侵犯了言論自由權，以及個人在未定罪之前當被視為無罪的權利，而這兩項權利也是《人權宣言》中所確立的。

除了把美國公民當做暗殺和不定期拘留的目標，最近的一些立法還撤銷了1978年《外國情報監聽法》的一些限制，史無前例地允許政府侵犯我們的隱私權，從事不經許可的竊聽活動，偷看我們網上通訊的內容。很多被多數票通過的州法律還允許政府僅僅根據人的外貌、宗教活動和交遊圈子就實行逮捕。

現在，我們不僅有一條主觀的原則，只要是被無人機擊斃的男性，都被認為是恐怖主義敵人，而且我們還認為，如果空襲殃及了附近無辜的婦女兒童，那也是不可避免的。美國今

十月評論 2012年第2/3期

年在阿富汗對平民區進行了30多次的空襲，該國總統哈米德·卡爾紮伊（Hamid Karzai）要求美國停止攻擊。但是空襲仍在巴基斯坦，索馬里和葉門的非軍事區域繼續。我們不知道有多少無辜的平民在這些襲擊中死亡。每一次襲擊都是經過華盛頓最高層官員的許可。在以前，這樣的事根本不可想像。

這些政策很明顯影響了美國的外交政策。軍方和情報系統的高級官員，以及目標地區的維權人士都證實，無人機空襲的升級使得許多受害的家庭投向了恐怖組織，令普通民眾對我們持敵對態度，也給了壓迫人民的政府以口實，讓他們以美國的行爲爲藉口，爲自己的專制行爲辯護。

與此同時，古巴關塔那摩監獄仍然關有169名囚犯。其中有約一半已經獲准釋放，然而他們何時才能得到自由，還是遙遙無期。美國官方透露，爲了得到口供，那些少數接受了審判（只在軍事法庭）的人中，有的曾被施以上百次的水刑，受到半自動武器或機械鑽的恐嚇，或者被以性侵他們的母親相威脅。令人驚詫的是，這些事實不能被用來爲被告辯護，因爲美國政府宣稱，這些措施是出於“國家安全”的需要。而其他大部分的囚犯，還不知什麼時候才會被正式起訴或接受審判。

革命正席捲全球，在這種時候，美國應該加強，而不是削弱，法治以及《世界人權宣言》所確立的正義原則。但是，美國非但沒有爲世界的安全做出貢獻，它侵犯國際人權的行爲反而幫助了我們的敵人，疏遠了我們的朋友。

作爲一個關心國事的公民，我們必須說服華盛頓政府改弦更張，遵循多年來我們一直珍視並奉爲國策的國際人權準則，並根據這些準則，重建我們的道德領導地位。

翻譯：許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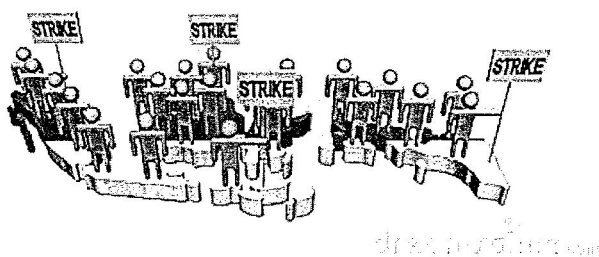
印尼工人運動的高潮

澤里·阿麗亞娜

整個2011年到現在，我們都看到工人激進主義的新浪潮。其標誌是，數千名工人在社會保障行動委員會（KAJS）的旗幟下動員起來，要求2011年中期通過社會保障（BPJS）法[1]。除了在工人組織之間對該法律的利弊有不同意見外，動員被證明是推動訴求的有效方式，而在佔領議會後，法律草案獲得通過 [2]。

2011年7月初，至少有8000個自由港麥克莫蘭銅金公司的工人罷工[3]近4個月。這是印尼後改革時代工人舉行的第一次罷工。工人封鎖補給車，動員他們的家庭和社區，要求把工資增加得超過最低工資標準。雖然他們沒有贏得他們的主要訴求，但他們堅決抵抗和爭取基本生存工資的強烈資訊，影響了印尼工人。

2011年年底和2012年年初，接踵而至的是圍繞全國最低工資標準談判的運動。2012年1月27日，在印尼西爪哇省勿加泗地區的7個工業區，至少動員了30萬工人。在為期三天的自發性罷工中，他們的抗議活動達到了高潮，一條高速公路被封鎖[4]。在雅加達鄰近的塔格朗（Tangerang），卡拉旺（Karawang）和普瓦卡塔（Purwakarta）等工業區，類似的活動在持續。巴淡島是一個鄰近新加坡的工業省，是著名的自由貿易區，在那裡以及在東爪哇的幾個工業區也有類似的鬥爭爆發。10萬多工人走上街頭 [5]。



該運動並沒有就此停止。2012年3月，在爭取合理工資的鬥爭後，勿加泗區成千上萬的工人群起反對燃料價格的上漲。接著大多數印尼的大城市的學生運動，來自不同工會的工人，

出現在反對價格上漲的運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顯示出相當大的決心。他們參與的人數以及方式，是一個新的發展。運動成功地推遲了燃料價格的上漲：在一場戲劇性的議會會議後，2012年3月30日午夜政府決定推遲燃料加價 [6]。

鬥爭仍在繼續

數萬名工人再次聚集在街頭，紀念2012年五一勞動節 [7]。要求維持生存的基本工資，反對外包以及用臨時工取代長期工的做法，為絕大多數人爭取終身社會保障。2012年7月12日，數千名印尼工會聯合會（KSPI）的支持者發起了一項運動，要求取消外包，在HOSTUM（停止業務外包，反對低工資）的口號下反對低工資 [8]。但是，運動的真正開始是在勿加泗。

從2012年五一勞動節後的一段時間，整個6月份，7月，8月，到現在為止，在不同的工廠和經濟區，該號召已經導致天天有自發性的罷工。它開始號召印尼工會聯合會（KSPI）的同志彼此動員和團結，但沒有人能阻止來自其他工會工人的自發支持。

超過4個月，動員的形式是所謂的“geruduk”即支援動員模式：用行動支援工人，因為他們中止了與管理層的談判，以便迫使老闆讓步。他們要求給合同工以長期性的就業。但是，一旦鬥爭開始，工人的要求可以很容易地變得更徹底，會涵蓋幾乎所有他們面臨的迫切的問題：低工資，裁員，工會破壞等。支持來自不同行業，特別是那些已經贏得了固定合同的工人。工人和積極分子通過Facebook組和黑莓手機，分發談判記錄並獲取支援[9]。

到目前為止，關於有多少工人因為這些活動贏得了永久雇用，還沒有官方資料。一個消息來源說有40,000人，但另一來源則說有18,000工人。不管直接受益於這些鬥爭的工人的數量

有多少，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即他們在工人之間創建了一個全新的團結感受，無論他們屬於哪個工會聯盟。“無限制團結”的口號正在成為現實。

在這個背景下，2012年8月印尼工人員工大會（MPBI）號召在9月和10月舉行罷工，以要求廢除外包和增加工資 [10]。印尼工會聯合會（KSPI）是現有印尼工人員工大會（MPBI）的工會聯合會中的先進之一。他們呼籲在全國14個地區舉行百萬工人大罷工，勿加泗是動員的心臟地區。

這個呼籲獲得了勞動聯合書記處（SEKBER BURUH）的支持，勞動聯合書記處由非MPBI成員的激進“紅色工會”組成。書記處認為，如果罷工涉及盡可能多的工會，那麼百萬工人大罷工只能是一個成功。但印尼工人員工大會（MPBI）只依賴於自身，特別是依賴印尼工會聯合會（KSPI），忽略了很多可能回應呼籲的獨立工會。“百萬罷工”可能變成虛張聲勢的事。書記處瞭解勿加泗運動和激進化的重要性，它在其中發揮了積極作用，這就是為什麼它支援呼籲的原因。



挑戰

罷工的呼籲本身是重要的。這是全國性大罷工反對該國低工資和外包的第一個呼籲。[11] 由於中央電錶人員聯盟在憲法法院贏得了他們的案子，部分取消了去年“勞動法”關於臨時工的兩款法條，因為在過去的4個月，勿加泗的‘geruduk（支援動員模式）’團結波浪，使得該呼籲獲得了真正的動力。

唯一令人擔憂的跡像是，印尼工人員工大會（MPBI）罷工的日期尚未決定。印尼工會聯合會（KSPI）提出了激進響亮的要求，這不是第一次，但與老闆談判所獲遠低於預期。在不同的時刻，印尼工會聯合會（KSPI）發言人說，他們並不是企圖取消外包，而是贊同勞工部長的建議，暫停外包[12]，或限制某些產品的外包，等等。這不是第一次：他們制定了激進的要求，以便動員普通成員的支持，但在與政府談判時，只提最低要求。

勞動聯合書記處（SEKBER BURUH）以及勿加泗不同地方和工廠的工會，努力保持並深化勿加泗的戰鬥化，推動印尼工會聯合會（KSPI）與其他工會的團結。無論印尼工會聯合會（KSPI）參與與否，勞動聯合書記處（SEKBER BURUH）都將嘗試最大限度地發揮它在這個過程中的作用。可以預期，在不同工業區真正的工人運動委員會，會在這一波的鬥爭中脫穎而出。

轉自KPRM-PRD 英語博客

► 澤里·阿麗亞娜是自由女性（Perempuan Mahardhika）全國委員會成員，人民解放黨（PLP --- 原人民民主黨 --- 窮人政治委員會 KPRM-PRD）領導委員會成員，其總部設在印尼雅加達。

註釋:

- [1] 整個2011年至今，我們....
- [2] <http://www.icem.org/fr/7-Asie-Pacif...>
- [3] <http://www.thejakartaglobe.com/home...>
- [4] <http://kprm-prd-english.blogspot.co...>
- [5] <http://libcom.org/news/strike-wave-...>
- [6] <http://www.thejakartaglobe.com/home...>
- [7] <http://directaction.org.au/issue23/...>
- [8] <http://workingindonesia.wordpress.c...>
- [9] 關於這種活動沒有英文新聞報導，但有一個例子<http://www.thejakartapost.com/news/...>，對 <http://www.thejakartapost.com/news/...> 也有影響作用。
- [10] <http://www.thejakartapost.com/news/...>
- [11] <http://www.mahkamahkonstitusi.go.id...>
- [12] <http://www.theindonesiatoday.com/ne...>

巴基斯坦：工廠更像死亡陷阱而非工作場所，工人更像奴隸而非人類

納西爾·曼蘇爾

9月11日是巴基斯坦勞工運動史上最黑暗最悲慘的一天，這一天在卡拉奇一家服裝廠發生的嚴重火災事故中，有300多名工人被活活燒死。

在這家工廠或其他工廠裏，火災事故不是第一次，而是被忽視的家常便飯，只是直到最令人髮指的罪行發生後，它們才被電子和印刷媒體曝光。300多名工人失去了他們寶貴的生命，成了資本主義利欲貪婪祭壇的犧牲品。

沒有人傾聽受壓迫者的呼喊，直至難以計數的傷害和難以想像的苦難加諸於他們，在這個意義上，社會是罪惡殘忍的。阿里公司的工人有同樣的遭遇，阿里公司位於卡拉奇工業區的哈布河路，過去那裏發生了幾次火災，但沒有一個政府機構採取過任何嚴厲的行動。

據瞭解，根據我們的工廠法註冊規定，該工廠是非法設立的。它是一個以出口為導向的工廠。在巴基斯坦，為了逃避規章管理和拒絕工人的合法權利，大多數工廠都未依據工廠法註冊。

該工廠的建設，沒有獲得卡拉奇建築管理局（KBA）方面的適當批准。在任何工作場所都很少見到安全措施，“阿裏公司”的情況也是這樣，那裏沒有其它疏散口，只有一個供500多名工人在緊急時候使用的出口，所有窗戶都上了鐵欄，門口和樓梯堆滿成品或半成品。

有發電機作備用電源，上面標有我們的適當安全防範措施，它成為了火災爆發的主要原因，它的鍋爐爆炸，幾個小時就毀滅了300名年輕的男女工人，許多屍體還在瓦礫中。工廠沒有消防設備和機制。

大多數工人的合同是協力廠商間接合同，沒有聘任書（沒有辦法確定死者身份，現正在通過DNA做測試），沒有人註冊了社會保障（Social Security）和雇工老年福利協會（EOBI）和工人福利委員會/基金（Worker Welfare Board/Fund）。不允許工人成立工會，不允許工人有集體的談判權。倖免於難的工人說，工廠本身有保險，但工人沒有，他們還指責說，

老闆沙希德·貝拉自己過去曾策劃過火災，以便得到巨額保險索賠。

巴基斯坦全國工會聯合會（NTUF）率先對事故作出反應，並在卡拉奇組織抗議活動，要求逮捕工廠老闆，並立案追究有關部門主管的刑事責任，要求勞工部長和工業部長，信德省省長和首席部長因他們的嚴重疏忽而辭職。

巴基斯坦全國工會聯合會（NTUF）還要求賠償死亡工人的家屬100萬盧比（PR），賠償受傷的工人40萬盧比（PR）並給予免費醫療。要求在職工代表機構的協作下，開始嚴格的勞動監察，根據工廠法註冊所有工廠，真心誠意地遵守健康和法律，取消可怕的公司制度，頒發聘書給所有就業的工人，把他們註冊在社會保障和老年福利機制和職工福利計畫上。

巴基斯坦全國工會聯合會（NTUF）還呼籲國際工人組織，對國際品牌和標籤商施加壓力，強制當地製造業嚴格遵守相關的勞動法律法規，以及遵守國際勞工組織公約和國家法律制定的工作場所的安全標準。

最新消息：

*據悉，火災時工廠裏有650名工人

*地下室充滿了高達16英尺的燙水，還獲悉，在意外發生時，地下室有工人的喊聲，他們有250人，因此有人擔心，還有死者屍體仍然留在地下室。

*在火災中死亡的女工超過100人

*也有跡象顯示，有一些死者為童工

2012年9月12日

►納西爾·曼蘇爾是巴基斯坦全國工會聯合會（NTUF）副秘書長

西班牙5月15日運動中的女權主義實踐

桑德拉·厄茲庫俄拉



5月15日運動是由男人女人共同創造的抗議空間，它重蹈了其前輩的覆轍，擔心女權主義會分裂而不是加強該運動。5月15日運動還未找到一個工具，可以用來識別深植其內心的男性主義邏輯，並將他們按照女權主義的觀點加以轉換。結果是渲染無形的暴力，讓婦女的聲音沉寂。

2011年5月以來，5月15日運動已聚集了龐大而多樣的各級民眾，只不過幾個月前，這些人還只是心懷不滿地遠處觀望危機，現在他們則在政治上積極的參與運動。今天，真正的重要性在於它意想不到地創造了新一代重要的積極思想者，他們思索，辯論，還有最重要的是行動。在幾十個西班牙城市中，5月15日運動引發了一些長時間的，最分散的，節慶似的，群龍無首和充滿希望的示威。它有助於傳播一種感覺，“是的，我們做得到”和“聯合我們的立場”；對於此前關於資本主義必然性的無可懷疑的話語，其新自由主義的公式及其持續的危機，它也傳播了不可逆轉的不信任。

除了它的演變，成功和失敗外，接下來的是對運動中的女性特殊經驗的反思，反思運動能夠在多大程度上整合女權主義的實踐和話語。我會首先在社會歷史的背景中給運動定位，表明背景的性別情況。其次，我會問，在話語權上，在初期運動中心的實踐，動態和角

色方面，在什麼程度上，5月15日運動為女權鬥爭的演變作出了貢獻。

這種分析的來源，有參與了巴塞隆納5月15日運動的作者自己，有與西班牙眾多女權主義活動家的對話，還有2011年5月15日以後的個人和集體有關運動進展的報告和記錄。正如5月15日運動的特徵是其巨大的多樣性和異構性一樣，已經啟動（或已經發展）的女權主義也是如此。雖然5月15日運動女權主義者的各種經驗分佈的地域相當廣泛，甚至是暫時的，本次調查嘗試綜合最相關的經驗，希望盡可能多的反映他們的積極方面，也反映他們較少積極的一面，從而有助於做全面的瞭解，這會讓我們持有一種真正的女權主義的義憤。[1]

一個女權主義者看到的現在：我們在談論什麼樣的危機？

2011年5月15日星期日的抗議口號，“我們不是政治家和銀行家手中的商品”，有很大的優勢，能把5月15日運動的主要觸機凝結成一個單一語句：一方面，危機的結果，使得大片人口的社會和經濟權利顯著的減少，另一方面，對一個政治階級的不信任在不斷增長，該階級被視為是腐敗的，而且無能解除國家的危機。

儘管西班牙女權運動近年來已做了大量的工作，凸現經濟危機和最近的（緊縮）改革影響婦女的各種方法[2]，但這並不是運動原來的譴責和要求。5月15日運動絕不是孤立的：自危機來襲，很多運動都在觸及當前經濟形勢的性別含義。面對危機早期階段男性失業率令人目眩的增加，不同傾向的媒體都認為，危機的特點之一，是它有望結束勞動力市場上的性別不平等。[3]

然而，今天的婦女，無論是在勞動力市場內還是在外，仍然處在非常脆弱的位置。從性別角度對危機的分析表明，如果2008年這一年看到了房地產泡沫的破裂和企業的危機 --- 兩者俱是男性為主的行業 --- 那麼僅僅幾個月後，勞動力需求的萎縮也傳到了服務行業，目

前在西班牙這個行業88.5%的人是女性。今天，女性的失業率為24.86%，男性失業率為24.09%。如果根據來源地分開該數位，我們就會看到西班牙本地男人的失業率“最低”，為21.54%，而外國婦女的失業率是35.06%，外國男人的失業率則高達41.72%！考慮到移民婦女集中在非正規經濟領域，她們的真實失業率應比官方數字要高得多，這是極有可能的。男性失業率的急劇上升，意味著越來越多的家庭依靠女人的薪水，許多婦女被迫加入勞動力市場。因此，婦女工作賺錢的比例，在2007年為48.94%，到2011年年底，這一比例已上升到52.91%。然而，這一增長並不伴隨著家庭照顧和責任的再分配。所有這一切，再加上作為家計的一部分，婦女家務勞動負擔的增加，以降低費用，使得女性的整體工作量增加，還有我們的日雙重工作量也加重。

性別不平等，仍然是勞動力市場上一個不可否認的現實，其表現是婦女臨時工和短工的高比例。我們在地下經濟的比例也比男人高：我們占未繳稅收入者的57.3%，在繳稅收入者中只占37%的比例。我們的平均工資比男性低22%，而80%的沒有退休金的“無經濟活動”者是婦女。

在西班牙社會主義工人黨（PSOE）和人民黨（PP）政府的反應中，從未就性別的角度看危機，這個情況一向如此。在危機的第一年，注入金融系統中的110億歐元的大部分，通過著名的“EEE計畫”（即政府救助計畫），進到了建造業，而這個行業在2008年，雇用了16%的男性，而只有1.9%的女性。而且救助協議所產生的合同中沒有規定聘用婦女。通過著名的2010年“砍削”計畫（Tijeretazo）而浮出水面的公共開支削減，還有從那時起執行的嚴厲的緊縮政策，會不斷地更新這個削減，當我們聚焦於醫療，教育和社會服務這樣的公共部門時，發現這些削減對婦女有巨大的影響。因此，對於減薪和公共部門工作崗位的消失，婦女是主要受害者。我們的社會和經濟的脆弱性，反過來又使我們對社會福利計畫的削減感覺更敏銳，當這些福利消失時，是女人，為我們無償地工作，彌補失去的公眾支援和服務。

勞工改革由“三駕馬車”提出，由西班牙社會主義工人黨（PSOE）和人民黨（PP）政府十月評論 2012年第2/3期

在2010年夏季至2012年春季實施，加強了勞動力市場的性別區分型工資，而且第一次退休金改革，越來越重視“貢獻原則”，這對婦女有負面影響：由於我們大量處在非正規經濟中，打短工，工資低，還有我們的謀生工作頻繁中斷，因為我們要照顧子女和其他家庭成員，這將使我們更加難以達到必需的貢獻水準，讓我們退休時獲得足夠的養老金。源于歐債危機的日益緊縮，對福利國家和公共服務有特殊的影響，讓政府把其社會保障的責任轉嫁給家庭（應讀作：女性）。

當女權主義變得憤怒...

我目前提出來的所有方面，都指向婦女在當前氣氛下的從屬地位的持久性，甚至惡化。然而，在大多數的危機經濟結算中，這種地位的從屬狀態是被銷聲匿跡的。這方面，5月15日運動也是有罪的，它最初的口號對於經濟形勢的性別特色沒有給以確認。在運動的第一周，如“女權主義”，“壓迫”和“性別不平等”這樣的概念，在許多會議裡，很難獲得任何共識，並遇到了很多阻力，原因是數百人對女權主義的說法缺乏認識，甚至有一定的反感，認為女權主義的說法不合理，過於激進或分裂。

在此背景下，她們感受到婦女聲音的沉默，儘管有一些分裂主義指控，許多女權主義活動家仍然在巴賽隆納的加泰羅尼亞會議大廳聚會，大家尋求創造一個空間，讓婦女，女同性戀者和變性者（身心-性向異者）參與討論，辯論和行動：一個‘女權鬥士’的集會。這個團體，不像其他陷入嘈雜爭論的委員會，它允許其成員推進其工作和宣傳，也讓運動的其他人都可以參與其中。在佔領廣場運動的最初幾天，女權鬥士寫了一個需求宣言，在巴賽隆納運動的一個最大聚會上，獲得一致通過。在該宣言中，女權主義者要求一個激進的社會變革，並從一個包容性的角度，考慮到婦女在社會和經濟秩序中的具體條件，對危機做出既定的反應：

“我們受到資本主義父權社會的壓迫。[...]我們希望社會以人民而不是市場為中心。我們希望當代（資本主義）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模式向服務於人類和地球的方向轉型。為了正確地

對付我們所面臨的各種危機 --- 環境的，食物的，能源的，經濟的，社會的和護理工作的危機 --- 投資於可持續發展的社會過程，發展城市和土地管理的新模式，把女權主義的焦點整合進這種轉型是至關重要的。 [...]我們要求就業機會和財富的再分配。減少工作量以便讓我們所有的人都可以工作。要求堂堂的專業和勞動條件。要求平等的再分配有償和無償工作，男女同工同酬，平等承認男女之間的工作。要求讓財富掌握在人民手中。 [...]我們要求認可照顧人民和家庭的任務，把這個任務整個社會化。 “[4]

這些分析和建議不僅同危機有關，而且也要求婦女，同性戀者，變性者（transsexual）和跨性別者（transgender）的參與，尋求真正參與的民主制度：“目前的民主制度是家長式的，並不代表我們。我們要循決策和政治行動的水平線組織社會。” [5]

女權鬥士是一個有凝聚力的，自主的組織，在處理一般的集會方面，具有舉世公認的合法性，在加泰羅尼亞5月15日運動的話語宣傳和動員中，它幫助促進和突現性別觀點，並要求婦女在辯論和行動中起核心作用。當她們用特殊的女權主義研討會，辯論和行動推進自己的議程時，她們也在眾多的場所協調運動，發出自己的聲音，並為更加團結的決策和動員貢獻她們的經驗。在所有這些事件中，女權主義團體形式的標誌，清晰可見，有自己的舉牌，有反對異性戀父權壓迫的象徵性行動，還有譴責緊縮經濟和政治危機對婦女的負面影響。

憤慨是女性化的嗎？

然而，凝聚鞏固一個女權主義者的空間，讓它的工作為人所見，這個任務不可能在所有發生5月15日運動的城鎮和城市達成。在一些地方，像畢爾巴鄂，埃爾切或布林戈斯，有一定的活動，比如增強人們對無性別歧視語言的需要的意識，或特別地組織女權主義的行動，但尚沒有一個關鍵的婦女群體準備（或能夠）把女權主義者的觀點系統地推向所有團體，或創造女權主義者的行動和討論空間。在維哥或帕爾馬等城市，在缺乏進展這方面，一個重要因素是某些部門視女權主義為低優先順序的，甚至是不相關的問題。同時，在加的斯，女

權主義工作組在即將開大會時，於馬德里和巴塞隆納發出了一個女權主義的宣言，它是發生在運動中心的豐富而有意義辯論的結果[6]，工作組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她們的宣言因“缺乏共識”而遭到了拒絕，因為它已經被加上了排斥和分裂的性質。另外，共識和完全一致之間的混淆，仍然使運動受到影響，這意味著，在300或400人的會議上，一個人就能阻止女權主義的建議。[7]

在巴塞隆納、馬德里、聖地牙哥這樣的地方，女權主義委員會和工作組有重要的影響和存在，即使在這些地方，也不能認為，這些團體已經成功地推動了整個運動的女性主義觀點的交流。這樣的交流如果實現的話，將意味著女權主義議程全面和有系統地出現在5月15日運動的話語和實踐領域裡。

女性主義話語權

正如馬德里的女權主義活動家在一個檔上的解釋[8]，在太陽門廣場（Puerta del Sol）女權主義思想交流的一些障礙，來自許多抗議者的大男子主義和同性戀歧視，在第一次大會上，甚至完全拒絕承認任何女權主義者的問題或建議。對於許多運動的參加者而言，女權主義同大男子主義一樣，只有性別相反而已。其他情況，如在聖地牙哥德孔波斯特拉，當女權主義者在大會上提出就歐洲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性別影響進行辯論時，她們必會聽到同在開會的活動家們的聲音，“我們不能討論這些實在微不足道的小問題” [9]

在5月15日運動中，性別話語權的（不平等）存在，到運動中心舉旗的女權主義積極分子的持續出現為止，並沒有造成多麼大的覺悟提升，卻導致許多婦女難以為繼的工作節奏和加倍的戰鬥。當她們推出這些想法時，它們常常好像已被接受，但如果她們不這樣做，幾乎沒有人會採取主動，就像塞維利亞女權主義團體（Las Setas Feministas）所說的，“我們的革命家同胞只看到了一半的不公正現象：直接影響他們的那一半” [10]。在一定意義上，5月15日運動中女權主義話語權的出現，繼續依賴於物質上“無處不在”的女權鬥士，通過批評，行動，文件，討論會和參預，緊跟具體的發展，發出它的聲音。然而，就像陽光運動者

所說的那樣，“我們想要得到理解，我們希望有影響力”。[11] 可以引起性別覺悟，或改造一個運動的集體框架的持續持久的女權主義合作，需要持續而廣泛的干預。到現在為止，在5月15日運動中，這個情況還沒有發生。

女權主義實踐

如果說在話語權領域中，運動仍然有很長的路要走，那麼實踐領域也是困難重重的。我們只需要記得，在佔領馬德里運動的最初幾天裡，當她們掛了一個橫幅，上面寫著“這場革命將是女權主義的，否則就完全沒有革命”，受到的是對女權主義的嘲笑，“滾，滾！”或“革命屬於我們所有的人！”。[12]一個人們稱作“大男子主義”的人，表演了他的蔑視，在成千上萬的人面前撕裂了橫幅。類似的事件也發生在聖地牙哥德孔波斯特拉的露營研討會，一面旗幟，上寫有“革命是女權主義的，否則就不是革命”，被挑釁拉倒。[13]這樣的事件非常清楚地表明，關於5月15日運動是所有鬥爭，包括女權主義鬥爭的交匯點這個問題，並沒有共識。

在抗議活動的頭幾個月，在實踐領域取得了重要的進展，比如，愈來愈多的人意識到，我們的語言裡有固有的男性主義偏向。雖然許多團體引入非語言的溝通，譴責某些詞彙的使用和異性戀或歧視性說法，但在避免男性語言形式的經常使用這方面，也作了更多的努力。然而，除了所用的字眼外，舉行大會的動機主要是由婦女推動的，她們設置合作的方法，辯論的流程和動態，而男人們繼續實行大多數的干預和政治主張。那些男人也作了發言，並控制演講台，自封為道德和知識權威，或經驗權威，除其他事項外，全不尊重婦女或娘娘腔男性在同一個平臺上講話的權力 [14]。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女性，尤其是年輕女性，往往鮮有機會，在大量觀眾面前講述“她們知道通常不受熱烈歡迎的，或僅僅因為她們是女人而預期會被打折扣”的問題[15]

因此，雖然在性別歧視的體現形式方面有可能已採取了某些積極步驟，但性別歧視的背景環境是很難解決的。例如，圍繞語言的性別層面，缺乏全面的辯論，這個缺乏是運動內在動態中更大缺乏的一部分：就分配任務，管理

關係或確定運動空間而言，性別不是分析的主要範疇。換言之，儘管性別是人類社會的基本組織原則，也是其中的角色，關係和不平等現象的基本組織原則，儘管日常現實中存在性別歧視和侵犯，這個事實要求制定一個對付它的方案[16]，但5月15日運動在其內心完全不把性別當成會引起分裂和壓迫的具有政治意義的問題。這導致缺乏適當的規範，用以約束任何形式的性別歧視侵犯事件或男人權力的濫用。就像奧布拉杜若（Obradoiro）廣場上的女性所說的那樣，“在奧布拉杜若廣場，看不見的性別歧視暴力和性別歧視控制行為及態度的存在，是一個日常活動中到處存在的現實” [17]。典型的一幕出現在巴賽隆納的一個委員會上，某（男性）調解員聽到了一位女子的投訴，因為她遭到一個男人的身體侵犯。面對此景，他無疑感到尷尬，調解員採取了貌似公正的做法，聲稱給侵犯者和受害者平等的發言權，還辯解說，他不能肯定誰說的是真話，誰在說謊，他推卸責任，保持沉默。這樣，他否決了她和其他女人確定的權利，這個權利的定義清楚明白，毫無歧義，它規定，侵犯行為從一個人感覺受到威脅的那一刻起就存在。

另一個揭示運動的性別動態的情節發生在6月初，當時，馬德里的女權主義委員會宣佈，其成員將停止在太陽門廣場（Puerta del Sol）過夜，原因是性別歧視和他們遭受或親眼所見的同性戀侵犯，而且這些事件被銷聲匿跡，眾人也沒有意願來解決這些問題[18]。在佔領運動經歷一個微妙的重新定義的時刻，雖然許多媒體使用聲明來詆毀5月15日運動，但運動的法律委員會和其他聲音，都盡力否認法律事件的存在，從而減少問題的涉及面，再次顯示了運動面臨巨大的政治挑戰，即如何處理一些男人侵犯人權及濫用權力的問題[19]。在這種情況下，性別問題表明，重要的不是依法處罰或不處罰的問題，而是已經有一些女性露營者，證明了在太陽門廣場（Puerta del Sol）等所謂的自由場地並不感到安全。對於這個情況缺乏政治解決方案也意味著，針對性別歧視的侵犯，很多女性不得不選擇個人解決辦法，而不是尋求集體性反應。因此，在實踐中，不是驅開侵犯或把營地侵犯者（如果他們是露營成員）趕走，反而是受害者從理論上甚或在實際上被排

除。奇怪的是，運動從來都毫不猶豫的聲明說：“合法的不一定是對的”[20]（正如其眾多的公民抗命行動所表明的那樣），在目前的情況下，性別公正的概念居然要服從合法性的話語，要保護運動的公眾形象。

5月15日運動還沒有找到辦法，識別其內心深處的重男輕女邏輯，反思其影響，並從女權主義角度審視它們。結果是助長暴力於無形，使婦女的声音沉寂。在這兩種情況下，一個機會錯過了，這個機會就是集體學習，限制損害，損害賠償並確保這些損害不再出現。政治上的正確性和否定都伴隨著可理解但不合理的關注，這個關注就是，這些事件傳揚出去，可能會羞辱和削弱運動。作為男性和女性共同創造的一個抗議空間，5月15日運動重複其前輩的錯誤，擔心女權主義譴責其內部的矛盾而分裂運動，而不是希望通過解決這些問題加強這個運動。

朝向一個真正的女權主義義憤

5月15日運動代表西班牙政壇最近數十年來最意想不到的和重要的現象之一，我們必須牢記，它的特點是不滿情緒的大規模聚集，而不是一個替代現存社會政治經濟制度的一致全面變革的建議。5月15日運動不是一個嚴謹的運動，對現有的不平等現象沒有確定的分析，也沒有具體的解決建議，就像一個虛幻的空間，沒有既定的邊界，到現在為止，其主要作用是提供一個場所，表達和分享廣泛而日益嚴重的社會不安。這並不意味著，在運動的核心，為了嘗試落實和加強其話語權和實際行動，沒有出現過緊張，辯論甚至爭鬥，但所有這一切的結果取決於正在進行的運動過程。

自運動誕生以來，特別是2011年在11月右翼人民黨在選舉中獲勝後，對婦女社會權利的攻擊成倍增長。在運動首個月令人目眩的快速動員後，運動有時間反思其優先事項，其組織和方向。雖然，一方面，本文強調女權主義分析與實踐對5月15日運動的巨大價值，另一方面，也指出其不可否認的局限性，要斷言從這裡開始將採取什麼步驟，是不可能的。我們只能希望，它們將是積極正面的。

整個歷史上，許多社會運動過程表明，給性別關係劃等級，質疑和改變性別關係，是不

容易的任務，因為性別關係在抗議和不滿者的男女環境中確定我們的社會。儘管有一些好的特例，像“憤怒反對太陽門大男子主義 (Indignados Contra el Machismo de Sol)”團體，但是在目前的環境中，女性主義和女權主義者繼續遇到很大的阻力。不過，不要沮喪，我們可以使用這些困難的表達作為警醒，在消除我們遭受的不平等的路上，我們邁出的任何一步，都是積極的一步。

如果去年5月，有成千上萬的人來到我們的城市廣場，生平第一次從事政治活動，如此迅速地克服了他們的恐懼和冷漠，參加群眾辯論；阻止幾十個家庭失去家園；對眾多的政治，宗教和司法決定表示懷疑；在其他的挑戰中，還有譴責員警暴力，這可能也提醒我們，女權主義團體孜孜不倦的，關鍵性的示範工作，可以確保這整個新的，政治化的，反叛的一代的憤怒也變成一個女權主義的憤怒。

最終，不是僅僅滿足於指出來自經濟的，政治和體制的不公正和虐待，這還可能意味著，男人和女人們，不管是去過的，正在去的，還是要繼續去到街道和廣場的人，也敢於正視那些不公正和虐待，而這些不公正和虐待正是他們，我們，所有人製造出來的，大家也遭受其害，並助長它們於無形。

* 資料來源：開放的民主。

* 本文的西班牙語原版由方達松·貝可發表於互聯網上。

* 本文由奧利·布洛克翻譯成英文。

註釋

[1] 厄茲奎拉，(Ezquerria, S.) “29S：我們遺留下來的禮物”，公眾報，2010年9月16日，第5頁，厄茲奎拉，(Ezquerria, S.) “危機與平等”，公眾報，2010年11月19日，第9頁，厄茲奎拉，(Ezquerria, S.) “養老金的隱藏面。”公眾報，2011年7月2日，第5頁。加爾維斯，L. 和托雷斯，J. (2010年)，不平等：金融危機中的男人和女人。巴賽隆納：伊卡裡亞島；哈闊特，W. (2009) “金融危機對西歐婦女的影響”，拉讓娜伽 (Larrañaga, M.) (2009年) “婦女，天氣，危機：各種組合。”

“經濟評論”，8；奧特克斯阿，（Otxoa, I）（2009年），“反資本主義：女性主義的一些原因”，南風雜誌，104頁；佩雷斯·奧羅斯科（Pérez Orozco, A.）（2009），“反資本主義的女性主義，這一可恥的事情及其他”文章出自‘女權主義大會’一書：格拉納達的過去和現在。編輯，“女權主義組織的國家協調”，馬德里，2010年，錢伯斯，L.（2009）研究報告。危機的救助。巴賽隆納：加泰羅尼亞語學院。

[2] 厄茲奎拉，（Ezquerria, S.）“29S：我們遺留下來的禮物”，公眾報，2010年9月16日，第5頁，厄茲奎拉，（Ezquerria, S.）.“危機與平等”，公眾報，2010年11月19日，第9頁，厄茲奎拉，（Ezquerria, S.）“養老金的隱藏面。”公眾報，2011年7月2日，第5頁。加爾維斯，L. 和托雷斯，J.（2010年），不平等：金融危機中的男人和女人。巴賽隆納：伊卡裡亞島；哈闊特，W.（2009）“金融危機對西歐婦女的影響”，拉讓娜伽（Larrañaga, M.）（2009年）“婦女，天氣，危機：各種組合。”“經濟評論”，8；奧特克斯阿，（Otxoa, I）（2009年），“反資本主義：女性主義的一些原因”，南風雜誌，104頁；佩雷斯·奧羅斯科（Pérez Orozco, A.）（2009），“反資本主義的女性主義，這一可恥的事情及其他”文章出自‘女權主義大會’一書：格拉納達的過去和現在。編輯，“女權主義組織的國家協調”，馬德里，2010年，錢伯斯，L.（2009）研究報告。危機的救助。巴賽隆納：加泰羅尼亞語學院。

[3]除了其他新聞，在以下報刊文章裡可以發現這種要求：“Medidas especiales para los parados. El Gobierno llevará propuestas nuevas al diálogo social”（公眾報，25/10/2008）；Hidalgo, S. 和 Valmorisco, C. “Los mileuristas son ahora los cabezas de familia”（公眾報，27/4/2009）；Peirón, F. “Los empleos son para las mujeres”（先鋒報，12/9/2009）；Moreno, J. “El paro sube en 98.906 personas en octubre”（公眾報，3/11/2009）；Moreno, J. “El paro sube otro escalón: marzo deja 25.988 desempleados más”（公眾報，6/4/2010）；西班牙沒能逃過這一現象，其他國家的媒體也斷言，在勞動力市場上，經濟

十月評論 2012年第2/3期

衰退影響婦女較男性為少（見“每日郵報”，2009年5月）以及“大男子主義的死亡”（外交政策，2009年9月）和“男人之終結”（大西洋月刊，2010年8月）

[4]女權主義義憤（Feministes Indignades）博客：<http://feministesindignades.blogspot.fr/>

[5]女權主義義憤（Feministes Indignades）博客。

[6]加的斯5月15日運動女權主義工作組的維琪。<http://comisionfeministacadiz15m.wi...>

[7]FeminismoSol網站：<http://feminismosol.net/>

[8]FeminismoSol網站。

[9]VVAA（2012年）R-Evolucionando。5月15日運動中的女權主義（Feminismos EN EL 15-M），巴賽隆納：ICARIA，第53頁。

[10]VVAA（2012年）：R-Evolucionando。5月15日運動中的女權主義（Feminismos EN EL 15-M），巴賽隆納：ICARIA，27頁。

[11]FeminismoSol網站。

[12]FeminismoSol網站；賽凡提斯，LI，“義憤？”（言論自由，2011/11/22）

[13]VVAA（2012年）：R-Evolucionando。5月15日運動中的女權主義（Feminismos EN EL 15-M），巴賽隆納：ICARIA，第51頁。

[14]FeminismoSol的網站。

[15]R-Evolucionando，5月15日運動中的女權主義（Feminismos EN EL 15-M），巴賽隆納：ICARIA，第53頁。

[16]範載恩（Fanzine）“Torres más grandes hemos visto caer”，P. 17：<http://es.scribd.com/doc/protected/...>

[17]：R-Evolucionando。5月15日運動中的女權主義（Feminismos EN EL 15-M），巴賽隆納：ICARIA，第49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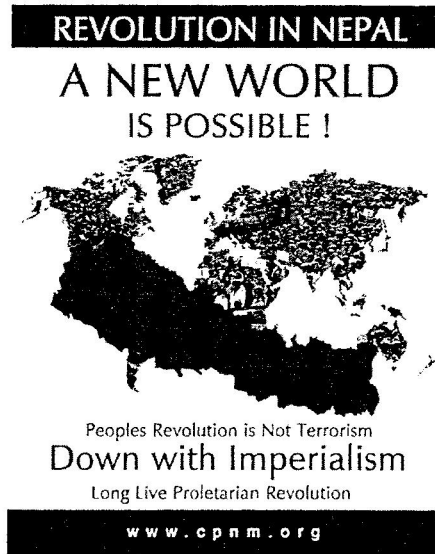
[18]在其公報中，他們解釋說，他們知道這種“性恐嚇，觸摸，邪視，手勢；權力的拒絕和濫用；身體上的侮辱和侵犯；非自願性接觸；家長式態度”是侵犯行為，FeminismoSol網站。

[19]歐洲新聞社，“太陽報澄清說，沒有性侵犯法”（先鋒報，2011年3月6日）。

[20]這是巴賽隆納運動提出的主要論據之一，因為他們宣佈，他們打算阻止定於2011年6月15日的議會辯論。

一分爲二：尼泊爾毛派的危機

亞曆克斯·德容



經過十多年的毛派叛亂和2005年由國王發起的政變後，2006年4月尼泊爾人民走上街道，迫使國王把權力交還給議會。終結了世界上僅存的印度教王國，但這只是該國持續的政治危機的新一步。毛主義黨，尼泊爾聯合共產黨（毛派）（UCPN（M））陷入危機，分裂已經不可避免。

自2006年起，六年以來，尼泊爾政府一直未能擬訂一個憲法，作為新的，民主的尼泊爾的基礎。制憲會議（CA），在2008年選出，原本爲期兩年，但即便數次延期，仍然一籌莫展，無法達成任何協定。無視最高法院關於制憲會議（CA）不能延長的判決，總理和毛派黨副主席巴布拉姆·巴特拉伊針對該判決提交了一份提案。最高法院裁定他蔑視法律，否決了其提案，於是在5月28日午夜巴特拉伊解散了制憲會議（CA），呼籲舉行新的選舉。最後的絆腳石是制憲會議（CA）裡的反毛派聯盟，因為他們拒絕允許改變政府結構，拒絕給該國的少數族群更大的自主權。[1] 這是尼泊爾第二個毛派政府的結束。右派希望選舉會讓他們改變，發展得足夠強大，不僅僅是在制憲會議阻止任何進展，就像他們過去四年裡所做的那樣，而且也影響其進程。

毛派則希望選舉帶來機會，打破僵局，讓他們自己的隊伍有發展，尚不能確定他們是否可以重複他們2008年令人吃驚的選舉勝利。在巴特拉伊的黨，即尼泊爾聯合共產黨（毛主義）（UCPNM）的內部，對黨領導層的批評一直在增長，尼泊爾聯合共產黨領導了十年的武裝鬥爭，控制該國大多數地區，然後與政府達成停火協議。巴特拉伊和其他領導人被指控背叛革命和著手分裂的準備工作已幾個月。要瞭解尼泊爾聯合共產黨（毛主義）（UCPNM）的危機及其領導的第二個聯合政府結束的緣故，有必要看看其領導人的戰略演變。

這次危機中的新一步

現存政黨和毛主義者之間的談判，自2005年起建立了一個框架，導致2006年5月的停火和2006年12月“全面和平協定”（CPA）的簽署。經過長時間的延誤，在2008年4月舉行了選舉，選出了制定新憲法並作為臨時議會的大會。令大多數觀察家驚訝的是，毛派贏得了巨大的選舉勝利，斬獲了三分之一的席位，成為議會第一大黨。其主席，普什帕·卡瑪律·達哈爾（Pushpa Kamal Dahal），即著名的普拉昌達（所謂‘兇悍者’），成為了總理。[2]

但尼泊爾的政治危機仍在繼續。很長一段時間，主要矛盾的一方是舊議會各黨派，另一方爲毛派。這些舊政黨中，最重要的是保守的尼泊爾大會黨（Nepali Congress，NC）和聯合馬列主義共產黨（the Communist Party United Marxist-Leninist，UML，既不是馬克思主義的，也不是列寧主義的黨，它在大部分叛亂中支持國王）。[3] 這些政黨同其他政治力量一起，抵制激進的變革，和抵制新憲法的制定，避免改變現有的權力關係而對他們不利。在另一邊是毛派，他們掌握了政府機構和選民的支持，聲勢蓋過其他任何單獨一個政黨，但是對議會政治的遊戲比較陌生，對基於政治機器的人事有影響。

毛派主義者強調，他們並沒有放棄自己社會革命的目標，他們參與議會，只是走向這個目標的一步。按照尼泊爾聯合共產黨（毛主義）（UCPN（M））的毛澤東思想，革命需要經過兩個階段。首先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是建立社會主義的一個步驟。[4] 這個第一階段要完成“資產階級民主”的任務，如土地改革，所有公民的平等權利，廢除君主制，維護國家主權，尤其是反對傳統的敵人印度。雖然尼泊爾毛派贊成多黨制，包括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多黨制，但他們堅持認為，這第一階段應在革命力量的領導下，立即開始為第二階段即社會主義革命奠定基礎。[5]

自2006年以來，尼泊爾的政黨和統治階級，在美國，尤其是印度的幫助下，試圖把毛主義者引進議會和制度化的政治，並說服他們把新民主主義革命推遲到不確定的未來。尼泊爾的政治格局由權力人脈網路控制，政黨一直在努力把毛派整合進這些網路及其政治機構，並把它中立化，就像現在組成聯合馬列主義共產黨（UML）的那些黨派，幾年前這些黨派已被中立化了。[6] 在2010年嘗試過一個失敗的起義後，特別是在毛派人民解放軍（PLA）被解除武裝和解散後，加上尼泊爾聯合共產黨（毛主義）（UCPN（M））許多其他的讓步，持不同政見者陣營擔心，舊有勢力在這方面的成功會讓他們不斷增長。這導致了這段時間在尼泊爾聯合共產黨（毛主義）（UCPN（M））內部左翼和右翼之間出現一個新的矛盾。

分裂

在過去幾年中，尼泊爾聯合共產黨（毛主義）（UCPN（M））實際上分為三個權力中心。右翼圈子的代表是巴布拉姆·巴特拉伊。巴特拉伊雄辯而且學歷高，是尼泊爾聯合共產黨（毛主義）（UCPN（M））的首席外交官，負責同其他政治力量接觸，領導一個重要的統一戰線，該陣線包含各種尼泊爾少數民族的民族解放組織。他是黨內第二號人物，位居普拉昌達之後，也被認為是其最重要的理論家。巴特拉伊一直認為，在目前的地緣政治環境中，一場社會主義方向的革命在尼泊爾是不可能的。他援引的論據是，尼泊爾在資本主義的中國和親美的印度之間的位置，其小規模的人口，天然

資源或經濟設施的缺乏，還有低水準的發展。尼泊爾人口不到3千萬。1998年，在毛派發動其“人民戰爭”的兩年後，尼泊爾約82%的勞動力受雇於農業部門，絕大多數是小農戶，失地農民，或者是佃戶，這些佃戶必須向地主繳納他們至少一半的收成和免費勞務，以換取一塊土地的使用和生活保障。尼泊爾農業發展還比較落後，按作物產量及每個工人的附加值計算，在南亞是最低的。[7] 2000年，全國成人識字率只是略微超過50%，而平均壽命低於60歲。[8] 契約勞工只是幾年前才在法律上廢除了，實際仍然存在。據聯合國人類發展指數的排名，尼泊爾在177個國家中居第137位。

尼泊爾不穩定的另一個原因，是大量的少數民族受到壓迫。在人民戰爭之前，尼泊爾已經被正式確認為“多民族”和“多語種”，有不同“官方語言”的國家。但親民主運動的要求是讓尼泊爾成為一個世俗國家並結束印度教的特權地位，這個要求被拒絕了。尼泊爾仍是一個印度教君主國，國王作為一個活的上帝而受敬拜。國家政策有利於印度教，種姓制度原封不動。這一政策把一部分龐大而多樣的尼泊爾人口邊緣化了。據官方統計，在尼泊爾有44個少數民族，占總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印度教種姓制度也被用於少數群體，把他們列為低種姓。在國家機構中，在選舉產生的職位中，這些群體的代表性都不足，在加德滿都山谷的權力中心處於不利地位。[9] 婚姻，離婚和繼承的法律依據的是印度教規範，對女性非常不利的。

面對這種民主和經濟發展的缺陷，巴特拉伊辯說，尼泊爾需要通過一個新的民主“次級階段”，在這個階段，進步運動不僅是把自己局限於民主的任務，不觸及私有財產，而且也可以接受親資本主義力量的政治霸權。[10] “全面和平協定”簽署以來，巴特拉伊達到了印度，尼泊爾聯合共產黨（毛主義）（UCPN（M））與印度共產黨（馬克思主義）建立了聯繫，並全盤接納了他們基於投資的發展主義的方法，長久以來，印度共產黨（馬克思主義）在印度大片地區一直是執政黨。

儘管在“全面和平協定”簽署之前，毛派黨內已經有其他的勢力對巴特拉伊的方法提出了批評。在毛派中間，一個左翼凝結了起來，

2009年在馬特裡卡·亞達夫領導下，引起了一個小分裂，馬特裡卡·亞達夫是前國會議員和政治局成員，他說尼泊爾聯合共產黨（毛主義）（UCPN（M））不再真誠地努力革命。一個更重要的左翼派別雖然目前仍留在黨內，現在也正離開。其領導人有訥特拉·比克拉姆·昌德（黨內名字：比普拉Biplab），錢德拉·普拉卡什·嘎居熱爾（又名果雷）及磨慙·維蒂阿（又名基蘭），都是尼泊爾聯合共產黨（毛主義）（UCPN（M））的傑出幹部，他們要求採取更激進的行動，已多年準備暴動奪取政權。最近人民解放軍（PLA）武裝的解除，似乎是他們的最後一根救命稻草。（這在後面有更詳細討論）。從那時起，這個派別與黨的左派力量在2012年3月結成了統一戰線，發起活動，反對尼泊爾聯合共產黨（毛主義）（UCPN（M））領導的聯合政府的政策，對尼泊爾聯合共產黨（毛主義）（UCPN（M））領導層的譴責越來越激烈。[11] 左翼派別的方向是更加經典毛主義的，他們堅持武裝革命（長期）的可能性。左翼也呼籲同印度共產黨（毛主義）的黨做更多的合作，印度共產黨（毛主義）也稱為納薩爾派武裝，比尼泊爾聯合共產黨（毛主義）（UCPN（M））更加密切地堅持毛派正統。[12]

右翼和左翼之間的平衡者是普拉昌達，他先聯合一派，然後在激烈的派系戰鬥中又同另一派聯合，在政策檔上達成妥協，這個月同一些得勢力量結盟，下個月又暗示造反起義，但始終確保他在權力臺上。[13] 但現在看來，似乎黨的右翼贏得了權力鬥爭，而左翼不再區分巴特洛伊與普拉昌達。解放軍的終結，對許多左翼領導人的支持基礎也是一個打擊。在黨的最高機關，右翼也加強了，因為尼泊爾共產黨（馬克思主義）（CPN（M））同團結尼泊爾共產黨（Unity Centre-Masal）於2009年1月合併了（這導致在黨的名字前加上“團結”一詞）。雖然這個小黨也聲稱自己是毛主義者，並運作於地下，它一直未捲入人民戰爭。合併協定的部分規定是，如果他們同右翼結盟，其一些幹部將在尼泊爾聯合共產黨（毛主義）（UCPN（M））中擔任要職。

曲折

要對尼泊爾聯合共產黨（毛主義）（UCPN（M））的演變作一個全面評估，需要考慮其在人民戰爭期間的發展。圍繞基蘭（Kiran）的派系要追溯到黨在2006年後的蛻變，巴特洛伊與普拉昌達以毛派同議會各黨派結盟來反對國王為理由，屈服于“資產階級民主”。用比普拉撲（Biplap）的話說，那以後他們的作用是‘資本主義議會民主的代理人’。[14] 這種方法忽視美國和聯合國，特別是印度的作用，因為它們運用財政刺激，援助專案和政治壓力，試圖把毛派引入“民主的主流”。它也把尼泊爾聯合共產黨（毛主義）（UCPN（M））的政治問題簡化為普拉昌達和巴特洛伊的主觀取向之一。但是，這種取向的基礎不斷深入。例如，尼泊爾聯合共產黨（毛主義）（UCPN（M））在人民戰爭期間的成功，很大程度歸功於其塑造的大聯盟，這個聯盟包括尼泊爾社會中的許多窮人和受壓迫者。然而，這個聯盟的基礎，本質上是資產階級的民主綱領，自從“全面和平協定”（CPA）簽訂以來，它的重要組成部分，特別是其中的‘民族解放戰線’已經分裂出來。

毫無疑問，2006年後，尼泊爾聯合共產黨（毛主義）（UCPN（M））基於巴特洛伊與普拉昌達制定的策略，接受上述的資本主義‘次級階段’的必要性，使其內部的發展方向日益向右。這個右傾方向的發展有三個關鍵時刻。第一次是在2009年5月，普拉昌達作為總理未能控制尼泊爾軍隊後，第一屆尼泊爾聯合共產黨（毛主義）（UCPN（M））主導的聯合政府瓦解。在尼泊爾的政治中，軍隊是非常獨立的力量，在全面取消君主制以前，它是國王的一個支柱。尼泊爾皇家軍隊（RNA）從來沒有被毛派擊敗過，王宮讓它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遠離叛亂分子的攻擊，大部分的戰鬥落在武裝員警的肩上。[15] 在“全面停火協議”（CPA）簽字以後，近20,000的毛派戰士們被限制於幾十個營地。直到2011年底移交鑰匙時，他們仍能接觸到鎖在聯合國監管的儲物櫃裡的武器。但解放軍在軍事上無法同尼泊爾皇家軍隊（RNA）相比；19-20,000的毛派戰士只有略微超過3,000支槍（通常還是品質較差的那種），而政府軍超過90,000人，由美國，英國和印度

的培訓，由美國武裝，後來還有中國的武裝。[16] 比普拉撲，果雷和基蘭現在強烈批評巴布拉姆和普拉昌達的議會道路，但這種方法產生于“全面和平協定”簽署後對力量對比關係的評估。

巴特拉伊和尼泊爾聯合共產黨（毛主義）（UCPN（M））領導層的其他人制定了一個複雜的計畫，要使尼泊爾皇家軍隊（RNA）中立化並‘裂解加德滿都’。首先，在2005年當國王剝奪了議會各黨派及其追隨者的權力後，他們同議會各黨派及其追隨者結盟。該聯盟贏得了來自印度的支持，印度是尼泊爾政治的最重要因素之一，而國王日益親中的傾向激怒了新德里。美國花了較長的時間才醒悟過來：911之後，它把毛派歸類為“恐怖分子”，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堅持認為，必須讓主流政黨和國王團結起來反對他們。然而，國王抓權只會加劇危機，而且他無法平息叛亂，當這個情況很清楚時，美國也來支持議會政黨與毛派的“七黨聯盟”反對國王的協議。正如所希望的，該聯盟成功地趕走了國王。

毛派的第二步是把軍隊中立化。尼泊爾聯合共產黨（毛主義）（UCPN（M））走向議會政治的入口被理解為這個計畫的一部分：在進入議會制度的掩護下，毛派將擴大他們在城市，主要是加德滿都的支援，做城市暴動的準備，對這樣的暴動，是無法動用軍隊的。在“全面和平協議”的條件下，解放軍戰士駐紮在聯合國監督的營地，還可獲得津貼。然而，許多解放軍戰士沒有進入營地，而是秘密組織了共產主義青年團（YCL）。共產主義青年團（YCL）將是城市戰鬥力量的核心，有可能獲得解放軍戰士的協助，因為解放軍戰士可以在任何時候離開自己的營地，並拿回他們的武器。

在人民戰爭中，尼泊爾聯合共產黨（毛主義）（UCPN（M））巧妙地利用它的對手反對另一個對手：王室反對議會，印度反對中國，美國反對印度。這種因地制宜，隨機應變的曲折學習，被稱為“普拉昌達道路”的一部分，是尼泊爾聯合共產黨（毛主義）（UCPN（M））對毛澤東思想的靈活應用。領導層聲稱，黨進入議會政治，只是在這條道路上跨出的新一步。即使是解放軍戰士被整合到政府軍中，這個做法在激進者看來，也是取得政權計畫的一部

分：整合後，毛派遊擊隊員將在軍隊普通戰士中間進行鼓動，他們處在一個破壞阻礙軍隊行動的位置。正是在這一點上，毛派策略高明。印度希望看到幾千毛派分子只是象徵性地整合進現在所謂的國民軍（NA）中。[17] 顯然，印度已經意識到了前遊擊隊在國民軍（NA）內的顛覆危險。新德里像華盛頓一樣，希望毛派分子將在2008年的選舉中失利，把此看作為一種方法，用來把他們鎖定在議會政治中。[18] 尼泊爾聯合共產黨（毛主義）（UCPN（M））在選舉中獲得意想不到的勝利，引發了一場新的鬥爭，鬥爭的焦點是誰任新共和國的第一任總統——國王更換後的一個重要職位，總統將控制軍隊。毛派候選人和尼泊爾大會黨（NC）及聯合馬列主義共產黨（UML）的候選人拉姆拉賈·普拉薩德·辛格之間的競爭爆發了。所有的保守政黨團結在拉姆拉賈·普拉薩德·辛格身後，結果他獲選。國民軍（NA）同總理普拉昌達起了衝突，因為國民軍乾脆拒絕按“全面和平協議”進行整合。相反，軍隊繼續招募兵員並拒絕整合毛派戰士。

然後，普拉昌達嘗試過把軍隊首腦儒克門古德·卡塔瓦爾（Rookmangud Katawal）解職，因為他違反了“全面和平協議”的規定，沒有把軍隊將減少到內戰前的水準並且把解放軍戰士整編進國民軍（NA）。然而，總統作為國民軍（NA）的司令，又恢復了卡塔瓦爾的職務，而普拉昌達自己則於2009年5月下臺。就像總統選舉期間，根據印度的指示，一個大型反毛派聯盟形成，聯合馬列主義共產黨（UML）領導人馬達夫·庫馬爾·尼泊爾成為新的總理。整個2009-10年度，在支撐這個總理的政府方面，印度都是至關重要的，因為這個總理在前面的選舉中已經失去了兩個選區。

在人民解放軍解散後，毛主義者只被允許有國家元首的位置。這個情況揭示了毛派分子在體制政治中的相對軟弱性，也揭示了尼泊爾統治階級及其政治代表維持反對他們的統一戰線的能力。[19]

這導致了第二個轉捩點，2010年5月的總罷工和失敗的起義。2010年5月的總罷工，本來是要推翻政府，形成一個毛派領導的新政府並踏出革命的新一步。普拉昌達下臺後，尼泊爾聯合共產黨（毛主義）（UCPN（M））開始動

員其支持者作“顛覆政府的最後一推”。毛主義者希望，政治危機和馬達夫·尼泊爾總理明顯的缺乏合法性，會有利於他們的工作，有助於他們組織反政府的運動。需要指出的是，在尼泊爾罷工不僅僅是停止工作，往往還包括道路的阻塞和所有商業活動的癱瘓。毛派支持者們從農村來到加德滿都參與這次罷工並被告知要準備做長期艱苦的鬥爭。罷工是黨內很多左派所期望的，希望罷工演變成期待已久的起義，從而奪得權力，然而，罷工失敗了。非常緊張的一些日子後，在加德滿都發生了一些衝突，尼泊爾聯合共產黨（毛主義）（UCPN（M））領導層就叫停了罷工。 [20]

在評估11月罷工的過程中，黨的分裂變得不可避免。普拉昌達無法提出一個讓所有派別都同意的政治聲明，這還是第一次。黨的左翼指責領導層缺乏膽量，沒有把鬥爭推向前進。他們聲稱，罷工本可以更有力，但被毛派早些時候的讓步而削弱了，當時他們按“全面停火協議”（CPA）的規定，拆除了農村的平行權力組織，尼泊爾聯合共產黨（毛主義）（UCPN（M））主導的“人民政府”。尼泊爾聯合共產黨（毛主義）（UCPN（M））重申其奪取政權的方向，但左翼認為這是一句空話。

黨的右翼似乎從經驗中得出了相反的結論。對他們來說，罷工似乎已顯示出他們所獲支援的脆弱特性，所以不能贏得同政府的直接對抗。有報導稱，僅幾天後，毛派支持者就開始離開這個城市，因為他們對運動的性質及其目標感到困惑（新的選舉，新一屆議會？還是革命？）並抱怨被迫參與運動，冒險與軍隊對抗。毛主義者似乎也犯了一個時間性錯誤，抗議活動正值種植季節開始的時候，卻促使許多農民支持者離開家鄉。 [21] 尼泊爾聯合共產黨（毛主義）（UCPN（M））然後同意舉行新的選舉，巴特拉伊在2011年8月就任總理。但代價是簽署了一系列的新協議，要政府依靠外商投資，實行一個自由的經濟政策。 [22] 其他的協議，進一步削弱了尼泊爾聯合共產黨（毛主義）（UCPN（M））的支持者，還有，解散解放軍，並要農民把他們在內戰期間獲得的土地還給“合法擁有者”。

同時，普拉昌達一直受到過去幾個月一些醜聞的困擾，涉及他的闊佬兒子使用政府資金十月評論 2012年第2/3期

和購買加德滿都最昂貴地區的豪宅。這些還不是困擾尼泊爾聯合共產黨（毛主義）（UCPN（M））的唯一醜聞。多年來黨的左翼一直抱怨幹部的腐敗，多次敦促領導層組織反腐敗運動。 [23] 其他醜聞也暴露了出來，影響了前解放軍戰士。如前所述，不是所有的人都進駐營地。給了戰士們許諾，說他們的津貼將預留給他們，但這筆錢很多已經“失蹤”了。在人民戰爭期間，毛派以他們的奉獻和簡單生活獲得了許多尼泊爾窮人的同情，這些醜聞不只傷害到對毛派的支持。也導致了黨內衝突。導致親普拉昌達和反普拉昌達的前解放軍戰士之間的衝突。 [24]

“沒有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 [25]

2011年9月，武器儲藏櫃鑰匙的交接是尼泊爾聯合共產黨（毛主義）（UCPN（M））演變的第三個關鍵時刻。尼泊爾聯合共產黨（毛主義）（UCPN（M））領導的根據地，地方“人民政府”解散並退回所獲的土地後，解除解放軍武裝和解散軍隊，是黨的左翼看到的領導層向現有權力機構的最後投降。很明顯，這種解散絕非是上述所謂機動戰術的一部分：同毛主義者的意願相反，只是他們中的一部分戰士被整編進國民軍（NA）。整編後的前遊擊隊指揮官同他們原來的戰士分開，這些戰士分散在不同的單位。只有一小部分，大概3000左右在政府請辭後被整編的前解放軍戰士，獲得補償而回家，所獲比整合條款更有吸引力。許多前遊擊隊員甚至沒有得到武器，而是給以手無寸鐵的森林警衛之類的工作！不是解放軍從內部顛覆軍隊，反而是毛派消解於更大的國民軍（NA）中。 [26]

特別需要一提的是，聯合國和國際非政府組織在整個過程中的作用。先是建立議會各黨派和毛派的合作關係，後來是讓解放軍復員和解除武裝，在這些方面，聯合國尼泊爾特派團（UNMIN）的作用是至關重要的。毛派領導人同意聯合國的解除武裝，軍人復員和重返社會的方案（DDR方案），而聯合國則協助執行毛派一些比較溫和的要求：廢除君主制，讓邊緣化的群體，如低種姓賤民和少數民族參與政治。

指望尼泊爾聯合共產黨（毛主義）（UCPN（M））的主流改變方向，這個希望沒有太大的可能。巴布拉姆·巴特拉伊已經明確的說，尼泊爾需要整整一代人的“資本主義發展”，普拉昌達宣佈瑞士是他的尼泊爾夢想。 [27] 在以前尼泊爾聯合共產黨（毛主義）（UCPN（M））蓬勃發展，欲使尼泊爾成為“世界革命基地”的地方，他們現在呼籲印度毛派放棄武裝鬥爭。中國政府曾被攻擊為毛澤東思想叛徒（以及國王在內戰最後階段的盟友），在那裡，尼泊爾聯合共產黨（毛主義）（UCPN（M））成員現在接受中共對外關係局的邀請，周遊該國，並就他們的旅行，寫一些阿迎奉承的報告。 [28] 更重要的是，先是解散人民政府，然後解散解放軍，這就結束了人民戰爭過程所創建的雙極權力的局面。尼泊爾聯合共產黨（毛主義）（UCPN（M））的“紅色派系”聲稱，普拉昌達和巴特拉伊有效地把尼泊爾聯合共產黨（毛主義）（UCPN（M））降低為眾多議會黨團中的一個，——一個在尼泊爾式選舉中較少經驗或對政治人脈影響不大的議會黨團。在加德滿都的傳統政治中不斷整合的尼泊爾聯合共產黨（毛主義）（UCPN（M））領導人也疏遠了許多他們的追隨者。黨的運作已經激怒了其最激進的支持者們，這些支持者被多次要求有耐心並準備起義，可是起義從來沒有來過。普拉昌達曾被他的追隨者稱讚為活著的最偉大的列寧主義戰略家，現在持不同政見的毛澤東主義者燒毀普拉昌達的肖像。

挺身而出？

不管人們如何看待巴特拉伊和普拉昌達的方向以及當前路線的失敗，他們2006年後的戰略是試圖回答棘手的問題，也即如何在如尼泊爾這樣的國家搞革命，這個國家極不發達，受到控制，‘就像夾在兩塊巨石（中國和印度）之間的甘薯’。在過去幾年中，尼泊爾聯合共產黨（毛主義）（UCPN（M））發展出了一種非常靈活和開放的毛澤東主義，包容多黨民主制，並擴大其思想視野，借鑒以前忌諱的人物，如羅莎·盧森堡。必定讓正統的毛主義者震驚的是，巴特拉伊甚至贊許地引用了托洛茨基。尼泊爾聯合共產黨（毛主義）（UCPN（M））的改變能力的一個例子是其同性戀觀點的轉

十月評論 2012年第2/3期

變。在戰爭期間，他們譴責同性戀是“資產階級頹廢的標誌”，“全面和平協定”（CPA）簽訂後，毛派騷擾過同性戀者或雙性戀者。受到內部和外部的批評後，尼泊爾聯合共產黨（毛主義）（UCPN（M））重新評估他們的立場，並在他們的領導下，尼泊爾政府在國內和國際上都捍衛性取向上的少數人群的合法權利。在2008年，同性戀關係（最終）合法化，並在2011年，尼泊爾在國際首先正式承認第三性別（如同其它的南亞國家，尼泊爾有著傳統悠久的第三性別社區，但是它們已經非常邊緣化了）。 [29]

關於尼泊爾聯合共產黨（毛主義）（UCPN（M））領導的運動，其真正進步性的其他例子，當然是全面取消君主制和國家的印度教特權，還有就是讓婦女在公共和政治生活中發揮更大的作用。臨時憲法規定，議會的婦女代表比例為33%，而毛主義者目前有最大的女議員比例。黨一向反對包辦婚姻和家庭暴力，並爭取婦女權利。 [30] 儘管這些進步顯著，但是他們並沒有結束農村地區的極度貧困，或為一個更加平等的經濟秩序奠定基礎。

尼泊爾聯合共產黨（毛主義）（UCPN（M））左翼掌握了顯著的支持，他們聲稱，大約有三分之一的黨的基層和國會議員將和他們站在一起。但目前這個左派似乎沒有什麼把鬥爭推向前進的眼光。他們堅持認為，下一步必須是奪取政權，但承認，尼泊爾聯合共產黨（毛主義）（UCPN（M））現在比六年前弱小。他們表面上唯一能做的是重回人民戰爭，重建人民解放軍和人民政府。面對他們所認為的巴特拉伊和普拉昌達派別的背叛，他們正回歸經典毛主義戰略與理念。但是，經過十多年的戰爭，贏得了一些民主的讓步和進一步的前景，納入尼泊爾政客網路的利益中，在大部分舊的親毛派農民和少數民族的聯盟中間，戰爭的意願已下降。尼泊爾聯合共產黨（毛主義）（UCPN（M））支持者的不滿可能會增加，會給新左派騰出空間——但如果尼泊爾最近的歷史表明了一件事，那麼，它就是舊的思想形式已不再足夠了。

▶ 亞曆克斯·德容是第四國際荷蘭支部雜誌“蒼茫”的編輯

註釋:

[1] 例如，參見尼泊爾作家·曼據西曆·塔帕 (Manjushree Thapa,) 編輯的‘在尼泊爾作家群’，德干紀事報，2012年5月30日，[網址](#)，尼泊爾聯合共產黨(毛主義)(UCPN(M))與制憲會議(CA)中的馬德西少數民族黨結盟。

[2] 阿欽·瓦奈克(Achin Vanaik)，‘新喜瑪雅拉共和國’，新左派評論49期(2008)47-72頁，然後給出了該發展的一個很好的概述。

[3] 聯合馬列主義共產黨(UML)對毛派分子的態度一直是非常投機和不一致的。在叛亂的早期，稱他們為‘友好的’，甚至捐錢給他們，以便削弱他們的最大對手尼泊爾大會黨(NC)。(克裡希納·哈切圖(Krishna Hachhethu,)，‘尼泊爾國家和毛派叛亂，1996年-2001年’，在邁克爾·哈特的：‘喜瑪雅拉人民戰爭’中。尼泊爾的毛派叛亂(布魯明頓，2004年)：58-79頁，)。他們成為一個強大的尼泊爾政治因素後，UML開始稱他們為‘法西斯’，(普拉迪普·尼泊爾，‘毛派運動和它在尼泊爾的影響’，在：阿瓊·卡克(Arjun Karki)和大衛·塞登(David Seddon)編輯。人民戰爭在尼泊爾。左派展望(新德里2003)405-438頁)，並加入尼泊爾大會黨(NC)和其他保守勢力，通過制憲會議(CA)阻撓進步的變化。

[4] 不發達國家通過兩階段革命的策略達到社會主義社會，是正統毛澤東思想的一部分。未來尼泊爾聯合共產黨(毛主義)(UCPN(M))所屬的毛澤東思想流派，革命的國際主義運動，強調目前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過渡性質及其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必要性。

[5] 檔‘目前的形勢與我們的歷史任務’，黨中央委員會於2003年6月通過，[網址](#)，介紹了如何獲取國家權力，有必要把‘群眾設立另一種革命政黨或國家領導人的權利’制度化，巴布拉姆·巴特拉伊進一步發展了這的論點，‘構建新型國家的問題’，‘工人’，尼泊爾(毛主義)共產黨機關報，9(2004)[網址](#)。值得注意的是，文章中的很多公式是不明確的，比如，有權撤出黨的權力，但以黨領導進一步革命的失敗為條件。至於誰決定黨是否在失敗，則沒有明確說法。“全面和平協定”簽署後，毛派分子繼續綁架對手，企圖恐嚇媒體工作人員(塞十月評論 2012年第2/3期

巴斯蒂安·馮·艾恩西德爾，大衛·M·馬龍和蘇曼·普拉丹編輯：“結論”，同上，‘尼泊爾從人民戰爭轉型到脆弱的和平’（劍橋2012）361-383頁，在372頁上），讓更多的人懷疑毛派對民主的承諾。

[6] 阿迪亞·阿迪卡裡(Aditya Adhikari)，‘通過其他方式的革命：和平時期的尼泊爾毛派分子的轉型’，塞巴斯蒂安·馮·艾恩西德爾，大衛·M·馬龍和蘇曼·普拉丹編輯：‘尼泊爾從人民戰爭轉型到脆弱的和平’（劍橋2012）265-287頁。

[7] 德文德拉·拉吉·潘迪，‘尼泊爾的失敗發展的遺產’：馮·艾恩西德爾，馬龍，普拉丹編輯，轉型期的尼泊爾，81-100頁。

[8] 尼泊爾人類發展報告2001。[網址](#)。

[9] 領導成功反叛的一個大黨，其基礎是大宗弱勢族群的存在。吉爾斯·博且拉特(Gilles Boquérat)，‘尼泊爾人民戰爭中的毛澤東思想和種族因素’：洛朗·嘎耶，克里斯多夫·傑佛瑞·瑞奧編輯，南亞地區的武裝民兵。原教旨主義，毛澤東主義者和分裂主義分子(2009年倫敦)45-65頁，瑪麗·勒孔特·提落蔭，‘毛主義內的民族需求：馬加爾領土自治，民族主義與階級問題’，赫特編輯，‘喜瑪雅拉人民戰爭’，112-136頁

[10] 和平協定簽署之前，他做了這樣的說法，例如在巴布拉姆·巴特拉伊的‘君主制與民主。尼泊爾的劃時代戰鬥’（新德里，2005年）10頁。

[11] ‘Baidhya派為首的陣線推出抗議計畫’，喜瑪雅拉，2012年3月23日。[網址](#)。

[12] 對尼泊爾聯合共產黨(毛主義)(UCPN(M))政治局委員巴桑塔的採訪，討論他們關於國際關係和民主等的一些觀點，他是持不同政見派別的支持者。尼泊爾---專訪巴桑塔，2012年4月22日。[網址](#)。關於印度共產黨(毛主義)對尼泊爾聯合共產黨(毛派)的民主，軍事戰略等方面觀點的批評，可以閱讀‘印度共產黨(毛主義)給尼泊爾聯合共產黨(毛派)的公開信’，2009年7月20日，[網址](#)。

[13] 一個前尼泊爾聯合共產黨(毛主義)(UCPN(M))的支持者討論了黨在2006年後的發展，羅斯漢·科松(Roshan Kisoorn)，‘尼泊爾的大欺騙’，2011年9月6日，[網址](#)。

- [14] “紅色陣線文章---尼泊爾革命的挑戰，訥特拉·比克拉姆·昌德‘比普拉’” [網址](#)
- [15] 塞巴斯蒂安·馮·艾恩西德爾，大衛·M·馬龍和蘇曼·普拉丹編輯，‘結論’：同上，轉型中的尼泊爾，361–383頁。
- [16] 在尼泊爾，人們普遍認為，毛派沒有交出他們的武器給聯合國尼泊爾特派團（UNMIN）。毛派分子在營地外也保持了一些解放軍戰士，同時讓非戰鬥人員登記為前戰鬥人員。然而，軍事分析家認為解放軍有比槍支更多的成員。S.D.牟尼，‘讓毛派分子從山上下來：印度的作用’：馮·艾恩西德爾，馬龍和普拉丹編輯，‘轉型中的尼泊爾’ 313–332頁。
- [17] 普拉賢特·桑傑·賈，‘尼泊爾對國際參與尼泊爾事物的觀點’，馮·艾恩西德爾，馬龍和普拉丹編輯，‘轉型中的尼泊爾’ 332–361頁，在337頁。
- [18] 桑傑，‘一個尼泊爾眼光’ 338頁。
- [19] S.牟尼，‘讓毛派分子從山上下來’，顯示了印度繼續扮演尼泊爾“大哥哥”的傳統角色，以及美國如何“外包”毛派給新德里處理的。
- [20] 穆馬·拉姆·卡納爾（Muma Ram Khanal），‘尼泊爾：毛主義的總罷工及其局限’，‘反擊’，2010年5月6日，[網址](#)。
- [21] 紅·馬瑞奧特，‘可預見的紅色資產階級之興起：一個神秘的尼泊爾毛派‘革命’” [網址](#)。
- [22] 特別是有爭議的是‘雙邊投資促進和保護協定（BIPPA）’，用於保護印度的投資。
- [23] 在“目前的形勢與我們的歷史任務”的檔中提到“黨的無產階級行為和工作作風迅速惡化”的抱怨
- [24] 在前戰鬥人員中間，幻滅與被背叛的情緒是廣泛的，在許多新聞中有過討論。有幾個是：“同志，我們的存款在哪裡？”，我的共和國（My Republica），2011年12月7日，[網址](#)，‘幻滅的士兵’，半島電視臺，2011年11月30日，[網址](#) “戰士的再見：暴力，作為黨‘要求’戰士‘兌現’者，Ekantipur 報，2012年2月6日 [網址ekantipur.com/2012/02/06]。關於普拉昌達之“新生活方式”的報導，尼爾森院長，‘尼泊爾毛派領導人採用百萬富翁的生活
- 方式’，每日電訊報，2012年1月30日 [網址](#)。
- [25] 來自毛澤東的語錄。
- [26] ‘3129整合’，MyRepublica，2012年4月20日。
- [27] 周升平，新華社，2011年11月6日，[網址](#)。
- [28] 德如巴·帕拉久利，‘獨特的經驗，沒有兌現的欲望’，進展1（2012年），14–17。
- [29] 加里·路義普，‘毛派同性戀恐懼症？來自尼泊爾的麻煩報告’，反擊，2007年4月23日 [網址](#)，蘇德斯納·薩卡，‘尼泊爾毛派站出來，在聯合國為同性戀爭取權利’ 12月11日 [網址](#)。道·愛爾蘭，‘尼泊爾的第一個同性戀總理發出聲音。國家的兩個最大的政黨擁抱LGBT的權利’，2008年05月08日，[網址](#)。是對蘇尼爾·潘特（Sunil Pan）的採訪，蘇尼爾·潘特是尼泊爾最有名的LGBT同志權利活動家，LGBT同志權利組織藍鑽石協會的負責人，也是許多尼泊爾小型共產主義政黨之一的共產黨（聯合）（the Communist Party-(United)）的一個國會議員。
- [30] 曼迪拉·夏爾馬和底斯訥西·普拉塞恩，‘人民戰爭的性別尺度：關於農村婦女經驗的一些思考’，在赫特編輯的‘喜瑪雅拉的人民戰爭’ 152–166頁，描述了毛派是如何成功的贏得了許多婦女對這樣的活動的支持。在尼泊爾聯合共產黨（毛主義）（UCPN（M））中，一個爭取婦女權利的顯著和尊重的聲音是西斯拉·雅美（別名帕瓦蒂同志）。雅美是尼泊爾聯合共產黨（毛主義）（UCPN（M））的領導者之一，一直認為在革命運動中婦女權利很重要，同時也強烈批評毛派運動中現有的性別歧視。西斯拉·雅美，‘尼泊爾人民戰爭和“婦女解放”（恰蒂斯加爾邦，2006年）。



社會主義革命和拉丁美洲統一

茲比格涅夫·馬欣·考瓦勒斯基

六十年代的古巴革命標誌著拉丁美洲革命的開始，標誌著拉丁美洲統一這個烏托邦理想的恢復和重整。從那時起，我研究了這個烏托邦理想在古巴，我的祖國波蘭和法國的起源，歷史和實效。我願與你們分享我的思考。

有人曾經說過，服務於拉丁美洲寡頭政治和殖民主義或帝國主義強權的三流作家捏造歷史傳說，把‘解放者’描述成創造了幾十個而不是一個非正常國家的狂熱黨徒。而且“官方歷史”這一真正醜惡的偽造在於這個事實：在西歐和美國，各個國家繼續作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勝利果實而存在，而在拉丁美洲，隨著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失敗而出現的政治體制則被視為截然不同的非正常國家。

無論誰是作者，這是個很好的說法。縱觀世界，拉丁美洲與阿拉伯世界都有一個不平常的特殊性，即四分五裂。在他的‘俄國革命史’一書中，里昂·托洛茨基就有關國家的問題上說，“語言是人際溝通最重要的，因此也是產業最重要的工具。它隨著整合國家的商品交換的成功而成為全民的。在此基礎上，民族國家作為表演資本主義關係最方便並且可圖利的常規舞臺而搭建起來”。[1]

這是事實，許多民族國家並不涵蓋使用其民族語言的全部領土而且 --- 儘管在相當特殊的情況下 --- 有時兩個鄰國有相同的民族語言。

但拉美所發生的事情非常特別。在民族語言相同或相似的連片領土上，在民族國家形成的典型時代，不是一個而是二十個左右的國家形成了。反常是無可否認而且規模巨大的。在這種反常情形裡，拉丁美洲作為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一個受制於人的被剝削未開發的周邊，它的條件被落實具體化。因此，在拉丁美洲，祖國是美洲這樣一種思想定期復活是很自然的，就像阿拉伯世界也有泛阿拉伯民族主義的存在一樣。

“在德國，容克道路是可能的，因為閔采爾的道路已失敗”，勒內·紮瓦裡塔·梅爾卡多說，指的是這個國家農民戰爭的失敗，以及後來的，遵循所謂普魯士寡頭政治道路的德國資本主義發

展。在世界資本主義的統治中心，所有道路，無論是自下而上引導的完全的民主道路---這條路同一個積極資產階級革命導致的資本主義發展有關，抑或是寡頭政治道路---這條路亦步亦趨地跟隨自上而下施加的被動的半資產階級革命，它們都導向一個獨立的發展。

不過，在寡頭政治道路的周邊，可能只有‘次資本主義發展’的附庸之路。就如紮瓦裡塔·梅爾卡多表明的，如果強加於拉丁美洲的正是這條路，那是因為尚未採取圖派克·阿馬魯和圖派克·卡塔里道路的緣故。[2]

1780年至1781年，與第一次北美革命即所謂北美第十三英國殖民地獨立戰爭的時間相同，在印加文明的領土上，在圖派克·阿馬魯和圖派克·卡塔里的領導下，爆發了與土著農民的激進起義相結合的，爭取獨立的偉大起義。北美革命基本上是政治性的，相比之下，安第斯起義在更大的程度上，是一個真正深刻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就它的階級組成和其本身的文明基礎而論，它比任何後來的獨立運動有更為巨大的潛力，為拉丁美洲的統一和資本主義的民主獨立的發展，奠定基礎。

西班牙殖民政權對印加文明的野蠻鎮壓和破壞，敲響了一場革命的喪鐘，這場革命有可能改變該半球西班牙或美洲伊比利亞部分的歷史過程。

在北美，發生在英國殖民地的獨立戰爭獲勝，並導致了殖民地的統一 --- 具體地說，導致一個聯邦。但在新聯盟的南部各州，奴隸制的維持和擴大，阻止了未來80年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 --- 民主和獨立的抑或寡頭和附庸的 --- 被確定採納。

在拉丁美洲，發生在19世紀上半葉的一些獨立戰爭，雖然取得勝利，但作為資產階級革命卻是失敗的：他們沒有成功地自我轉變為拉丁美洲民族革命，建立一個拉丁美洲聯盟，或者至少是支持這個聯盟形成的堅定基地。不是形成一個聯邦或起碼是邦聯，擺脫了西班牙枷鎖的美洲支離破碎，成為一些國家的烏合之眾。

西蒙·玻利瓦爾省

緊接這個意義上的失敗，獨立戰爭也沒有導致新共和國的殖民地被抑制。與此相反，獨立戰爭後，經過無數內戰，統治階級和殖民地方式的剝削保存下來。西蒙·玻利瓦爾省曾有一個不好，但鮮明的預感：即在北美，舊英國殖民地的聯盟和前西班牙帝國的破碎將決定他們的相互關係，也就是說，美國將統治拉丁美洲。基於這個原因，他期望在單一民族內的前西班牙殖民地的統一。

在合眾國，第一次美國革命的80年後，北方南方間爆發內戰，北方各州在剝削工薪勞工的基礎上發展資本主義，南部主張分離的各州通過剝削奴工發展資本主義，內戰轉化成爲國家再統一和廢除奴隸制的革命戰爭。多虧了這一可怕的戰爭，美國最終贏得了全國團結。它讓資本主義發展的民主和獨立的道路壓倒了寡頭政治和附庸的道路。如果南部主張分離的各州贏了，這並非不可能，也並非未必會發生的，那末後一條道路將獲勝，美國會分裂並呆在世界資本主義的附庸周邊。南方失敗後的少許事件大大地揭示了美洲兩部分不同的，甚至對立的歷史過程。

在拉丁美洲，巴西、阿根廷和烏拉圭寡頭的三重聯盟在世界霸權英國的支持下，領導了一場對巴拉圭的可怕的種族滅絕戰爭，導致在獨立戰爭中顯現出來的，爲確保資本主義獨立發展而作的唯一嘗試完全和不可逆轉的毀掉。

該嘗試，其魯莽的程度一如它給地方帶來的災難，其悲劇結局向我們表明兩件事。第一，在這個時代，在世界資本主義系統的周邊附庸拉丁美洲，如果不同這個系統作長期決裂，如同獨立巴拉圭的創始人和第一任總督何塞·加斯帕爾·德·弗朗西亞領導的那種根本的決裂，一個獨立的資本主義發展是不可能的。第二，這個時候，在世界體系的拉丁美洲這個周邊中的單獨一個國家裡，一個持久的獨立發展已經是不可能的。

針對任何聽天由命的觀念，比如所謂美國和拉丁美洲註定要遵循他們已有效地行走過的道路，應當記得，這種態度反映了這樣一個事實，即歷史是勝利者寫的，正如奧古斯汀·奎瓦的觀察，“歷史不是一個有目標的運動，有一條道路在前面可以追溯，而是一台階級衝突的戲”。“因爲這種宿命論只是精英主義的另一邊，有關19世紀拉丁美洲革命運動歷史和民主選擇的知

識，仍然是‘歷史的私生子’”。[3]

當時歐洲的各大列強都非常清楚，---正如法國總理弗朗索瓦·基佐所說的---這是“歐洲黨”和“美洲黨”之間鬥爭的最後結果，它將決定拉丁美洲的命運。

在美國，“美洲黨”壓倒“歐洲黨”的勝利是必然的嗎？而在拉丁美洲情況恰恰相反？不，該兩宗案件中沒有甚麼是命中注定或預先確定的。是階級鬥爭和內戰戰場上勝利的一方決定的。

在墨西哥“美洲黨”黨魁貝尼托·華雷斯領導下進行的勝利卓著的戰鬥---改革，內戰和全國抵抗戰爭---注定要在波菲裡奧·迪亞斯政權下的墨西哥資本主義的超級寡頭政治的和極度受縛的現代化中結束？不，他們可以以一個根本不同的方式結束。

可能性的計算，包括了在美國和墨西哥幾乎同時發生的“美洲各黨派”在戰爭中的勝利的影響，連同他們政府的聯合支持，正在朝南半球迅速擴大，挑起了大陸“美洲黨”同“歐洲黨”堡壘的決定性衝突：這個堡壘是曾幾何時粉碎巴拉圭的三重聯盟。但是，這並不是所發生的情況，“改革期間，資產階級民主選擇的失敗”，奎瓦說，“在任何情況下，把整個拉丁美洲的航道，沿著資本主義發展的極端保守---“寡頭政治”---的路徑加固，這正好吻合世界體系已進入的帝國主義階段，確定著我們歷史的一個新時期。”[4]

兩件事，應該是很清楚的。首先，我們是在談論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歷史時代。其次，這個時代曾是封閉的，在美國奴隸主的“歐洲黨”失敗後，在墨西哥人民向歐洲資產階級施以巨大打擊，在墨西哥處決篡權者哈布斯堡以及三重聯盟的“歐洲黨”摧毀巴拉圭以後，僅僅幾年就在世界範圍內完全封閉。結束它的是巴黎公社：第一次無產階級奪得政權的革命，雖然只是一個過渡方式。

在上述時代的末尾，我們因而有分佈於該半球兩部分之間兩個系列的邏輯和歷史相關性：北美的國家統一，資本主義的發展是民主獨立的，而且國家向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心推進；拉丁美洲的國家分裂，資本主義的不良發展是寡頭和受牽制的，而且拉丁美洲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處於持久的附庸地位。

隨著資本主義向帝國主義階段的過渡，這兩

個系列的相關性產生的東西莫過於玻利瓦爾省所預期的：在該半球，美國的發達資本主義和拉丁美洲的欠發達資本主義之間的兩極化，由統治和從屬的關係不可分割地聯合著。就像托洛茨基後來會說的那樣，拉丁美洲一直受到來自美國的“國家剝削，那是完成並鞏固階級剝削的剝削”。

在世界資本主義這個框架內，並在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基礎上，這兩個系列相關性的結盟是不可動搖的。

雖然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歷史時代在1871年最終結束，世界上每一個尚未完成這些革命歷史任務的國家，仍然留在沒有完成的狀態。這個時代不可逆轉的結局和充分實現這些任務的耽擱，兩者之間的矛盾，意味著這些任務再也不能由資產階級或其任何部門或派別加以解決。

拉丁美洲和世界其他地方隨後的整個歷史過程充分證實了這一點。現在，面臨著拉丁美洲資產階級在完成其歷史任務方面的破產，正是巴黎公社已經宣佈了其不可避免的崛起的革命階級，應完成它一度建立過的自己的政權權力。

一如既往，大拉丁美洲家園的構思，存活於革命拉丁美洲民族主義者中間。資本主義到帝國主義階段的過渡期間，拉丁美洲乃至整個殖民地附庸周邊所出現的最著名的革命家，何塞·馬蒂，把它作為一個革命戰略而啓動。

佩德羅·巴勃羅·羅德里格斯·阿因此這樣形容這項應用於古巴的戰略：“戰爭是爲了獨立，但也包括其他的目標：這只不過是一個非常長遠的政治戰略的路標，它開始於古巴，會繼續貫穿於波多黎各的獨立和拉丁美洲的漸進統一過程，面對美國的擴張企圖，西印度群島是首當其衝的防洪壩。

這一戰略將保證消除拉丁美洲社會中西班牙殖民主義的所有遺跡，避免建立新形式的殖民主義。用我們時代的語言，人們可以稱這是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運動的大陸戰略(...)。有一點是明白無疑的，即在這條道路上，僅玻利瓦爾省一人走在馬蒂之前，當時，他要求一個拉丁美洲聯盟強大得像在北美形成的聯盟那樣。

然而，兩人的時代有很大不同；玻利瓦爾省領導南美洲獨立戰爭的時候，美國開始把他們的領土擴張到太平洋沿岸，掠奪印地安人的土地，而英國則主導發達的資本主義世界。馬蒂經歷過的時代，是美國從壟斷資本主義前期向帝國主義

十月評論 2012年第2/3期

過渡的決定性時期，這個時期保證了它在加勒比國家的霸權，並把它投入到同南部大陸的歐洲人的競爭裡。在玻利瓦爾省時代或多或少是遙遠可能性的東西，在馬蒂時代成了一個現實。”[5]

整個馬蒂的工作所作的參考表明，對他來說，拉丁美洲的統一也將意味著在拉美範圍內形成一個單一的“新共和”，也即是馬蒂自己所界定的，這種共和從根本上不同于傳統的拉丁美洲共和國，因爲它將打擊內部殘存的殖民地。

同邏輯上可能的期待相反，拉丁美洲工人運動及其馬克思主義政黨的發展，沒有辦法用玻利瓦爾省和馬蒂的大家園思想作恰當的翻譯解釋。屬於第二國際的，第一批拉丁美洲的社會主義政黨忽視了他們。可能因爲有這樣的猜想，即共產主義運動將與社會民主黨的遺產徹底決裂。

受玻利瓦爾省和馬蒂的影響加入運動的革命鬥士，比如胡利奧·安東尼奧·莫拉，被十月革命勢不可擋地吸引住，信心十足地期望這一點。但他們很快就感到幻滅了。

問題是在1928年共產國際第5次代表大會上首先提出的。共產國際的拉丁美洲事務主要負責人，瑞士共產主義者儒勒·恩貝爾-德羅茲，建議共產主義運動同意把拉丁美洲的聯邦工農共和國聯盟的建立作為其主要的革命任務之一。他的建議，明晰且不可或缺，挑起了一個敵對的反應，而他被指責爲對一個像美洲人民革命聯盟（APRA）那樣的運動做明確的暗示，跟隨著“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拉丁美洲主義”走。在同一會議上，共產國際把爭取歐洲社會主義合眾國的鬥爭從其計劃綱領中剔出了。

蘇聯斯大林官僚權力的崛起，以及服從它強加給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在一個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戰略，引發了無數災難性後果，這只是其中的一個。結果，共產黨同列寧托洛茨基領導下所採取的反帝統一陣線和革命民族主義者同盟的政策破裂。這個破裂，極大地影響了拉丁美洲革命運動的發展。回想梅拉所作的關於資產階級和革命民族主義之間的根本區別，革命民族主義是拉丁美洲歷史上非常重要的政治潮流，梅拉在其中說，他“想要一個自由的國家，以杜絕內部寄生蟲和帝國主義侵略者，因爲認識到了任何一個社會的主要公民，是那樣一些人，他們以日常工作幫助提升社會，而又不剝削利用他們的人類同胞。”[6]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使用這個詞。

面對共產國際的斯大林化，最清醒的思想和革命民族主義活動家，才會維持這種想法，即在爭取解放及掙脫帝國主義統治的各個基本任務中，拉丁美洲的統一應作為其中的一項。但是，斯大林丟棄和背叛了十月革命的原始綱領，按照十月革命的直接傳統，這場革命的列寧以外的另一主要領導人，起用了被共產國際主動否決的觀念。托洛茨基不是只用了它，而且把它作為他對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決定性貢獻---不斷革命論---的基礎。

在俄羅斯，不僅直到1917年10月無產階級取得政權時候，而且差不多一年後，直到1918年秋天，革命的社會領導力量是無產階級的，但其直接的任務是資產階級民主的，而不是社會主義的。取得了政權，無產階級首先進行的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在這個國家還沒有完成的各項任務，包括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即解放被俄羅斯帝國壓迫的民族，以一個不間斷的或永久的方式，把這些任務從後面提前到第一批的社會主義任務。

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最初是為俄羅斯革命精細設計的，後來他把它推廣到了所有的不發達的，殖民地和非獨立國家。據他表示，無產階級在這些國家上臺的可能性，當然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這個階級在國家經濟上的作用，因此取決於其資本主義的發展水準。但是，這並不是唯一的標準。

對於托洛茨基，稍遜一籌的重要問題是，是否在該國存在著一支宏大熾熱的“大眾化”的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會吸引大多數國民並且要求最大膽的革命措施。在這個問題單中，他強調了民族問題。

鑒於帝國主義列強施加的不能忍受的民族壓迫，按托洛茨基的觀點，在民族民主革命的基礎上，年輕和較小的無產階級可能掌權，在純粹社會主義基礎上，主導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高度發達國家的無產階級可能掌權，在時間上，前者可以先於後者。如果無產階級沒有取得一個受壓迫民族的領導權並奪取政權，就沒有民族民主革命，甚至像拉斐羅·卡登那斯那樣激進和特殊的領導人帶領的，像墨西哥革命那樣大的革命，都不能履行其解放民族脫離帝國主義統治的任務。

當斯大林化的共產國際拒絕拉丁美洲統一的想法，把它歸於美洲人民革命聯盟（APRA）

的改革派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時候，托洛茨基以根本不同的方式提出問題。在評論美洲人民革命聯盟主要領導人的立場時，他寫道：“哈亞·德·拉·托瑞堅持拉丁美洲國家聯盟的必要性，他信的結尾是這個用語：“我們，南美合眾省的代表”。就其本身來說，該思想是完全正確的。為拉美合眾國的鬥爭同每個拉美國家的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是分不開。不過，什麼道路可導致這個統一？是必須要清楚明確回應的問題。哈亞·德·拉·托瑞的一些極為模糊的提法可導致一個結論，即他希望說服目前拉丁美洲的各國政府在...美國的監護下...自願統一。在現實中，只能通過反對帝國主義，包括反對“民主”帝國主義和其內部代理人的群眾革命運動，達成這一目標。我們承認，這是一條艱巨的道路，但沒有其他辦法。”[7]

立基於農村生活的半奴隸條件的拉丁美洲資本主義，具有陳舊而已經腐朽的特點，在指出這種情況時，托洛茨基解釋說：“美洲資產階級在其歷史性的興起時，在北部半個大陸，它已經能夠統一在一個單一的聯邦內，現在它利用從統一獲得的全部力量把南半部分化，削弱，退化到奴隸制。中美洲和南美洲只有把他們的國家統一成一個強大的聯邦，才能使他們自己根本離開落後和奴隸制。

但不是落後的南美資產階級---外國帝國主義的腐敗機構，而是年輕的南美無產階級---被壓迫群眾所選擇的領導者，將被召來解決這個問題。因而，在反對世界帝國主義的暴力和陰謀，以及反對土著買辦集團的血淋淋統治的鬥爭中，口號是‘中南美洲蘇維埃合眾國’。”[8]

採取了這一論斷後，由托洛茨基在1940年5月草擬的，關於帝國主義戰爭和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第四國際宣言，繼續說道：“只有在其本身的革命領導下，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無產階級才能與大都市無產階級和工人階級整個實現無敵的合作。

“惟有這項合作可以推翻整個世界的帝國主義，從而把被壓迫人民帶向完全確定的解放。國際無產階級勝利，將把殖民地國家從漫長而痛苦的資本主義發展階段釋放出來，向他們打開與先進國家的無產階級攜手到達社會主義的可能性。永久革命的觀點並不意味著在任何情況下，落後國家應等待先進國家的信號，或者說，殖民

地的人民應耐心等待大都市的無產階級解放他們。上帝幫助自助者。所有國家，不管是殖民地還是帝國主義國家，只要那裡存在條件，有利於為其他國家的工人樹立一個榜樣，工人們就應在那兒發展革命鬥爭。只有主動和活動，決心和勇氣，才能真正實現口號‘工人即團結！’”[9]

在拉丁美洲，古巴革命第一次把國家從帝國主義枷鎖中解放出來，並進行了歷史上未完成的其他民主任務。它能夠這樣做，根本原因是：因為同1917年俄國革命裡所發生的方式類似，它給一個堅固的革命力量帶來權力，這個革命力量把自己等同於無產階級和人民群眾的直接和歷史的利益，並以一個永久和不間斷的方式，把民族民主革命任務的成果轉向社會主義革命任務的成果。

拉丁美洲和世界左翼力量的絕對多數都持守所謂的革命階段論，自從斯大林在蘇聯掌權以來，它成了共產主義運動的一個根本原則，任何熟悉革命階段論的人，都知道古巴革命所帶來的是一個多麼巨大的破裂。階段論應用的結果一直是相同的，在它被應用處：不僅社會主義革命總是降級為不可能的事，即使是第一階段的任務也沒有完成過。他們不能得到實現，因為確保民族民主革命征服的唯一可能的路是實現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這就是不斷革命論的本質。胡利奧·安東尼奧·梅拉是這樣總結的：“具體地說，只能由無產階級通過工人革命的手段贏得絕對的民族解放”。[10]

被強大的拉丁美洲這樣一個使命所觸動，古巴革命把拉丁美洲民族主義最革命潮流的綱領性訴求同社會主義革命聚集一起。馬蒂去世後第一次並且受激於他的榜樣，在20世紀60年代這場革命闡述設計了大陸革命的戰略，它在拉丁美洲的大膽實施，是由國際遊擊部隊首腦切·格瓦拉司令執行的。我們今天知道，在切的戰略計劃裡，他的指揮下的民族解放軍，要在單一戰略的基礎上團結所有拉丁美洲的革命運動，並且有一天被整合到國際無產階級軍隊裡。這個軍隊的形成訊息，是在他的‘給三洲的信’中宣佈的。在參加了剛果革命和目睹了它的失敗之後，切寫道：“國際無產階級軍隊的倡議在第一次挫折面前應該不會死亡。”[11]

當切·格瓦拉和他的古巴，玻利維亞和秘魯的同志在玻利維亞鬥爭時，一個歷史性的事件發生在哈瓦那。來自拉丁美洲所有國家的絕大部份革命流派和左派組織相會於拉美團結組織會議(OLAS)。“這裡代表的組織”古巴代表團主席阿曼·赫德說：“開會擬訂一項共同的鬥爭戰略反對揚基帝國主義和偏從美國政府利益的資產階級寡頭和地主。古巴代表團代表一個革命黨。我們的論點依據的是馬克思列寧的意識形態。我們是這個大陸人民的團結這個優良革命傳統的繼承者。我們應忠實於這一傳統。巴黎公社的時候，馬克思說，該人民革命的目的，在於破壞國家的軍事官僚機器並代之以武裝的人民。列寧後來說，這一思想裡有馬克思關於革命中的無產階級的任務的基本教訓。我國代表團認為，歷史經驗已經證實了馬克思列寧的這些結論。我們認為有必要根據理論與其實際後果這兩方面分析馬克思列寧的這些方法。”[12]

在其對大陸革命戰略的報告中，古巴代表團回顧說，“馬蒂觀念的價值和深刻性可以衡量如下：[馬蒂]加深了拉丁美洲作為單獨一個偉大國家的玻利瓦爾省理念，提出古巴的獨立鬥爭是拉丁美洲革命的一部分”。在同一時間內，古巴代表團表示，“今天拉丁美洲人民的革命團結，比作為其基礎的背景有更大的深度，因為單一的拉美人民的大陸這個觀念已得到加強。”[13]

一年後，英迪·佩雷多，玻利維亞遊擊隊的倖存者，加強了他對於“在拉丁美洲建立社會主義的革命力量的勝利”的信念和他對於“玻利瓦爾省和切·格瓦拉關於政治和經濟上團結的拉丁美洲的夢想”的忠實，說：“我們的單一和最終目標是解放拉丁美洲，這不僅是我們大陸，而且我們的國家，目前分為20個共和國。”[14]

近40年後，迫切需要我們重申“一個單一的拉美人民的大陸概念”以及切·格瓦拉在玻利維亞為之鬥爭的理念，即“拉丁美洲將是一個單一的國家”，也要迫切把拉丁美洲的社會主義統一納入人民運動和革命運動的綱領計劃。我相信，不要再拖延，我們必須開始為一個大陸革命戰略的精心設計準備條件，再一次，未來可能會證明大陸革命比它看起來的更加臨近。一套策略，將對應於拉丁美洲和世界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條件和美帝國主義主導的單極世界，美帝比任何時候都更強大，更具侵略性和致命的危險，但同時，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加腐朽黴爛，還有爆炸性的和不可調和的矛盾。

只有無產階級及其廣泛的盟友可以贏得獨立戰爭未贏得的東西，以及拉丁美洲資本主義不可挽回的損失，實現受剝削受壓迫群眾偉大鬥爭的目標，不可避免地走向拉丁美洲作為一個單一國家的統一。今天，大陸統一是在一個更廣大平靜的架構下提出的，應該能夠吸引加勒比地區的不同民族。

在已經引述的，1967年OLAS會議上古巴代表團的報告中，我們看到有“一個明顯的事實，對於其各個方面，一直沒有評估：從未有過如此眾多的一群人民，這麼龐大的人口和如此延展的領土，卻保有非常相似的文化和利益，相同的反帝國主義的目標。我們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是‘我們的美洲’的一部分。因此，我們學習歷史傳統，因此，我們繼承了我們的祖先，因此，我們學習我們的前輩！對於拉丁美洲革命組織的代表們，這些都不是新的思想。

但我們是否充分的評估了這些事實代表什麼嗎？十九世紀最初幾年的遙遠時代，我們有一個大陸的鬥爭理念，它已發展到整個拉丁美洲，我們是否深入分析了該事實的意義？拉丁美洲由一個單一的偉大民族構成，我們是否足夠清楚地分析了這個不爭的事實？”[15] 所有這些問題，一如既往，也同今天有關。

要成為一個單一國家，拉丁美洲應該是社會主義的。要成為社會主義的，拉丁美洲應該是單獨一個國家。為讓拉丁美洲實現其第二次，真正的和明確的獨立，這是100多年前由馬蒂，40多年前由卡斯楚宣佈的，拉丁美洲的革命再次上路，直到建立一個單一的拉丁美洲社會主義國家。它似乎是已經再次與委內瑞拉玻利瓦爾省革命一起踏上征程。

•茲比格涅夫·馬欣·考瓦勒斯基是波蘭評論“rewolucja”（“革命”）的編輯，專門討論世界革命運動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羅茲地區（1981年）團結工會的前領導人，和第四屆國際成員。我們在這裡發表的他的報告，以色列亞·哈特的作者姓名，發表在2004年9月10日在哈瓦那舉行的關於“我們需要烏托邦”的會議上。

茲比格涅夫·考瓦勒斯基在1980年至1981年是羅茲地區團結工會的領導成員。作為第一屆團結工會大會的一個代表，他參加擬訂的方案獲得採用。1981年12月宣佈戒嚴令時，他受法國工會主義者的邀請訪問巴黎。他說明編輯波蘭語言國十月評論 2012年第2/3期

外通訊，1981年到1990年第四國際在波蘭發行的雜誌，並出版了“Rendez-nous nos usines!”（“把我們的工廠還給我們！”）（La Brèche，巴黎1985年）。他目前是工會週刊Nowy Tygodnik Popularny和理論期刊Rewolucja的編輯。

註釋:

- [1] 里昂·托洛茨基，“俄國革命史”，第3卷，第39章，www.marxists.org
- [2] R. 紮瓦勒塔·梅爾卡多，“玻利維亞人民”，Siglo Veintiuno 出版社，墨西哥，1986年，第84-95頁。
- [3] 奧古斯丁·開福，“拉丁美洲資本主義的發展：歷史解釋”，Siglo Veintiuno 出版社，墨西哥，頁49-59。
- [4] A. 開福，同上，頁59-60。
- [5] 佩德羅·巴勃羅·羅德里格斯，“何塞·馬蒂的民族解放思想”，思想批判。49，1971，頁144，156。
- [6] 胡利奧·安東尼奧·梅拉，“文獻和論文”，社會科學出版社，哈瓦那，1975年，第190頁。
- [7] L. 托洛茨基，“工程”，里昂·托洛茨基研究所，巴黎，1985年，卷.19，頁160-161。
- [8] L. 托洛茨基，“工程”，里昂·托洛茨基研究所，巴黎，1979年，卷.4，頁56-57
- [9] L. 托洛茨基，“工程”，里昂·托洛茨基研究所，巴黎，1987年，卷.24，頁55-56
- [10] L. 托洛茨基，“工程”，里昂·托洛茨基研究所，巴黎，1987年，卷.24，頁55-56
- [11] 埃內·切·格瓦拉，“革命戰爭通道：剛果”，Sudamericana社論，布宜諾賽勒斯，1999年，第32頁。
- [12] “‘海浪’大會第一次會議上古巴代表團的報告”，哈瓦那，1967年，頁5-6。
- [13] 同上，頁30，38-39。
- [14] 圭多·“Inti”·佩雷多，“玻利維亞遊擊隊沒有消亡！他才剛剛開始”，三洲-特別副刊，1968年，頁6。
- [15] “古巴代表團報告”。同上，第26頁。

回到凱恩斯？凱恩斯和氣候變化

塔都·帕托

根據馬克思的說法，歷史悲劇像鬧劇一樣重演。考慮一下與資產階級國家的官方危機管理有關的，現在所標榜的“新凱恩斯主義”，人們得到的印象是，凱恩斯原來的意思實際上是重演一場鬧劇...

沒有人談論凱恩斯意義上的再分配或美國30年代的新政。

三十多年來，他們一直是資產階級經濟學的搗蛋鬼：即凱恩斯學派。佩勒林山學會的激進市場學派，連帶密爾頓·弗裏德曼這種臭名昭著的人，似乎已經戰勝了經典凱恩斯學派 --（資本主義）經濟的政府管理宣導者，也戰勝了誕生於1980年代的，把凱恩斯基本思想同新古典主義經濟學派相結合的所謂“新凱恩斯主義”，他們在絕望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和工會會員的環境中，享受放鬆管制的時代，陶醉於對充其量只是朦朧存在的“自由市場”神秘力量之近乎宗教的信仰。

現在凱恩斯再次流行於整個國土，表面上，可能在非專業人士看來，從東到西，形形色色的經濟政治學家突然偏離過去30年的激進市場過程，真是所謂“誰在乎我昨天的胡言亂語”，並重新發現凱恩斯。但是，等一等！如果你仔細看看凱恩斯的思想和你們會有不同的結論。

甚麼是凱恩斯的意圖？

在他的主要著作[2]中，凱恩斯開始立論的觀點是，轉折週期可以最合適“作為資本邊際效率的週期性變化的後果”來考慮。他把總需求定為不僅是生產水準而且也是就業水準的中心要素，因此拒絕了新古典主義理論，這一理論認為，必須通過降低工資減少失業。他有力地反駁說，降低工資產生的積極影響將立即因購買力的減低而挫敗。

凱恩斯的主要著作，於1935年出版，是在一個特殊歷史情形的影響下寫的：首先是1929年世界經濟危機及其所有後果，第二，獨裁經濟體的崛起，例如蘇聯，還有法西斯德國（凱恩斯是德國帝國銀行總裁內松·沙赫特的私人朋友），第三，美國羅斯福政府的政策調整過程，把幾個凱恩斯理論要素務實地整合進其政策中，也即所謂的三十年代新經濟政策。凱恩斯的理論無疑是打算一方面避免他歸類為“專制的政治制度”，另一方面，消除失業：“可以肯定的是，除了短時間的恢復期以外（這在我看來是不可避免），由於當代資本主義的個人主義，世界將不會容忍更長時間的失業。但是，通

過正確的分析問題，應該可以治癒這個問題，同時又保護能力與自由（他否定“專制制度”，——塔都·帕托）。[3]

他無疑認識到統治著社會的不平等現象，但他認為這是不可避免的：“我自己相信，收入和財富的顯著不平等在社會上和心理上是有理由的，但不應當像現在這樣，有那麼大的不平等存在。”[4] 因此按他的觀點，一方面，國家應通過一定的幹預確保充分就業和減弱危機週期，另一方面，限制收入的不平等現象。因此，他提出了一系列的措施，首先是在指導投資和消費增加方面，國家的集中和持續干預。這一點以及他的市場自由主義擔當主角的論點似乎很現代：“因此政府任務的延伸，就是平均消費傾向和誘發投資，儘管這種做法對於一個19世紀廣告員或一個美國經紀人，似乎是對個人自由的可怕幹預，但我反而堅持認為它是唯一可行的工具，可用來避免破壞現有形式的經濟整體，又是個人首倡精神之成功實行的一個先決條件。”[5]

在這一點上凱恩斯走得很遠 - 這點現今被完全地掩蓋隱藏了起來。以他的看法，國家應該提高徵收遺產和高收入稅，他說，“一個相當全面的社會化的投資將會作為幾乎完全就業的唯一措施而出現。”[6] 因為他 - 不同於其他資產階級經濟學主要人物 - 不認為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是歷史的最終結局，他的結論相當激進：

“對於國家，不是產品的所有權，而是其收購性才是重要的。如果國家能夠給所有的資源立法，專門用於增加這些商品並給它們的主人以獎勵，一切必要的事就會實現。此外，社會化的必要措施可以逐步引進，同時不打破社會的普通傳統。”[7]

還是新凱恩斯學派？

凱恩斯模式的經濟，有國家的幹預和再分配，這在“自由市場經濟”的主要人物看來自然是奇怪的。據他們的看法，所謂的新凱恩斯學派設置的欄杆較低，把自己限制於要求所謂的反週期經濟的週期政策 - 不僅當情況出現時，而且要有計劃和不斷地：降低稅收，用赤字金融幫助公共投資，在危機時期降低利率，加強需求和促進投資，而且-在理論上-在經濟繁榮階段則採納相反做法。按這個方向行事，導致了不斷增長的公共債務。無論是凱恩斯還是他的不幸追隨者都沒有考慮到的是，資產階級國家決不是一個中立機體。提取繁榮階段的利潤，可能使得國家維持對未來危機的幹預能力，

但這種利潤的提取在一定程度上根本沒有發生過（不是說遺產稅...）。

現實

面對全球經濟危機，如美國、歐盟、日本等主要經濟大國今天所做的，同凱恩斯的原來方案，幾乎沒有任何關係。表面上，就像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要求的那樣，所謂的“消費優惠券”，一攬子計劃，降低利息和降低稅收可能會出現。但是，政府的“赤字花錢”的目的絕不是漸進的重新分配。相反：花在直接財政援助，債務擔保，以及支持購買金融資本和大型企業的財政支出總量，同用於公共投資的資金之間的關係，是極其不對稱的。舉例來說，在德國，有5000億歐元的拯救銀行一攬子項目；只有約500-800億歐元用於公共投資和加強購買力。比較一下：在60年代後期的危機中，在德國，一個社會民主黨財政部長開啓了一個400億德國馬克投資計劃。聯繫到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今天這將意味著大約4000億歐元。

並沒有各個政府政策總體改變的跡象。相反，最近幾個月，不同的領導人推出了單一的措施，似乎凱恩斯和其追隨者的理論是每個人都能根據財政和政治機會可加以利用的東西。一方要求減稅，另一方要求消費優惠券，第三方要求強迫富人貸款（但要有興趣，自然地！）。沒有人談論凱恩斯意義上的再分配或30年代的美國新政（順便說一下，美國新政完全沒有成功，是世界大戰拯救了美國經濟），他們的行為，好像整個事情僅僅是一個政府救援和緊急措施的事情，那以後，一切都可以繼續像以前一樣。因此世界各地的政治家斷言，經濟再次運行的時候，政府將立即退出經濟業務。

但仍然有直截了當的新凱恩斯學派，如德國左翼黨主席奧斯卡·拉方丹，他要求作公共投資。但是，他懇求建設新公路的事實清楚地顯示凱恩斯主義做法的薄弱點。

凱恩斯主義與氣候變化

凱恩斯及其繼承者注意的焦點始終在增長。但問題是，如今我們面臨著一個聯合危機，它是資產階級經濟無法解決的。一方面，我們有自1929年以來資本主義制度的最深切的經濟危機，一個典型的生產過剩危機，另一方面，氣候變化的威脅，其產生原因正是通過經濟量的指數式增長，導致對自然環境的150年的無限開發。後者證明，把重點放在進一步數量的經濟增長的政策已經過時。例如，我們並不需要更多的汽車，街道和高速公路，只需要一個無環境公害的公共運輸系統。當代形式的個人交通在生態上已經是窮途末路。對付氣候變化意

十月評論 2012年第2/3期

味著把一個經濟秩序提到議事日程上，評估所有生產和分配機制的生態意義，而不是試圖通過市場機制或財政政策（稅收，二氧化碳證書）應對生態後果，或應對以建立額外的“氣候產業”。

但是，對於真正需要的，順應氣候和環境中立的可持續迴圈型經濟，資本主義經濟並沒有提供基礎 - 無論是（新）凱恩斯或其以市場為本的變種都沒有提供基礎。因此，我們要有一個根本不同模式的面向人民需要的生產和分配，又要努力保護自然環境，這對人類生存至關重要。

凱恩斯及其繼承者完全忽視了這一點，因此，我們所需要的是，不能讓國家掌握在產業和金融資本說客們手中。

結論

工業化國家政府實際上的做法，既不是弗裏德曼學派的，不是新凱恩斯主義的，也不是凱恩斯主義的政策。完全沒有任何主見，是短視的，從氣候政治的角度來看，是災難性的。國家和財政部，被產業和金融資本統治集團騙光 - 在今後的年代，廣大的人民將受到危機後果的最嚴重影響，受害於低工資，失業和老年貧困。除了這樣一個事實，即政府“救援包”的成功受到懷疑之外，這將導致進一步的剝削工作階級：剝削的方式是通貨膨脹，這將是債務巨大膨脹的不可避免的結果。

政府實際上正在執行再分配：有利於富人，不利於工作大眾，並且犧牲環境。這些政策被一些宣傳者加上“新凱恩斯主義”標籤，“新凱恩斯主義”誤導地說，有一個理論上站得住腳的一致的危機管理方法。但是，這不是真的：它是虛假的標籤，純屬無可奈何之舉。

註釋:

[1]例如：大衛·羅默，格裏高利·曼昆：“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劍橋，MA及倫敦，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1991年）

[2]所有引文出自：JM 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的一般理論，鄧克爾和漢姆雷特，柏林，第6版，1983年（該文章最初是德文的，所以引用的是德語翻譯部份，可能無法完全吻合英文原文。--- 塔都·帕托）

[3] 凱恩斯，同前。321頁

[4] 凱恩斯，同前。315頁

[5] 凱恩斯，同前。321頁

[6] 凱恩斯，同前。319頁

[7] 凱恩斯，同前。

► 塔都·帕托是德國RSB（革命社會主義聯盟）的領導成員，第四國際的國際局成員

埃內斯特·曼德爾和關於官僚體制的馬克思主義理論

查理斯·坡斯特

過去的兩百年，官僚體系的出現和發展，各種組織裡的無產官僚主義（non-propertied officialdom），在社會科學家引發相當多的討論。通常，資產階級的社會學認為，官僚等級制度是現代社會不可避免的特點，它的規模和複雜性把人民群眾對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做民主控制的任何可能性都排除在外。

馬克斯·韋伯認為，要組織人數眾多的活動，官僚體系是最合理，最有效的模式，因為它確保決策根據的是一般規則，而不是官員或培訓出來的“專家們”的情緒發作，並減少腐敗和任人唯親的機會。[1] 韋伯的官僚體系理論，最初用於分析資本主義國家的官場機制，羅伯特·蜜雪兒斯則把韋伯的理論，擴展到對二十世紀早期的群眾工人階級政党和工會的研究上。[2] 社會民主黨和新斯大林主義者今天接受了“寡頭政治的鐵定規律”，這就意味著，在資本主義制度和任何後資本主義社會秩序下的群眾工人階級政党和工會，其全職官僚階層的增長和篡奪權力是不可避免的。

斯大林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和資產階級的理論否認在現代世界按民主方式組織工人鬥爭和工人力量的可能性，曼德爾的工作提供了可取代這種理論的強大馬克思主義理論。有一種觀念認為，由少數官員和專家獨攬權力，是複雜的大型現代社會組織的“必然”結果，對這樣的觀念，曼德爾其在一系列的作品中[3]，給出了一個複雜一致而有良好經驗基礎的回應。曼德爾認為，官僚機構是人類中間的，以及人類與自然界之間的特定歷史上有限關係的產物，是特定社會關係和物質生產力的產物。對於經典馬克思主義關於官僚體系的討論，特別是對羅莎·盧森堡和托洛茨基的工作，曼德爾的官僚體系理論，為其提供了一個現時代的辯護，發展和深化。

對於曼德爾，出現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以及出現在後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群眾工人階級政党和工會的官僚體系，兩者的根源都在於管理工作（屬於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的社會

分工。無論是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工人階級鬥爭的鬆散性質，還是二十世紀革命後社會的廣泛的物質匱乏情況，“腦力”工作和“體力”工作的持久分工，產生了一個全職管理層，它或者管理群眾性政党和工會，或者管理後資本主義的國家機器。在大多數情況下，這一階層會演變成一個不同的社會階層，有自己的物質利益，政治利益和意識形態。官僚體系機構的發展並不能提高“效率”，不能提高資本主義制度下工人群眾組織的有效性，也不能提高後資本主義社會之中央計劃經濟生活中的工人群眾組織的有效性。相反，官場的壟斷權力破壞群眾工人階級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捍衛自己最直接利益的能力，也破壞群眾工人階級建立一個替代資本主義的可行方案的能力。曼德爾關於官僚體系的理論，是工人階級的自主活動，自我組織和自我解放的革命政治計劃的主要科學基礎之一。

我們對曼德爾官僚體系理論的討論分為三個部分。在第一部分，我們將研究曼德爾有關資本主義社會形態中勞工官僚體系的起源和作用的分析，以及他用以替代官僚改良主義的革命工人組織理論。曼德爾試圖解釋，為什麼同革命馬克思主義者的期望相反，自20世紀20年代以來，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並沒有出現真正群眾性的革命政黨，對於這個解釋，我們亦有評估。在第二部分中，我們將檢討的是，曼德爾嘗試更新和完善托洛茨基對後資本主義社會官僚體系的分析。特別地，我們會努力解決官僚體系與工人階級之間的關係是否構成了新生產模式的問題，還有，這些政權，在任何馬克思主義的意義上，是否可以理解為“工人政權”這個問題。最後，我們將討論曼德爾官僚體系理論的政治重要性。

I. 資本主義社會形態中的勞工官僚體系

在二十世紀早期，群眾性社會主義政黨內部的改良主義有增長的趨勢，對這個趨勢進行解釋的嘗試，導致了關於勞工官僚體系的經典

馬克思主義的討論。歐洲社會主義的革命左派領導人不只是批評社會民主主義主流的理論和實踐，而且還試圖揭示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勞工運動的保守主義及其最終屈服于本國資產階級的社會物質根源。由於布爾什維克革命的實際成功，列寧關於社會民主黨蛻變的看法，用曼德爾的話說，變成了“近半個世紀之久的革命馬克思主義者的‘教條’”，這並不令人驚訝。[4] 根據列寧的說法，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運動中，改良主義思想的增長，是“勞工貴族”意識的表現，這個“勞工貴族”是西方工人階級中享有特權的少數人階層，他們享有更高的生活水準，他們之所以有這種生活，是因為他們能夠分享來自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攫取的“超級利潤”。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期和期間，這一階層支持黨和工會機構中的“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傳播改良主義和“社會愛國”政治思想。[5]

曼德爾是第一位明確拒絕列寧“勞工貴族”概念而具有革命馬克思主義傳統的思想家。有種說法，認為在帝國主義國家中有一個工人階層分享從“第三世界”工人那裡攫取來的“超級利潤”，曼德爾列舉了拋棄這個概念的三個重要理由。首先，跨國公司直接投資于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而獲得的總利潤，不能算在工業化國家裡工會工作者的工資單上，即便是工會中薪資最高者，也是如此。簡單地說，“第三世界”的工人並沒有生產足夠的剩餘價值“收買”顯著份量的歐洲，美國和日本的工人階級。其次，“北方”和“南方”工人工資之間的差距，要遠遠大於“北方”工人中間的工資差距。換言之，整個歐洲，美國和日本的工人階級是潛在的“勞工貴族”。不過，曼德爾指出，造成這些全球性工資差距的原因，是發達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的較大資本密集度（資本有機構成organic composition of capital）和較高的勞動生產率（剩餘價值率rate of surplus value），而不是工業化國家的資本和勞動之間共用“超級利潤”的結果。簡單地說，獲得較高薪水的“北方”工人比比收入低劣的“南方”工人所受的剝削更重。最後，曼德爾指出，在歐洲，美國和日本，一些收入最高的工人，尤其是金屬加工行業的工人，是最勇敢和徹底的無產者，是1920年代和1930年代初的革命共產黨的群眾基礎。[6]

在羅莎·盧森堡的工作中，曼德爾發現了一個較有成效的馬克思主義討論，該討論涉及的是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勞工官僚體系。[7] 在列寧和托洛茨基之前，盧森堡就理解到，工會和黨官僚的出現和發展，是德國社會民主主義中保守主義不斷增長的關鍵。[8] 在1905年的俄國革命之後，盧森堡宣導用“群眾罷工”作為德國工人運動的一種戰術，她遭遇到了反對，反對者有伯恩斯坦領導的社會民主黨（SPD）的公開“修正主義”派，還有考茨基和倍倍爾周圍的黨領導層的“正統馬克思主義者”。她得出的結論是，整個領導層不容忍競選活動和例行集體談判以外的任何活動，其原因不單是中產階級知識份子的影響，其根子在於黨和工會的全職官員對社會民主黨（SPD）的霸權。盧森堡認為，這種官僚主義，一旦同群眾工人階級的機構結合起來，會把保存黨和工會的機構看得比任何深化和擴大工人鬥爭的企圖更重要。

曼德爾確認勞工官僚體系的起源，在於資本主義制度下工人階級鬥爭的起伏斷續性。對於曼德爾來說，階級覺悟發展的必要條件是工人本身的自主活動和自我組織。是群眾的經驗，是在工作場所和社區中反對資本及其政府的成功的集體鬥爭，開啓各階層工人徹底革命的政治理念。如果工人不進行群眾性的鬥爭或遭受失敗，那麼當該階級的一部分階層徒勞地試圖保衛他們的特殊階層（民族，職業，種族，種族，性別）利益不受工人階級的其他部分影響時，他們就變得保守和反動。總之，不是文化的影響，如城市化，電視，電影之類的東西，而是階級鬥爭和獨立性的程度，決定了資本主義制度下階級覺悟的基本屬性。[9]

作為一個整體，工人階級不能永久地活躍在階級鬥爭中。整個工人階級不能始終搞罷工，示威和其他形式的政治活動，因為這個階級沒有有效地佔有生產資料，為了生存，被迫把自己的勞動力出賣給資本。“實際存在的”工人階級作為一個階級，只能在特殊形勢中，在革命中或革命前的形勢中，進行群眾鬥爭，由於資本主義制度下工薪勞工地位的結構性，群眾鬥爭必須是持續時間短的。大部分的時間，不同階層的工人階級在不同的時間段，活躍在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中。

在成功的群眾鬥爭之後，只有少數的工人保持活動。這個“工人先鋒”的大部分 --- 這個階層的工人“即使在鬥爭的平靜期，也不退出階級鬥爭的第一線，繼續戰鬥，可以這麼說，繼續‘用其他手段’戰鬥”。[10] --- 在工作場所或社區向新的工人傳播群眾鬥爭的傳統並保存這個傳統。但是，“戰鬥少數”中的少數，加上中產階級知識份子，他們具備文化技能，而工人階級的大部分沒有這個能力，所以只能由前者擔負起管理工會或政黨的責任，因為群眾活動會經常性的急劇增加。曼德爾承認，“沒有一個具有全職工作人員的機構，群眾性政治或工會組織的發展，是不可想像的。”然而，他指出，全職官員階層的出現，它帶來：風險，工人階級組織本身將分劃成執行不同功能的階層。專業化會導致越來越多的知識和重要資訊的壟斷。知識就是力量，對它的壟斷會導致凌駕於人民之上的情況...，如果不加控制，就意味著老闆和老闆之下的群眾之間產生一個真實的分化。[11]

在階級鬥爭不可避免の間歇期間，如果絕大多數工人階級是被動的，那麼潛在的官僚化就會變成現實存在的。特別是在資本主義發展的“興旺 (long-waves)”期間，大多數工人的生活水準和工作條件獲得改善，沒有騷動，沒有群眾鬥爭，這時，群眾性工人組織的官僚階層會把自己同其他部分的工人階級分開。成為工會和政黨官員的那些工人，他們的生活條件，開始非常不同於那些留在工作場所的工人的生活條件。新的官員發現自己從通常的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屈辱中解脫出來。他們不再屈從於簡單枯燥的異化勞動，無須受辱于工頭的專橫行為及他們的監視。可設定自己的時間計劃，安排自己的活動，並投入大宗清醒的時間“為工人們奮鬥”，官員們尋求鞏固這些特權，並尋求新的特權，尤其是欲使其收入遠高於他們聲稱所代表的工人的薪水。當工會和群眾性工人政黨在資產階級社會中爭得一席之地時，勞工官僚階層的特權已經相當可觀了，為了捍衛他們的特權，勞工官僚不讓工會和黨的普通成員有任何真正的決策權。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勞工官僚作為一個社會階層，不同于而且分離於工人階級的其它部分，它的鞏固，產生了其獨特的政治實踐和世

界觀。保存工會或政黨的機構，作為目的本身，成為了勞工官僚的主要目標。勞工官僚尋求遏制工人階級的戰鬥範圍，勿使其威脅到機構的繼續存在，因為那是官僚們獨特生活方式的基礎。這樣，由於“部分勝利的辯證關係” (dialectic of partial conquests)，新的鬥爭可能導致工人階級群眾組織的破壞，這些情況支援勞工官僚依賴選舉活動和議會的壓力戰術 (“遊說”) 爭取政治改革，嚴格地組織集體談判以提高工資和改善工作條件。在所有的討論中，一直嘗試堅持認為，必須撤銷工人和被壓迫人民自主活動和自我組織所引起的動盪，比如在工作場所的鬥爭行動，群眾性政治罷工等等。[12] 在這一點上，官僚組織機構的拜物教 (把機構的保存，看得比鬥爭的新進展更優先) 發展為替代主義 (substitutionism)，要求工人無條件地服從領導，而那些領導人聲稱他們知道“對工人最好的是什麼。”

曼德爾不厭其煩地指出，選舉政治的改革派替代主義和群眾鬥爭的例行談判，忽略了“基本生產關係和政治社會階級力量的結構特徵”。[13] 換言之，資本主義社會形態中的勞工官僚政治是最消極意義上的烏托邦。[14] 勞工官僚機構試圖調解資本和勞動之間的鬥爭，非常緩慢地修改力量對比關係，使其有利於工人，持續在資本主義不可避免的盈利危機以及由此而激化的階級鬥爭中挪移行進。1935年後，當傳統的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開始轉變成改良主義政黨時，[15] 他們兩者的歷史，不幸的是，都完全證實了官僚體系的漸進論是不切實際的。在革命前和革命中的危機期間，比如1920年的義大利，1918-1923的德國，1936年至1937年的西班牙和法國，1970年至1973年的智利，社會民主黨和斯大林主義政黨成功地瓦解了工人的鬥爭和組織 (工人委員會，工廠委員會等)，他們的理由是，維護資產階級的民主和工人運動既得的成功。不幸的是，群眾性革命鬥爭的脫軌，不只是浪費了奪取國家政權和開始建設一個新民主及社會主義秩序的機會，還給反動勢力開了路。1921年義大利法西斯的勝利，1933年納粹奪得政權，1939年佛朗哥獲得軍事勝利，1940年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崩潰，1973年9月11日皮諾切特的政變，這些都是工人階級喪失時機未能奪取政權的結果。總

之，勞工官僚把工人鬥爭“自我限制”在資本主義民主界限內的企圖，促進了資本主義統治的獨裁和鎮壓兩者的牢固結合。 [16]

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選舉活動，議會施壓政治，爭取工人階級利益的官僚化集體談判，還有群眾運動，這些變革，導致西方國家勞工運動隊伍中出現廣泛的混亂和消極性。雖然這種官僚形式的“鬥爭”，能夠“交付貨物”，產生一些成果，比如提高工資，改善福利，穩定工作條件，還有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經濟發展的“長波”期，擴大“福利國家”，但是在20世紀60年代後期，“長波”經濟發展開始停滯，這一戰略就顯得完全不夠。隨著資本主義盈利危機的加深，改良式的替代主義給了實用主義政治（realpolitik）一條生路，讓它能適應生活和工作條件下降的新“現實”。曼德爾指出：

當今的社會民主漸進主義的基本假設就是：讓資本家生產商品，以便政府可以重新公正地分配它們。但是，如果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要求更不平等，更不公正的“增長成果”之分配，那又怎麼辦？如果因為資本主義的危機而完全沒有經濟增長，又怎麼辦呢？可漸進主義只是機械地重複說：沒有辦法，沒有出路。 [17]

避開工人和其他被壓迫人民的戰鬥性和直接行動，西方的勞工官僚和改革派政治家別無選擇，面臨雇主的進攻，只能做出讓步，對於資本主義國家的緊縮措施，只能執行。最近二十年，在整個資本主義世界，改革派官僚回避改革鬥爭，這種奇觀一再重複，伴隨著可悲的結果：從義大利共產黨同緊縮政策的擁抱，到美國勞工聯合會-產業工會聯合會（AFL-CIO）官員的讓步談判，密特朗政權的預算削減，私有化和放鬆管制，到南非後種族隔離時代的非洲國民大會-南非總工會（ANC-COSATU）主導之政府的屈服，再到一些人所謂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的“受虐貨幣主義（sado-monetarism）”。同樣，在資本主義盈利危機期間，即使是最溫和形式的社會民主漸進主義，都被證明是深深的烏托邦，無法保護工人的既得成果，不能贏得有意義的新改革。 [18]

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群眾鬥爭必然有時間性，在這樣根本的環境中，工人階級群眾組織的官僚主義化是不可避免的嗎？顯然，曼德爾關於資本主義社會形態中的勞工官僚的理論，

十月評論 2012年第2/3期

讓我們得出結論，在全世界資本主義制度被推翻之前，改良主義將繼續是工人運動中的問題。不過，曼德爾的理論還確定了防止政黨和工會官僚化的措施和對等的社會力量。在其可能最重要的政治理論貢獻中，他對列寧主義的組織理論做了闡述和澄清， [19] 曼德爾表明，創造環境從而讓勞工官僚得以發展的階級鬥爭過程，具有相同的時間性，曼德爾說明了該過程是如何為一個群眾革命工人政黨提供物力的。在階級鬥爭的潮漲潮落中，一個工人先鋒沉沒了。一個革命社會主義的核心在組織並最終融合最積極戰鬥的激進工人這方面的能力，會創立各種針對勞工官僚階層的潛在壓力。

在非革命時期，有組織和無組織的工作場所的“先進工人”的非社會主義組織 --- 在美國，我們稱之為“普通職工”的大眾 --- 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們保存著工人運動傳統的戰鬥和團結精神，為工會和群眾組織獲得有效而民主的保障（官員的選舉，減薪，為競選職位而舉行的自由辯論和討論等）而戰鬥。通常情況下，這類組織能夠取代黨和工會的官僚機構，領導重要而卓有成效的日常鬥爭，發展工人的政治和意識形態的自信心。即使在非革命時期，較小的革命社會主義團體也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它們組織“普通職工”大眾，向最激進的工人教授馬克思主義理論和政治學。在革命期間和革命以前的緊要關頭，革命核心同廣泛的工人階級先鋒有效地融合，成為一個真正革命的工人政黨，就可能開啓社會主義革命的機遇。一個群眾性革命政黨，若是深度植根於工人運動，就有助於促進工人階級權力組織（鄰里，工作場所，學校等處的各種委員會）的形成和集中，推出實際替代改革派官僚做法的道路，突破把鬥爭限制於資本主義盈利能力和政治權力之容忍度內的框架，導致奪取政權的成功。 [20]

問題仍然存在，儘管工會和改良主義政黨中的官僚機構是明顯的無能，對於雇主的進攻和資本主義的緊縮壓力，它們甚至沒有能力組織最起碼的防守鬥爭，那麼在20世紀20年代，為什麼沒有看到真正的群眾性革命政黨出現呢？在20世紀30年代後期，托洛茨基和他的第四國際支持者相信，第二次世界戰爭將導致終結蘇聯官僚統治的危機，導致歐洲資本主義國

家中斯大林式共產黨的迅速崩潰，開啓建立新的群眾性革命工人組織的道路。同樣，在20世紀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隨著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停滯“長波”的開始和工人鬥爭的動盪興起，第四國際內外的革命社會主義者預期其相對較小的組織發展迅速，並紮根於工人階級的戰鬥層。曼德爾肯定未能免於受這一時期激情的感染：從1968年到現在[即1977年]，這個期間的基本作用，是讓中堅左派積累足夠的力量，帶著可望贏得廣大工人階級支持的現實可能性進入這個革命時期。[21]

革命左派的樂觀主義，經常同必勝信念相連，它遭受了挫折，因為1970年代初的群眾罷工和革命前期起義的浪潮，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變成了整個工業世界工人階級不斷的退卻。當資本主義發起一些挑戰時，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那一代激進學生和青年工人中的大多數，放棄了革命的政治和較早停滯期有作為的革命組織，或者消沉下去。只是在過去的一年，法國發生的，總體上是成功的公共部門的工人大罷工，加拿大的反緊縮罷工，還有仍然分散的一些工人行動，例如美國代頓汽車工人的罷工等，讓我們看到，在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方面，有一個新鬥爭可能的開始。

20世紀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起義並沒有把歐洲革命左派轉變成數萬工人革命者的組織，關於這點，曼德爾在20世紀70年代末提出了一些初步的解釋。一方面，他指出，他所看到的是，自1968年以來出現在歐洲勞工運動中的一個新的“戰鬥的少數”，暫時迷失方向。1974-75年全球經濟衰退，雇主的進攻和緊縮政策的啓動，正好與葡萄牙革命的失敗相遇：...抓住了工人階級的無覺悟，以及沒有準備...我的意思是，工人階級的堡壘，先鋒，組織幹部，工會代表 --- 所有這些同志們過去一直站在無產階級鬥爭的最前沿。這些同志，在保衛實際工資以對抗通脹的鬥爭方面，有豐富的經歷和組織經驗，但在反對大規模失業的鬥爭方面，他們完全沒有準備。經驗不足，加上官僚體系 --- 義大利和西班牙的共產黨，大多數其他國家的社會民主黨 --- 向資產階級思想政治方面的進攻徹底屈服，使情況愈發糟糕了...

不過，曼德爾認為，這個工人階級“現在被置於暫時的防禦中。”[22]事發後近二十年，現

在看來，很清楚的是，曼德爾嚴重低估了歐洲工人運動所遭受的倒退。

另一方面，曼德爾意識到，20世紀50和60年代，共產黨轉型為改革派組織，產生一些累積影響。曼德爾特別指出：反資本主義傳統的消失，是一個比較近期的現象，它伴隨著發達工業國家共產黨的確定轉變，這個變化發生在第二次世界戰爭的結束時，尤其是冷戰的結束期。即使是在人民陣線時代，這種反資本主義的教育也在繼續...今天，社會民主式改良主義和斯大林式改良主義聯手，力圖讓工人階級成為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囚犯。但是，任何專注於這種現實的階級鬥爭觀點，都會低估一點，就是：任何顯著不穩定階段的階級鬥爭，幾乎是結構上就具有反資本主義的內在動因。[23]

最後，曼德爾認為，1968年以後，建設群眾性革命政黨的障礙是非常短暫性的。在一個相對短的時間內，相信革命組織將能夠深入積極工人的先鋒中，在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建立有數萬成員的小型群眾性政黨。

當20世紀70年代後期工人鬥爭的“暫時”退卻，變成20世紀80，90年代資本主義的長期進攻時，曼德爾的第四國際的政治思想同志開始研究，要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建設群眾性革命政黨，更長期的障礙是什麼。在第四國際過去三屆世界大會採用的檔中，承認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工人先鋒的歷史中有一個深刻的斷裂。有個觀念，認為革命者只須把現存官僚化政黨裡的戰鬥的反資本主義工人爭取到手就可以了，這個觀念已經被換成了另一個觀點，即設法通過新的群眾防禦性鬥爭，漸進地重新組合工人先鋒。在最近的第四國際世界大會上有一個決議，其中說道：

需要重新積累群眾的經驗，局部的勝利和新時代的戰鬥化，彙聚所有的條件，以便大踏步地建設先鋒組織，這個組織將是革命的和國際主義的。出現在20世紀30年代的那種革命先鋒之危機，其實是不再會出現的。今天，不僅是改變破產的領導層的問題。必要的重組將不會被限制於改變有組織的工人運動內部的力量平衡。必須逐步重組不同的國際解放社會運動。這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世界階級鬥爭的某些大事，可能會加速這個過程。[24]

曼德爾的官僚體系理論，他對西方共產黨的社會政治變革的分析，實際上是解釋大批徹底革命工人虛擬消失的關鍵。曼德爾在托洛茨基後，也看到了共產國際第七次世界大會是契機，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斯大林主義政黨演變的契機。[25] “民眾陣線”的戰略從政治上和社會學上轉變了共產主義政黨。在政治上，共產黨適應了傳統的改良主義戰略——保護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度，把它當作勞工運動“歷史性成果”的最佳保障。從社會學的角度，在法國，義大利和（在20世紀60年代末的）西班牙，“民眾陣線”導致共產黨整個變成勞工官僚體系。換句話說，共產黨原本是一個普通戰鬥工人的黨，他們在工作場所積極組織，反對官僚體系和雇主，如今轉變成了工會和黨的招工處。結合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的經濟擴張長波期的影響，共產黨的社會轉型，完全摧毀了十九世紀末期以來的群眾性工人先鋒維護的戰鬥，團結，民主和反資本主義的激進主義傳統。這種新的形勢，向西方的革命馬克思主義者提出了新而艱巨的任務。為了招受和培訓工人積極分子，使他們成為馬克思主義者，需要維持革命社會主義的宣傳和教育，同時，他們還必須發揮積極的主導作用，圍繞“階級鬥爭”但又不能有明確的社會主義色彩，圍繞戰鬥，團結，民主和政治獨立的綱領，重組工人的先鋒隊。[26]

II. 後資本主義社會的官僚體系

曼德爾關於後資本主義社會的斯大林主義官僚體系理論，深化了托洛茨基關於蘇聯官僚統治的起源和矛盾的馬克思主義的開創性分析。[27] 20世紀20年代，大部分布爾什維克領導人，目睹了後革命時期黨和政府中全職官僚的增長，用曼德爾的話說，“作為一個純粹的權力政治，體制的... 行政的問題”，因為他們的“政黨-工人關係的替代的概念：黨在列寧主義的中央委員會的領導下，行使無產階級專政”。換句話說，大多數俄羅斯革命家看到了“官僚主義”問題之一的管理不善以及不稱職官員的壞決策。1923年，托洛茨基是第一個看到這個問題的馬克思主義者：[蘇聯]官僚層...轉化為一個特定的社會階層，有自己特定的物質利益。黨機器捍衛其對政治權力的壟斷，把權力當作

捍衛和擴大自己物質利益的手段。[28]

對於曼德爾，托洛茨基對斯大林主義官僚階層的物質根源和特徵的瞭解，讓他對官僚化的蘇聯社會的動力和矛盾，作出一個嚴格的馬克思主義分析，還使他依據工人的革命性自我組織和自我活動，提出了一個嚴謹的反官僚統治的政治戰略。

曼德爾和托洛茨基關於後資本主義社會的官僚化的理論，來自馬克思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過渡階段的必要性的說法。[29] 在全球（不只是在一個國家內）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商品生產廣泛化和社會內部及社會之間的不平等不斷增長的經濟）後，立即走向社會主義（“自由聯合的生產者”民主地制定計劃的經濟，其中的社會不平等和國家則“消亡”）是不可能的，因為資本主義會竭力阻止均衡而平穩的勞動生產率的發展。雖然二十世紀後期在全球範圍內科學和技術應用於生產過程，有可能較快地輕地滿足所有人類的基本需求，但這將需要：對最起碼需要的限制：人吃食物以不餓為度，衣著樸素，居住簡樸，送孩子去很初級的學校，只享受有限的健康服務。[30]

為了讓整個人類都能享受標準的生活，更重要的是，減少工作日，讓他們能夠發展其全部潛能，消除經濟的不平等和促進國家的“消亡”，全球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是必要的。這反過來要求保存一定的“資產階級分配”模式，即按勞分配，而不是按需分配。工資形式，貨幣，某些消費品市場和確保這一切運作的國家機器，是一個社會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必要條件。儘管經典的馬克思主義傳統認為，工人民主對於一個成功的過渡是可能的和必要的，但他們也承認，維護國家機器和“資產階級分配模式”會帶來這樣的可能性，即產生新形式的社會不平等和衝突。然而，在20世紀20年代中期之前的革命馬克思主義者相信，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迅速勝利，特別是在世界最先進工業資本主義社會的擴展，將大大減少這些危險。[31]

二十世紀世界革命的實際發展，1923年後出現的“國際階級鬥爭的歷史僵局”[32]，讓革命馬克思主義運動面對一個完全意想不到的情況。在一些國家，包括像德國和義大利這樣的工業化程度較高的國家，不是開始向社會主義的全球過渡，而是革命被孤立在經濟最落後的

歐洲部分---前俄羅斯帝國。俄羅斯的經濟落後，加上內戰的破壞性影響，更是雪上加霜，參加過10月革命的一代革命工人，大部分死亡，國家微薄的工業基地遭受大規模的破壞，工業無產階級的大部分被分散到農村。對於德國和義大利革命的失敗，社會民主黨的官僚體系要承擔主要的責任，革命失敗也在俄羅斯創造了一個形勢，在那裡，過渡社會的所有內在矛盾---社會化大生產和資產階級的分配---都激化了。

缺乏成功地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兩個主要先決條件---物質上的富裕和大而集中的無產階級---創造了讓蘇聯官僚體系增長的環境。產生了一個脫離工人群眾的黨政全職官員階層，它首先出現在對人民做稀缺資源的分配和服務的管理工作中。內戰期間，黨政官員的數量開始增長，因為蘇聯徵用農民的糧食養活城鎮工人和紅軍，並試圖組織萎縮的國有工業為戰爭進行生產。20世紀20年代，在新經濟政策下，黨政的官僚機構如雨後春筍般產生，使得城市和農村的商品生產和流通復興。在20世紀20年代後期和30年代，蘇聯的官僚體系加深了對國家機關的掌控，用災難性的農業集體化和“命令經濟”控制國有生產資料。在20世紀30年代末，官僚體系通過對黨政機器的清洗，分散和裂解了所有的反對派，尤其是來自工人階級和農民的反對者，鞏固了他們的政治權力和巨大的物質特權。[33]

就像在他之前的托洛茨基那樣，曼德爾強調蘇聯官僚化的客觀物質來源。一方面，需要有一個機構，在“社會之上”，在物質極端匱乏的情況下分發物品，從而為黨政官場的成長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另一方面，由於失業，工業無產階級四處分散，削弱了作為蘇聯民主之社會基礎的積極分子。[34] 然而，曼德爾和托洛茨基兩人都認識到，布爾什維克重大的主觀政治錯誤，尤其是革命黨人在內戰中的勝利，有助於斯大林官僚體系的勝利。托洛茨基和曼德爾認為，1921年共產黨第十屆代表大會的決定---全面禁止所有反對派參與蘇維埃，以及在執政黨內部禁止反對派---“阻礙而不是促進俄國工人的自主活動。”[35] 這些決定破壞了蘇聯工人，甚至是政治上最活躍的黨員，組織起來反對新興的官僚機構的能力，並給這些

官僚機構一個有力的思想武器，打擊執政黨內外的任何和所有的反對者。正如托洛茨基在1937年確認的：禁黨令後，就禁止派系。禁止派系的結果就是禁止同萬無一失的領袖有不同的意見。員警製造的黨內的鐵板一塊，導致了官僚無法無天的情況，成了各種放蕩和腐敗的根源。[36]

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曼德爾毫不避諱地正視存在於1920-1921年“黑暗歲月”的列寧和托洛茨基政治學中的不會犯錯的替代主義元素。[37] 雖然曼德爾清楚地同意馬塞爾·利伯曼的說法，認為革命前的布林什維主義的特性，是一個堅決的反替代主義的“自由列寧主義”，[38] 同時，曼德爾也指出，內戰時工人民主遭到侵犯，這在當時是必要的，但布爾什維克領導人後來把這種侵犯轉化成政治道德，曼德爾揭示了這個轉化過程。具體來說，列寧和托洛茨基認為，臨時禁止反對社會主義的政黨，限制農民和資產階級的選舉權，授權契卡逮捕，審判和處決反革命分子而無須政治監督，這些是無產階級統治必要和需要的功能。在許多著作中，列寧和托洛茨基明確地為黨和工人階級關係的替代主義概念辯護。托洛茨基在恐怖主義和共產主義（曼德爾正確地指出這是“他最糟糕的書”[39]）一書和他同“工人反對派”的論戰中，宣佈工人階級是一個“搖擺不定的群體”，不能直接而民主地行使其統治。在相同的幾年中，列寧多次把工人群眾描述為無望地分化了的群體，有被資本腐化的各階層（“勞工貴族”）。在1920年至1921年，兩人都宣稱，黨是唯一的---即便同工人階級的願望和欲望相反---建設社會主義的力量。曼德爾為革命馬克思主義運動作出的一個偉大貢獻，就是識別並拒絕了我們傳統的這一面。

如同資本主義國家勞工官僚的情況一樣，前蘇聯和其他官僚社會的統治官僚發展了自己的替代主義世界觀和政治實踐。“部分勝利的辯證法”導致東方的統治官僚偏愛特定版本的“組織拜物教”---保存現有黨政機構要優先於工人階級的自我組織和自我活動的信念。在內部，斯大林主義者和新斯大林主義官僚的替代主義有特權發揮“黨的主導作用。”執政的共產黨是工人階級唯一合法的代表。只有他們能捍衛工人階級的“歷史性利益”，反對所有敵人，

包括工人階級隊伍本身的“持不同政見者”和“左或右派”。執政官僚機構的替代主義意識形態，為蘇聯1930年代大清洗時對工人階級的殘酷鎮壓，為1950年代東德，波蘭和匈牙利的起義，為反對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為反對1971年和1981年的波蘭大規模罷工和1989年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和工人，提供現成的理據。對於官僚體系，只有黨，而不是工人，是無產階級的“真正利益”的最終擔保人。 [40]

從外部看，執政的官僚機構試圖要其他國家勞動人民的鬥爭服從“保衛一個國家（選擇您最喜愛者）的社會主義”的目標。根據托洛茨基的分析，要工人和被壓迫者在本國的實際鬥爭服從捍衛國外的一些“社會主義祖國”的目標，會有災難性後果，曼德爾擴展了這個分析。1933年的德國共產黨，1936年至1937年法國和西班牙的共產黨，二次世界戰爭之後的希臘和1965年的印尼共產黨，把後資本主義官僚體系的外交需要，置於本國階級鬥爭的需要之前，付出了極高的代價 --- 受到大規模的鎮壓，數萬名中堅分子遭殺害。在東方，對統治官僚的屈服，創造了條件，使法國，義大利和西班牙的共產黨，逐步轉型為改良主義政黨，並導致20世紀60年代許多左派革命的崩潰，因為這些左派把毛式官僚主義當作政治指南[41]

最終，後資本主義官僚體系不能鞏固一個繁榮的，吸引人而且穩定的資本主義替代者。曼德爾的主要貢獻之一，就是他發展了托洛茨基關於官僚中央計劃之局限的洞見：蘇聯官僚階層的進步作用恰逢這樣的時期，在這個時期，資本主義技術元素被全力地引進蘇聯...根據現成的西方模式，通過官僚命令，可以建立龐大的工廠，雖然，可以肯定是正常費用的三倍。但是你走得越遠，經濟運行的品質問題越多，它像影子一樣的滑出官僚之手... 在一個國有化的經濟中，品質要求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有一個民主作用，批評的自由和首創性 --- 這些條件不符合一個充滿恐懼，謊言和奉承的極權主義政權。 [42]

曼德爾用廣泛的研究，從理論上提煉，從經驗上記錄該理論 [43]。用黨政官僚機制代替工人和消費者的民主決策，斯大林的指令經濟（中國也是這樣的）沒有任何機制可以保證勞動生產率長期和持續的發展。後資本主義官

僚機制有能力組織大規模的增長，迫使數百萬背井離鄉的農民在工廠工作，再現了西方資本主義的勞動過程，讓勞動生產率僅有“一次性”的提高。然而，當他們面對有組織的集中強化增長時，措手無策，不斷地用新技術和新消費項目的生產替換生產活動。官僚機制既缺乏“競爭的鞭子”，以確保每一個資本主義企業不斷地通過機械化減少必要的勞動，也缺乏對經濟決策的民主控制，無法讓“自由聯合的生產者和消費者”按照他們的利益，減少勞動時間和保證個人及集體消費項目的品質。因此，官僚經濟沒有經濟或政治的動力，要去開發新技術或節約利用資源。結果是“普遍缺乏責任感，對工廠的運作情況漠不關心，是該制度的一個特徵，它以停滯和衰退威脅著蘇聯。” [44] 東歐和前蘇聯官僚指令經濟的命運，悲劇性地證實了曼德爾和托洛茨基的理論。

托洛茨基把自己限於一般的號召，呼籲通過反官僚的工人革命恢復蘇維埃民主，與托洛茨基不同的是，曼德爾提出了詳細的民主集中制的經濟計劃模型。全球性的“自我管理”的經濟將建立在生產者和消費者民主協商的基礎上。這些參加協商的官員將由所有成年人選舉出來，將服從立即的召喚，並會獲得一個熟練的工人的平均工資。這些工人權力的民主機制，通過西方反資本主義的革命和東方反官僚的革命而產生，這些機制將在國際，國家，企業及管理，工廠或其附近的層面上接合起來，其中：決策應在其最容易執行的層面上做出，而且還應讓最大比例的受到其實際影響的人可以參與決策過程。 [45]

簡單地說，國際機構和國家機構將有權制定經濟計劃的基本輪廓，企業的，地區的或工廠-管理的機構在決定如何實現其計劃的特定部分時，將會諮詢他們產品的消費者。 [46]

為了讓民主的“自我管理”是有效的，在計劃過程中，工人階級必須能夠表達自己的需要和願望，必須要有對社會經濟的計算錯誤作校正的機制。據曼德爾的看法，要讓工人階級按照其所有的差異性，有效地控制計劃過程，政治多元化是必需的。如果不讓所有的政治潮流（包括思想上親資本主義者）有權利組織政黨，能夠使用媒體（按他們的人數比例），以及有權組織示威遊行和其他非暴力行動，以推

動他們特定的觀點，中央計劃將無法有效地利用生產資源，提高勞動生產率。曼德爾也承認，形式上的民主機制和各階層人民政治權利的嚴格保障，是民主社會主義治理的必要條件，但並非充分條件。還有關鍵的社會和經濟條件，最重要的是，徹底減少人民大眾的工作時間，使所有人“有足夠的時間，管理他們工作場所或社區的事務。”[47] 工作時間的這種減少，讓大多數人每天花3-4個小時在商品的生產或提供服務方面，每天另外的3-4小時則用在社會自我管理的工作上。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的分工是官僚體系的基礎，爲了取消這個分工，必須普及教育，文化和掃盲，以適應一個高水準的物質豐富性和勞動生產率。曼德爾斷言，要做到這點，不僅東方官僚統治要被取代，還須在一些先進的工業社會推翻資本主義，釋放其巨大的生產潛力，這才有可能。[48]

曼德爾如同他之前的馬克思和托洛茨基一樣，他承認，當資本主義在世界範圍內被推翻後，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商品生產和流通以及市場還會存在。曼德爾同意最權威的“市場社會主義”理論家亞歷克·諾夫的觀點，認爲“在任何後資本主義社會，對剩餘市場關係的激烈壓榨”不是“目前可望的或現實的。”事實上，曼德爾看到，諾夫的“可行社會主義”模式中有些元素，同其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民主治理社會中市場結合計劃的觀念相近。[49] 不過，“市場社會主義者”聲言，商品生產是經濟生活的永久而不可改變的特徵，這是曼德爾不同意的。對於諾夫，一個工業化經濟體中經濟決策的複雜性，以及人類的“無限欲望”，使得匱乏的消除是不可能的，而匱乏是商品生產的基礎。根據曼德爾的看法，市場的消亡是可能的，原因有兩個。首先，“溝通靈活的自我管理”系統可以把數千計劃經濟必要的決策的大多數，分配給不同的民主組織的機構，克服“決定太多”的問題。其次，一旦基本的物質需要得到滿足，可以設想到商品和服務需求的“飽和度”。曼德爾拒絕簡單化的“人性”的概念，這個概念是新古典經濟學和“市場社會主義”的理論基礎：不斷地積累越來越多的商品... 絕不是人類行爲的普遍甚或主要的特點。個人才能和興趣的發展，健康和生命的保護，對孩子的照顧，作爲心理穩定和幸福之先決條件的豐富社會關係

的發展 ---一旦基本的物質需求得到滿足，所有這些就會成爲主要的動機。只須看看資產階級上層在食品，服裝，住房，傢俱或“文化產品”上的作爲，就會注意到，對於那些已經‘生活在共產主義制度下’的人，理性的消費會取代無休止的欲求。[50]

曼德爾在回應過去二十五年環保運動的興起時，對不同形式的社會經濟組織同自然環境的關係作了詳細討論。資本主義和官僚經濟兩者都強暴毀壞環境，對此有“綠色”分析，談到了馬克思主義角度的社會主義，曼德爾對此提出了兩點反對意見。各種“綠色”理論家認爲，馬克思主義關於未來社會的觀點，立基於物質匱乏的消除，這將給這個星球加上難以承受的物質資源壓力，並導致一場生態災難。曼德爾指出了資本主義和官僚指令經濟兩者的社會資源的浪費規模。單是直接取消軍火工業，就會釋放出巨大的資源，把其用於對社會有用的生產（基於可再生能源者，環保技術等）上，可以爲世界人口的大部分提供足夠的生活水準，而無須對地球有限的能力提出新要求。當身體安康（食物，衣著，住房，醫療，教育）的基本物質需求得到滿足時，優先考慮的應是非物質的“自我實現”（文化，政治，思想和個人發展）的需求，這些需求的滿足無需使用有限的自然資源。

第二個對馬克思主義的“綠色”批判，基於前蘇聯和東歐的生態災難，認爲在生態方面，中央計劃經濟並不比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更善。對於曼德爾，由於相同的官僚之不善管理在東方造成的環境破壞，導致了勞動力和其他資源的系統性浪費。換句話說，在東方，對中央計劃者和工業管理者這個部分，由於缺乏一個民主的問責制，使他們能夠系統地污染物質環境。與此相反，民主計劃的經濟有可能避免生態災難，而生態災難是資本主義和官僚指令經濟的特點。積極參與制定和實施經濟發展計劃的工人和消費者，有不可抗拒的利益，要發展既不傷害生產直接參與者的健康，又不污染必須呼吸的空氣和飲用的水的勞動過程。此外，工人嘗試提高他們生活水準而未考慮到對後世的影響，可能會造成環境的破壞，而民主的“自我修正”有可能把這些破壞極小化。[51]

曼德爾對托洛茨基後資本主義官僚體系理

論的發展，不僅為自由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和斯大林官僚主義理論，而且也為其他馬克思主義理論，提供了一個有力的理論替代方案。對於認為前蘇聯，東歐和中國是“國家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的理論，曼德爾提出了廣泛的批評。[52]有些經濟，其主要生產工具的分配，根據的是有意的計劃決策，而不是不同的利潤率和生產價格，但是官僚管理不善；勞動力不再是商品，國家壟斷的對外貿易把全球資本主義競爭的影響傳達到計劃經濟上，認為這種經濟是資本主義的，這個觀念在理論上和經驗上是站不住腳的。這個理論，正如曼德爾多次指出的，粗暴地對待馬克思主義的資本積累理論和官僚經濟的經驗現實。[53]

關於官僚體系的其他主要的馬克思主義替代理論，“官僚集體主義”的理論，曼德爾也有批判，不過不像他對“國家資本主義”理論的剖析那樣嚴格。同托洛茨基一樣，對於曼德爾，後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官僚是一個印度式的種姓階級，一個社會階層，它不同於社會階級，在社會生產中的沒有必要的角色。官僚體系和計劃經濟間的“寄生”關係，剝奪了這些後資本主義社會的既成生產方式的社會一致性。20世紀30年代後期以來，針對斯大林主義的各種馬克思主義批評向這一理論提出了挑戰，認為官僚是一個新的剝削階級，它們在前蘇聯和東歐集團國家組織了一個新的，後資本主義模式的生產。[54]“官僚集體主義”的理論已被各種各樣的革命社會主義者掌握，包括前東歐集團裡許多著名的反官僚體系的活動分子。[55]其理論的吸引力並不讓人奇怪。一方面，它避免了“國家資本主義”理論的問題。另一方面，它避免了曼德爾和托洛茨基之“過渡性社會”理論的複雜性和模糊性，把官僚體系和指令經濟放在人們熟悉的階級和生產方式的馬克思主義範疇內。

曼德爾對官僚集體主義理論做了兩種不同的批評。第一個，我們認為是較弱的反應，針對的是官僚經濟中商品生產和流通的保存。工資形式的保留，世界市場的影響等，是任何過渡性社會特點，是同計劃經濟邏輯背道而馳的。因此，這些經濟體是：分配式經濟和商品-生產經濟的雜交組合，價值規律運行其中，但不占主導地位。而且價值律的這種影響，最終確

立了官僚專制不可移動的限制，這就是“官僚集體主義”理論家...看不到...對於一個“新”的，“官僚主義”的，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出現，蘇聯官僚體系必須要一勞永逸地脫離價值規律的影響[56]。

這段說法針對幾個重要的批評。首先，據曼德爾和托洛茨基的觀點，官僚特權和權力主要來自“資產階級分配方式”的保存，這個觀點是有問題的。相比工人階級的生活，許多官僚有高得多的生活水準，這並不是來自其優厚的收入和商品市場的來往。相反，是基於他們的政治權力，而權力來自他們對國家機器和國有生產資料的指令，他們通過特殊的商店和“插隊”方式，優惠地的攝入非市場，非商品的消費品，獲得相對稀缺的消費品，如汽車，房屋等。其次，更重要的是，在許多社會裡，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同相當廣泛的商品流通並存，還有“統治階級特權中的特權...主要局限在私人消費領域，[而且]在持續增加的生產力方面，他們沒有長遠的利益。”[57]古代和所謂“新世界”的歐洲封建制度，奴隸制度，以及各種“亞細亞”社會，在某些情況下，推進過廣泛的商品生產，雖然不是那種可能只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才有的廣義商品生產。這些相同的生產方式由剝削階級主導，他們的特權限於私人消費，無法按生產力持續提高的方式組織其直接生產者的生產過程。事實上，只有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統治階級的特權會延伸到對生產工具 --- 組織勞動過程的手段的真正掌握。因此，在世界歷史上，資產階級是第一個能夠而且必須通過機械化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的統治階級。[58]

在過去25年，“市場機制”引入官僚指令性經濟，已經證明了這個可能性，即“市場”和“計劃”的結合能夠不破壞特權和權力。在過去的四十年中，南斯拉夫，波蘭，匈牙利，中國和前蘇聯的統治官僚，都在不同的時間點，推出了“市場化改革”，以圖克服東歐集團勞動生產率的長期停滯。我們知道，對於刺激集中性經濟發展或者減少官僚專制，這些改革均奇特無效。如果有的話，市場機制豐富了官僚體系，加劇了同工人階級和農民的對立，因為它不強制生產單位引進新的勞動過程，或更有效地使用材料。[59]總之，每一個社會，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時，計劃和商品生產的結合

是必要的性能，計劃與市場的結合，並不是拒絕前蘇聯，東歐和中國發展的新生產方式理念的充分基礎。

對於作為一個“新統治階級”的官僚，曼德爾所作的第二個批判比較強烈，指出了官僚權力和有效的經濟計劃邏輯之間的深刻矛盾。[60] 首先，官僚體系同經濟計劃有個“寄生”關係 --- 理論上，對於計劃經濟，這是不必要的。無須特權階層的官員，工人階級可以很輕鬆地組織起一個計劃經濟，雖然，至少在最初階段，並非沒有專家和技術人員參與。相比較而言，人們無法想像沒有資本家和工人的廣義商品生產經濟。

第二，官僚體系欲使自己富裕，這種企圖會破壞計劃過程的效率。在指令經濟的每一個層面，官僚階層有系統地隱藏資源，無論是勞動力，原材料還是機械，都隱瞞起來，以滿足生產目標，獲得現金或獲得更好的住房，休假等形式的獎賞。官僚體系的秘密，使得有效的經濟計劃是不可能的。如果沒有資源和生產能力的實際資訊，要設定現實可行的生產目標，是不可能的。與此相反，資產階級發財致富的努力，深化了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競爭，因為每個資本家都試圖降低成本，削弱別人，提高自己的市場份額。資本家的個人利益同價值規律的運作一致，但官僚的個人利益同經濟計劃的邏輯背道而馳。

最後，官僚特權和計劃邏輯之間的矛盾，剝奪了官僚經濟的危機復蘇的任何內在動力。雖然官僚特權破壞計劃的有效性，導致20世紀70，80年代經濟增長率的下降，但官僚經濟內部卻沒有可以解決危機的機制。只有社會力量的關係從政治上發生深刻的變化，或者是發生工人的反官僚體系的革命，或者是資本主義復辟，才可能建立恢復增長的條件。資本主義有內在的動力，要替換人的勞動，雖然這會使利潤率下降和引起定期的“長波式”經濟危機。然而，資本主義自己會產生這些長期危機的解決方案。經濟崩潰時，低效資本和“多餘”勞動的大規模消除，會恢復利潤積累的條件，迸發新的“長波”經濟擴展。[61] 因此，不存在資本主義的“最終危機”。資本的統治，像封建貴族和植根於生產方式的統治階級，必須被推翻。對托洛茨基和曼德爾理論之最有力的歷史驗證，

就是前蘇聯和東歐的政權，它們沒有植根於新的生產方式，所以在1989年至1991年迅速倒塌。這些社會的官僚統治並不是由工人階級或帝國主義推翻的，而是長期經濟停滯導致的崩盤結果。毫不奇怪，出現在東歐和前蘇聯的社會形態，還沒有成功地過渡到資本主義。

雖然曼德爾和托洛茨基關於後資本主義社會“過渡性”的理論仍然有說服力，但他們聲言，這些政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官僚化”形式，這個觀點是有待商榷的。[62] 俄國革命初期，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基本上把工人政府等同於高度民主形式的公眾參與和問政，特別是1871年的巴黎公社，1917年至1921年間出現在俄羅斯，德國，匈牙利，義大利的工人，士兵和農民協會。[63] 中西歐革命的失敗和內戰的破壞，削弱了俄羅斯蘇維埃作為人民權力機關的可行性。對於列寧和托洛茨基，俄羅斯國家的工人階級特性被保存在社區的黨組織中，後者組織了最活躍，最堅定的工人。然而，“黨的統治”被證明不足以維護甚至是間接形式的工人自治。1921年後，黨內民主的衰落，派別活動遭禁止，在1920年代末期，黨政官僚體系得以鞏固，把蘇聯共產黨變成了斯大林主義的官僚政治工具。

到了20世紀30年代末，托洛茨基認為，蘇聯仍然是一個工人國家，儘管“政治上沒收”了工人階級的權力，不過官僚體系仍然維持社會和經濟的“十月革命成果”--- 國有資產，中央計劃和國家對外貿易的壟斷。蘇維埃政權是一種“波拿巴主義”的形式，既類似封建專制主義，讓貴族割讓權力給皇室官僚以保存封建主義，又類似法西斯主義，讓資產階級分出些權力給小資產階級，以便維護資本主義積累的條件。因此，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主流，包括曼德爾，把蘇聯，後來的東歐，中國和越南，視為“官僚化的工人國家”，工人階級統治但沒有治理國家。[64]

有令人信服的理論原因，要維持“官僚化工人國家”的理論。最重要的是，傳統的托洛茨基主義概念同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公理是一致的，這個公理就是，每個因社會衝突而撕裂的社會，無論它是多麼不穩定的，多麼暫時的，都是由單一的社會階級統治的。正如佩里·安德森說的，托洛茨基對斯大林主義的解釋：提

供了相當長歷史時期的斯大林主義現象的理論，它同古典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範疇是一致的。托洛茨基在對蘇聯官僚體系性質做審視的每一處，都尋求在連續的生產方式以及它們之間轉換的邏輯中，找到它的位置，以及相應的階級權力和政治制度，他繼承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傳統做法...因為他可能考慮到斯大林主義在這個時代性的歷史階段的出現和鞏固，他避免了倉促新聞式的解釋和湊合出新的階級或新的生產方式，以免同歷史唯物主義脫節，而那是他許多同代人的反應特點[65]。

然而，這些優點，掩蓋了深層次的“工人國家”觀點的問題，據該觀點，工人統治國家但並不治理國家。用封建專制主義和資本主義獨裁統治作比喻，往往模糊了向社會主義過渡的不同層次問題。首先，無論是封建主義的還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它們都不是因為自覺地試圖創造新社會形態的階級鬥爭而出現的。相反，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出現，是有產階級為鞏固擴大其階級統治而鬥爭的結果。相反，社會主義，是無產的社會階級，也即工人階級，通過有覺悟的鬥爭而建立的第一個社會形態。此外，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再生產，靠的是“盲目的經濟邏輯”，“背後”操作的是經濟上占主導地位的階級和直接生產者。封建貴族和資產階級無須直接支配政府，就能控制社會。社會主義是第一個基於精確計劃的經濟發展的社會形態。社會主義和所有以前的勞動形式之間的這些深刻差異，導致曼德爾在其最後的主要研究中認為：工人階級沒有治理而能執政，這是不可能的。必須同時在企業和部門，城市和地區內，以及在政府和國民經濟的總體上行使權力；在‘統治’這個詞的任何現實和直接的意義上：在分配稀缺資源時，對經濟，社會和文化的輕重緩急做出關鍵的決策。因此，在‘專業行政權’和大眾階級之間，無產階級的決策功能，啟動了一個社會過程，抑制這種直接的階級集體統治。[66]

這裡，曼德爾提供了令人信服的理由，反對把專制主義，法西斯主義和官僚統治看作類似的東西，據此，他與托洛茨基曾經建立了“官僚化工人國家”的概念。

曼德爾在其他著作中，試圖捍衛“官僚化工人國家”的理論，認為斯大林官僚是工人階級的十月評論 2012年第2/3期

特權階層，篡奪了工人階級其餘人的權力。首先，他聲稱官僚階層的大部分特權來自工資：官僚階層，因為它沒有自己的生產資料，專門參與國民收入分配，以此作為其工作報酬。這產生許多特權，但它是一種報酬形式，性質上同薪金報酬形式並無不同。[67]

這種說法面臨兩個批評。首先，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官僚通過非工資的，非市場的方式獲得消費品，確定其更高水準的消費。官僚的特供店，別墅等等，來自他們的政治權力 --- 對國家機器的統治和對國有生產資料的控制。第二，工資形式，因為工人階級的必要特徵不足以把一個社會群體定義為無產階級的一部分。在資本主義的社會形態，上層和中間級別的企業高管領取薪水。即使這些高管沒有自己的股票（儘管大部分人是這樣的），他們還是資產階級的一部分，因為他們指揮他人勞動和配置生產資料。同樣，可以說，一個更大階層的“打工仔” --- 低一級的主管，技術人員和專業人士 --- 在先進資本主義社會也不屬於工人階級。許多當代馬克思主義者認為這些組別形成一個新的中產階級，它產生的原因，是資本主義制度下的資本集中和中心化，以及科學在生產上的系統性應用。[68]

曼德爾還認為，後資本主義的官僚是工人階級的一個階層，因為工作的個人容易轉入官僚體系。

今天，相當多的官僚，按照其廣泛而真正的意義，不僅是工人的兒子和女兒，甚至是以前的工人本身，這是絕對肯定的。... 在蘇聯社會的特殊結構，使官僚體系可以吸收工人的兒子和女兒甚至工人自己進入國家機器中。雖然不是進入國家機器的高層，但其位置遠遠高於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那些所謂的中產階級。[69]

有一種看法，認為在東方的工人階級和官僚體系之間，社會地位上升的流動速率雖然緩慢，但比西方的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地位上升的流動速率要高得多，[70]這種說法在理論上仍然不能令人信服。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來看，決定階級屬性的是它們同社會生產的客觀關係，而不是其成員的社會出身。簡單地說，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可能會遇到顯著增加的社會地位流動性 --- 大量資產階級的無產

階級化，以及少數工人階級的資產階級化，而資本和雇傭勞動之間的結構關係並無改變。事實上，許多甚至大部分來自工人階級的後資本主義官僚，並未成為無產階級的官場部分。

我們關於後資本主義官僚體系的討論，把我們置於一個困難的理論境地。一方面，官僚體系是一個基於新生產方式的新社會階級的概念，很少有理論或實證的基礎。後資本主義的指令經濟是過渡社會的，其社會主義進程受到官場的阻止，權力和特權使得有效的經濟計劃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非常難以認為，官僚政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變形”。東方的工人階級既未統治也未治理，官僚不是工人階級的一個“階層”。這使得我們無法確定是哪個階級統治前蘇聯，東歐和中國。在最好的情況下，我們可以說，這些社會是“歷史流產”的結果，是二十世紀“全球階級鬥爭僵持”的產品。他們是極不穩定的過渡性社會，受官僚階層的控制，官僚階層把工人階級排除在任何真實的或正式的社會政治權力之外，只讓自己是唯一的統治階級。他們在1989年至1991年的迅速爆裂，表現了其深刻的不穩定性和徹底的官僚“寄生”特性。根據我們對他們實際歷史演變的經驗，這是我們作為馬克思主義者，對這些社會可以有的最佳理解。進一步的理論澄清，將需要新的官僚化過渡社會的出現，它將為我們的理論提供了額外的“原料”。出於這個原因，我們有理由希望這個理論問題，永遠不會決定性地加以解決。

III. 結論：工人階級自我解放 和工人民主的必要性

在盧森堡和托洛茨基所提供的基礎上，曼德爾的工作，為我們提供了理論上最嚴格，經驗上良好可行的，關於官僚體系的最近的馬克思主義討論。曼德爾對資本主義制度下和後資本主義社會形態裡執政官僚體系中的勞工官場的分析，是一個有力的替代理論，可以替代自由主義的，社會民主主義的和斯大林主義的理論，因為後者主張一個專職的非有財產官員集團的統治是現代社會一個不可免的功能。官僚體系是特殊的，歷史上短暫的社會關係和物質生產力的產物，而不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個不可避免的發展。

曼德爾更多地表明，在資本主義和後資本主義社會兩者中，工人階級都有民主自治組織的可能。他有關官僚體系的理論，連同他對20世紀資本主義積累動力的調查，指出了，工人階級的自我解放的必要性，因為那是全人類解放和生存的唯一基礎。認為勞工官僚階層可以保護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工人的利益，或者執政的官僚階層可以構建一個可行的資本主義替代者，這個觀念已被證明是徹底的烏托邦。西方的改革派官僚層的物質地位和自身利益，讓他們瓦解和解散工人階級，不做任何實際鬥爭，使大多數在過去的半個世紀努力爭取工人利益的人屈服投降。東方的統治官僚階層的物質地位和自身利益，導致他們破壞計劃過程，浪費寶貴的人力自然資源。總之，逐步改革資本主義，或建立替代它的獨裁體制，這些官僚體系的戰略失敗，一定會在資本主義和後資本主義兩種社會形態裡的官僚階層的社會地位上掙扎。

對於二十世紀後期我們的革命社會主義政治項目來說，曼德爾的官僚體系理論，是重要的科學基礎之一。我們的論點是，即工人階級的自主活動和自我組織提供了唯一可能的基礎，讓人民可以抵抗資本主義進攻，推翻資本的統治，構建一個替代它的集體主義的社會秩序，這個論點直接來自曼德爾有關社會民主黨和斯大林主義官僚體系的理論。不是善意，民主理想主義或單獨一個平等的道德承諾，而是對工人運動和後資本主義社會之官場作用的科學認識，使我們堅持認為，工人階級的自我解放是替代資本主義野蠻的唯一可行之路。

▶ 查理斯·坡斯特是美國社會主義組織‘團結’的成員，在紐約城市大學教社會學，是該校教職工工會的積極分子。

註釋:

- [1] 馬克斯·韋伯，*經濟和社會：解釋社會學概要*（伯克利：加州大學出版社，1979年），第2卷，第十一章。
- [2] 羅伯特·蜜雪兒斯，*政黨：關於現代民主的寡頭統治趨勢的社會學研究*（紐約：自由出版社，1962年，初版於1911年德國）。
- [3] 對於我們而言，最重要的三個作品是：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第二卷（紐約：每月評論出版社，1970年），第15章，“什麼是官僚？”T·阿裡（主編），*斯大林主義的傳統：它對20世紀世界政治的影響*（哈蒙茲沃思：企鵝出版社，1984年）；*權力和金錢：馬克思主義的官僚體系理論*（倫敦：Verso，1992）。
- [4] “什麼是官僚？”75頁。
- [5] 列寧關於“勞工貴族”的理論，來自他的“壟斷資本主義”的理論。見：列寧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通俗的論述，第八章，列寧選集，第1卷（莫斯科：進步出版社，1970年）。
- [6] 曼德爾對列寧的“勞工貴族”理論的批評，見於“什麼是官僚？”75-76頁。曼德爾對“第三世界”工人和工業化資本主義社會工人之間的工資差距根源的思索，發生了很大的演變。在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 [卷II，453-459頁]中，曼德爾認為，欠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工人的低工資，是這些社會中的資本的低有機組成和低剝削利率。在晚期資本主義 [倫敦：新左派圖書，1975]，359-364頁]中，曼德爾認為，在我們看來正確的是，即固定資本和勞動生產率的不平衡發展是全球工資差距的原因。
- 關於“勞工貴族”和工資差距的理論的最近討論，否定了這個想法，即“壟斷”或“寡頭”--- 缺乏或限制競爭--- 是工資差距的根源。相反，工資差距是真正的資本主義競爭的結果，因為競爭必然會在生產部門內部和之間產生不同程度的資本密集度。見：撒母耳·弗裡德曼，“論勞工貴族”，*中流砥柱*（舊系列）2,3期（1983秋），撒母耳·弗裡德曼，“結構，過程和勞動市場”，小威廉·達利提，*勞動經濟學：現代觀點*（Hingham, MA：克魯維·奈霍夫，1983），霍華德·波特翁尼克，*持續存在的不平等現象：資本主義的競爭下的工資差距*（普林斯頓：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1993年）。
- [7] “什麼是官僚？”72-75頁。
- [8] 在這方面，盧森堡最重要的工作是 *群眾罷工，政黨和工會*（紐約：Harper & Row出版社，1971年）。
- [9] 曼德爾的階級覺悟理論，詳見於S·布盧姆（編十月評論 2012年第2/3期

- 輯）的“列寧主義的組織理論：它與今日的關係”，20世紀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和社會現實：曼德爾文集（大西洋高地，新澤西州，人文國際新聞出版社，1994年），80-91頁。類似的觀點見於J·Brenner和R·布倫納，“雷根，右派和工人階級”中流砥柱（舊系列）1,2（1981年冬），29-35頁。
- [10] “列寧主義組織理論”，85頁。
- [11] *權力和金錢*，59-60頁。
- [12] 顯然，勞工官僚也不是鐵板一塊。群眾鬥爭導致了工會和改良主義政黨領導層的分裂，這些領導層的官僚部分試圖取得工人階級鬥爭浪潮的領導權。然而，官場的一個部門的這種調整，通常是對獨立的組織和主動行動的一個反應，這些主動行動是“自下而上”（工會的普通員工等）的，往往由激進分子和革命者領導。“反叛”的官僚試圖干預這些鬥爭，把它們限制在改革派政治的範圍內。20世紀30年代美國的群眾產業工會主義出現時，約翰·L·路易斯的作用，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卡爾·列金及其他社會民主聯盟官員在武裝和動員德國工人挫敗1920年卡普政變時，它也有可能起了背景的作用。美國的情況，請參閱：A·普雷斯，*勞工的一大步：產業組織大會（CIO）的20年*（紐約：探路者出版社，1964年），第I部；M·大衛斯，“美國勞工和民主黨的野蠻婚姻”，*新左派評論* 124（1980年11月-12月），46-54頁。德國的情況，請參閱：C·哈蒙，*失去革命的德國1918至1923年*（倫敦：書簽，1982年），第8章。
- [13] *權力和金錢*，235（原文重點）。
- [14] 我們使用的“烏托邦”一詞，在同一意義上，馬克思和恩格斯把它用於前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者，托洛茨基把它用到斯大林主義的“一國社會主義”的概念：一個改變社會的戰略，它並沒有根據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階級鬥爭動態的現實科學的認識。
- 曼德爾也承認，“烏托邦主義”有一個積極的方面：有能力想像一個更好，更民主的，平等主義和集體主義的社會秩序，作為一種革命鬥爭的鞭策。見*權力和金錢*，232-235頁。也可見邁克爾·洛伊，*論改變世界：從馬克思到瓦爾特·本雅明的政治哲學論文*（大西洋高地，新澤西州，人文學科出版社，1993年）。
- [15] 關於西歐共產黨的社會民主化，參見曼德爾，*從斯大林主義到歐洲共產主義：“一國社會主義”的惡果*（倫敦：新左派叢書，1977年），第1章。
- [16] 參見：F·克羅丁，*共產主義運動：從共產國際到共產情報局*，第I卷（紐約：每月評論出版社，

1975年)。

[17] 權力和金錢，236頁。

[18] 曼德爾關於這個動力的詳細討論見於“義大利共產黨 (PCI) 和緊縮”中，從斯大林主義到歐洲共產主義，125-149頁。對於改良主義矛盾的類似分析，請參閱羅伯特·布倫納，“改良主義的悖論”，中流砥柱，43期 (1993年3月)。

[19] “列寧主義組織論。”

[20] 儘管其對在20世紀70年代末西歐革命的短中期的可能性有非常過分樂觀的估計，有關這一戰略的最好演講之一是曼德爾的“西方社會主義戰略”，今日的革命馬克思主義 (倫敦：新左派出版社，1977年)，第1章。

[21] “社會主義戰略在西方，”42頁。

[22] “社會主義戰略在西方，”，48-49頁。

[23] “社會主義戰略在西方，”61頁。

[24] “建立第四國際的今天，”第四國際第14屆世界大會檔，特刊，國際觀點 (1996年春季)，58頁。

[25] 從斯大林主義到歐洲共產主義，17-22頁。

[26] 這種說法是更為詳細的C·坡斯特和K·A·外訥爾，今日社會組織 (底特律，MI：團結小冊子，未來1996年)。

[27] 托洛茨基對蘇聯官僚的成熟分析之最完整的說法見 被背叛的革命：什麼是蘇聯和它走向哪裡？(紐約：探路者出版社，1977年，最初發表於1937年)。關於蘇聯官僚的托洛茨基理論發展的一個優秀概述，請參見佩里·安德森，“托洛茨基對斯大林主義的解釋”，阿裡 (主編) 斯大林主義的遺產，118-128頁。

[28] 曼德爾，作為替代者的托洛茨基 (倫敦：Verso叢書，1995)，41頁。

[29] 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過渡階段必要性的討論，包含在他關於德國工人黨1875年綱領的簡短“邊際筆記”中，哥達綱領批判 (紐約：國際出版社，1938)。托洛茨基有關過渡時期的更詳細討論見於 被背叛的革命，第三章。關於曼德爾對該討論的貢獻，請參閱：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II，第16章。

[30] 曼德爾，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II，608頁 (原文重點)

[31] 關於1923年之前共產國際領導的團結一致，關於“在一個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不可能性，見托洛茨基，“共產國際綱領草案---基礎評判”列寧之後的第三國際 (紐約：探路者出版社，1970年；首次出版於1936年)，3-73。

[32] 曼德爾，作為替代者的托洛茨基，47頁。

十月評論 2012年第2/3期

[33] 曼德爾對蘇聯官僚的物質根源和發展的分析，權力和金錢，第2章，和作為替代者的托洛茨基，第3章，緊緊追隨托洛茨基的分析，被背叛的革命，第二，四，五章，因為有各種社會民主黨人和前斯大林主義者，聲稱斯大林只是在1920年代後期和1930年代實行了托洛茨基的經濟建議，儘管採取了“野蠻的形式”，對此，曼德爾提供了一個各種非常有力的回應。在作為替代者的托洛茨基的第4章中，曼德爾證明，托洛茨基直到他於1940年去世時，一直主張民主管理的經濟，這種經濟把主導的國有企業，計劃部門同市場機制結合起來。

[34] 撒母耳·法伯 [在斯大林主義之前：蘇聯民主的興衰 (倫敦：Verso叢書，1990年)]，儘管有許多重要的見解，當他強調布爾什維克的主流主觀上低估民主制度和權利時，往往低估這些物質因素的分量。對法伯工作的長處和弱點有很好的討論，請參閱 大衛·曼德爾，“蘇維埃民主的興衰”，中流砥柱 37 (1992年3-4月)，48-49頁。

[35] 曼德爾，作為替代者的托洛茨基，82。

[36] 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104-105頁。托洛茨基有關這些問題的最長討論是 斯大林主義對陣布林什維主義 (紐約：探路者出版社，1974年，最初出版於1939年)。曼德爾最終在幾部作品論及這些：“什麼是官僚？”83-85頁；權力和金錢，117-118頁；作為替代者的托洛茨基，第81-82，84-86頁。

[37] 權力和金錢，118-125頁；作為替代者的托洛茨基，83-84頁。

[38] 馬塞爾·利伯曼，在列寧名下的列寧主義 (倫敦：梅林出版社，1975年)。保羅·勒布朗，列寧和革命黨 (大西洋高地，新澤西州，人文學科出版社，1993年)。

[39] 作為替代者的托洛茨基，P. 83。

[40] 曼德爾，權力和金錢，104-109。

[41] 見 從斯大林主義到歐洲共產主義，革命馬克思主義的今天，見各處曼德爾關於“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對世界工人運動的災難性後果的討論。

[42] 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275-276。

[43] 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 II，第15章，超越改革：戈巴契夫的蘇聯的未來 (倫敦：Verso，1989年和1991年)；權力和金錢，第1章。

[44] 權力和金錢，42。我們可以看到類似的模式，資源浪費和低品質的消費者的資本主義國家所提供的服務 (醫療衛生，郵政，電信，運輸等) 同樣，沒有導致官僚的浪費和低效率的“鞭子”競爭或控制這些服務的生產者-消費者。這是非常重要的

工作中產階級的支持，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服務“私有化”的物質基礎。

[45] 權力和金錢，213頁。

[46]“保衛社會主義的計劃，”新左派評論 159（1986年9至10月），5-38頁。

[47] 權力和金錢，202頁。

[48] 權力和金錢，197-214頁。

[49]“保衛社會主義的計劃，”9，31-34頁。

[50] 權力和金錢，206頁。這些論點首先見於曼德爾同亞曆克·諾夫的辯論：曼德爾，“保衛社會主義的計劃，”諾夫，“市場與社會主義”新左派評論 161（1987年1月-2月）98-104頁；曼德爾，“市場社會主義的神話”新左派評論 169（1988年5月）108-121頁。

凱薩琳·塞梅熱，在〈計劃，市場與民主〉，7-8期的學習研究筆記（阿姆斯特丹：國際研究與教育研究所，1988年）和她在該卷的撰稿中指出，諾夫無法區分過渡性的後資本主義社會的不同類型市場機制的影響。諾夫往往忽略了東方官僚體系的“市場改革”的災難性歷史，它加深了社會的不平等而備有提高勞動生產率。接著黛安·埃爾森的建議〔“市場社會主義或市場的社會化？”《新左派評論》172（1988年11月-12月），3-44〕，塞梅熱認為，在社會主義過渡期，某些類型的市場監管同計劃及工人民主管理是相容的。

[51] 權利與金錢，209-210頁，240-246頁。

[52] 托尼·克裡夫，國家資本主義在俄羅斯（倫敦：Pluto出版社，1975年，最初發表於1955年），P·賓斯，T·克利夫和C·哈曼，俄羅斯：從工人國家到國家資本主義（倫敦：書簽，1987年）。

[53] 這些主題所包含在曼德爾與克裡斯·哈曼和英國“國際社會主義”潮流的其他成員的辯論中，國家資本主義的不一致性（倫敦：IMG出版社，1969年）。

[54] 馬克斯·沙特曼，官僚革命：斯大林主義國家的崛起（紐約：唐納德出版社，1962年），傑克·特勞特曼編輯。官僚集體主義：斯大林主義的社會制度（底特律，MI：太陽出版社，1974年）。

[55] 亞采·庫隆和卡羅爾·莫德澤勒夫斯基，“致波蘭統一工人黨華沙支部和青年社會主義者聯盟成員的公開信”在G·L·韋斯曼（編輯）的波蘭革命馬克思主義學生的聲音（1964 - 1968年）（紐約：優異出版社，1968年），15-90頁。

[56] 權力和金錢，28—30（著重號為原文）。

[57] 權力和金錢，32。

[58] 羅伯特·布倫納，“資本主義的起源：對新斯密式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新左派評論 104（1977年8月），25-92頁。

[59] 見凱薩琳·塞梅熱，計劃，市場與民主；R·史密斯，“中國資本主義之路，”新左派評論 199（1993年5—6月），55-99頁。

[60] 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II，572-574頁，584-599頁；超越改革，第1和第3章。

[61] A·謝赫，當前的經濟危機：成因及啟示（底特律，MI：‘中流砥柱’小冊子，1989年），“美國的利潤下跌率與經濟危機”，R·切瑞等編輯，岌岌可危的經濟，第一卷：左翼宏觀經濟學的視角（紐約：激進政治經濟學聯盟，1987），115-126頁；瑪麗·C·馬婁伊，“在當前危機中的金融與產業資本：論布倫納的‘美國衰落政治學’”中流砥柱，57（1995年8月），27-32頁。

[62] 同馬克思一樣，我們交換地使用“無產階級專政”和“工人國家”。參見哈爾·德雷珀，卡爾·馬克思的革命理論，第三卷：“無產階級專政”（紐約：每月評論出版社，1986年）。

[63] 馬克思，法蘭西內戰，見於第一國際及其以後（紐約：蘭登書屋，1974年）；V·I·列寧，“國家與革命”，列寧文選，II；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寧文選，III。

[64] 這個位置上最好的陳述仍然是托洛茨基的‘保衛馬克思主義’（紐約：探路者出版社，1970年，最初出版於1940年）。見曼德爾，革命馬克思主義的今天，141-150頁。

[65] 安德森，“托洛茨基對斯大林主義的解釋，”123-124頁。

[66] 權力和金錢，74-75頁（著重號為原文）。

[67] 革命馬克思主義的今天，142頁。

[68] 有關新中產階級的資料摘要，請參閱C·坡斯特，“新中產階級？”中流砥柱（舊系列），2,4（1984年冬季），35-41頁。

[69] 革命馬克思主義的今天，143。

[70] 曼德爾討論了蘇聯階級地位緩慢向上流動的文獻，見超越改革，第3和第4章。

共產國際與格柏烏

-----5月24日的行刺企圖和墨西哥共產黨

托洛茨基著(1940年8月17日)



政治前提

這篇文獻的目的，是司法方面的而非政治方面的。可是墨西哥這個所謂“共產主義”黨的成員的犯罪行為，卻是出於政治動機。5月24日的行刺企圖，是一項具有政治性質的企圖。要是不把行刺企圖的政治底蘊袒露無遺，而只是作總括性的描述，那便無法理解引發這宗罪行的機制，更無法理解激勵行刺參與者的動機了。

這次行刺企圖是由斯大林最主要的統治工具格柏烏一手組織起來的，時至今天，公共輿論對於這點已經毫無疑問。克里姆林宮寡頭集團的屬性是極權主義的；也就是說，它把國家的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思想生活的全部功能置於其下，把任何最細微的批評意見和獨立意見的表達一一粉碎。克里姆林宮政治學的極權主義性質並不是源出自斯大林個人的性格，而是源出自新的統治階層凌駕人民之上的位置。十月革命追求兩項緊密相關的任務：第一項是生產資料社會化，以及通過計劃經濟來提高國家的經濟水準；第二項是在上述基礎上建立一個沒有階級分野的社會，並從而建立一個沒有職業官僚的社會——一個由社會全體成員整體來料理的社會主義社會。第一項任務的基本輪廓已經實現；計劃經濟的優越性縱使在官僚

主義的影響下仍然以其無可爭議的力量披現出來。在社會政體方面卻是另一回事。社會政體不是邁向社會主義，更反是愈離愈遠。出於歷史性的原因——本文不宜處理這個課題——一個新的特權階層在十月革命的基礎上發展起來了，新的特權階層把全部權力集中在其手中，恣意吞食愈來愈大宗的國民收入。這個階層發現自己處在深刻矛盾的位置之內：它在口頭上以共產主義之名冒起，但在行為上，它爭取的卻是本身的無限權力和排山倒海的物質特權。新貴族受到被欺騙的群眾的不信任，被憎恨所包圍，它無法承受其制度內最微不足道的裂口。新貴族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無法不把哪怕是一閃而滅的批評和反對也給絞殺掉。所以就有了令人窒息的暴政橫行，就有了普遍匍匐在“領袖”腳下的卑躬屈節和同樣普遍的虛情假意。從這同一個源頭便派生了作為極權統治工具的格柏烏的龐大無比的角色。

斯大林的專制主義不是由“神的賜給”，或“神聖不可侵犯”的私有財產來支撐；支撐它的是共產主義的平等思想。這麼一來，便剝奪了寡頭集團之運用任何說理和有可信性的論句來給它的獨裁統治作辯解的可能性。同樣地，寡頭集團也不能拿政權的“過渡性”來自圓其說，因為問題不是在於為什麼仍未能夠徹底的實現平等，而是為什麼不平等在持續地增加。統治階層無法不系統地撒謊，把自己美化，披上假面具，並且每每把批評者和反對者行動動機的原因說得截然相反，顛倒過來。任何挺身而出，為保衛貧苦大眾而反對寡頭集團的人，便會被克里姆林宮立刻扣上帽子，說成是資本主義復辟的支持者。這種一律化的謊言並不出於偶然：它從這個階層的客觀位置派生出來；這個階層既誓言要搞革命又是反動的化身。在此之前的所有革命裏，新生的特權階級用虛假的革命辭藻保護自己，以圖對抗左派的批評。在法國大革命時，特爾米多分子和波拿巴主義者向所有真正的革命者——雅各賓派

——窮追猛打，把他們譴責為“保皇派”和英國皮特反動政府的間諜。斯大林並無發明任何新鮮事物，他不過是把握造政治冤案的制度推至極致而已。在蘇維埃社會篡奪權力的官僚層從它的位置中頑強地源源不絕的發放各種謊言，誹謗，迫害，誣告和各種司法喜劇。人們除非明白這一點，否則便不可能理解在蘇聯內部的政治，亦無從理解格柏烏在國際舞臺上的作用。

列寧在遺囑裏（1923年1月）提議撤去斯大林作為黨總書記的職務，列寧給出的理由是斯大林其人粗暴，不守誠信，並且有濫用權力的傾向。在此之前的兩年前，列寧已經提出警告說：“這個廚子將只會調製辛辣尖刻的菜色。”黨內沒有一個人喜歡斯大林或尊敬斯大林。不過，當官僚層開始尖銳地感到來自人民的威脅的危險性，它所要求的正好就是一個粗魯和不守誠信的領袖，這個領袖隨時準備為了官僚層的利益而濫用權力。因此，一個調製辛辣尖刻菜色的廚子，便如此這般的成為了極權主義官僚層的領袖。

莫斯科的寡頭集團之對我切齒痛恨，是由它根深蒂固地深信我“背叛”了它而引起的。這樣的一種指責自有其歷史性的含義。蘇維埃的官僚層不是一下子便把斯大林擢升到領導層，並且也不是沒有過躊躇不決的。直到1924年前，即使在較闊大的黨圈子裏，斯大林仍然是不為人所知悉的，這更遑論是在人民之間了；而且正如前面說的，斯大林就是在官僚的行列裏也是不負人望，不受歡迎的。新生的統治層曾經希望我擔起保衛其特權責任。在這個方向上曾經做過不少功夫。只當官僚層終於確信了我是無意保衛它的利益以反對貧苦大眾，而且更是相反之保衛貧苦大眾的利益而反對新生的貴族，官僚層才徹底轉向了斯大林，並且宣佈我是“叛徒”。特權階級口中的這個稱號遂構成我忠於工人階級事業的證據。在過去12年裏，所有那些建立起布爾什維克黨，發動十月革命，創立了蘇維埃國家和創立了紅軍，領導了內戰的革命者們，他們中的9成人全都被作為“叛徒”而給一一消滅掉，這不是出於偶然的。另一方面，在這同一段時期裏，斯大林主義的機器把在革命年代裏對抗街壘的壓倒性的大多數人納進其內。

十月評論 2012年第2/3期

在那個時期，共產國際蒙受到同樣的墮落過程。在蘇維埃政權初期，當革命從一個險境大踏步到另一個險境，當全部的精力都被內戰及附隨而來的饑荒和時疫所吸去，各國最大無畏最無私的革命者紛紛加入到十月革命和共產國際。這批在艱難歲月中用行動來證明其對十月革命忠心耿耿的整個第一代革命者們，如今蕩然無存。克里姆林宮這一幫極權主義的夥徒，他們通過沒完沒了的開除手法，經濟壓力，直接賄賂，清算和死刑而把共產國際徹底的變成了順從的工具。現行的共產國際及其各支部的領導層，都是由那些沒有參加十月革命的人所組成；那些人參加的是那個洋洋自得的，作為高官厚祿源頭的寡頭集團。

現在那些“共產主義”官僚的類型，壓倒性都是政治野心家，從而就是與革命者背道而馳的另一極。那些政治野心家的理想，就是在他們本國之內得到與克里姆林宮寡頭集團在蘇聯之內所得到的同樣地位。這些人不是無產階級的革命領袖，卻是極權統治的追求者。他們夢想在那個蘇維埃官僚層及其下的格柏烏的扶助下獲得成功。他們懷著欽佩和羨慕的看待紅軍侵略波蘭、芬蘭、波羅的海諸國和比薩拉比亞，因為這些侵略，立即造成權力的轉移，使權力移交給地方上那些追求極權統治的斯大林主義者。

這些共產國際支部的領袖們缺乏獨立的身份，獨立的見解，獨立的影響力，他們充分認識到，他們本身的地位和名譽與克里姆林宮的地位和名譽聯成一道，同起同落。在物質的意義上來說，他們依靠格柏烏的供食；這點稍後在本文加以陳示。因此，他們為掙扎求存，狂熱地守護克里姆林宮以反對任何反對派。對於來自所謂的托洛茨基派的批評，他們無法不意會到那些批評的正確性，從而亦無法不意會到那些批評的威脅性。而這只會令他們加倍地憎恨我和我的同道人。這些共產黨的領袖們就如他們在克里姆林宮的主子，他們對第四國際的真實見解無法作出批評回應。因此便唯有訴諸捏造和冤案，這些捏造和冤源源不絕的從莫斯科輸送出來。因此，墨西哥斯大林主義者的行為之與“民族性”完全無尤；他們只不過把斯大林的政策和格柏烏的指令轉譯成西班牙語。

作為行刺組織者的格柏烏

斯大林幫之首先把我流放，然後企圖在外地把我殺害，這在沒有創見的人看來，或許是無法理解的。要是像對待其他許多人一般，在莫斯科便把我殺害，那不是更簡單嗎？

這就是解釋：在1928年把我驅逐出黨及流放到中亞細亞的那個時候，莫說是槍殺，而是連談到逮捕也是不可能的。我與之一起共同經歷了10月革命和內戰的那一輩人仍然還健在。政治局感到四面楚歌。我從中亞細亞能夠與反對派維持直接的聯繫。在這種情況下，斯大林在經過一年來的舉棋不定之後決定，把我流放到外國去是最少遺害的辦法。按他的推想：從莫斯科隔離出來的托洛茨基，被剝奪了機關和物質資源之後，將完全無權無勢，辦不了任何事情。斯大林還算盡心機，估計他把我在全國的眼裏成功地抹黑之後，他可以毫無困難的從友國土耳其手中把我討回來，以便在莫斯科給我來個總算帳。可是事態表明，不擁有任何機關和物質資源，也完全有可能參與政治的生活。我在年輕友人們的幫助下，給第四國際奠定基礎，它正在穩步向前，步履雖慢但卻堅忍不拔。1936-1937年的莫斯科大審判，是爲了把我從挪威遞解回國而開出來的一台戲；那就是說，是爲了把我交到格柏烏的秘密員警之手而設的。但這事沒有成功。我抵達了墨西哥。我得到消息說，斯大林有好幾次承認，把我流放外國是一項“重大的錯誤”。除了訴諸恐怖行動，無法糾正這宗錯誤。

格柏烏近年來消滅了我數以百計的友人，其中包括我在蘇聯的家人。在西班牙，他們殺害了我的前秘書愛爾文·吳爾夫及我的一些政治同道；在巴黎，他們殺害了我的兒子里昂·西道夫——斯大林的職員殺手把他追蹤了兩年。在[瑞士]洛桑，格柏烏殺害了伊尼亞斯·賴斯——賴斯脫離了格柏烏而加入了第四國際。在巴黎，斯大林的間諜殺了我又一個前秘書魯道夫·克萊門特——他的屍體在塞納河被發現，其中頭，手，腳全被斫掉。這張受害者名單還可以無窮無盡的算數下去。

在墨西哥，有過一次暗殺我的明顯企圖：有個人拿著一張偽造的政治要人的介紹信來到我家，這宗事件令我們的友人警覺到，有必要十月評論 2012年第2/3期

採取更爲嚴密的保安措施：設立日夜輪班的守衛，設置警報系統等等。

格柏烏積極參與西班牙事件，並且進行實實在在的謀殺；自此以後，我收到主要是來自紐約和巴黎的友人的許多信件，都是關於從法國和美國派到墨西哥的格柏烏的特務，我適時地把部分這些先生們的名字和照片轉交給墨西哥的員警去了。在[第二次]大戰爆發後，由於我對克里姆林宮的國內政策和外交政策所作的絕不妥協的鬥爭，局面是更加惡化了。我在世界報章上發表的宣言和文章——關於分裂波蘭，入侵芬蘭，被斯大林斫去盲腸的紅軍之脆弱等等問題——在世界上所有國家數以千百萬計的給重印。蘇聯的內部不滿與時俱增。在上一次大戰開始時的第三屆國際比起今天的第四國際，是無可比較地薄弱得多。

在1939年8月25日法國和德國之間的外交關係行將破裂之前，法國大使古龍德向外交部長G·邦內特彙報他在下午5:30向希特勒進行的一次戲劇性的訪談：

“要是我真的認爲”——觀察所見——“我們將會勝出，我也同樣的恐怕，到了戰爭結束之時只會有一個真正的勝利者：托洛茨基先生。”總理打斷了我的話，吼叫道：“那麼你爲什麼讓波蘭自由放任？”（《1938-39年外交檔》，頁260，檔編號242）

就在戰爭之前夕的關鍵時刻，兩個帝國主義勢力的兩名權勢代表人物，一名是民主國家的，一名是法西斯主義的，互相以一個革命者的名字威嚇對方；而這名革命者，格柏烏多年來徒勞地試圖把他塗黑爲“帝國主義的間諜”。我尚可以引述其他同類的事例哩。但實在毋須多費筆墨。希特勒和古龍德無論如何皆是比大衛·西凱羅斯和倫巴度·托尼丹諾更要認真許多的專才政治家了吧。

斯大林作爲從前的革命家，他明白到，戰爭的進程或許會於第四國際的發展提供有力的推動，而且會在蘇聯的內部發展。因此，斯大林給他的特務發出指令，盡可能快些把托洛茨基幹掉。

因此，從眾所周知的事實和總體的政治考慮可見，俱無可置疑的展示出，組織5月24日的

暗殺企圖只能來自於格柏烏。況且還有補充性的證據哩。

1. 在暗殺行動發生前數個星期，墨西哥報章上滿載有關於格柏烏特務群集到墨西哥的謠言。在這些報導裏，有許多內容都是子虛烏有，可是謠言的本旨正確的。
 2. 襲擊技術之高超值得十二分的注意。暗殺之所以失敗，就和每場戰爭皆有意外事故一樣：戰爭和意外事故是不可或分的。襲擊在規模，計劃和效率方面所作的準備和執行，實在教人嘖嘖稱奇。恐怖主義者對房子的規劃和房子內部的活動情形瞭如指掌；他們配有員警制服，武器，電鋸，繩梯等。他們徹底成功地把駐守在房子外的員警捆縛，正確的使用開火的策略而把屋內的守衛癱瘓下來，他們深入行刺目標的房間，無傷無故的開火三至五分鐘，投擲燃燒彈，然後不留痕跡地離開襲擊現場。像這般俐落的行動，私人集團是辦不來的；遵循這樣的行動需有其傳統，培訓，巨大的資源和一大群各式各樣可以精心挑選的劊子手。這就是格柏烏的工作。
 3. 襲擊計劃本身的其中一環，是急不及待的把調查轉移到錯誤的軌道去：這是嚴格遵照格柏烏的整套的方法。襲擊者一邊把員警捆縛，一邊高呼：“阿爾馬桑萬歲！”這種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向著5個員警——其中有3個在睡覺——惺惺作態的呼喚，旨在一石二鳥：一是爲了轉移視線，以讓在未來的數天或哪怕只是數小時裏，不向格柏烏及其在墨西哥的特務作調查；二是爲了挫害總統競選人之一的追隨者。格柏烏——更準確地說，它的勵志者斯大林的典型手法，就是在殺害一個反對者之餘，把可疑點嫁禍到另一個反對者的身上。
 4. 襲擊者隨身帶來了幾個燃燒彈，其中兩個投擲到我們的孫子的房間。從而，有份參與其事的襲擊者所考慮到的，不僅是謀殺，而且還有縱火一項。他們縱火的唯一目的，就是把我的檔案庫毀滅。我的檔案庫，在反對莫斯科寡頭集團的鬥爭中，對我具有無可比擬的價值，因此，我的檔案庫的毀滅，惟有對斯大林才有利。
- 十月評論 2012年第2/3期

在我的檔案庫的說明之下，我對莫斯科審判捏造的冤案假案之揭露尤其玲瓏突現。單在1936年11月7日，格柏烏蒙受重大風險之下，竊取了我位於巴黎的檔案庫的一部分。格柏烏在5月24日這次對檔案庫也念念不忘。因此，那些燃燒彈，猶如是斯大林的到訪名片一般。

5. 格柏烏罪行頗富特色的一點，就是在秘密殺手和所謂“合法友人”之間的分工，格柏烏在一邊進行地下密謀，爲襲擊作出準備，一邊就發動誹謗攻勢，旨在使襲擊對象名譽掃地。這種分工在行事之後照辦如舊：恐怖主義者躲藏起來，而他們在光天之下業務的代理人就試圖把員警的注意力引導向錯誤的路線。

6. 最後，不可能不注意全世界報章的反響：各類傾向的新聞報章，皆公開地或心照不宣地把這次襲擊當作是格柏烏一手包辦的事情來處理；惟有由克里姆林宮所津貼，俯首聽命於克里姆林宮的報章，才會爲相反的版本說項。這就是無可辯駁的政治證據啊！

7. 然而，說明這次行刺企圖是由格柏烏所組織的最重要和最有說服力的證據，就是行刺的所有同犯都是共產黨的成員或者其最親密的“友人們”；還有，這批人中最重要的人員，俱是在格柏烏直接發施號令的那種西班牙軍隊部隊內（“第五軍團”和“國際縱隊”）擔任指揮職務。

爲何我已確知會有行刺的企圖

爲什麼打從年初開始，我已經那麼肯定預料會有行刺的企圖？7月2日當我在法庭上回答辯護律師帕馮·弗洛雷斯先生提出的這個問題，我特別指出墨西哥共產黨在今年3月舉行的大會，那次大會宣佈它的方向將邁向把“托洛茨基主義”殲滅。爲了把我的回答作進一步的澄清，我必須附加提供更多的說明事實。

爲了讓行刺的圖謀在今年1月能夠開始作出實際的準備，同時也爲了讓初步討論和詳細地切磋行刺方案有所需要的間隙時候，容或可以確定的說，行刺的“命令”最遲得在1939年11月或12月間下達到墨西哥去。

回溯《墨西哥之聲》報，可以看到，墨西哥黨領導層的危機，正是打自那個時期出現的。引發危機的衝力既來自於黨外，而危機本身亦是由自上而下的發展開來。1月28日刊載在《墨西哥之聲》的那篇被稱之為“討論材料”的特殊文件是誰人執筆，這點無人知悉；這篇檔對舊有的領導層（拉波爾特，坎帕等人）提出匿名指控，指稱領導層對待托洛茨基主義犯有“調和”之罪。廣大的公眾輿論當時對於事情的背後到底是什麼還是徹底地一無所知。可是對於有心的人及有興趣的觀察者而言，那是毫無疑問的正在磨刀霍霍地作出認真的準備，以對付托洛茨基主義或托洛茨基本人。

墨西哥共產黨的顛覆是和莫斯科的行刺命令緊密相關的，這在今天已經是不言而喻。最可能發生的事，大概是格柏烏碰到墨西哥共產黨某些領導人的反對，因為那些領導人已經慣于太平無事，並且甚至恐怕行刺會引起甚為不快的政治後果和員警插手的後果。或許這正是那些領導人被指控為“托洛茨基主義者”了。

一個匿名的“清算委員會”把墨西哥共產黨的領導人拉波爾特及由前次大會選出來的中央委員會一併撤職。誰能給清洗委員會注以這麼巨大的權力？而委員會本身又是從何處生出來的？這不會是自動自發產生出來的。這是由外而來，得到委以全權的人所委任的委員會。那些人顯然有各種理由必要隱姓埋名。

唯當在2月18日之時，當變動已經完成，剩來下的唯一的事情只在於把變動作出認可，才向公眾公佈新設的委員會的組成名單。這個委員會全部由墨西哥人組成，可是對於他們是由誰來委任這點，卻仍然沒有任何交待。待到3月21日召開墨西哥共產黨大會的時候，所有的問題已經有了決定，而留給大會代表的唯一事情，就是讓他們向那個新領導層效忠。這個新領導層產生，代表們既不在場，而且大多數的代表也不知道產生這個新領導層的背後目的是什麼。

由《墨西哥之聲》（1940年3月18日）對黨大會所作的報導所示，就有關“向托洛茨基主義和其他人民之敵作鬥爭”的問題，並非一如大會其他議程般公開地作討論，而卻是在一個特別委員會的秘密會議中進行。這項事實本身就是證據，證明新的領導人認為有必要在他們

十月評論 2012年第2/3期

本身的黨的大會前掩藏他們的計劃。我不知道這個特別委員會是由誰來組成。但是誰人在幕後作出指導，則可以猜測出來。

大會選舉了——毋寧說是被動地通過了一個“榮譽主席團”；這個“榮譽主席團”的成員是季米特洛夫，馬努伊爾斯基，庫西寧，撒爾曼，卡洛斯·孔特拉斯等人。這張名譽主席團名單刊載在奧尼西奧·恩西納寫的小冊子“帝國主義者滾蛋！”內（1940年，大眾版，第5頁）。其中季米特洛夫，馬努伊爾斯基和庫西寧是人在莫斯科，撒爾曼是人在柏林的監獄，而卡洛斯·孔特拉斯是人在墨西哥。把孔特拉斯納進名單去，並非出於偶然。孔特拉斯不論在那個方面都不入於那些所謂的國際“頭目”的那一號人；把他納入名譽主席團去具有儀式性的特色。孔特雷拉斯首先是在西班牙內戰中獲得的惡貫滿盈的聲譽，他在西班牙內戰其時，是第五軍團的委員長和指揮，是格柏烏最兇殘的特工的一員。裏斯特，孔特拉斯和“鄉民”在共和派陣營內發起他們的內戰，把反對斯大林的無政府派，社會主義者，P.O.U.M.派和托洛茨基主義者肉身消滅。這項事實，可以從報章的電訊和許多西班牙難民的證言中得到確證。所以，要是我們假設這位第五軍團的前委員長和大會“榮譽主席團”的成員之一，就是今年初掀起領導層變動的重要搞手之一，該不會是過分魯莽的假設。尤其是，孔特拉斯在1929年之時已經在墨西哥共產黨進行過一次“反托洛茨基主義者”的清算活動，所以更能說明上述假定的正確性。但既是這樣，哪為什麼要把他選進和行刺陰謀聯結起來的大會名譽主席團呢？

我在今年初在報章上注視墨西哥共產黨的事態那時所能看到的東西，完全沒有現在所看到的那麼清晰。不過，即使在那個時候，很明顯，在黨的影子戲的布幕之後是掩藏著實質人物的活動的這一點，對我來說已經明白不過。格柏烏人員是這一場表演的實質人物。此所以我預料會有行刺的企圖。

為行刺而作的“道德”準備

發展一個托洛茨基驅逐出墨西哥的“群眾”運動的這個原有計劃的草圖，蒙受徹底的失敗。格柏烏唯有訴諸恐怖行動。但為了達到

這個目的，便有必要作好公共輿論的準備。由於格柏烏不打算承認它是這次謀殺的贊助者，所以有必要把恐怖行動與墨西哥的內部政治鬥爭聯接起來。在更早的時候，《墨西哥之聲》，《民眾報》和《未來報》已經企圖把我與塞迪奴將軍，阿馬婁將軍，巴斯孔塞略斯，阿特爾博士，以至更不消說還有那些石油大亨和戴斯委員會掛鉤在一起。現在，他們接到命令，要加倍朝著這個方向盡力。總統大選和預計在來臨中的尖銳衝突看來給這種努力提供了最為有利的時機。行刺企圖的知識份子同犯企圖把我扯進阿馬桑將軍的陣營混為一談，而這在後來也無礙於他們把行刺的搞手歸咎到阿馬桑的追隨者去。這些人的活動是由斯大林早在希特勒將之化為公式之前所應用的格言作指引的：“謊言愈大，更可入信”。

為行刺而作的“道德”準備是和技術性的準備同步進行。在去年12月，推動反對“托洛茨基主義”的努力更趨激烈化已經明白可見。在12月24日該期的《墨西哥之聲》，有一篇名為“托洛茨基主義的作用”的文章，在該文中我們讀到：

“... 至於那個新教皇里昂三十世——聯想到卑鄙的猶大的那三十個銀幣——他執行了戴斯委員會編派於他的角色，... 里昂三十世站在帝國主義勢力那邊來干預拉丁美洲的事務，以宣佈‘沒收石油是共產主義者的工作’來完成他的工作，...”（作者：貢薩洛·貝爾特蘭）

那句“沒收石油是共產主義者的工作”附有引號，彷彿就是從我的文章摘引出來似的，用以表示反對沒收石油公司。這不消說是個謊話。我在全世界的報章上所做的，是盡我所能的保衛墨西哥人民之作為本國自然資源的主人的權利。但這宗小事是不會打岔格柏烏的捏造者的。

墨西哥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成員安特尼斯·加西亞·沙爾格度在黨3月大會上作的報告，其撒謊之能事打破了國際斯大林主義的所有紀錄。儘管這些謊話令人深惡痛絕，也且讓我舉敘述一斑吧：

“... 卡德納斯政府違反所有工人組織的意見，容許了托洛茨基進境；托洛茨基得以在我國設立一個為所有反動勢力服務的國際間諜組織的指揮中心這個事實，僅僅是由於帝國主義者們本身有意思把我國變成一個供他們進行間諜活動和煽動活動的中心而才有可能。”

不管這些人有多麼的無知，他們不會不知道，沒有任何一個帝國主義國家會容許我進入它們的國境；他們也不會不知道，所有帝國主義國家的領導人皆把我看作是頭號敵人；我的同道人在所有帝國主義國家中皆受到迫害，而墨西哥政府之所以對我客氣，正由於它並不是個帝國主義國家，而且其政府對尋求庇護權持有嚴肅的態度。可是那些正為行刺而磨刀霍霍地作準備的捏造者們是不會為這些區區瑣事而卻步。沙爾格度先生繼續說：

“所以托洛茨基派の間諜經常與佛朗哥的軍隊合作，與敵人的軍事行動相配合，在忠心派的後衛隊裏進行叛亂和煽動。”

“為蒙特裏的老闆們所歡呼喝彩的托洛茨基這個人，他是按照反動派和帝國主義的需要而調轉他的工作，他為石油公司之反對工人組織，反對政府而提供論句。”

“同志們：讓我們以此為鑒來加強我們反對托洛茨基主義的鬥爭，而且因為這夥間諜的頭目必須給逐出本國。”（見“把人民之敵逐出革命隊伍”）

這就是一個“共產主義”的黨大會上的一個領導人的報告！克里姆林宮的寡頭集團把曾經一度正確的共產國際，改造成怎麼一個藏污納垢的水槽啊！一個革命家聚集的場所，由於自然而然的物以類聚和人為的選取，而逐漸被野心家、惡棍和職業誹謗之徒所佔據了。沙爾格度也屬於這麼的一個集團。就在1940年5月1日的《墨西哥之聲》，刊載了黨的一篇正式宣言，它要求受到員警追捕的西凱羅斯博士享有完全的行動自由；這篇宣言向人民發出以下的聲明：

“把帝國主義代理人逐出墨西哥！必須把外來的間諜和煽動者逐出本國，其中首先要驅逐的是他們中最邪惡最危險的頭目托洛茨基…”。

在保衛西凱羅斯博士之同時，又要求同一個政府把托洛茨基迫害，所有這些在行刺前三個星期裏發生的事，倘若不是爲行刺而作出的準備，哪會是什麼呢？

就在1940年5月19日，即行刺前的5天，我們在《墨西哥之聲》上找到一篇文章，那篇文章苦心經營的狂熱症到癱瘓陣發的程度：

“就如倫巴度·托尼丹諾同志在某個場合對他作的評定一樣，托洛茨基這個‘老叛徒’每次都能向我們顯示到，他是愈老愈卑怯，愈老愈尖酸刻薄。”（見《叛徒托洛茨基》）

“受反動派勢力收買の間諜，戴斯委員會在墨西哥的特務... 墨西哥的叛徒，帝國主義公司和戴斯委員會的特務，托洛茨基在這些陰謀中負上責任...”

“托洛茨基必須在國家當局跟前，對他的反無產階級，反墨西哥的行徑作答，必須停止他的極端愚昧的行爲。”

“在最近，這個叛徒大概在夢想再一次重現迭戈·里維拉的房子裏由他的友人們來評判他的那些日子，他現在發出挑戰，要求設立一個法庭，對指他爲戴斯委員會的特務的那些指控作出審議。而他本人曾經在公開聲明中招認過他與戴斯委員會的關係。”

“托洛茨基是爲了從事攻擊墨西哥工人的惡毒活動而謀求開啓論壇，這是最清楚不過的。但人民不會給他這樣的論壇。”

“對於托洛茨基，在他必須被驅逐出境這個意義上，墨西哥工人已經宣佈他們的意見。”

這篇文章是由集體連署的，這全然不教人覺得出奇。連署人是：大衛·西凱羅斯，內斯托爾·桑切斯·埃爾南德斯，路易士·亞雷納爾，大衛·塞拉洛和馬里奧·帕馮弗洛雷斯。

在同一期裏，另有一篇文章聲稱，托洛茨基正在準備：

“... 支持煽動家和刺客，急於要介入墨西哥的內部事務...”

往下又說：

“有關於托洛茨基，我們記得這個惡形惡相的叛徒剛剛向《民眾報》和《未來報》發出挑戰，要求它們在72小時內對“第四國際”這個老不中用的小頭目提出指控——也就是墨西哥和全世界的整個革命運動所提出的指控。這個老叛徒是多麼的狡滑啊！他深知肚明，在72小時之內，單是就他在蘇聯，中國和西班牙所犯的所有彌天大罪和惡行，在他與所有人民之敵的糾葛之種種，也不知從何說起才是。”

我們已經看到，在行刺發生前最末一期的《墨西哥之聲》，基本上是對托洛茨基窮追猛打，徹底捏造的專號。這樣的寫法，是準備放下筆桿，執起槍桿的人的寫法。《墨西哥之聲》的編輯部是知道行刺在即的，是在爲本黨和同情圈作出輿論的準備。

若說《墨西哥之聲》那些飽富風霜，精神正常的編輯相信他們筆下的那個我，這是一刻也不可能的。他們是根據從上而來的指令而冷酷地撒的謊。而且，他們在接收莫斯科的現成誹謗之外，更附上自己發明的一筆，指我的“參加”到塞迪努的叛亂，指我與戴斯委員會“聯線”反對墨西哥和插手墨西哥大選；這樣一來，便加倍地披露了他們的惡毒。撒謊者們以不願讓我有開設“論壇”和“宣傳”的機會爲藉口，拒絕就他們的指控提供證據。而當我把他們稱作爲金錢而替斯大林工作的人，他們則威嚇說要用“毀壞名譽”之罪把我送進監獄去！

這就是斯大林主義的學校。它的特點是意識形態方面的犬儒主義，道德方面是厚顏無恥。這些人對於事實和文獻毫無尊重，從來不會清楚確鑿而有系統地闡釋他們作出的指控；他們所作的誹謗，具有着把污名化而廣之的特色。從無人膽敢對斯大林及其同僚表示相反意

見的蘇聯，充斥着奴性，阿諛奉承和犬儒主義的精神，這種精神直擴散到整個共產國際，其毒性直透工人運動的骨髓。

為格柏烏的蹤跡作遮掩

在企圖行刺發生後的數天裏，主謀者先生們躲在他們的巢穴裏按兵不動。他們恐怕他們的“軍事”同僚或會落入員警的手上。格柏烏的報刊初時所作的暗示是十分的謹慎小心。但是，每個新的一天給這些紳士先生們帶來更多的勇氣。他們通過若干管道而推廣流通那個愚蠢而又惡毒的“自我襲擊”的版本。員警被那些道德上的同謀犯誤導方向。如所周知，直到五月底，仍然無法追蹤到罪犯的線索。斯大林派的圈子是愈來愈自鳴得意。到了6月1日，《墨西哥之聲》便已經把行刺稱為“這一場怪誕的鬧劇”了：

“由可憐的托洛茨基及其一夥聰明地進行的，最近在墨西哥發生的那些事件，其所包含的挑釁性質是欲蓋彌彰...”

“托洛茨基這個特工，把身體和靈魂都交給了國際資本主義；為之服務，甘心為它的利益而當工具。這一趟，他以在他所居住的宅第中作為被襲擊的對象為國際資本主義再作一次服務，他並不感到有何不妥。”

至於“資本主義”和托洛茨基本人為什麼需要有此神奇的事件，這份報章沒有給人解釋。“謊言愈大，入信愈易”——希特勒-斯大林的格言如是說。

《墨西哥之聲》竭力的為共產黨確立不在犯罪現場的證據。這點對於人類的腦袋是可以理解的。可是這份報章卻沒有就此停下來，而是同時也替格柏烏辯護：

“... 由托洛茨基本人直接惹起的挑釁，尤其具有反蘇維埃的挑釁的特徵。”（1940年6月10日）

確鑿無疑！托洛茨基運用“自我襲擊”的手段，企圖損害格柏烏的純潔無瑕。

在同一期裏，編輯們宣佈：

“我們收到西班牙共和國退役兵會社墨西哥分部的一些宣言，這些宣言作出聲明說，攻擊反革命者托洛茨基的‘行刺企圖’，是反動派和帝國主義者反對墨西哥人民的庸俗技倆。”

擔當這個會社的墨西哥分部的主席者，不外乎是大衛·亞爾法羅·西凱羅斯！行刺的搞手對“反動的庸俗技倆”作出抗議。編輯完全是此地無銀三百兩了。他們為了證明他們之不在罪案場，不得不表現出那個他們無法掙脫關係的格柏烏是與本案無涉的。而為了證明我是“自我襲擊”，他們感到有必要引述更高的權威D. A. 西格羅斯。這一切的一切，都有著瘋人院的成份。目空一切和厚顏無恥距離瘋狂不過一線之隔。但就在這種瘋狂裏有著一種做法，這種做法與格柏烏的名字難分難解。

《墨西哥之聲》在介紹西凱羅斯不偏不倚的證言之餘，也自己寫上一筆：

“托洛茨基... 是催生第五縱隊的主要人物之一，第五縱隊是支持墨西哥反動派和帝國主義美國佬的據點，是屠殺墨西哥人民的最頑劣的劊子手所雇用的人員。”

恐懼在此說出了瘋狗病者的語言。這些人為他們將要為5月24日的行刺企圖答辯而害怕。

對於這份卑劣的，在墨西哥員警和格柏烏之間掙扎打滾的斯大林派報章，實在不需要對它的每一期作出分析。在最為關鍵的幾周裏，《墨西哥之聲》的行為無可爭辯地表現出，打一開始，其督印人之對於行刺是由斯大林的代理人所編排一事，是完全的心知肚明。他們知道D·西凱羅斯在行刺行動中的作用。他們知道，羅伯特哈特不是行刺的同犯，而卻是受害人。他們製造這個自我襲擊論，散佈攻擊哈特的流言蜚語，是為了格柏烏的利益，同時也是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

結論是不言而喻的：要是格柏烏的正式喉舌報在墨西哥出版，則這份喉舌報為行刺所做的準備，及後來為行刺的線索的所作的掩飾，其表現出來的狂熱和無恥，亦無法超過《墨西哥之聲》的所作所為。

“自我襲擊”論

自從我抵達墨西哥的第一天（1937年1月）開始，員警便採取了保護我的特殊措施，以防各種行刺企圖。墨西哥當局無疑有著非如此不可的嚴重理由才採取這樣的措施。人們會想到，員警守衛我，並不是嚴防戴斯委員會，因為在1937年時，戴斯委員會尚不存在；而員警之所以守衛我，既不是為了嚴防“阿爾馬桑的追隨者”，也不是為防“自我襲擊”。那麼，墨西哥員警在5月24日發生行刺當天之前的三年半裏，他們之所以把我守衛，到底是嚴防著誰呢？對於這個問題，只可能有一個合理的答案：是嚴防格柏烏。

然而，當行刺的確發生了，並且還呈露出使用的是斯大林的秘密員警所具有的全部特點，卻有某一類的墨西哥報章（《墨西哥之聲》及其傳聲筒《民眾報》和《未來報》），發動起一場造勢運動，旨在證明行刺事件與格柏烏毫無瓜葛。唯有格柏烏特務訓練有素的目空一切，才會煞有介事的把那麼荒唐的“自我襲擊”的想法，看成是真有其事。

我能從這般可怕，可厭而又危險的投機冒險行為中去達到什麼目的呢？時至今日，仍沒有人給以解釋。有種暗示謂我想把斯大林及他的格柏烏抹黑。但對於一個摧毀了整個老一代布爾什維克黨的人而言，他還有任何聲譽可言嗎？有人說，我想證明“第五縱隊”的存在。為什麼呢？況且，格柏烏的特務有足夠的行動備金，無須有一個神秘的“第五縱隊”存在。有人說，我希望給唯一為我提供庇護的政府製造困難。那麼，我能有什麼動機，要給唯一為我提供了庇護的政府製造困難呢？有人說，我是想激發美國和墨西哥之間的戰爭。但這個解釋完全是一個胡說。要挑起這樣的戰爭，應該組織反對美國大使或石油巨頭們的活動，而不是反對帝國主義世界排斥和憎恨的布爾什維克革命。

當斯大林組織針對我的行刺企圖時，他的目標是明確的：清除第一號敵人。斯大林自己不必冒任何風險，他只要遠距離操縱。另一方面，安排“自我襲擊”，我就要自負其責，讓我自己的命運，我家人的命運，我的政治聲譽和我投身其中的運動的信譽，擔受風險。那麼，

我會得到什麼呢？

但是，即使我們假定，放棄我畢生的事業，違反常識和違反我自己的切身利益，是可能的，為了一個未知的目標，我做了決定，安排了一個“自我襲擊”，但還是有問題：我如何獲得20個執行人？給他們配備員警制服？武裝他們？向他們提供所有必要的東西？如此等等。換句話說，一個生活同外界幾乎完全隔絕的人，怎麼能策劃必須由一個強大機構來實施的活動？我承認，批評一個不值得批評的想法，我感到很尷尬。

斯大林的代理正準備把西凱羅斯宣佈為托洛茨基的代理人

刻下，共產黨的領導人正圍繞著西凱羅斯這個人大造手腳。這些動作的目的，是要把西凱羅斯犧牲，把我毀謗，謀求自保。可不過，正是這種滿腹機關的陰謀詭計，而會造成的結果，將會做出與格柏烏戰略家所預期的相反的證明。

這些技倆是由，大衛·塞拉諾先行開始的；塞拉諾是共產黨政治局的成員，所以是共產黨的官方領導人之一。6月19日的報章就他的聲明作出以下的報導：

“他表示，在可沃亞崗的事件發生後，共產黨立即作出調查，以便探尋發生了什麼事。從那個時候開始，調查便落向了A·西凱羅斯；這個人是不受控制的分子，被認為是瘋狂的。...從那時始他們便對西凱羅斯有所懷疑。與他一起被懷疑的，還有一個名叫布朗哥的和一個名叫安東尼奧·普霍爾的，這兩人是他的學生和助理，經常露面。”

像這種對自己最親密的同路人，行刺中的同謀者所作出的譴責，在一個革命黨人裏是絕對不可能發生的。不過斯大林主義的規則是“向至高無上的格柏烏致敬”。D·塞拉諾把西凱羅斯稱為“不受控制和半瘋狂的分子”，是為把注意力引離開克里姆林宮和他本人。

6月23日，當襲擊的總體性質和主要參加者的名字已經得到披露，《墨西哥之聲》刊出共產黨以下述聲明：

“多個名字被直接和間接的影射到，其中的一人是D·A·西凱羅斯，他被指為襲擊的首領...墨西哥共產黨明確地宣佈，這場挑釁的參與者沒有一人是黨的成員；他們所有人都是不受控制的分子，都是專職煽動家...”

這則聲明在隨後的日子裏，大同小異的一再重申。打那時開始，西凱羅斯不僅被稱為“半瘋狂”，而且是“專職煽動家”。

D·塞拉洛對西凱羅斯和A·普霍爾兩人所作的聲明，是讓其餘囚犯作出同類聲明的訊號。

“塞拉諾·安多奈吉首先提供了A·西凱羅斯的消息，繼而兩名女特工願意擴充她們所作的聲明...”因此所有被告都把全部責任推卸給A·西凱羅斯。黨員之一的馬特奧·馬丁內斯最初承認，政治局成員D·塞拉洛這個人“即如行刺托洛茨基之類，是什麼也幹得出來的”。但顯然的，經過黨中央委員會成員之一，其代表律師帕文·弗洛雷斯的有益影響之下，馬丁內斯突然明白到D·塞拉洛與此事無關，而且唯有西凱羅斯這類專職煽動家才能夠做出那種行動。

斯大林派搞定這點之後，就向前推進...，到了8月2日，據報章所報導來判斷，D·塞拉洛已經作出口供說，我把一筆錢交給西凱羅斯，用作出版或...“自我襲擊”。這遭新的荒唐話的目的很清楚：D·A·西凱羅斯是逐點逐滴的給改造成...托洛茨基主義者了。就如希特勒-斯大林的格言說的：“謊言愈大，入信愈易”。

在官式調查的幕後，毫無疑問的進行著緊湊的活動。格柏烏不願意就此放棄。儘管有著羅伯特·舒爾頓·哈特的屍體，也儘管有著一部分被捕者的供詞，格柏烏意欲讓自我襲擊論死灰復燃。這對於那撮污名累累的人是多麼的便利啊！再者，格柏烏擁有用之不竭的經濟資源。

在極權主義的莫斯科，掌管這麼的一台機器會是沒有困難。但在墨西哥卻是另一回事。在這裏，格柏烏的特工及其D·塞拉洛和他的律師馮·弗洛雷斯須把他們的熱情約束起來。他們的謊言太笨拙，他們自相矛盾太過突兀。今天的他們忘記了昨天的所作所言。我們將就此用充分的證據給以陳述。這些段落之目的，是爲了防止格柏烏用陰謀詭計把公眾輿論迷惑，

哪怕只是迷惑數天也不應該。

在行刺發生之前，共產黨和西凱羅斯的實在關係是什麼？他們的關係是親密的合作者，在目的及方法上完全統一；他們的關係是友好分工的關係。毋庸置疑，西凱羅斯從不曾與克里姆林宮破裂。他一如往昔，仍舊是斯大林忠心耿耿的特工。西凱羅斯無疑對墨西哥共產黨裏某些領導人有“誤解”。一般而言，黨內氣氛的特點是競爭，勾心鬥角，相互譴責。但是西凱羅斯從未同克里姆林宮破裂。他持續是斯大林的一個忠實特工。在西班牙，他和D·塞拉洛一起共同在蘇聯格柏烏的特工的領導下工作。他是作為莫斯科所信賴的特工而返回墨西哥的。所有斯大林派和半斯大林派的團體皆向他致敬。《民眾報》和《未來報》皆有文章對他推崇備至。倫巴度·托尼丹諾，V·比利亞塞尼奧爾和門力山德羅·卡裏洛怎麼可能從不去懷疑西凱羅斯是個“半瘋狂”，“專職煽動家”，乃至是個“托洛茨基主義者”呢？

在1939年12月，當行刺的計謀已經在密謀者的小圈子裏緊鑼密鼓地進行時，共產黨組織了一次向“親切的指導者，全世界無產階級的驕傲”的斯大林的60歲生辰致敬的聚會。我們在12月21日的《墨西哥之聲》上讀到有關該次聚會的報導：

“上述速記下來的訊息，就在希大爾高劇院出席斯大林六十壽辰的參加者如雷震耳的鼓掌聲下得到通過...主席團有占姆士·福特同志，A·西凱羅斯同志，拉斐爾·卡裏洛同志，巴倫廷·坎帕同志，安特尼斯·沙爾格度同志和西班牙作家馬加烈達·尼爾金...”

那麼，這個在很久以前已經被“開除”出黨的“半瘋狂”的“專職煽動家”西凱羅斯，就這麼的和競選美國副總統的斯大林黨的候選人福特和共產國際其他星光燦燦的人物並肩坐在祝壽會的主席臺上。D·A·西凱羅斯（那時仍沒有疑心他的“托洛茨基主義”）明明白白，滿心歡喜的簽署那份致送給斯大林的興高采烈的賀電，而他在此之前的不久，才從斯大林那裏接獲組織一次行刺的命令哩。

我們在同一期的《墨西哥之聲》裏找到另一篇文章：

“另一宗同類的事例是關於D·A·西凱羅斯同志，他被聯邦地方警隊下級的雇員通過捏造的證詞非法地送上法庭...，我們的意見是，所有組織也必須在西凱羅斯同志的案件上組織起來。”

《墨西哥之聲》把“托洛茨基主義者”西凱羅斯稱為“同志”，並且熱烈地保衛這名專職煽動家，反對墨西哥的員警。

1940年1月14日，當西凱羅斯已經著手給行刺進行實際的籌備其時，《墨西哥之聲》報告了又一則共產黨的會議：

“接著是西凱羅斯登上講壇，為的是展示那些所謂‘獨立報刊’的真正性質，這些報刊把自己出售給最高的出價者，並且按付錢的主子而改變標準，....他向每個人，人民及其組織作出召喚，提醒他們注意一場反動叛亂的威脅，他肯定墨西哥共產黨是正在動員，以使用任何必須的形式來回答帝國主義者和民族叛徒的進犯。”

D·西凱羅斯作為共產黨集會上的一名主要的講者，他不僅與這個把他“排斥”的黨團結一致，而且權威地以這個黨的名稱發言：“肯定墨西哥共產黨是正在為鬥爭而動員”。唯有黨的領袖，才會使用這種語言。至於《墨西哥之聲》的編輯部，則是五體投地的團結響應西凱羅斯“同志”這番戰鬥性的演詞。

在5月1日的《墨西哥之聲》，我們找到如下這篇文章。

“... 西凱羅斯的審訊即將結束。由於商業性報紙的腐敗的影響力，他有著被判有罪的威脅。所以，工人的團結支持有必要表現出來，立即支持‘讓西凱羅斯完全自由委員會’。”（見《爭取西凱羅斯自由》一文）

距離行刺當天只有三個星期；格柏烏迫切地需要西凱羅斯，而西凱羅斯處在員警的監視下。《墨西哥之聲》的編輯們為他作辯，卻無法預見到，就在個把月之後，他們要把自己的親密同黨宣佈為“專職煽動家”。

如此這般的犬儒主義的矛盾性，同樣可以十月評論 2012年第2/3期

在共產黨與羅森多·科美斯·洛倫索的關係上找到，只是規模較小了罷。據6月19日的報章所載：“有關於羅森多·洛倫索，他（D·塞拉洛）說他知道由於[洛倫索]犯有某些欺詐的把戲而在之前已被開除出黨。”《墨西哥之聲》也複述這個版本，把洛倫索定性為一個把黨收集得來的款項吞併的普通竊賊。

後來，在6月23日，出於確信洛倫索有份參與行刺一事不會得到證實，而且考慮到稍後有需要用到洛倫索，《墨西哥之聲》的寫法便有了不同：

“對報人羅森多·科美斯·洛倫索表現出同等的憤慨；由於洛倫索贊同革命力量的立場，使得那些聲名狼藉的記者們對他痛恨交加。”昨天被宣佈為竊賊的一個人，在次日卻被描繪成一個為了革命事業而犧牲的烈士！

我們在此之前已經聽過，D·塞拉洛是如何輕蔑地指普霍爾是半瘋狂的西凱羅斯的“學生和私人助手”的了。D·塞拉洛之和普霍爾明明白白的是毫無共同之處囉。可不過，在1939年1月4日，《民眾報》刊登了一份發自巴賽隆納的電報，該篇電報的日期是同月2日，是致發給“墨西哥工人聯會”的，電文如下：

“最近被遣返回國的墨西哥退役軍人，我們祝你們打擊反動派和法西斯主義的聯合革命鬥爭裏有一個豐收累累的新年。致委員會：總書記普霍爾；鼓動及宣傳處書記塔拉韋拉；組織書記胡斯托。”

胡斯托就是大衛·塞拉洛。這則電報只是無可辯駁的證言，證實D·塞拉洛和普霍爾以至西凱羅斯其人密切無間的合作性。

格柏烏難道不會在明天以死來脅西凱羅斯，要他招認他一向是個秘密的“托洛茨基主義者”嗎？西凱羅斯難道不會宣稱羅伯特·舒爾敦·哈特是在“自我襲擊”期間受害的嗎？難道D·塞拉洛本人不會招認他只不過是戴斯組織政治謀殺的眾多人員之一？《民眾報》難道不會就這個題目已經寫就了一篇社論嗎？我們可以在事前預見到愛國人士同仇敵愾的風格

了！就讓他們試試看！莫斯科在很久以前便給諸如此類的行為創造了經典的模型。我們平心靜氣地守候新的陰謀詭計。我們毋須作出什麼發明。我們將會做的，只是協助闡明這些事實的邏輯。偽造者一腦子碰上這些邏輯是將要頭殼破裂的！

斯大林派為什麼抵賴自己親手做的事？

當那個荒唐的“自我襲擊論”招來貽笑大方，克里姆林宮的特工的罪行大白於人前時，西凱羅斯的友人們，主雇者們乃至他的保護人皆依據“原則”性，企圖洗脫與行刺的關係。

6月1日的《墨西哥之聲》寫道：

“列寧和斯大林的國際：共產國際及其下的全世界政黨，從來不曾主張而且也不從事個人恐怖式的鬥爭，但只是主張和從事於群眾性的有組織的暴力...”

6月16日的《墨西哥之聲》再次重申：

“共產黨成千上萬次宣佈過，它的綱領不接納亦不主張個人恐怖主義；它所接納和主張的是人民大眾為保衛自身的利益而作的公開行動。”

6月30日同報又說：

“那麼，共產黨又怎麼可能會否認其自身的原則，違反自身的利益而行動，參加到與我們的鬥爭戰術和方法完全陌生的恐怖主義行動呢？”

被指控的D·塞拉洛，馬特奧·馬丁內斯和他們的律師皆複述了同樣的說話。他們全部都孤高傲岸的大談那禁止個人恐怖的精神性的“原則”，卻無一人就事實講上一句話。無人談到格柏烏。他們難道真的未聽聞過這個機關的存在嗎？他們難道真的對格柏烏在蘇聯本土乃至世界所有文明之國家有系統地忙於暗殺的事無知無聞嗎？

這事全然無關乎共產黨那些所謂“原則”之孰好孰壞。問題之所在，乃是共產黨的所作所為及共產黨的中央委員會與格柏烏的真正關係。

格柏烏不僅是蘇聯的秘密員警而已，它而十月評論 2012年第2/3期

且是更要重要的東西。它是斯大林幫對蘇聯和共產國際施行極權統治的工具。格柏烏最重要和最行之不懈的任務之一，就是把反對斯大林個人獨裁統治之最堅決，最危險的反對者的肉身消滅。在蘇聯內部，這種消滅是用上合法的形式來半遮掩的。在蘇聯以外，就通過用計謀，行刺和謀殺來進行。

格柏烏和共產國際之作爲兩個組織，它們兩者並不一樣，但卻是難分難解。它們兩者互相隸屬，然而發號施令的並不是共產國際而是相反，是格柏烏徹底的把共產國際來支配。這種支配性，表現在共產國際的所有支部的中央委員會，隨著莫斯科的頤指氣使而會突然作出更換，也表現在從黨背後伸出的神秘之手所進行的種種清算。位於中央委員會的那些格柏烏人員，監視著黨的行為，以防黨在任何方面違反格柏烏的利益。而由於黨內無從談得上有任何的自由討論和民主決策，所以格柏烏人員能夠經由中央委員會透過施行道德懲罰而有時甚至是肉身消滅的方式來強使黨員執行格柏烏的決定。倘若不明了這些機制，便無從理解《墨西哥之聲》，被告們及其支持者的種種行為背後的真實動機了。

在1937年6月，埃爾南·拉波爾特先生遵照莫斯科的命令而把中央委員會的政策及他自己本人置於“自我批評”之下。以下是他的悔過書的一些內容：

“我們要求撤銷允許托洛茨基留駐在墨西哥的協定，我們並且以群眾行動作脅，但是我們無法把群眾行動策動起來，因為我們沒有必要的力量...”（見埃爾南·拉波爾特，‘不惜一切代價而團結’，1937年）。

這段摘錄非常嚴重。莫斯科自然是寧可我在群眾的壓力下被驅逐出墨西哥。可是黨並無群眾，黨於是便落入了荒唐的局面。莫斯科曾經一度希望倫巴度·托尼丹諾運用把托洛茨基驅逐出墨西哥的口號，能夠較為成功的把工人發動起來。但不管托尼丹諾是如何的賣盡氣力，工人是頑固地拒絕回應這一次鼓動——貧困大眾並不喜歡扮演迫害者的角色。隨著戰爭的爆發，莫斯科更感到尤其迫切地需要令我的聲音沉默下來。隨著每一天的消失，莫斯科是

更不耐煩了，它對其在墨西哥的代理人是更為催迫了。歷史教導我們，當一個冒進主義的組織在缺乏把任務來解決的政治力量時，恐怖主義行動的念頭便會應運而生。必須用手槍，機關槍，或炸藥來替代群眾力量之不足。這是個人恐怖主義的傳統公式。

《墨西哥之聲》對恐怖主義的譴責，只不過是回避責任的儀式性的言詞了罷。D·西凱羅斯其人的行為是這種虛情假意的譴責的最佳明證。1939年3月5日，西凱羅斯在一次墨西哥教師的會議上，以斯大林派的雄辯家之一的身分，就發動鬥爭以打擊“叛徒”必要性作出以下的訓誨：“...並且有必要讓他們知道我們將向他們進行戰鬥，而這些戰鬥並不是通過直接的行動，而卻是通過群眾的聯合一致。”（《民眾報》，1939年3月6日，第1頁，第2欄）。

西凱羅斯在此所採用的公式，正是《墨西哥之聲》，《民眾報》和《未來報》在後來爲了與西凱羅斯脫離關係而被迫一再重申的完全相同的公式。卻都是徒費功夫！西凱羅斯已經令這一條作爲救贖的公式徹底失去信用。

革命黨派使用的恐怖手段之與格柏烏那一幫人所使用的恐怖手段之間的巨大差異，是無法不予強調指出的。俄羅斯是典型的充滿個人恐怖國家。革命政黨對其所作的每一宗的血腥行動，向來都是採取公開負責的態度。波蘭的恐怖主義者和愛爾蘭的恐怖主義者在進行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裏的行為，同是不相伯仲。但斯大林派卻是全然不同。他們在幹掉一宗處心積慮的謀殺案後，他們不但不承認自己幹的罪行，而且還將之搪塞給他們的政敵。他們是爲了一個極權幫派的利益而行事，而不是爲了人民的利益而行事。他們不得不把人民來欺騙。這個懦怯的表裏不一，使格柏烏的恐怖有著欺詐和可憎的屬性。

我的指控的性質是甚麼？

7月2日，我在法庭上再一次確定我對《墨西哥之聲》，《民眾報》和《未來報》的論斷，即它們皆是格柏烏的工具，收取格柏烏的金錢。《墨西哥之聲》遵循《民眾報》和《未來報》的做法，認爲有必要入稟法院，控告我“毀壞名譽”。精明的一步！共產國際之爲克里姆林宮的順從的工具，正與格柏烏相同。可是啊，

十月評論 2012年第2/3期

《墨西哥之聲》既然仍然是共產國際屬內的一份報刊，怎能又同時認爲把它和克里姆林宮聯繫起來就是一種“毀壞名譽”？很顯然了，《墨西哥之聲》之入稟投訴，只是爲了把《民眾報》和《未來報》的投訴化爲荒誕不經的事。

莫斯科方面對別個國家的革命運動給與物質協助的這件事，是從布爾什維克奪取了政權那一刻開始的。在1917年12月26日，人民委員會公佈了如下法令：

支持世界革命的撥款

考慮到蘇維埃權力是建基於無產階級國際團結的原則之上及建基在所有國家的貧困大眾的兄弟般的關係之上的這個事實，考慮只有在整個國際的範疇來發起反對戰爭和帝國主義的鬥爭，才能把鬥爭帶向完全的勝利的這個事實，人民委員會議認爲有必要運用所有可能的手段，也包括金錢的手段，以向所有國家內的勞工運動中的國際左翼提供協助，不論這些國家是否處在戰爭中，或是否與俄國結爲同盟或是否採取中立。人民委員會爲此決定撥授200萬盧布以供革命的國際運動之需，這筆款項交由外交事務人民委員部的外交代表處理。

人民委員會議主席
V·烏里揚諾夫（列寧）
外交事務人民委員
L·托洛茨基

即使在今天，我亦無意撤回我在這道法令上的簽名。這是關乎到在工人組織的控制之下向其他國家的革命運動給予公開的援助。受取援助的黨派享有批評蘇維埃政府的完全自由。在共產國際的大會裏，向來都有著熱烈的意識形態鬥爭，而列寧和我不止一次的處在少數。

在斯大林的政權下，向外國組織提供財政援助的問題蒙受了徹底的墮落。由黨控制和向蘇維埃交付的“工農政府”變成了建基在非人化的機關工作人員所組成的極權機器的個人獨裁專政。國際團結變爲向克里姆林宮的卑屈投誠。財政援助成了賄賂的形式。就在共產國際仍然是個革命組織的那個時期，沒有一個革命家膽敢把從克里姆林宮收取援助的說法稱之爲“誹謗”！這種“援助”來到了今天，就是連

莫斯科的代理人也感到是一種不能公開承認的，可恥墮落的依附。克里姆林宮的墨西哥代理人之向我提出“毀壞名譽”的訴訟，只不過進一步鞏固我對現時的克里姆林宮的評價。

我並不非難《墨西哥之聲》和其他刊物之從它們在外地的同路人處得到金錢。這事沒有可非議之處。我所指控的，及我對他們的指控，乃他們在蘇聯的同路人並不是工人和農民，而卻是工人和農民的壓迫者和劊子手。我指控的是他們履行格柏烏可恥的罪惡任務，他們為寄生的寡頭集團的反動目的服務，他們被迫掩藏他們與格柏烏的连接及他們在經濟上對格柏烏的依賴。我全盤地維持這項嚴重的指控！

共產國際的財政預算案 及對外國支部的經濟援助

自1926年初，當斯大林確定的把自身置於共產國際的首腦地位，格柏烏之介入共產國際的事務，向外國的勞工運動的領袖作貪污賄賂的制度便開始有系統地發展開來。與此同時，反對派（“托派”）開始對共產國際及其週邊組織的專橫和行賄進行毫不妥協的鬥爭。因此，舉例來說，反對派把英國工會界的著名領袖珀賽爾收取每月25英鎊的秘密月薪，以作為他對蘇聯——即克里姆林宮的“友誼”的回報這件事揭露出來。在這些工會裏的其他重要領袖，也同樣的享有各式各樣的物質恩賜。他們的妻室，則獲得“沒有冒犯性”的禮物黃金和白金。毋須贅言，所有這些在形式上不屬於共產國際的紳士淑女，俱把托洛茨基主義者視為“叛徒”。

由於害怕反對派所作的揭露，斯大林不得不開始刊登某些性質屬於共產國際的財務報表的東西。我在這篇聲明裏附錄了其中三年——1929年，1930年和1931年的三份財務報表。必須首先申明，這些在格柏烏的實驗室裏著手準備的財務報表徹頭徹尾是虛假不實的。整項財政預算一而再的削減，秘密的開支隻字不提。款項來源是偽裝出來的。在彙報裏所指的削減後的數字——即上述三年的675,000美元，956,000美元和1,128,000美元——幾乎全部來自斯大林的秘密資金。

儘管有著如許種種的掩人耳目和扭曲，或

該說是正由於有著這種種動作，開支欄裏的其中一個專案便尤其具有說服力了。我們在每年的預算中找到一個特別專案：補助黨出版物，該3年的數額分別是\$435,000，\$641,000 和\$756,000；也即是說，由這份大刀闊斧地刪減掉及偽造的財務報表承認了有這樣的一宗開支。在三年間，補助共產國際眾支部的出版物的費用分別躍升了50萬，75萬，和1百萬美元。所以，報表是認為，對於這項廣為人知的事實，即莫斯科方面對其他支部及其刊物的財政援助是不必要掩藏或不可能掩藏的了。顯然，那些高度謹慎的格柏烏會計從不曾想過，《墨西哥之聲》會把有關於指它吸收莫斯科的金錢援助稱之為“陳腐的誹謗”。這些財務報表很自然的只是述及共產國際的正式出版物如《墨西哥之聲》一類，至於那些在形式上並不入於共產國際的期刊，例如《民眾報》和《未來報》之類，其所作的直接或間接援助，財務報表是完全抹省掉了，但這些期刊卻履行著格柏烏極之重要和微妙的任務。我們將分而述之。

自然會有人提出這個問題來，為什麼我只動用1929年，1930年和1931年的財務報表。答案很簡單：在把“托派”鎮壓掉之後，也就不再刊登這些財務報表。他們的虛假捏造挑起各方面的更多懷疑，不能令任何人感到滿意。而同時，公告諸如資助共產國際支部和出版物這些專案，則為一些支部製造了麻煩。共產國際不再刊登其財務報表這個事實本身證言了共產國際不得不把它的財政活動全面隱藏起來

但這絕不是說它對支部和“友人們”的資助是終止了。正要相反，這些資助是與年俱增。時至今日，其總數必定是數以千萬美元計，而且這一數額中的大部分無疑是給予那些在形式上不屬於共產國際的出版物和“友人們”。

共產國際和格柏烏難分難解的關係

身為美國共產黨創始者之一，美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成員，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及共產國際主席團成員的B·吉特洛在致我在美國紐約的律師亞伯特·戈特曼的一封信裏，對共產國際與格柏烏的關係有如下的界定：

紐約克羅姆邦特

1940年7月25日

戈特曼先生
116大學區
紐約市，紐約州

親愛的戈特曼先生：

在我身任共產國際主席團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成員那個時候，我協助指導共產國際的事務，對於共產國際這個組織之作爲格柏烏的代理人的方式非常熟悉。

共產國際從俄國派往外國的每一個代表，經常都攜有格柏烏的特別指示，他們倘非格柏烏的特工，也會是在格柏烏代理人的指導下工作。

共產國際在莫斯科那個主持簽發護照，簽證和向俄國以外的共產黨和共產黨報刊提供財政津貼的特別部門，同時也主持格柏烏，這個特別部門的主管是個受薪的雇員，直接向格柏烏這個組織負責。

共產國際的財政事務操持在格柏烏的手中這點，對我而言是一個普通常識。

您真誠的本傑明·吉特洛

鑒於吉特洛先生所在的市鎮沒有法律公證人，A·戈特曼先生用特設的宣誓書爲這一封發給墨西哥法院的信件的真確性作出證明。

宣誓書

亞伯特·戈特曼本人正式以口頭宣誓作證，作出以下的宣誓：

1. 他本人是美利堅合眾國紐約州紐約市的居民；
2. 他收到一個從本傑明·吉特洛發於1940年7月25日的一封信件，該封信件涉及的是有關於共產國際與格柏烏的關係的事宜；
3. 他認識本傑明·吉特洛的手筆，並以他所知認爲上述信件確是本傑明·吉特洛的手筆。

亞伯特·戈特曼

於西元1940年7月29日當天在我本人臨場下簽名和作誓。

法律公證人：H. E. 明尼克

十月評論 2012年第2/3期

B·吉特洛在他的‘我供認’一書內，就共產黨之依賴格柏烏的事情作了殊爲重要的和殊爲確切的聲明：

“但黨和蘇維埃政府的聯繫也有著更爲強力的串繩。這些串繩當中最重要的是格柏烏。黨應格柏烏之請而把黨員供應給它以加入它的情報員的行列。這些黨員便成爲了正式的格柏烏人員，受蘇維埃政府支薪雇用。這些人員是黨和格柏烏之間的聯繫。黨書記局爲他們打點接觸交往，不時對他們之如何行事提供建議。一個黨員一旦給選拔爲格柏烏的特工，便會脫離黨的活動，從屬於格柏烏套用到其人員的嚴苛紀律之下。僅有少數幾個領導人知道哪個黨員成爲了格柏烏的特工，並且會把這個資訊嚴格保密。每次當黨被格柏烏敦促幫忙，黨將收到遠高過實際開支的費用，餘款將收歸黨的庫務部。可是，我們這些愛惜每一次格柏烏差遣的機會，援助格柏烏的工作及它所信賴的黨領袖們，是知道格柏烏同樣也把我們密切監視著的。格柏烏向莫斯科供應美國共產黨所有領導人及黨整體活動的完整記錄，這點對我們這些領袖來說，是個公開的秘密。…然而，我們所有人都知道，蘇維埃政府不僅把我們的黨視作由蘇維埃政府的領導人支配下的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而且也把美國共產黨看爲它的代理之一。…蘇維埃政府把美國共產黨黨員使用於廣大的區域，包括中國、日本、德國、墨西哥和中南美洲的國家…”（見B·吉特洛《我供認》，第302、303頁）。

就我們所觀察，墨西哥並無例外。否認與克里姆林宮有聯繫這點，亦不是《墨西哥之聲》的首創；B·吉特洛就這一點這樣說：

“…美國共產黨經常申辯說它與蘇維埃政府沒有任何聯繫，但事實是，美國共產黨之與蘇維埃政府的關係，就和美國內部收受納粹德國金錢的代理人之和第三帝國政府的關係相同。”（見B·吉特洛《我供認》，第300、301頁）

馬托拉斯和克里維茨基的證言

西班牙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會書記，西班牙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成員之一的恩里克·馬托拉斯在他的1935年於馬德里出版的文獻性書籍裏，就克里姆林宮對共產國際支部所施行的財務專政，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資料，儘管這些資料遠非完整：

“共產國際在經濟上支持共產主義運動，經費的攤派或多或少，通常每個國家有一個固定的數額，但是在異常情況下它會發送更大的款項。這種支援不僅針對恰當地稱為黨的組織，還延伸到其他不同的形式的共產主義運動分支。”

“西班牙每月收取的各種形式的資助大約如下：

	(披索)
共產國際支付給黨	12, 000
國際紅色工會支付給共產主義工會運動	10, 000
共產國際青年團支付給青年組織	5, 000
國際紅十字會援助西班牙支部	5, 000
國際工人援助西班牙支部	2, 000
紅色國際運動會付予文化工人運動聯合會	1, 000
共產國際報刊部付予黨刊	10, 000
合計	45, 000

上述數額並不入於維繫各個代表的款項，而只限於用在增強黨和其下的各種不同組織的活動。尤可注意的是，黨的‘政治局’和青年組織的所有成員，每月都收取400披索定額以作月薪；此外，他們在本城以外出差能享有每天10披索的出差費，以致所有出差費用的開銷皆可報銷”。

“該宗金額通過各種方法送到西班牙境內。有時是由個人攜帶，或有婦女專門擅長這項工作。有時是經由與黨有聯繫的出版社作中介；人們因此而推斷塞列出版社接收該宗款項有超過兩年以上。簡言之，共產國際設法通過一切手段務使每個國家有一隊受薪的雇員供它

完全差遣。”（見前西班牙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會書記恩裏克·馬托拉斯著的《西班牙的共產主義，其方向，組織和程式》，馬德里，1935年西班牙出版，“Pax”版專利本，Plaza de Santo Domingo 13, Apartado 8001. Madrid. 第13，15頁）。

這裏提到的款項是相對地小額。但且讓我們不要忘記，馬托拉斯這本書是在1935年面世的，也就是說，是寫在格柏烏決定性地介入西班牙內戰爆發之前。E. 馬托拉斯的證言是證明了無論如何，共產國際對其支部的資助，在其取消出版共產國際的財務報表之後，還沒有停止過。

前面摘引的參考材料是有關共產國際而非格柏烏的援助。但這裏涉及的僅僅是用術語來掩飾的問題。格柏烏並無本身的庫務部。克里姆林宮出於實際的考慮而把所有這些發放基金蓋上諸如共產國際，國際紅色援助金，國際文化關係協會，或“蘇聯之友”或運動國際等等之類的印章。掩飾在這些印章之後的是那同一個斯大林，而他用以維繫外地接觸的就是格柏烏這部機器；這部機器有著各種理由需要隱姓埋名。

就共產國際各個支部對克里姆林宮的財政依賴這點，我們有的是克里維茨基將軍歷數不竭的證言；克里維茨基直至1938年時一直是蘇維埃在全歐洲的間諜的頭目。

“共產國際的心臟是罕為人知的，從不傳世的國際聯絡部，這個部以其俄文簡寫見稱：OMS（*Otdyel Mezhdunarodnoi Svyazi*）... 他（皮亞涅特斯基）之作爲OMS首腦便實際上成爲了共產國際的財務部長和人事部的主任。”

“他創立了一個向他交代的全世界的長駐特工的網路，用以作爲莫斯科和整個歐洲，亞洲，拉丁美洲和美國的那些名義上獨立的共產黨之間的聯絡官員。這些OMS代表作爲駐共產國際的人員，執掌著揮舞在其駐留地所在的共產黨領袖們頭上的鞭子。普通的基層黨員以至大多數共產黨領袖皆不知悉這些OMS代表的身份；這個OMS代表向莫斯科交代，不直接參與黨的討論。

“在近年間，格柏烏逐漸取代了OMS的許多運作，尤其是有關追蹤對斯大林有異心的人事及將之向莫斯科彙報這方面的運作”。

“付託給OMS駐當地特工的最為微妙的工作，就是分配金錢以資助共產黨，其昂貴的宣傳和其虛假的陣線——例如“爭取和平民主聯盟”，“國際勞工援助會”，“國際勞工援助”，“蘇聯之友”及各種名目上的非黨派組織，當莫斯科著手從事人民陣線時，這最後一類組織變得尤為重要...”

“世界各地的共產黨從未能應付多過它們開支負擔中的一個極為微小的比率。莫斯科自己本身的估計，是它必須承擔外國共產黨平均支出的90-95%。這宗金錢由蘇聯的國庫部支付，按斯大林治下的政治局所決定的數額，經由OMS來支取。

“對於當地共產黨希望設立的任何的開支新項目，駐當地的OMS特工會首先是這項新專案是否得當的裁判人。例如，在美國，美國共產黨的政治局假如考慮出版一份新刊物，它會諮詢OMS特工的意見。這名特工會考慮這項提議，倘若他認為提議值得注意，便會向莫斯科的OMS總部傳達...”

“莫斯科向外國當地的共產黨傳送金錢和指示的慣用方法之一，就是通過外交郵袋，這些郵袋是豁免於搜查的...從莫斯科送發...這些有蘇維埃政府蓋章的郵包裹裝有一束束鈔票和如何分配的指示。他（格柏烏的代表）把這一束束鈔票親自交給共產黨的領導人；他是與黨領導直接接洽的。有過好幾次，這些送往國外給共產國際使用的美金，英鎊和法郎，由於輕率不慎而蓋有招人話柄的蘇維埃國家銀行的蓋章。”（見W. G. 克里維茨基著的《斯大林的特工》，第. 51~54頁）

克里維茨基從而證實了共產國際的各個支部在財政上是絕對地依賴莫斯科，而對共產國際施行財政控制的直接機關就是格柏烏。

由於克里維茨基在美國國會調查委員會上宣誓作證所提供的資料是和上述摘引的段落的資料相同的，而且他也準備答覆墨西哥法院對他的質詢，因此對克里維茨基該書的摘錄，具有法律供詞的份量。

B. 吉特洛的補充證據

就有關於證明共產黨對莫斯科在財政上的依賴這件事，唯一的困難就是可資應用的證明和文獻是汗牛充棟，不勝枚舉之多。在此，我不得不把有關的摘錄減至最少。

過去20多年來在美國共產主義運動裏擔任領導角色的本傑明·吉特羅，他曾經出版了一本書，內裏載錄了共產國際的各個支部對莫斯科的全盤財政依賴的無可爭辯的證據。吉特羅已經與共產國際脫離關係，否則他不會站出來作此披露。我對吉特羅現時的政治立場並無興趣。這本書在事實方面是建基在無可反駁的事實之上的，這點便綽綽有餘：

“...《工人日報》經常蝕錢，遠遠不能自行繳賬。共產國際在投資開創這份報章的3萬5千美元的創辦費之外，一而再次的注資進去...我們希望，隨著把總部遷到紐約，《工人日報》將能從增加銷路的形式而得到較佳的收入。在建設物，一般維修，新印刷廠和各項突發開支的費用，達到30萬美元...”（見 B·吉特羅《我供認》，第. 307頁）

“黨在今天伸展到如此之多的新領域方面；有鑒於日本的局勢，其對蘇聯外交政策的重要性使黨有必要推行史無前例的宣傳活動，使用上每一種宣傳途徑，包括動用十分昂貴的無線電廣播。在最近，黨又創辦了兩份新日報，一個在三藩市，另一份在芝加哥出版，儘管《工人日報》的每年赤字經常超過5萬美元。蘇聯現在顯然要較之過去給予美國黨尤為沉重的津貼...”（見 B·吉特羅《我供認》，第. 389頁）

“...我從莫斯科回國參加1928年競選總統提名的黨大會時，牛仔褲裏袋有俄國出資的5000美元，這筆錢是莫斯科捐贈給我們作總統競選活動的3萬5千美元的首期付款。這也是我們每年從給予特殊用途的特別授款中所得到的25萬美元的一部分。莫斯科在1924年給我們的總統競選活動捐贈了五萬美元。莫斯科從最初捐贈3萬5千美元以創辦《工人日報》之後，每年繼續用不少於這宗金額的數目來餵養這個無底深潭。而當然了，在我的那個時期，莫斯科

對美國共產黨的財政捐贈，比起今時的數額，只不過是區區小數；今時的莫斯科已經是無可非議的老闆了...”（見 B·吉特羅《我供認》，第. 496頁）

莫斯科作的財政援助的比例有多少呢？不止一次地從莫斯科掌間轉手經費的B. 吉特洛對此作出以下的宣稱：

“...莫斯科是個豪爽的捐贈人，但我們的所有行動遠遠不是全都由俄國人支付的。美國共產黨當年的成員從不超過1萬6千人，我們平均每年支出1百萬美元，其中的過半數是在美國國內募集得來...”（見 B·吉特羅《我供認》，第. 470頁）

即便富裕有如美國的黨，其中近半數的財政開支也得由莫斯科的來源來勾銷。

同一位作者向我們訴說在倫敦創辦一份共產黨人報章的情形：

“...英國共產黨被當作一個病弱的孩子般來對待，黨每走一步，都必須得到來自莫斯科的援助...，共產國際試圖迫使英國黨為創辦一份英國共產黨日報所需的金錢而自行募集其中若干比例的數目。開始英國黨的領袖們則搬出各種各樣的藉口來解釋他們為何不能籌得這筆款子。報紙終於出版了，金錢是由共產國際一手包辦的；為創辦這份報紙和維持其不倒的所有金錢，實際上全部都是由俄國人來供應。這些國家的領袖們的實情，也適用於其他國家的領袖們的實情，分別只在於程度的多寡...”（見 B·吉特羅《我供認》，第587-588頁）

據我們的觀察，無理由假設墨西哥會是個例外。

吉特洛的書，我不是作為一部文人的著作而卻是作為一個證人的證詞來引述的；首先是因為他在國會調查委員會上宣誓而後作出與該書相同的證言，其次是由於他準備在宣誓下回答墨西哥法庭提出的任何問題。

對拉丁美洲共產黨的財政援助
拉美的共產黨之與莫斯科的關係，是和世

界其他國家的共產黨之與莫斯科的關係大同小異，這點已經是相當的不言而喻。即使我們在這方面沒有特殊的資料，也是毫無疑問的了。不過我們確是持有這方面的資料。在此我附上約塞·紫克的重要證言。紫克在美洲，包括拉丁美洲的共產主義生活中發揮了領導的角色有15年之久。以下是約塞·紫克宣誓後所作的證言：

宣誓書

約塞·紫克本人口頭宣誓作證如後：

1. 他在美利堅合眾國的紐約市居住。
2. 他在大約15年間是美國共產黨的成員，在這段期間，他是黨中央委員會的成員，並擔任其他許多負責性的職位。
3. 他在1929-1930年期間為位於莫斯科的紅色國際工會工作；在1930年時，他被共產國際當時的書記皮亞涅特斯基和共產國際的主席馬努伊爾斯基遣往拉丁美洲哥倫比亞的波哥大，以代表共產國際監督哥倫比亞共產黨的工作。他作為共產國際的代表在哥倫比亞停留了15個月，並且也代表共產國際而在委內瑞拉停留了7月。當他在該處時，他和駐烏拉圭蒙特維多的共產國際局保持經常接觸。
4. 宣誓人進一步聲明，當他在哥倫比亞期間，他被授權開銷並且確有開銷了約6千5百美元，作為資助當時隸屬於共產國際的哥倫比亞的工作的用途。當他在委內瑞拉期間，他也有開銷作為資助委內瑞拉共產黨的工作的金錢。大部分的金錢來自於居住在紐約的一個名叫吉蒂·哈里斯的共產黨黨員。

他特別記得，他個人有一次從一名稱作威廉斯的共產國際代表裏收到800美元的數目。據他所知和據他相信，這個威廉斯其人是格柏烏的成員。

約塞·紫克
在我當前宣誓和簽署
1940年7月20日
法律公證人：沃爾特·A·索洛爾

不錯，J. 紮克是沒有和墨西哥有聯繫。但格柏烏既然沒有忘記哥倫比亞和委內瑞拉，則它無疑有更多理由須關注墨西哥。

墨西哥政府在1931年時留意到有一個名叫馬奴爾·戴亞斯·拉米尼斯的人，其人有一筆巨大的款項存入他的銀行戶口。1931年5月6日《宇宙報》對此事有以下文章：

“... 據知，他曾經屬於墨西哥共產黨有10年時間，現在是第三國際在墨西哥的代表，就此他曾經到過俄國，在那裏留了一年。他從1927年到1928年掌管黨的財政，處理了3萬披索。他出差的全部開支就是由這個基金支付。”
（《宇宙報》，第一部，第7頁第7欄）

據我所知，在那個時候已經堅實的確定了，那筆錢是來自莫斯科的。法庭當局完全有可能對這段插曲作出查證。

就在墨西哥和蘇聯中斷外交關係的那段時期，墨西哥政府曾經正式述及共產國際的支部之與蘇聯國家機關的關係。

對於墨西哥和蘇聯的外交關係破裂是“正義”或“不正義”的問題，我將之完全置諸一旁；同樣的，我也把墨西哥共產黨的迫害的問題置諸一旁。我所感興趣的是已經官方確立了的事實。墨西哥政府在1930年1月23日的傳達如下：

“墨西哥政府清楚無誤地知道：俄國的共產主義團體並不是獨立地工作，亦不能獨立地工作，因為該國無論任何政治都是隸屬於蘇維埃政府的。”

在蘇聯，沒有一個組織可以作為獨立于政府而自行其事的這個論斷，絕對是無可爭議的。對所有組織的指揮皆集中在格柏烏的掌中，而當關乎到對外的關係，更是變得尤為嚴苛和專橫。向共產國際的外國支部以及對“友好的”刊物的財政援助，俱是格柏烏的事務。墨西哥並不成其為例外。

個人貪污腐化的制度

在莫斯科向來自外地的勞工運動的領袖所使用的貪污行賄的方法，在很久以來已經是家喻戶曉的了。莫斯科對共產國際內部的反對

派，要麼是行賄，要麼是扼殺之。由黨大會合法選出來的美國共產黨代表團，在出發前往莫斯科之時，黨的領袖便在事先知道他們在莫斯科將會受到怎樣的接待：

“... 我們必須保護我們的代表，以對抗莫斯科貪污制度。我們向他們提出警告，前往莫斯科是一個嶄新的經驗，他們該準備會遇到各式各樣的麻煩。我們也向他們解釋共產國際的種種做法。我們告訴他們說，共產國際有著無與倫比的資源，它的人員會給他們花天酒地，會向他們作出各式各樣的誘惑，以令他們改變看法，而要是誘惑不生效，便會使用壓力。我們的代表莊嚴地誓言保持忠心，為我們所尋求的正義而奮鬥到底。”（見 本傑明·吉特羅著《我供認》，第528頁）

共產黨領導人之間的你爭我奪，經常都是用把一些“領袖”調往格柏烏來解決。當吉特洛因企圖實施一項獨立的政策而失寵時，莫斯科便試圖把他調往格柏烏。吉特洛本人就這件事有以下的說法：

“... 對我作了種種行賄的企圖。有一份薪金十分優厚的職位提供給我，是在拉美國家做保密性的格柏烏的工作，除優厚的薪金之外，還包括有足以供我乘坐頭等交通，出入最佳酒店的旅費，... 我把這個誘惑推掉，因為我認識到這是一項賄賂，並且也知道，要是我讓自己任由格柏烏的差遣，從此之後我便會由它為所欲為的了。”（見 B·吉特羅《我供認》，第568-569頁。）

這個插曲，揭示了 給許多那些曾經被“開除”，被“撤位”的人的命運，諸如D·A·西凱羅斯，G·洛倫索，H·拉波爾特等人，投下了耀目的光照。把吉特洛這麼顯要的一個人物派往拉丁美洲的企圖，展示了格柏烏對拉丁美洲國家有著特殊的興趣。

美國的工人領袖之一弗雷德·比爾在他的書裏談了他在莫斯科是怎樣被爭取過去的：

“共產國際... 開始用打動人心的渴求來討我

歡喜。他們讓我在莫斯科稱心滿意：住的好，吃的好，為報刊而作的演講和文章的稿費也好。”（弗雷德·比爾著《無產者之旅》，第257頁）

吉特洛談到克里姆林宮是怎樣把著名的美國黑人福特爭取過去的：

“...形形色色的諂媚討好，獎狀，徽章和禮物鋪天蓋地的向他投來，...”（見 本傑明·吉特羅著《我供認》，第455頁）

就在5月24日行刺發生之前，在墨西哥共產黨出現了翻天覆地的變動的期間，當時在墨西哥代表著共產國際的人，就是這同一個福特；在此指出這一點，實在不是多此一舉。

克里姆林宮採取誘使個人貪污腐化的這些例證，只是一個已經完成了的制度裏的一些孤立的狀況。這個制度的基本元素，就是斯大林引進的雙重工資制度：第一重工資是正式償付給黨雇員的工資；第二重工資，是由格柏烏控制下的一個秘而不宣的特別財庫部專門支付給那些“負有更多責任”的機關人員的工資。這個制度以莫斯科為發源地，從打擊“托洛茨基主義者”反對派生氣勃勃的抵抗開始，旋即擴展到共產國際的整個方面去。毋庸置疑，同樣的制度在過去和現在皆在墨西哥照辦如儀。收受秘密酬勞的中央委員會成員，因此能把他們的精力用在友好組織（《人民報》，《未來報》）方面，從而給它們提供了最重要之一種經濟支援的方式。

吉特洛回憶起斯大林是如何的愛在莊嚴的場合裏，大談共產國際的純潔性和貞潔性：

“...‘共產國際是神聖的工人階級的最神聖者。一定不能把共產國際與股票市場混為一談。’可見，這正好是斯大林打理共產國際的方法：收買，出賣，把共產國際的領袖們弄得一敗塗地...”（見 B·吉特羅著《我供認》，第553頁）

墨西哥共產黨的領導人也不能例外！

《墨西哥之聲》的公正無私

1940年7月7日，《墨西哥之聲》聲稱，我斷言它從莫斯科接受財政援助，這個說法，是一個“陳腐的誹謗。”為把我自己同斯大林式的傲慢浮誇撇清開來，我要再加上一段摘錄：

“卑劣叛徒的斷言，陳舊誹謗的重複，都不會讓我們感到驚訝，但我們等待，希望他提供證據，但肯定他無法提供，因為這份報紙帶著自豪和切實的期望，獲得工人，農民和同情者的自願捐款而維持存在。”

顯然的，這些紳士先生們是帶有這麼一種印象，即他們既然採用了目空一切的調調兒，那麼他們便毋需要處理他們本人已經承認過的事實。

《墨西哥之聲》否認有接受來自莫斯科財政援助，它假惺惺的裝作相信，在統治著共產國際的常規裏，全世界獨有墨西哥共產黨是個例外。於是，正是這同一份報章，在今年5月1日該期裏寫道：

“黨之所以陷入這樣的經濟局面，其根由乃在於黨過去的領導層把這個無產階級政黨弄成依賴於總督，議員，代表，把黨綁到... 資產階級的尾巴去，使黨的原則變質，放棄保衛的工人和人民的利益，制止群眾爭取更好條件的鬥爭，把黨與之對立。”

我們看到，對於選取金錢的來源，黨並不是如它在7月7日裝模作樣宣稱的那麼一絲不苟。

就在黨上一次的大會裏（1940年3月），黨領袖之一的沙爾格度指控前領袖拉波爾特收取賄賂說：

“尤卡坦人民的全部痛苦和饑餓，就以每個月一千比索之數目，賣給了控制著國家的一小撮政客。”（見《把人民之敵趕出革命行列！》）

黨另一名領袖拉斐爾·卡里略在1940年4月就有關上次黨大會有以下的寫法：

“...全國非常大會做出了無可估量的努

力...它把須對存在於基層之中的混亂和貪污腐化的局面負責的領導人開除出黨...”（見迪奧尼西奧·恩西納著的小冊子《帝國主義滾蛋！》的序言。1940年墨西哥出版）

我們因而知道，在以黨之名義發言和行事的黨領袖之間，不僅充斥著無組織的“混亂”，而且還有著“貪污腐化”。

這不是一個無傷大雅的插曲。須為“貪污腐化”負上責任的埃爾南·拉波爾特其人，從1928年開始出任黨的最高領袖，也就是說，長達十二年之久。他對黨有無限的權力；在過去的五年，更尤其如此。

黨的新首腦迪奧尼西奧·恩西納對此有如下的說法：

“黨在過去的領導層不過是一個狹小的領導層，由它處理和解決所有事務，把政治局的其他成員淪為附從，這樣的領導層不是狹小的領導層又是什麼？”

還有：

“...自第四屆大會迄今，也這是說，黨在拉波爾特和坎帕的領導之下足有五年。”（同上，第102頁）

作為墨西哥斯大林主義者的領袖之一的D·A·西凱羅斯，有一次這樣宣稱：“從莫斯科方面收取金錢，要比從墨西哥資本家方面收取金錢為佳”。他們在1940年時，公開的承認有從墨西哥資本家方面收取金錢。而這當然並不表示他們在同一時候裏沒有收取莫斯科的金錢。

共產黨之與總督、議員、代表和墨西哥資本家的關係，我在此是毫不關心的。《墨西哥之聲》和沙爾格度先生以前承認了的事實，使我感到興趣之處的，僅僅是在於他們把有關《墨西哥之聲》這份報章只是全賴著“工人，農民和同情分子的自願捐助”而生存的這項斷語，徹徹底底的駁倒了。

上次黨大會（1940年3月）不錯是決定了此後要過上更富德行的生活。可是我們就在下一輪的清算裏得知，黨所採取的措施，首先是它

所推行的程度，是有多麼嚴肅：共產黨從所能及的方面收取盡所能多的金錢，而且對於金錢的來源毫不靦腆；這個事實，一直維持迄今。

即使我們接受上次大會的虔誠意欲是真實不虛的吧，我的話裏亦沒有一丁點兒的誹謗成分。《墨西哥之聲》認為從“同情分子”間收受金錢完全是可允許的。而難道斯大林主義者不入於同情者之列嗎？就在那篇把我稱作“誹謗者”的評論裏，斯大林是被稱作為“偉大的蘇維埃領袖斯大林同志”。然則，為什麼又不可能接受這位“偉大的蘇維埃領袖”的同情者的金錢呢？

但問題不僅是“同情”分子。共產國際是把本身看成為無產階級的國際政黨。格柏烏的頭目貝利亞，聯同其委員會的所有成員，及在格柏烏擔任要職的所有人員，全部都是共產國際的成員；這就和《墨西哥之聲》編輯中的黨員同志一樣。所以，這份報章是可以接收貝利亞和格柏烏委員會——國際黨的同志——的金錢而不會損害它的“驕傲”。因此，在我的論斷裏，全沒有一點誹謗的影子。不過，《墨西哥之聲》的公正無私必定是完全入於神話的範疇了吧。

華爾特·克里維茨基

向墨西哥法庭作的特別聲明

在本檔行將完成之時，我接到由蘇維埃駐歐洲情報處的前任首腦華·克里維茨基將軍向墨西哥法庭作出的一份特別聲明。這份聲明是就蘇聯和國外的格柏烏組織的系統，格柏烏和共產國際的關係，及國外格柏烏的恐怖活動而作出的。身為格柏烏多年來最重要的代表之一的華·克里維茨基先生，他在斯大林開始通過捏造冤案審判而把布爾什維克黨革命的一代摧毀的時刻裏，與莫斯科決裂。克里維茨基在全世界報章和最近通過書本形式所揭露出來的事情，皆被所有嚴肅的出版界譽為是有關克里姆林宮政治學的隱藏機制方面最為有力和最為精確的證據。

為了避免誤會，必須交代，克里維茨基聲明內的縮寫GUGB的所指，就是格柏烏機關。由於格柏烏的名字[“國家安全委員會”]具有招人憎惡的性質，克里姆林宮試圖給它取用其他名稱。不過，不論在蘇聯和外國，由於事情的

本質無改，所以人們仍然把GUGB稱為格柏烏。

我把在紐約的代表律師A·戈特曼宣誓作證以證明克里維茨基的聲明確是出自其人不虛的聲明，一併附錄在後。克里維茨基將軍本人由於受到格柏烏的職業殺手追殺，所以他萬非不得已，除緊急事態外是不會在公眾場合露身的。

亞伯特·戈特曼所作的聲明的日期是8月9日，這與克里維茨基的聲明是同一天：

“我謹為里昂·托洛茨基和代表他作出以下面聲明，這份聲明可以在墨西哥任何一個法庭使用。

國家內部關係全國委員會安全總行政部（GUGB - NKVD）是蘇聯秘密員警的部門。內務部人民委員貝利亞同時是GUGB首腦。

GUGB按部門編分，配合著蘇聯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結構而組織。

GUGB的基要部門名叫特別部門。這個特別部門執掌對整個黨組織的監視工作，軍隊中的特別部門和海軍也隸屬其下。特別部門在所有組織裏布有秘密人員和線人。由這些秘密人員和線人所作的舉報，就成為GUGB扣留的根據。GUGB典型的工作方法就是定期的逮捕。登記在GUGB檔案名冊的人，都是不太完全忠於蘇維埃政府者，沒有受到任何實質犯罪指控。GUGB把這些人目為“潛在的反革命”；他們在這支不忠心的公民大軍裏實行大規模拘捕。在獄中，他們把這些人變成罪犯，令他們為國家生活中的各個領域的失敗背上責任。

GUGB在國外的代理機關有著代表人。

這些人在官式方面擔任外交人員的職務。在這些人的指導下，他們對位於所在國的所有蘇維埃正式機關進行監視。

在國外的共產國際的全部工作，都是經由國際關係部（OMS）執行。從1936年至1937年以來，國際關係部在莫斯科和國外的全體機關，俱通過GUGB的特工而融為一體，而國際關係部的所有活動，皆由GUGB所操縱。在共產黨屬於合法的國家裏，都有來自莫斯科的國際關係部的一名代表。在過去，這些代表是處於較次職位的使節人員，而在近來，這些人俱轉到地下。這些人員的運作如下：對共產黨的活動和財政狀況作出控制；轉達來自莫斯科的指示和經濟

援助。蘇維埃政府的金錢資助，不僅限於正式的共產黨及其報刊，而且也及於不屬於黨的親斯大林派的報刊。例如：巴黎的《今夜刊》。拉丁美洲的共產國際的所有活動，皆駐集在美國；國際關係部出任美國和其他拉丁美洲國家的首要代表，就是駐在美國。這名代表的助手們散佈多個國家。有關的指示和經濟津貼，主要通過蘇維埃駐華盛頓大使館進行。除了這個主要中心之外，國際關係部還有著非法的網路機關供其差遣；這個網路機關分有歐洲，亞洲和美國各不同部門。這種編排，是為了應付與任何一國發生戰爭或外交關係破裂而作出的。

GUGB組織在國外的恐怖活動。有鑒於執行命令會涉及的風險和外交麻煩，這些恐怖行動的指令皆是由內務部人民委員會，GUGB最高頭目親自發出，經由斯大林批准。負責組織恐怖行動的搞手，都是國外GUGB身居要職的人員。為GUGB服務的殺手通常都是外國人，都是經過共產黨反復考驗過的戰士。在這類人之中，有些人由於被認為具有陰謀家的性格，所以不是正式屬於黨的。”

華爾特·克里維茨基

亞伯特·戈特曼首先以口頭宣誓作證如下：

1. 他是美利堅合眾國紐約州紐約市的居民。
2. 他接獲華爾特·克里維茨基的一份文件，這份文件以英文開首如下：
“我謹以里昂·托洛茨基和代表他作出以下聲明，這份聲明可以在墨西哥任何一個法庭使用。”
這份檔共有三頁，由俄文寫成。
3. 他熟知華爾特·克里維茨基的手筆，並且知道該份檔是出自華爾特·克里維茨基的手筆。
4. 這位華爾特·克里維茨基無法親自作出宣誓，因為他若親自作出宣誓便會暴露出他的所在；他由於害怕格柏烏而不願意暴露他的所在。

亞伯特·戈特曼

在我當前簽署及宣誓，

西元1940年8月9日

法律公證人：梅耶 B·卡爾巴

結束語

由於我在法庭表示，《墨西哥之聲》的負責人肯定是和其他的格柏烏人員一樣，是有從主子收取財政援助，《墨西哥之聲》的編輯部便要求我必須為“毀壞名譽”負責。

在這篇文件裏，我嘗試證明，並且相信我是已經成功地證明了，《墨西哥之聲》是充分意義上的一份格柏烏的喉舌報。這份報章除了由克里姆林宮通過格柏烏灌輸到其國際特工的政策之外，別無其他政策。它保衛格柏烏所犯的全部罪行，誣告格柏烏的敵人。它在過去數年間最暴烈洶湧的誹謗造謠，就是用來攻擊我的。

我還進一步嘗試證明，並且希望我已經能夠成功地證明，墨西哥共產黨和《墨西哥之聲》在籌措行刺的過程和在事後把行刺的線索加以掩飾所用上的種種錯綜曲折的手法。墨西哥共產黨全體的領導層參與了行刺的準備，領導層中的一部份人而且更參與了實際行動。

而在道德輿論方面的準備，主要就是有用有系統的，蓄意而為的用惡毒的誹謗來攻擊我；這些誹謗更是屬於最嚴厲和最富殺傷力的指控。

這同一批的人物，在代辦了行刺之後，又試圖用新一輪的誹謗攻勢（所謂“自我襲擊論”等等），來愚弄負責調查的當局和公眾的輿論。

所有這種種工作，從始到終，俱是對應著格柏烏的任務和利益而作的，而且也是履行其指令而作的。墨西哥共產黨的領袖和《墨西哥之聲》的眾編輯，是作為格柏烏的特工而行動。指稱他們像所有其他格柏烏特工一樣，必然是有收取格柏烏的酬勞的這項聲明，並無一點兒的“毀壞名譽”的成分。我已經額外地舉出了無數的證明，以說明全世界各國共產國際支部的領袖們，都是由克里姆林宮支付酬勞。

說到“毀壞名譽”方面，那些據以對我作
十月評論 2012年第2/3期

出誹謗而造就政治事業的那批人，應該是最無資格來談“毀壞名譽”的。我的前文裏，已經陳示了一些他們作的誹謗的樣本。這些誹謗的惡意之甚，已是無出其右的了。

從而，我在此謹表達我深信：墨西哥司法不僅會拒絕指我毀壞名譽的訴訟，並且反過來要讓《墨西哥之聲》的編輯們為誹謗負責，而且根據他們有系統性地、惡毒地作出的誹謗的性質，而對他們判以最重的刑罰。

L·托洛茨基

1940年8月17日，墨西哥科約阿坎

史丹譯自《托洛茨基文集1939——40年》



我無悔！

幟英

我的祖父原來在湖北務農，娶妻後移居上海做小販，賣湯丸，住在小沙渡的工人區。街上很多店鋪是回教徒開的，招牌上有“清真”的字樣。祖父在小沙渡工人區協助籌款創辦清真寺，牲口要經他宰殺，別人稱他為爸爸，意即教父。祖父生四子，我父親是長子，我是獨孩，也是五代唯一的女孩。

外祖父在農村給人家“磅牛”，拍拍牛身就能估量牛有多重，殺牛後切開來稱，很準確。外祖父重男輕女，有2子2女。大舅舅幫人以馬代步，是被馬踢死的。小舅舅務農。

我母親三歲時，外祖母死了，母親哭壞了眼睛，靠比她大七歲的姐姐照顧。外祖父後來娶了填房。母親想嫁給城裏人，把眼睛醫治好，嫁了比她大兩歲的我的父親，24歲時生我。父親嫖賭飲吹，染上性病。二叔在監獄做事，把麵包屑拿回家，母親懷著我時，只吃麵包屑，身體很差。祖母是出名的刻薄惡婆，經常打四個兒媳婦，母親是同鄉，少點挨打挨罵。據說，祖母很凶，三個小夥子都打不過她。她打罵兒媳婦後，還不讓吃飯，兒媳婦之間會偷偷送飯。母親生倒睫毛，用夾子夾著眼皮，祖母打她的時候，偏打她眼睛。我出生後，幾個月打噎；祖母還好意思說，寶寶打噎，是因為在娘胎裏受了氣。

我是五代唯一的女孩，出生的時候，小鵝蛋臉，很美，阿訇為我洗禮時，祝賀我祖父，說你添了個天使。

我六歲的時候，祖母提出要把我送到日本紗廠筒子間做細紗童工，母親不答應。當時，二叔是崇信紗廠的職員，在廠裏有點權力，所以祖母在工廠負責派廁紙；母親同另一人負責在打好包的紗包上蓋章，活輕，下午三、四點可以下班回家。如果我做紗廠的養成工，會有

工資。

母親讓我報讀崇信紗廠的附屬崇信小學，讀到小四。我們家窮，有一個同班同學叫姚桂香，與我很要好，她和妹妹上學由家裏的私人黃包車接送，路經工人房區把我接上。我讀書時比較懵，小一的課文“人手足刀尺山水田狗牛羊白布五匹六匹”，“燕子爾又來乎，舊巢破，不可居。燕子銜泥銜草，重造新巢”，我都琅琅上口，可是一本書讀下來，我還搞不清“人”字原來在第一頁。小三的時候開始讀英文，老師問“時鐘”怎麼說，我答不上，後來能答是“clock”，老師問怎麼拼寫，我不知道，老師給我板尺，自己打手板。有一次，我問母親拿一個銅板買英文練習本，母親不識字，要我唸英文給她聽，我大聲把26個英文字母唸了一遍，母親還以為我英文流利，給我銅板買練習本去。

我讀書不大行，但是好奇心重，觀察力強。母親比較迷信，曾經請拖著駱駝的相士給我算命。我不迷信，自己一個人在街上觀察擺地攤的相士怎樣用雀鳥占卜，雀鳥會啄出客人的生肖紙片，很準確，但是我拆穿相士說，你不要指手畫腳，要讓雀鳥自己找。我對機器很感興趣。大概八歲的時候，有一次偷拿了叔叔的掛表，拆開來看為什麼能轉動，接著沒法拼好，趕快把零件扔到小巷對面的樓房裏，二房東知道，幸好沒告訴母親。十來歲在北方的時候，我又拆開了一個座台鐘，然後重新裝嵌，分針慢了15分鐘，我勉強把針撥過去，沒被人發現。

母親有很強的自尊，教導我要有骨氣，不貪婪，不依賴。我自小走路只往前走，目不斜視。也很執著，兩條小辮子不對稱，一定要重紮，否則不肯出門。母親管教很嚴厲，知道我不規矩會教訓我。沒有玩具，我用繩子綁著一

塊銅板，走一步踢一下；母親上班後，我會把新鞋翻出來穿上，到母親幫我舊鞋換新鞋時，才發覺新鞋早已破爛。有一次，我看到一個吹氣進去會彈開發出嗚嗚聲的小玩意兒，我很想得到，從母親那兒偷了十個銅板，一股腦兒給了小販，換了小玩意兒，回家後，給母親按在床上狠打一頓。母親不苟言笑，也不讓小孩饒舌，我很少說話，儘管有時候會鬧出笑話，比如說，家人說不能吃普通的牛肉，要吃清真的牛肉，我就提議大家吃清真的豬肉。

工廠有工屋，大部分被黑社會霸佔。所有工屋一律是樓下客廳、廚房，樓上居室，每月付4元租金。二叔有一間工屋。父親常常不在家，母親和我租住一個後樓，把三塊床板放在兩條長凳上。在板牆上貼花紙，不久，花紙上都是吸血白蚤，在床板上淋火水、燙沸水，還是被咬。上樓樓梯的近出口位置放了一塊板當台用，上面放火水爐煮食，馬桶放床旁邊，行李塞在床下。整個工廠區有十多弄，名字很好聽，有大旭裏、梅芳裏，我們住在櫻華裏第七弄，路中間有自來水和電供應。在炎熱的夏天，我們愛把小板凳放在屋子外面的大街，坐著乘涼。二叔住在櫻華裏第二弄，跟我家隔一個馬路；母親打我的時候，我就跑出去，我跑得快，母親追不到，祖母是我的護身符。二嬸生的嬰兒夭折了，讓我去吃她的奶。我小時候身體羸弱，到十六歲乘船從遼寧去上海，連小孩半票都不用買。

大概十一歲的時候，父親在北方遼寧（奉天）東塔兵工廠冷作間做工，賭博贏了很多錢，租用了楊宇霆第五姨太的物業，把全家連祖父母、叔祖父母、三叔父子倆、母親和我，一起接到遼寧住。我讀完小四，到北方輟學幾年期間，父母親帶我在城裏購物，我買了毛線和十字本，父親工友的妻子教我編織毛線，我再對著本子學，給自己織了一條長毛線褲。接著，我在兵工廠小學繼續唸小四。

祖父閑著沒事幹，早上用拐杖點數外牆上的喇叭花，一天五次虔誠磕頭做禮拜。我只跟從祖父在家裏做過幾次禮拜。一方面，我痛恨母親和嬸嬸們在家裏地位卑微，挨打挨罵；另一方面，我不相信鬼神，所以我後來叛離回教。到我參加托派組織後，同志們作弄我，在飯裏放豬油，看不出來但我覺得有一股臭味。後來，少吃豬肉不是宗教原因，只是貧困。

在遼寧的時候，我聽家裏人說，二叔功夫很厲害。祖父懂功夫，我父親頭額上有一個硬包，用頭額撞人，可以撞死人。父親不肖，祖父再沒有教他功夫，傳了給二叔，二叔收了兩百多徒弟；但在1927年出家後門準備回工廠的時候，被三個共產黨人圍著，他們打不過二叔，開槍殺死了他；工人恨他這個工頭。在東北的時候，我聽到父親跟工友聊天，是否吹牛就不得而知了，他說，他在上海跟人打架，打死了人，被通緝，逃到新疆，做過官，再到法國，因為非法入境，被抓到牢獄裏。牢獄的小房間有一個小窗對著街，他請一個路過的中國工人幫他弄到一把斧頭，打了洞逃獄，但被抓回去，關進同一個牢房，之前打洞補上的牆還沒乾透，他有點功夫，用手肘把洞打穿，成功逃脫。四叔是律師樓的師爺，吊兒郎當，有一子一女，但他另外租房子跟別的女人同居。叔祖母是傻婆，螃蟹生吃，回上海後生一子，有一次帶兒子看病拿了藥，把藥給兒子一次性全吞下，兒子死了。

我十四歲的時候，母親生病，肚子很大，姨母在湖北漢口，母親帶我跟著她去治病，在仁濟醫院，同一天三個人做手術，另外兩個人都死了，幸好她沒死，從肚子裏拿出來的血肉瘤，有13磅重，可能是沒成胎兒的雙胞死嬰，應該是跟我父親的梅毒有關。之後母親再回遼寧。那時候，母親住在醫院，我很不懂事，不懂得擔心她，反而向她訴苦，說吃不慣姨母做的飯菜。如果母親當時死了，我真是不堪設想。

我陪母親離開遼寧去湖北的時候，第一天出門，第二天父親就招妓進屋。我們回到家裏，看到被褥都換了新的。我被遺傳了父親的梅毒，第一胎墮胎，第二胎小產；懷第三胎時，在廣州，產前檢查驗出有梅毒，說200元包治好，但是我們沒有任何生活費，哪來200元？於是自己買了914藥，請同志幫忙打針。針藥要打進血管，不能打進肌肉。頭兩針沒事，第三針打不好，將914打進肌肉，晚上全身發腫，送去廣州的紅十字會方便醫院。生產是在伯多祿醫院，全身潰爛，生出來的男嬰，眉目清秀，像個女的。鄰床的孕婦生了女嬰，看上去卻像個男的。我當時病重，丈夫喂我一口一口吃飯，嬰兒卻一周後餓死了，丈夫把他拿到山邊挖一個洞埋了。

我十五歲的時候，父親輸了錢，欠了賭債。一天，他帶著我出去找朋友，到一個地方，他讓我坐在客廳，他和別人在後頭談話。接著到另一個地方，最後到了一個妓院。父親在後樓說話，一個外號叫“老江湖”的工友在靠近樓梯口的床上抽大煙，跟我說，“你父親輸了很多錢，用什麼還賭債？”我忽然醒悟，立即輕輕地跑下樓梯，在馬路邊跳上一部人力車，請他拉快車，帶我去遼寧東塔二邊門；到弄口，看到母親還有其他人。母親在哭，因為父親威脅要殺她。過了一會兒，父親回來，大家都不說話。這是我險些給父親賣到青樓妓院的故事。

我們一家在遼寧住了大概6年，父親欠債想辦法偷走，祖父等親戚也陸續離開。父親回上海租了一個店鋪，賣牛肉湯，然後委託工友安排我們母女倆坐船回上海。我十六歲回到上海，不再上學了，到紗廠做工。紗廠工資比較穩定，有津貼，有工人住房，但是空氣環境不好，而且工人忙著跟機器轉動，一點不能鬆懈，就像查理卓別林的《摩登時代》一樣的情景。我第一天上班是夜班，工頭不派活給我，早上離廠的時候，他向我提親。我第二天就不去上班了。我們在新大昌雜貨店租用了一個灶披

間，後來我在這個灶披間的牆裏收藏違禁的托派組織刊物。隔壁住了一個織綢女工，跟一個老男人同居。雜貨店老闆姓賈，除了開雜貨店和在市中心開旅館，也放高利貸。他的母親和妻子同情我們，介紹我去學織綢。

織綢廠剝削很嚴重。我到織綢廠學師，先送禮給兩個介紹人，頭一年全部幫師傅做，工資歸師傅。做滿一定量之後，學徒只能拿2成的工資，然後4成、6成、8成，等到幾年滿師，才能拿全工資。學師的廠多半是織錦，經是真絲，緯是人造絲。自己派到機器的時候，做的是計件工，織一碼算一碼。了機要換新經的時候，等一兩天完全沒有工資；機器出毛病斷了一梭絲，要一根一根地駁上；檢查織綢的人可能很苛刻，會做出處罰（他下班後也會經常在路上被工人打）；甚至工友之間嫉妒，故意下班交接時在機器上做手腳。所以，織綢工資好像高於紗廠，但平均下來，工資不如紗廠工人收入穩定。我當學徒時，有一次把手伸進機器的時候，一個工友開機，我的右手肘被夾著，去了醫院，放了很多藥紗進去，幸好沒夾斷，否則就殘廢了。為此，我停工幾個月，沒有分文工資收入。右手肘上留下了一道疤痕。

我學滿師後，做了幾年織綢工。工資僅夠勉強糊口。織綢廠的好處是空氣流通，一人一部機，可以坐著，下午累的時候，可以趴著休息一會。因為是件工制，晚飯後會回去做到10點。我對機器有興趣，師傅來維修機器的時候，我會在旁邊看著偷師，拿螺釘扳鉗（士巴拿）學著修理機器，也略懂修理電器電燈。

我本來在滬東做工，不在美亞等大廠，而是在開利織綢廠。開利有二十多部機器，一排五部，有四、五排，全廠有幾十個工人，工廠規模不算小，有職員宿舍。1937年8.13事變，日軍打進上海，我和父母親被迫從滬東逃難到比較安全的滬西英法租界區，後來東搬西搬，還是回到開利織綢廠。我也曾經在工廠做大機，不做花機，織航空飛機用的太空傘，有2碼寬，

用的是真絲，緯是濕的，織出來的航空布，不能有一絲跳線，要密密的不透水不透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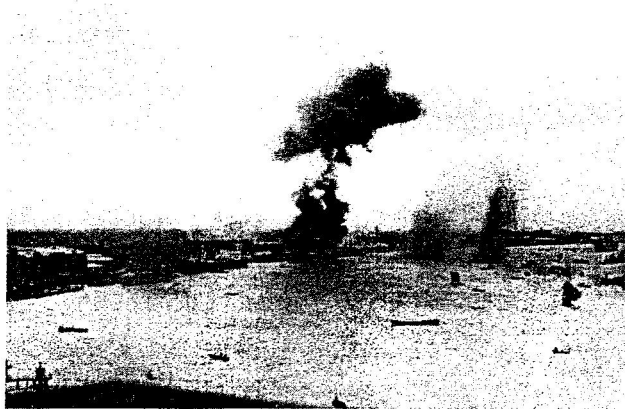


我們上海織綢女工，上班穿裁縫做的旗袍，前後長短不同，前面長及腳背，後面長及鞋跟，旗袍叉開到大腿，方便活動。我不喜歡花布，旗袍大都是素色的。做學徒時，有一個男工是國民黨黨員，對我說“三從四德，婦女道也”，我裝作沒聽見。經常有工友留字條向我表達愛意，我很嚴肅，不理睬他們。我身體不好，經常病，工頭介紹一位駐廠中醫師給我治病，他叫顧正洪，比我小兩歲。他到我家給我治病，看到我小學的中英文讀本，還有我做工後自己買來讀的《古文觀止》和詩詞書。他追求我，向我父親提親；父親說不能把我嫁給漢教。爲了要與我結婚，他趕緊洗禮，改信回教，取得我家人的歡心。我和他訂了婚。訂婚時，他買糖果送給我們的親戚族人，還做了兩個大本的訂婚書，一人一本，每次來看我，他都會帶上他那本訂婚書，以表明我們的關係，免生誤會。我從來沒有見過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只聽說過他弟弟在背後批評他哥哥過分順我意。

一年多之後，我聽顧正洪說他父親是漢奸，我想，我不能做漢奸的兒媳婦，立即提出要解除婚約。爲了躲避他，我不斷搬家，換工廠，持續了幾年。無論我搬到哪兒，他都能找到我，後來我知道父親是內奸，給他通風報訊。

他以羊肉酒菜討好我父親，父親後來胃潰瘍，說不定與此有關，但他肯定不是有意害我父親。他又高又帥，皮膚白皙，善良、斯文、坦率，我覺得他是真心愛我，無奈他父親是漢奸。有一次，我父親把刀橫在我脖子上，要逼我和顧正洪結婚。我說，我死也不要跟漢奸的兒子結婚。父親將刀橫在我脖子上威脅我，我把頸脖伸直，讓他砍，嚇得母親向他下跪哭求，說，女兒給你殺了，你也沒有女婿了，他才作罷，放下手上的刀。父親後來因胃潰瘍去世，母親哭得很傷心，我一滴眼淚也沒流。父親去世後，母親安排了一個伯父與顧正洪中午來我家，伯父要他同意解除婚約，揮拳打他胸口，顧正洪即時答應。之後，母親把他送給我的一件我從沒穿過的名貴灰背旗袍（長袖旗袍的夾裏是灰鼠的黑背毛）退回給他。顧正洪家頗有社會地位，正式解除婚約時，報紙刊登了消息，標題是：“青年醫生顧正洪婚變，未婚妻毅然決然提出離婚。”

1937年發生上海8.13事變時，我在滬東的開利織綢廠上班，已經是熟練工人了。8月13日那天早上，父親一大清早出去了。我睡在床上，日本轟炸機投下炸彈，把我床邊的窗玻璃震碎，碎片灑到我床上。我和母親立即跑到樓下躲在樓梯底。沒有父親的訊息，我們匆忙用兩張床單包裹細軟，一人背一個包，沒有從外白渡橋走，因爲逃難的人擁擠堵塞在那。我們邊走邊看到轟炸機嗚嗚地飛過來，投下兩顆炸彈，像生下兩隻蛋一樣，接著是嘭嘭兩聲巨響。看到飛機時，我們找地方躲避，沒有飛機時，我們趕快走，邊走邊躲邊哭，從滬東經過浦東到海對面的滬西小沙渡工人區找同鄉，到達時，父親已經從外白渡橋來到這裏。滬西是英法租界區，又是日本紗廠區，日本軍不會轟炸這裏。不久之後，我找到工作。可是，後來爲了避開顧正洪，我不斷搬家，重回滬東，回到開利織綢廠。



1939年，我參加了托派組織。少數派以鄭超麟、王凡西、樓子春爲首，主張對抗日採取失敗主義。多數派以彭述之爲首，主張抗日。從此，中國托派分成兩個派別。固然，除非組織獨裁，否則有不同意見，就會分裂。我參加後不久，聽同志說，托洛茨基在墨西哥給斯大林的特務謀殺了。

我參加組織，是在開利織綢廠的時候。那時已經解除婚約。開利在楊樹浦，老闆是中國人，抗日時趁機發國難財。我和母親在亭子間住了一段時間。工人要排隊領米，要求不要工資，只要每天一頓午飯，老闆也不答應。當時米價是一元一斗米。在三八婦女節，上海的女工會自己放假，參加大規模遊行。我很積極，在大路上倒著走，在地上寫上標語：“八小時工作，八小時教育，八小時休息！”一個共產黨的男工調侃我：“這還不夠激烈啊！”工友美玲與我一起鬥爭，她的丈夫蔣某是托派，女兒已10歲。蔣某像知識份子，身穿巴黎長衫，帶流氓氣，是織綢廠支部的負責人，五人支部除了蔣某和我，還有織綢廠三個男工，兩人未婚，一人已婚。我討厭他們開會時爭風呷醋，搶著向我獻殷勤。我一本正經，不苟言笑。我參加組織後，自覺地、天真地搞罷工，常常單人匹馬，在工廠籌備罷工，要求改善工人待遇。罷工時，要面對的有廠家的親戚，有走狗，有共產黨，也有托派。

蔣某對我有野心。我參加組織後沒多久，有一次發熱、腰疼，不能上班，臥病在床，美玲來看我，告訴我他丈夫的話，說我“年輕貌美，又勇敢，若有這樣的女子抱在懷裏，多麼窩心”，又說他丈夫說我在某時某地接受了資方金錢，出賣工人。我聽到後，不管生病臥床，立即起來跑到蔣家樓下，破口大罵他，說斯大林莫須有污蔑人，你和斯大林一樣，造謠中傷。蔣某從樓上扔東西下來欲打傷我，我還是大罵。然後我回到家裏對著母親，邊哭邊訴苦。

當時我們住在湯丸店後面的灶披間，時間已經很晚了。就在那時候，一個日本兵推門進來，手裏拿著槍，我看到很危險，一個箭步從他腋下鑽出去，在湯丸店裏裝作是老闆娘招呼客人。日本兵悻悻然離開，店東立即上了排門，樓上樓下全熄燈，前樓住戶讓我躲在前樓床上假裝前樓住客的孩子。沒多久，樓下有人大力敲門，我們不吭聲。一到天亮，母親和我立即逃到滬西，同時我也離開了組織。聽說蔣某後來死於中共獄中。

我繼續在織綢廠搞罷工，組織對我觀察了一段時期，認爲我可信任，又把我找回去。我下班後，會聯絡較爲要好的工人談話。我認識了羅子玲，她哥哥是小織綢廠經理，我影響了羅子玲參加組織，甚至在他哥哥的織綢廠和她一起搞罷工。我做過很多織綢廠，有時候是長夜班，一周上日班，一周上夜班，每班12小時。當我在滬西做一個有幾十個工人的大廠時，我寫信代表工人，要資方改善待遇，接著罷工；幾天後，我懷疑被中國共產黨出賣，我和羅子玲及幾名工友被資方抓進巡捕房。我的30歲生日，在牢獄中度過。我記得四叔送來一碗紅燜羊肉面，慶祝我生日。

有一個叫阿楊的女同志，年紀較輕，廣東人，戴眼鏡，學生出身，香港的體育健將，從香港來上海，沉默寡言，比較呆板。我們感情很好，她很疼我，常帶我遊玩。我在織綢廠上班時，她跟我在新大昌雜貨店的灶披間一起

住，母親煮了飯，她把飯菜送來工廠給我吃，路程挺遠的。我們入獄後，她認為其他同志不關心我們被捕，儘管王國龍勸她不要探監，她堅持要來送飯，結果也被捕。被問訊的時候，警察騙她別人都說了，她太天真，沒經驗，供出了其他同志的名字和住處。她被送進我們的囚室時，只說“我不說你們都說了！”我很氣憤，拉她咬她的鼻子，罵她出賣了同志。鼻子滑，我咬不住。她很快就被釋放了。同志說出獄後，阿楊瘋了，有人看到她一絲不掛拾街上的食物，喝溝渠裏的水。

獄中，五個人一個牢房，除了我和阿楊外，還有同志羅麗萍，同情者尹靜文；先我們入獄的，還有一個吸毒的女犯，毒癮發作的時候大叫大喊。牢房約10平方米，沒有床，沒有水，只有一個坐廁。我接廁所的水來洗臉，沒有換洗的衣服。食物是一股臭味的玉米連渣攪在一起，和一條不鹹的雪裏紅鹹菜。開始我們都不吃，後來餓了，警察把麵包扔進來，把我們當作是狗，我們也沒法，只能撿來吃了。

這次同時被捕的有三個男同志高擎宇、李永爵、劉康，在隔壁的囚房裏。在日本憲兵的指揮下，李、劉飽受酷刑逼供，要供出彭述之等同志的地址，但是他們堅持不說，連施行酷刑的中國警察也稱他們為硬漢子。高擎宇是老師，很斯文，警察沒對他逼供。

警察也沒有向我問口供，有一個警察還逗我玩，把兩隻手放在頭角上，讓我猜他姓什麼，我說“楊”，他說嘻嘻猜對了。獄中度過多久我也不清楚，大概幾個月吧。獄中有一個高級日本軍官喜歡我，出獄時他要約見我，我故意打扮得很醜，不搭理他，他也作罷。有工友為我可惜，說丟了做官太太的大好機會。我不屑一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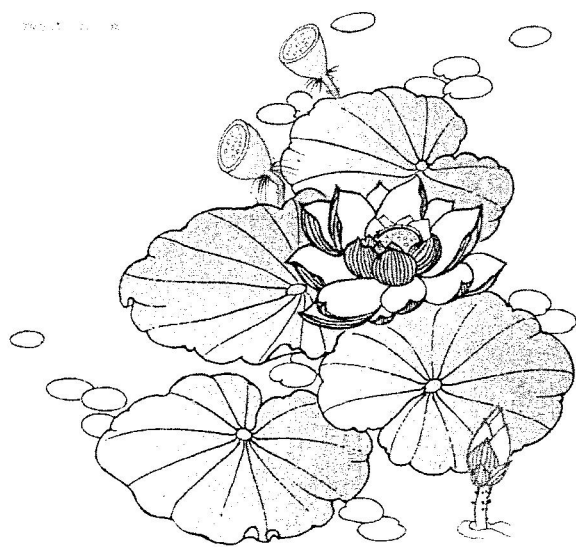
出獄後，由於我到處組織工人爭取權益的名聲太大了，沒有哪個織綢廠願意聘請我，我早上上班，中午吃飯回來，老闆已經不准我進廠了，半天的工資也拿不到。日本投降後，我

還是怎樣都找不到工作。我不到十歲的時候，到姨父鄉下玩，學會打算盤，於是我家自修珠算、會計。接著叔父介紹我到一間工廠做簿記，不久被老闆轉到虞爾雅清路的一品香旅館的中菜部，做正式會計。我要做兩本賬，真假各一，國民黨的官員來查賬，被查的是假賬，票據齊全，一點漏洞都沒有被查出。

1948年，我在廣州患病時，在報紙上看到廣州稅務局招聘會計的廣告，我應聘被錄取，在稅務局做了幾個月會計。

也許有人會認為我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可是我認為自己沒有走錯路。在這自私自利的黑暗社會裏，我受盡折磨，委曲求全。我奮鬥一生的理想，是要實現真正的社會主義，沒有國界之分，沒有貧富之分，只有勞動者是主人，人人平等自由，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沒有剝削，沒有人禍，避開天災，最後進入共產主義，實現真正的社會和諧。

我無悔！



孟浪少年時——我的中學時代

熊安東

一九三八年上半年，濟南一中二百多師生遷移到河南南陽除旗鎮，與從山東各地流亡出來的中學師生成立省立“山東聯合中學”。一九三八下半年“山東聯合中學”遷移到湖北鄖陽，改成“國立湖北中學”。我在鄖陽讀初中一年級下學期。

學生的伙食，由各班選出一名伙食委員組成伙食團管理。一天，我偶然走過伙房，看見幾個伙食委員圍著一籬筐藕啃食，這些藕是做菜用的。我回到班上，氣忿地對我班伙食委員傅迺昭說了一句：“你們真該挨揍！”午飯後，幾個人找到我宿舍來，“你要揍俺！”是個操魯西口音的高中學生，隨著語音一個上來推搡我一把，接著一個打我一拳。同住一室的成德茂、李芸生、張錫縉等快速把我拉開，一位姓沙的魯西同學跑來，連推帶拉地把那幾個人勸走。我初次遭受這樣的屈辱，又氣又恨，從此，我同傅迺昭永遠不再講話。從那時起我同成德茂、李芸生等幾個格外親近起來。

一九三九年初，到達四川羅江後，在學校所在的文廟附近有個籃球場，我們立刻成立了取名“平平”的籃球隊。買了個籃球，定制了印有“平平”字樣的球隊背心。“平平”字型像雙翼飛機，我們挨過日軍飛機的狂轟濫炸，對飛機的印象太深了，我們的球隊也應像飛機那樣威猛。球隊成員：成德茂、李芸生、李玉才、信法鈞、李克成、李毓林、張錫縉、張洪仁、張同祥、王連德、熊安東等十二人。

一九三九年，六中四分校真是個自由民主的園地，學生自由結社，組織讀書會，舉辦各類討論會之風盛行。壁報貼滿山西會館的東牆。還能記住的刊名：《老百姓》、《思潮》、《突擊隊》、《射擊手》、《路燈》、《白火》、《新地》、《戰旗》、《火炬》、《喇叭》、《十月》、《暴風雨》，等等。各類性質的都

十月評論 2012年第2/3期

有，政治的，綜合的，最多的是文藝的——散文、隨筆、詩歌、漫畫等等。方敬老師評論：“你們各種各樣的壁報，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抓住現實，認識真理，都希望自己的筆能跟爭取民族解放的刀槍靈活地配合起來，表達了與時代相呼應的感情和思想。”

“平平”隊員們不甘心只玩球鍛煉身體，我們也出了一份壁報《白火》，物理課上聽老師講過，火焰的白色部份溫度最高。球隊的名稱和壁報的刊名，顯示了我這夥青少年的心態。

我們沒有正式成立讀書會，只商定把每人手中的書刊集中起來，存放在成德茂的一隻竹箱子裏，誰要看書，隨便去取。竹箱子裏多是文藝書：肖紅《生死場》，肖軍《八月的鄉村》，葉紫《豐收集》，范長江《中國的西北角》，斯諾《西行漫記》，巴金《家》，矛盾《子夜》，姚雪垠《春暖花開的時候》，曹禺的幾部戲劇等。社會科學書有艾思奇《大眾哲學》，張仲實《社會科學基本問題》，何干之《中國社會性質問題》，李昂古耶大《政治經濟學大綱》等。矛盾主編《文藝陣地》和胡風主編《七月》兩份月刊不定期地購買。

物質生活是很艱苦的，文廟和城隍廟裏用竹笆木板拼湊起來的寢室，潮濕，陰暗，散發著黴腐的氣息，睡在硬硬的鋪板上，僅只有一條棉被的同學，一半鋪在床板上壓在身下，一半裹在身上。米價飛漲，伙食費只夠維持吃不飽餓不死。李廣田老師在作文課上曾給我們出了個作文題“我們在飢餓中成長”。

我們的精神生活豐富多彩，讀課外書，寫壁報稿，開讀書討論會，歌詠會，上街下鄉抗日救亡宣傳活動等。

方敬老師離開六中四分校兩年後的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三日（正是六中四分校被教育部以“赤化”為藉口撤並時）寫了篇六千多字的文

章，題為《苦難——給一群苦難中奮鬥在奮鬥中成長的孩子》，發表在當時成都一家報紙的文藝副刊上，詳實地記敘了他在六中四分校的所見所聞和他的感受。如今讀此文，塵封了近七十年的如煙往事，彷彿又歷歷在目。他曾參加了我們班的一次生活批評會，也簡要地記錄在他的文章裏：

我又坐在你們的批評會上了。

——近來我們的生活與學習都很鬆懈，督促不嚴，班長先得負起責任來。一個同學“發難”了。

——我的能力不夠，很多事情都沒有做到，很對不起同學，希望大家想個好辦法。

——我看每個人都應該問問自己，看看有沒有不對的地方。

一種難耐的沉默，全都低著頭，好像責備自己，真是孩子，犯了過錯，怕見大人似的，畏怯的不寧的情緒塞滿了你們的心。你們的表情是自疚而難過的，你們，有過錯的或無過錯的，都在默默地懺悔。

——這幾天都欠緊張，比如早晨該早起不早起，上午該上課不上課，也不能只怨誰，大家都有關係，我想也不會是出於有意。過去的不說了，以後要能夠積極地做到自覺自治，制裁還是消極的。

——自然能夠做到積極方面最好，不過我覺得還應該舉出幾個人來負責監察的責任。

大家都贊成這個建議。監察人數決定四人。接著就選舉了，你們不約而同地選出了四個近來懶惰的，他們都不好意思地用手蒙著臉，這好像給了他們最有力的懲罰，自己在痛心地悔改。忽然一個被選者發言了：

——這是我的錯，對不起同學，對不起自己，我發誓從明天……

他顫抖而羞赦地自白著。落後忽然坐下，靠在桌邊，哭了起來。話好像被什麼東西哽塞住了。這孩子至誠的猛省使你們都感動。你們都原諒了他，而且還勸慰他：

——過去的，讓它過去吧。

你們是好孩子，你們知道怎樣把錯誤的小坑填平，錯誤的石子踢開，你們走著，隨時提防著失足。

* * *

在那艱苦的戰爭年代，我們養成了自學自治的習慣，並且能在集體生活中教育自己。

一九三九年暑假後，九月間，童子軍老師鄒紹夷組織三級一班的學生去南山舉行露營活動，三級二班的學生決定偷營，我參加了偷營活動。晚飯後等到太陽落山天黑，我們出城，先隱蔽在山下一農家的院子裏。半夜時分落起了濛濛小雨，我們分成三個組出發。第一組是幾個身體最棒的，負責突擊山頂偷營；第二組埋伏在半山腰接應；第三組安置在山腳下掩護，我被分派在第三組。第一組摸爬到山頂後，發現營地竟沒有站崗放哨的。拔掉營地的旗杆，把放在帳篷外的鍋灶等工具搬了家散棄於山腰，偷營成功。三組人馬在農家小院集齊後回城，雖然全身被雨水淋得濕透，勝利凱歸，心情興奮，虛擬的冒險活動，也夠刺激。

回到學校，顧不上休息，我和尹繼文商量著寫偷營勝利捷報，我執筆寫稿，尹繼文謄抄，趕在早飯前就貼到文廟門口的牆上。捷報的用語用詞，都是從報紙上戰地記者報導中學來的，抄來的。詞句極盡吹噓並表彰自己，矮化加醜化對方。惹惱了三級一班的同學，連帶隊的童子軍老師生了氣，因為他沒有安排我們偷營，說我們“太自由了”！這位老師思想舊派，他把自由理解成任意妄為。

童子軍老師的生氣，使我們三級二班的同學都感受到了壓力，因而產生了意見分歧。邵延儀是第一組的突擊手，幹得最熱火，旗杆是他拔的，他看到老師生氣了，膽怯了，他抱怨我和尹繼文，不應該寫那張捷報，他認為是那張捷報闖的禍。我和尹繼文又加了一層精神壓力，不知如何是好，沒了方向。

李廣田老師教我們兩個班的國文課，關心我們的學習和生活，深受同學們的愛戴和尊敬。想不到他出面召集兩班同學開了個和解會，並為我們草擬了份和解公告，他還徵求我們對公告內容有無不同意見。李老師的一紙和解公告竟使兩個班爭吵得面紅耳赤的問題一笑了之，冰釋了。

這已是七十年前的事。李老師在文革時期慘遭迫害致死也已四十年了。在《李廣田散文集》第三冊裏，我發現收有他寫的那篇和解公告的草擬稿：

“有露營者則必有偷營者，有防守者則必有攻取者，否則守營者獨居荒野而問津無人，當復有何趣味？況成敗乃兵家之常事，戰勝者不驕，而敗者勿自餒也。此次三級一班露營，三級二班偷營之後，又復誇大其詞，其用意原在引起偷營之興趣，言詞雖未盡屬實，而對三級一班同學，實未存絲毫侮慢之意，況我三級一、二兩班原屬兄弟之國，今乃互為假想之敵，聊作鬩牆之戲，熟長熟短，何足道哉！而今而後，仍當親愛精誠之精神，共相扶持，互為砥礪，有敢侮我者，共先外禦之。”

李廣田老師寫此稿時三十三歲，我時年十七年。如今八十五歲，重讀並抄錄老師此稿，反躬自問，深感當時老師用心良苦，措詞婉轉，“誇大其詞”，“未盡屬實”，“未存絲毫侮慢之意”，像是孩子犯了過錯後得到父母的原諒，又得到撫慰，心境慚愧又自責，牢記老師的諄諄教導，樸實做人。

一九三九年暑假前，教育部派了位叫孔敬
十月評論 2012年第2/3期

庵的督學到六中四分校查思想，來做“思想之糾正”，怎麼糾正不得而知，只聽到李廣田老師在課堂上說：“他是來裝貓變狗的”。暑假後，又派了一位督學由校本部校長陪同來四分校視察，召開老師座談會，指責李廣田老師在課堂上不按照教育部規定的教材講課而專門教授高爾基和魯迅的作品，等等。召集幾名初三學生談話，問一位學生：“你信仰資本主義還是信仰共產主義？”“我信仰三民主義”。“為什麼信仰三民主義？”“因為三民主義是救國主義。”這位思想進步的初三同學巧妙地套用了國民黨官方的宣傳口號，使這位視察員緘口。

教育部先後兩次派員視察之後，國民黨中央訓練團調六中四分校孫校長到重慶，以“縱容左翼師生”為藉口扣留，要他接受檢查。經四分校師生向教育部嚴正抗議，十一月底孫校長平安返校，全校師生開了個盛大慶祝會，特定名為“孫校長受訓畢業返校歡迎大會”，孫校長在大會上講述了他在重慶遭受到那些無理由的控告和莫須有的指責，“左傾”、“赤化”帽子一大堆。我們聽了，感到無比憤慨。一九三八年我在湖北鄖陽時，就聽說那末一股守舊勢力，用“左傾”、“赤化”等流言蜚語攻擊和誣詆濟南一中的師生。腐敗無能又想保住既得到利益的各層官員們看來，自由民主就等同“左傾”、“赤化”，像幽靈一樣地使他們感到恐怖。

一九四〇年初，教育部撤銷了孫校長的職務，由教英語的丁老師當校長，他是位死抓住學生課業不放手的老師。跟他學英語，只有死記硬背，勤讀勤寫，不然，在課堂上只有挨訓挨罰站的份，我就挨過一次，一個詞的音節念錯了，“你站在那裏吧！”一直站到下課為止。

托派（中國共產主義同盟）同學是受閔子桂老師思想影響的，同學們中很多人都知道。在課堂上，他們和同學們一樣地聽閔老師講解社會科學理論知識，在課堂外，和我們不同的是他們從閔老師那裏得到更多的思想指導。他們成立“真理讀書會”作為外圍組織，在初二、

初三和初中畢業後升入綿陽六中校本部讀高中的各班級中都有會員，共約五十多人，兩地都出壁報，羅江是《思潮》，綿陽是《黑白》。

一九三九年底，四分校學生有了共產黨小組，當時，我不知道是方敬老師發展的，只知道與我同年級的劉守身，低我一年級的張繼乾，石仁厚三位共產黨同學活動很積極，他們在初一和本地四川學生班中成立“野火讀書會”作為外圍組織。初二和初三的劉公寬、李存業、蘭善達、楊鎮畿、薑渭微等受共產黨同學的影響，成立了“十月社”，出壁報《十月》。

受托派同學及共產黨同學活動的影響，一九三九年底我認真地讀了《共產黨宣言》、《國家與革命》等幾本馬列的著作，為的是弄明白共產主義到底是怎麼回事。讀之前，我曾以為馬列理論書一定是深奧難懂，讀之後，才知道馬列的書不難理解。讀了馬克思列寧的理論書，明白了資本主義剝削的非正義性，資本制度把人異化成了為資本增殖利潤的動物。在那戰爭的年代，容易接受他們的學說，相信只有經過社會主義革命，實現了社會主義才能根除戰爭。到了社會主義社會，沒有了剝削，沒有了壓迫，人人自由平等，每個人都獲得全面發展。我信仰了馬克思列寧的共產主義學說。

一九四〇年初，共產黨同學劉守身常到我住的寢室來，找李玉才、成德茂、李芸生、信法鈞等談話，他知道我們“平平”球隊的幾個人恩想進步，傾向共產黨。我們幾個人對他也表示好感。有一次，他送來了《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他說：“這本書很重要，很全面，它發展了馬克思主義，讀了這本書，才能懂得什麼是列寧主義。”他說：“馬列的著作，我不用看，就相信是正確的，在蘇聯不是都實現了嗎。托派們讀馬克思列寧的書，他們懂個屁！他們只會反馬列、反蘇反共、他們就想在蘇聯復辟資本主義。這本書一定要好好的讀一讀。”等成德茂、李芸生幾個人讀過之後，我讀了劉守身介紹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

又讀了他拿來的一本康生寫的小冊子《鏟除日寇偵探民族公敵的托洛茨基匪徒》。我不相信閬老師和托派同學會是匪徒，我不明白共產黨人為什麼把陳獨秀說成是漢奸。我很想知道托洛茨基派是怎麼回事。

一九四〇年暑假前，我在羅江縣民眾教育館的圖書館隨便查看圖書卡片時，無意間發現有《托洛茨基自傳》，我借了出來。信法鈞、李芸生知道了，責備我，“怎麼看這種書，不要看！”語氣是認真的。“不看怎麼知道他的不對呢”，我講的也是實在話。

與我同年級不同班的杜文林知道我讀《托洛茨基自傳》是想瞭解托洛茨基是不是反馬列，他主動把托洛茨基著作介紹給我，我早就知道他是“真理讀書會”的會員。他性格內向，待人態度和善誠懇。一九三九年上半年，他一個人辦了一份壁報，不貼在校內，而是貼在街頭的牆上，向民眾宣傳抗日救亡。他勤奮認真，星期日，他一個人自寫自編自畫，忙一個上午，一星期出一期，堅持了很長時期。

一九四〇年暑假前後的兩個多月裏，我讀了托洛茨基的《兒子、朋友、戰士》，《中國革命問題》，《不斷革命論》，《十月的教訓》，《蘇聯現狀與前途》，《在新的世界大戰之前》等幾本書。杜文林還給我看了抄在練習簿上的幾篇文章：《德蘇協定的前因後果》，《蘇芬戰爭》，《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之路》等，都是閬子桂老師的筆跡。

讀了托洛茨基的書和文章後，知道了一個過去不知道也不理解的托洛茨基。與《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裏講的正相反，托洛茨基認為斯大林叛離了俄國十月革命的傳統，敗壞了列寧的蘇維埃民主制，背叛了共產國際的國際主義使命，使第三國際名存實亡，對於俄國十月革命後的蘇聯脫變出斯大林官僚獨裁制，托洛茨基的分析批判是很有說服力的。讀了托洛茨基的書，瞭解了他是為了捍衛馬克思列寧界定的社會主義世界革命而反對斯大林特權體制。

斯大林體制打著社會主義的旗號敗壞社會主義信譽，而有會導致資本主義在蘇聯復辟的危險。

讀托洛茨基書的同時，我讀了法國著名作家紀德寫的《從蘇聯歸來》和《從蘇聯歸來答客問》兩本小冊子。他寫的《剛果旅行記》，我早已讀過了，他記述了在殖民主義者的野蠻掠奪和殘酷剝削下，剛果人民的悲慘災難生活。紀德同情受壓迫的窮苦人民，認識了現代社會制度而痛恨資本主義，痛恨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因而轉向了信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他對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後建立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這樣一個新的社會制度懷有崇敬心情，一九三六年他應邀參加高爾基葬禮的機會，到蘇聯旅遊參觀訪問，到處都受到熱情周到的接待。他親眼看到和感受到的蘇聯現實，與親蘇人士宣傳和吹捧的蘇聯，完全是兩樣的。回國後，他寫了《從蘇聯歸來》，如實地記述了在蘇聯的所見所聞，沒有盲目地歌頌和唱贊美的詩，使親蘇人士感到失望，他們原來打算借用紀德的名人效應，撈點宣傳蘇聯的本錢。紀德又寫了《從蘇聯歸來答客問》，回答親蘇人士對他的指責。紀德明確地告訴人們，斯大林的蘇聯沒有實現列寧的社會主義，他看到舊世界的特權在蘇聯披著社會主義外衣還魂。因之，紀德遭受到法共和親蘇人士的陰險毀謗。我相信紀德是正真的人，他對蘇聯社會實況的考察和描述，證實了托洛茨基對蘇聯現狀的分析和判斷。

我信仰馬克思列寧，也信仰了托洛茨基。

一九四〇年暑假後，我同“平平”球隊的李芸生、成德茂、信法鈞等分了手。他們堅信《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相信斯大林繼承和發展了的馬列主義才是真正馬克思主義，他們相信蘇聯已經實現了社會主義，他們跟共產黨走，為實現蘇聯那種社會制度而奮鬥。僅僅一年前的一九三九年，我還是懵懵懂懂地和他們一樣地相信斯大林是列寧的學生，把斯大林同十月革命聯系起來敬仰和崇拜，只因我讀了托

洛茨基的書，我的思想認識起了變化，我信仰馬克思列寧的共產主義原理，信仰托洛茨基的觀點而成了托派思想的人。

當時的思想進步同學，都是在那艱苦的戰爭年代把謀求個人的生存和國家民族的命運聯系起來而睜開了眼睛的青少年。國民黨屢遭軍事失敗，政治黑暗，貪污腐敗，官商勾結大發國難財，通貨膨脹，米價飛漲，直接影響到我們的生活。我們思想早熟，對現實不滿，為追求真理，為實現信仰而選擇了各自的道路。有的去了延安，有的回到敵偽佔領的山東家鄉去打遊擊，有的到重慶進入工廠，當工人，在那裏經受鍛煉，投身工人運動，求索中國革命的新路。

一九三九年冬，托派真理讀書會的孟憲章、楊壽元、曹慶華、孫鴻智等十多名同學離開學校去重慶時，我還不是托派，是事後知道他們去進工廠當工人。孫鴻智因吃不消苦一個人又回到學校讀書。

一九四〇年暑假，六中校本部三青團放火燒房，嫁禍於人，迫害進步師生，又有第二批托派真理讀書會員離校去重慶，他們有範文華、蘇學常、康至泉、劉志超、陳汝霖、任玉璽等十多位同學，大都進工廠當工人。他們離校時，我正在讀托洛茨基的書，對托洛茨基派的活動，稍有所瞭解，他們棄學走向社會的實踐活動，對我的思想影響不小。

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變”，國民黨發動第三次反共高潮，羅江有捕人的傳聞，三位共產黨同學劉守身、張繼乾、石仁厚迅速撤離學校，受他們影響的劉化生被逮捕。藺善達、肖力山、信法鈞、成德茂、李芸生、楊鎮畿、呂登州、朱靜英等十五名思想進步學生被迫離開四分校。三月，從一分校調來三十多名三青團學生，四分校建立了三青團區隊。教育部派來一位年輕的女音樂老師指導三青團活動。這位女音樂老師不教唱抗戰歌曲，專門教唱些迎合青少年萌動心情的情歌民歌，例如：“千盡流

水／萬裡長江／煙波一片茫茫／離情別意隨波流去／不知流到何方”。自從這位女音樂老師來校後，只要有人高吭：“……呵，姑娘／你是天上的月／我是那月邊的寒星／你是池中的水／我是那水上的浮萍／你是……”，《夜豐歌聲》立即變成多人的大合唱。自從這位女音樂教師來校後，抗戰歌曲不時尚了，彷彿這位女老師的音域承受不住那雄壯，悲憤的《義勇軍進行曲》（即現在的國歌），承受不了那粗狂勇猛的《大刀進行曲》。以後我在六中讀高中部時，一位男音樂老師也是教育部派來的，他也不教唱抗戰歌曲，教唱些修身養性的歌曲，例如：“坐臥廣廈中／不愁炎熱風／行立大樹下／不怕烈日烘／廣廈大樹蔭蔽吾／吾心感謝伊／如何感謝伊／立志圖奮起”。盡教唱些忘卻戰爭，好像生活在太平盛世的歌曲。陳翔鶴老師曾說過，成都的中學裏，國文課念文言文不教白話文，音樂課不唱抗戰歌曲。

一九四一年五月，國民黨羅江縣黨部派軍警包圍了四分校，逮捕了韓梅村、田裕恒、張潔民、南成美、張錫縉、隋超、劉宏讓、王守先、胥正華、張宗武等二十多名進步學生，關押了四個多月，杳無證據，由四分校新校長丁用賓老師做保獲釋後，大都離開了學校，多數人去了北方。他們中的幾個人欲去延安，行經寶雞時被扣留，關在當地警察局看守所裏，他們自稱是打算回山東老家的學生，寶雞方面曾有公函寄到學校求證，我聽教地理課的萬禹疏老師講，他建議學校出公函保他們出來。這幾名學生中的劉宏讓是萬老師在山東時的學生，“七七事變”後投筆從戎，他所在的部隊參加了南京保衛戰，南京潰敗後，他在浦口隻身扶著一塊木板渡過長江，他輾轉到徐州，打聽到山東流亡學校的去向，他又追趕到河南找到了他原來學校的老師和同學，到了四川分配到四分校讀書。他平時總是少言寡語，有時他講起參加南京保衛戰的事，他總說：“當局沒有抗戰決心，一會說與城共存亡，一會又說保存實力，

十月評論 2012年第2/3期

撤退，能不潰敗！”我不知道他讀過什麼進步書刊，我認為他同共產黨同學少來往，同托派同學也少來往。一九四一年五月他同許多思想進步同學同時被逮捕，大概促使他思想激變，決定投奔共產黨去。

一九四一年十月和一九四二年二月，國民黨特務先後兩次破壞重慶托派組織——中共同盟四川地委會，逮捕了兩名主要領導人梁貽，王振華和在工廠裏做工，從事工人運動的六中學生楊壽元、曹慶華、張洪仁、杜文林、任玉璽、趙鳳田等十人，他們在六中四分校讀書時，都是真理讀書會員。

一九四二年二月，國民政府教育部以“赤化”為藉口，撤併了六中四分校。在校師生被併入六中二，三分校。

* * *

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三年，我在梓潼六中一分校讀高一，在綿陽六中校本部讀高二和高三。高中畢業後，一九四四年初離開綿陽去重慶。

梓潼一分校，是國立六中的師範部，國民黨和三青團在學校裏有嚴密的控制力量。為了甄別和監控四分校和二、三分校的初中畢業生，特開設了高中部。訓育主任宋東甫是個國民黨黨棍，他嚴禁學生閱讀進步書刊物，不准學生組織社團，班會和學生自治會也不許成立。他明查暗訪被認為思想有問題的學生，還佈置三青團學生採取盯人戰術。他對學生訓話時，除了“國家至上”，“民族至上”，“一個主義”，“一個領袖”之外，他講不出什麼貨色。在訓話中一旦提到蔣介石的官銜（“委員長”或“總裁”）時，規定學生們都要肅立立正。再次提到，學生們要再次肅立立正。他的訓話就成了領袖崇拜馴猴戲。

認為有問題的學生，被叫到他的辦公室，輕則警告，重則離校，否則有被拘捕的危險。一九四一年暑假前後，一些在初中讀書時與共

產黨劉守身、張繼乾有交往的同學悄聲地離開了學校，其中有與我很友好的張同祥，走前，他告訴我，他被宋東甫叫去，受到了警告。

托派真理讀書會的李麗亭、隗寬、王學誠、單松岑、王香臣、張洪仁、杜文林、蔣復學等十名學生被迫離開了學校，他們大都去重慶進入工廠當工人。留在學校裏的真理讀書會員有王元勛、曹玉林、李安民、姜桂林、習長堯、劉錫佑、王春祿等十人，表面上我們停止了相互間的交往。爲了保護我們手頭上的社會科學理論書，主要是馬恩列托的書，我們把一部份藏在肺病隔離療養室的病床下，王元勛害肺病，住在那裏療養。另一部分，由曹玉林和李安民設法攜帶到城外，用桐油紙包好，藏在山廟的神座下，埋在古墳的磚縫裏，塞進南山塔的牆裏，爲此，損壞和丟失了一部分。

在梓潼被甄別，整訓了一年，一九四二年初，教育部把一分校從國立六中獨立出去，成立國立梓潼師範，爲川北地區培養師資，高中部的學生歸併到綿陽六中校本部。一聽說這個消息，我們的心情像獲釋的囚犯，不等學校正式宣佈，我們就立即打好背包，迅速離開梓潼，徒步直奔綿陽，兩地相距一百一十華里。蔡校長立在校門口，看著我們毫無留戀之情的離校而去，一副無可奈何的苦笑樣子。我走過他面前時，還向他鞠了一躬，我不知道對他說什麼好。在山東時，他是濟南第一師範校長，我父親在他那裏教書還曾兼任過教務主任。我就在他們師範學校的附屬實驗小學讀書，小學老師都是他們學校的畢業生。蔡校長是我小學老師的老師，又是我父親的朋友，我向他鞠躬告別，出自敬仰之情。我們對梓潼一分校沒有好感，主要是對訓育主任宋東甫沒有好感，國民黨黨化教育的一個官僚。還有一個原因，我們不相信教簡易師範的老師能教高中，而綿陽六中校本部是正規高中部，那裏聚集了山東時就有名望的高中老師，學生總是崇敬名校名師。

國立六中校本部的校址位於綿陽城外西北

部，是利用一家停辦的針織廠房改建和擴建的，大部份是磚瓦平房，新建的房子都是土牆草屋頂。校園圍牆外是農田和爲農田灌水的小溪。初春，學校就座落在金燦燦的油菜花的海洋中。校門朝北，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時剛剛修建好的川陝公路在校門前經過，川陝公路聯結西北公路通到新疆，是抗日戰爭時期兩條國際通道之一，抗戰初期，蘇聯援助國民黨政府的軍用物資，經這條通道源源運來。另一條國際通道是一九三九年才建成通車的滇緬公路。一九四一年蘇德戰爭爆發後，蘇聯自顧不暇，無力援華，美國援助國民黨政府的軍用物資，即從滇緬公路運進。

我們到綿陽後，校本部的葛校長即把我們召集起來，在訓話中講到：“……我是教育部派來的，你們要聽我的話，要好好念書就行，不好好念書，開除！……”我們都是流亡學生，都以學校爲家，被開除，首先就是沒有了飯吃。抗日戰爭時期，在中日兩方的交戰區和敵佔區，有許多中學生流離失所，國民黨政府在它統治的西南地區，先後成立了二十三所國立中學收容這些學生，爲抗戰建國培植人材。我早就聽說，這位葛校長在國民黨政府裏有後台，才撈到了國立六中校長一職。他治校的方針是校黨團一元化，他樣樣都要抓，樣樣抓而不緊。他知道禁止學生看進步書刊是難於辦到的，因此，他提出“要引導學生思想走上正規”，“要進行心理建設”，“要思想之糾正”，他的具體辦法是命令各課老師增加學生的課外作業和多舉行不定期的抽考。繁重的作業，天天備考，把學生的精力和時間捆牢。

一九四一年十月和一九四二年二月，重慶的托派組織遭國民黨特務先後兩次破壞後，我們與重慶暫時失去了聯系，我們決定讀完高中考大學成了一股動力，我們做到了好好念書，上課時專心聽老師講課，勤記筆記，課後及時把作業做好，從容不迫應對抽考。星期日和暑假寒假，我仍有時間讀想讀的課外書刊。

我讀高二和高三的一九四二年和一九四三年，中日戰爭和第二次世界大戰，都演變到了轉折點。日本偷襲珍珠港，美英對日宣戰，蔣介石國民黨政府對日本侵華戰爭消極地應戰四年之後，才跟在美英屁股後頭正式對日宣戰。把中國人民抗日救亡爭取民族獨立的戰爭拼入了美英與日本爭奪亞洲和太平洋地區控制權的帝國主義戰爭。在歐洲，德軍打敗英法聯軍，法國投降，英軍撤出西歐大陸後，希特勒拋棄德蘇互不侵犯條約，德蘇戰爭爆發，斯大林祭起了反納粹法西斯主義的國際統一戰線，蘇聯同英國簽訂了對德戰爭協定，一九四三年宣佈解散第三國際，與美英結盟，斯大林、羅斯福、丘吉爾三巨頭召開了佔勝德國、瓜分勢力範圍的德里蘭會議。

一九四二年初，重慶《大公報》發表了陳獨秀《戰後世界大勢之輪廓》一文（未登完待續），立即遭到中共《新華日報》的毀謗，連在國共兩黨之間持中立姿態的《大公報》也受到了指責，因此沒有再發表未登完的續篇。五月陳獨秀病逝。他沒有看到蘇聯軍民取得莫斯科保衛戰的勝利之後，又續在南方戰場幾次大決戰中，全面擊潰德國侵犯軍，取得了衛國戰爭的勝利。第二次世界戰爭的結局改觀，戰後出現了美蘇兩個集團的冷戰對峙局面，人類被推進了核戰毀滅的威脅中，是當時任何人都料想不到的。

第三國際解散，重慶國民黨報紙上掀起了一陣反共喧囂：“解散共產黨，取消邊區”等等。在川陝公路上跑汽車的司機帶來消息：國民黨調集了幾十萬大軍包圍了陝甘寧邊區，局勢很緊張。

我們不知道上海托派對中日戰爭的性質和對蘇聯的性質的看法，有了意見分歧而發生了分裂。我們仍然按照列寧關於民族與殖民地的觀點理解中國抗日戰爭的進步性質，按照托洛茨基關於蘇聯是墮落的工人國家的觀點理解蘇聯衛國戰爭的正義性質。列寧的書在重慶、桂

林、成都等大城市的《新華日報》門市部或生活書店能買到，托洛茨基的書已無處可買，我們手頭的幾本經多人閱讀和藏放保管不善等原因，都已破損，曹玉林決定手抄一份出來。

在學校教室裏抄不方便，怕引起三青團他們的注意。沿公路走十多里路，路邊有一家供過客歇腳吃茶的小店鋪，每逢星期日，我陪他去那裏，他抄書，我做功課，同時留心公路上的動靜。我們陸續抄了好多個星期日，初去時老闆娘餵養的一群毛絨絨的雞雛在我腳邊跑來跑去，我還特意帶點吃的撒地上看它們爭食。曹玉林抄完《蘇聯現狀與前途》和《不斷革命論》兩書時，那群雞雛已經是羽毛齊全的童子雞，散養在屋後的竹林裏，看小公雞跟小公雞爭鬥很有趣。

一九四三年暑假我們得到好消息，一九四一年重慶托派組織遭國民黨特務破壞，被捕的同學有部份人獲得釋放，並安排他們到指定的學校讀書。張洪仁去三台國立十八中，楊壽元去閬中國立四中，張聖時去江津國立九中，杜文林去沙坪壩中大附中。同時也知道經歷了那兩次破壞未被捕仍堅持下來的同學，又重新組建了重慶托派組織。

一九四三年底高中畢業後，我、曹玉林、習長堯、王春祿決定去重慶，姜桂林、楊承志、王元勛、劉錫估去成都。



Both Hu Jintao and Xi Jinping Need to Maintain Social Stability

Zhang Kai

On 8 November 2012, Hu Jintao presented a report, entitled “Firmly March on the Road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Strive to Complete the Building of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in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e appealed to the capitalist countries that China has implemented market economy for over the past 30 years. In fact, China has legalized the protection of private property, which led to the enlarging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social conflicts, class polarizations and struggles. There are escalating tensions between party cadres and ordinary people. These are the inevitable consequences of China’s adopting of a capitalist road. If it is what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means, then it implies that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quals to capitalism, and contradicts obviously Marxist Socialism.

China under the rule of Hu and Wen

When Hu took power, he urged that CPC should adopt ‘people-centered’ policy, bear people in mind, and fulfill what people desperately need. But he has not carried out what he promised during his rule. Every year, he repeated the same things: “we must be keenly aware that there is still much room for improvement in our work and there are a lot of difficulties and problems on our road ahead. They include the following: Unbalanced, uncoordinated and un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mains a big problem. ... Many systemic barriers stand in the way of promoting development in a scientific way. The tasks of deepening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changing the growth model remain arduous. The development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between regions is still large, and so are income disparities. ... Some community-level Party organizations are weak and lax. ...Some sectors are prone to corruption and other misconduct, and the fight against corruption remains a serious challenge for us. We must take these difficulties and problems very seriously and work harder to resolve them.”

In order to maintain social stability, China has spent tremendous money. Social instability, embedded in popular discontents, is exactly a consequence of promoting autocratic, bureaucratic and capitalist system by CPC. Whenever the premier Wen Jiabo proposed for limited political reform, he was rejected by the conservatives within the Party, as it would destroy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rivileges of the bureaucratic interest blocs.

In section 5 of Hu’s report, it states that “we should separate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from the management of enterprises, state assets, public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But it does not mean that the Party should separate from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So the Party is still in super power and the Party cadres can do whatever they like. Although the people are supposed to be ‘the master of the country’ who own the power of supervision, it is only true on paper.

Today, what Chinese people urgently need most is political democratic reform. During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CPC, official media such as the Community of Powerful Country of People’s Net conducted a survey on top ten social issues of concern. 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first was “democratic politics”, 32.4%, followed by others such as ‘anti-corruption’, ‘social livelihood’,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1] It is reasonable as it is proved by people’s truthful experiences. The

social problems have led to more and more massive struggles. The number increased from 58,000 cases in 2003, to 90,000 cases in 2008. Afterwards, there was no more official record. But according to Professor Sun Liping of Tsinghua University, there must be at least 180,000 cases in 2010. [2]

After Xi Jinping took power

In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Xi Jinping was elected to be the general secretary of CPC and the chairman of CPC Central Military Commission. He declared that “empty talk is useless, only hard work can achieve the revival of a nation”. It seems that he will not give any empty talk. He also said that China would continue the policy of reform and open door, but there should be new explorations. Moreover, he claimed that it must fight against corruption, “if corruption gets worse, it will undoubtedly kill the party and ruin the whole country”, “do not think of making profit by being an official, and even take privileges by abusing power, as bureaucracy will be an absolute outcome.” He takes a strong stance on party governance, “no organization or anybody can be above the constitution and law”. However, this kind of privilege has existed for a long time. Everybody knows it. If he cannot abolish it, that means he gives empty talk as well.

Actually, corruption is very serious in today's China. Anti-corruption implies that officials have to challenge their own interest groups. The situation gets worse even though some CPC leaders and resolutions made several anti-graft calls. A few corrupt officials were punished as they became losers in the power game. Particularly when capitalism becomes prevalent, officials and businessmen conspire, and lots of cadres become businessmen, the anti-graft campaign would obtain no achievement. The newly elected leadership laid out some concrete anti-graft policies and punished a number of corrupt officials. But corruption is everywhere and becomes institutionalized. Only if the whole bureaucracy and its privileges are completely destroyed, the people of the whole country can be the real masters.

Xi claimed that he continued to adopt the policy of capitalist market economy which led to problems such as conspiracy of officials and businessmen and corruption getting serious. In that sense, China will become unstable and CPC needs to pay a high cost of maintaining social stability.

He mentioned about ‘new explorations’ but he has not talked about the concrete contents after one month in office. Later, during his visit to Guangdong, Xi called on the entire Party and people from all ethnic groups to unswervingly adhere to the path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put greater focus on pursuing reform in a more systematic, integrated and coordinated way. Xi vowed no stop in reform, and no stop in opening up. Xi urged to work hard to build the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and to push forward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He stressed that CPC should dare to tackle difficulties and venture along dangerous paths to break through barriers to reform presented by ideological differences and vested interests.[3]

Will Xi's new calls and promises come true? Particularly can the last statement be carried out and not be empty talk? We do not have any illusion about this. Let the people wait and see.

20 December 2012

Notes :

[1] quoted from *Apple Daily*, 19 Nov 2012.

[2] the figure is quoted from Pan Xiaotao, “Historical Status of Hu Jintao”, published in *Ming Pao*, 14 Nov 2012.

[3] Xinhua' news in *Wen Wei Po*, 11 Dec 2012.

十月評論 2012年第2/3期

The Truth of Li Wangyang 'Being Suicided' Is Partly Disclosed

Jun Xing

This year, on 16 June, Zhang Kai wrote, "the sudden death of Li Wangyang, a committed activist of Democratic Movement of 1989, proves that the local bureaucracy ignores law and justice. The local authorities announced that Li hanged himself in the hospital. But there were many doubts. ... The local authorities forced his sister to agree to quick cremation. This obviously violated the new Criminal Procedure Law that forbids forced confession and evidence elimination" (see "Postscript" of 'Comments on China's New Criminal Procedure Law', Issue no. 232).

Afterwards, the official authorities announced that Li Wangyang's sister, Li Wangling and her husband, Zhao Bozhu, agreed to the autopsy report and signed, to apply for cremation, and to write an open letter stating there will be no further communication with the outside world.

Nearly 100 days after the doubtful 'suicide' of Li Wangyang, a reporter of *Ming Pao* broke through barriers to interview Li Wangling, Zhao Bozhu and Yin Zhengan (Li Wangyang's good friend) in Shaoyang City of Hunan province. Zhao testified that they had not taken part in any investigation or signed any autopsy report of suicide. Their statements clearly contradicted the official reports.

The report asked them if the signed documents were fake. Zhao replied that they were requested to sign something that looked like a medical report. "We saw it, but we did not understand those medical jargons ... Anyway, we signed at last, but could we say no at that moment?" And, they declined that they wrote the open letter.

During his visit, the reporter's telephone was suspected to be tapped. Worse still, he was continuously interrogated by the police as he was in detention at the hotel for 44 hours. The authorities also arranged 'an interview' under the surveillance of officials. They brought Li, Zhao and Yin to the hotel, then asked the reporter to do an interview. The officials took the video-recording. Zhao was very nervous and said again, "don't talk again any more the past" (quoted from *Ming Pao*, 12 September).

The above all shows that the authorities made fake documents, cheated the public, violated the law, and repeated mistakes.

Professor Wang Youjin, a mainland legal expert, remarked that the statements of Li Wangling and her husband are key proofs, which fundamentally denied the official report. This already justified starting a new investigation.

Despite the public challenges, Hunan provincial authority investigated the case and finally stated that Li Wangyang committed suicide. This showed that within the traditional bureaucracy, what the Shaoyang City authorities did was normal practice. But it violated the reporter's human security and interview freedom and endangered press freedom. *Ming Pao* strongly protested and complained to Hong Kong News Executives' Association, HKSAR, Liaison Office of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LOCPG), and Hong Kong and Macao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of PRC. They require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o investigate into the 44-hour detention of two reporters and guaranteed that it would not happen again.

Despite its stance of pro-Beijing,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Journalists expressed the same concerns to LOCPG which later replied that they would direct Hong Kong opinions and requests to the mainland authorities. Lee Cheuk-Yan, chairman of Hong Kong Alliance in Support of Patriotic Democratic Movements in China, went to Geneva to see the UN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He submitted at least 20 reports of Li Wangyang's case prepared by Hong Kong organizations and council members, in order to draw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to require Chinese government to conduct an investigation with independence and justice, to punish the officials who violated the law, to compensate Li's family, and to take precautions against relevant crimes.

We completely support the above requests. We also request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must immediately disclose the truth of Li Wangyan's death, ensure human security and freedom speech of Li Wangling, Zhao Zhubo, and lawyers, and guarantee that they will not be suppressed afterwards.

27 September 2012

Hong Kong

- 2 CY Leung should step down due to his hypocrisy and misrule.....Zhen Yan
 4 HKSAR should immediately issue free TV license for defending freedom of press.....Juan Di
 5 Some comments on 2012 LEGCO Election.....Wei Bo
 LEGCO member Leung Kwok-Hong's Report to the Public (reprint)

China

- 8 Both Hu Jintao and Xi Jinping Need to Maintain Social Stability.....Zhang Kai
 10 Who controls 'chicken', 'milk', and 'soy bean' in China?.....Po Mi
 12 60 Anniversary of Repression of Chinese Trotskyists in the Winter Solstice of 1952.....Yi Cu
 14 The Truth of Li Wangyang 'Being Suicided' Is Partly Disclosed.....Jun Xing
 15 Some selected poems of 'We are all Li Wangyang' Poems (reprint)

International

- 16 How the people pay for the crisis?.....Henri Wilno
 18 Japan's dangerous legalization on nuclear armament.....Zhao Jing
 21 The war of drone.....Zhao Jing
 22 As mining conglomerates target Haiti, Latin America rises against them...Roger Annis & Kim Ives
 26 Indonesia: Hightide for the Indonesian workers movement.....Zely Ariane
 27 Pakistan: Factories more like death trap than workplaces, workers treated more like slave than
 human beings.....Nasir Mansoor
 28 Spanish State: Feminist practice in the 15-M movement.....Sandra Ezquerria
 35 Nepal: One divides into two – Nepal's Maoists in crisis.....Alex de Jong
 43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Latin American Unity.....Zbigniew Marcin Kowalewski
 49 Keynes reloaded? Keynes and Climate Change.....Thadeus Pato
 --

Profile

- 51 Ernest Mandel and the Marxian Theory of Bureaucracy.....Charlie Post

History

- 67 The Comintern and the GPU: The Attempted Assassination of May 24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Mexico (August 1940).....Leon Trotsky

Memory

- 90 I persist with no regrets.....Guoying
 96 My life as a high school student.....Xiong Andong

Article in English

- 104 Both Hu Jintao and Xi Jinping Need to Maintain Social Stability.....Zhang Kai
 106 The Truth of Li Wangyang 'Being Suicided' Is Partly Disclosed.....Jun Xing

十月評論

October Review

第39卷第2/3期 (總第233期)

2012年12月31日出版

- 香港 2 梁振英無誠信和施政不當，必須下台.....振言
4 維護新聞自由，港府須速增發免費電視牌照！.....涓滴
5 立法局選舉簡評.....微波
6 平民議員 向您交待(轉載).....長毛梁國雄
- 中國 8 胡錦濤習近平主政都需要維穩.....張開
10 誰在操縱中國的‘種雞、奶牛’和‘大豆’？.....破謎
12 壬辰冬至六十周年.....一卒
14 李旺陽「被自殺」真相部份揭露.....軍行
15 《我們都是李旺陽》詩刊選篇(轉載).....
- 國際 16 人民是如何為金融危機買單的.....亨利·威爾努
18 在礦業集團覬覦海地時，拉丁美洲起而反對他們.....羅傑·安妮絲、金·艾夫斯
21 日本邁向核武裝的危險立法.....趙京
22 無人機的確煙.....趙京
26 印尼工人運動的高潮.....澤里·阿麗亞娜
27 巴基斯坦：工廠更像死亡陷阱而非工作場所，工人更像奴隸而非人類.....納西爾·曼蘇爾
28 西班牙5月15日運動中的女權主義實踐.....桑德拉·厄茲庫俄拉
35 一分為二：尼泊爾毛派的危機.....亞曆克斯·德容
43 社會主義革命和拉丁美洲統一.....茲比格涅夫·馬欣·考瓦勒斯基
49 回到凱恩斯？凱恩斯和氣候變化.....塔都·帕托
- 人物 51 埃內斯特·曼德爾和關於官僚體制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查理斯·坡斯特
- 歷史 67 共產國際與格柏烏-----5月24日的行刺企圖和墨西哥共產黨.....托洛茨基著
- 回憶 90 我無悔!.....馮英
96 孟浪少年時——我的中學時代.....熊安東
- 英譯 104 Both Hu Jintao and Xi Jinping Need to Maintain Social Stability.....Zhang Kai
106 The Truth of Li Wangyang ‘Being Suicided’ Is Partly Disclosed.....Jun Xing